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3

2008

当代 学林



◇ 郭英德

郭英德，1954年生于福建。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教授。兼任国家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等。曾任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访问教授、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2000年入选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曾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教学名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戏曲、中国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合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与参与国家与省级科研项目10余项。近年出版的论著有《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建构与反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思辨录》、《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神》等。一生以学术为生命，探索“问题—文献—历史—理论”四位一体、依次递进的研究范式，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术理念。

學術研究創刊五十周年



順潮學術開民主

蘇世文章起國魂

二零零八年夏陳永正書於京華



為學術樹一派
於論壇立口碑

祝賀華南師大建校五十周年
戊子初夏暨南大學周述卓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张国仪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陶原珂 雷比璐

学术研究

(1958 年创刊)

2008 年第 3 期 总第 280 期

出版日期：3 月 20 日

融会与超越

跨文化批判与当代汉语哲学

——晚期福柯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德] 何乏笔 5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中国转型的新阶段：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拐点

颜鹏飞 甘鸿鸣 14

哲 学

儒学与当代社会 【四篇】

国学与时代精神	李宗桂	21
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原因与影响	李维武	33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及儒学	陈卫平	39
20 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	景海峰	46

经济学 管理学

基于中国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构建	周 冰	53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变迁与秩序生成 ——近代以后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生成的考察	张 镛	61
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应用 ——2007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介	朱 琪 陈乐优	76

政 法 社会学

两难抉择与政府职能转变	李丹阳	83
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	蓝宇蕴	90
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助模式	杨 芳	96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hilaw@yahoo.com.cn
哲学 gzphl@yahoo.com.cn	历史 gzhist@yahoo.com.cn
经济 gzronger88@yahoo.com.cn	文学 gzliter@yahoo.com.cn

历史学

后现代思潮与史学史研究的反思【六篇】

后现代理论视域下的问题意识与史学史的重写	向燕南	101
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	赵世瑜	106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徐兆仁	109
后现代与史学史的新视角	张耕华	111
在后现代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价值	江湄	115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邓京力	119

文 学 语言学

文学教育研究【两篇】

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	郭英德	123
论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特色	谢雍君	131
詹安泰对常州派词学的继承与修正	曾大兴	138
试论《水明楼诗词》	张海鸥	145
经典与文艺学学科生机的反思	王 坤 蓝国桥	151

•学术动态•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综述	张荣芳	156
-------------------------	-----	-----

英文摘要

159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3, 2008

Cross-cultural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Philosophy: a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Researching the Late Michel Foucault	He Fabi (5)
The New Period of China's Transition: Another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Sustainable Reform	Yan Pengfei and Gan Hongming (14)
Four Essays on Confucianism and Current Society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Li Zonggui (21)
The Crux, Cause and Influence of the Resuming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Li Weiwu (33)
How Should We Popularize the Confucianism Today?	Chen Weiping (39)
On the Three Turns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20th Century	Jing Haifeng (46)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ransitional Economics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Zhou Bing (53)
The Economical Change and Order Genera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Zhang Lei (61)
The Mechanical Design Theory for Optimizing Resource Dispos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2007 Nobel Award for Economics	Zhu Qi and Chen Leyou (76)
Paradox in the Choice for Governmental Function Change	Li Danyang (83)
An Analysis on the Social Factors i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Village	Lan Yuyu (90)
On the Models of Surviving the Poor Population in Chinese Cities	Yang Fang (96)
Six Essays Reflected the Post-modernist Trend and the Historiography History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Re-writing the Historiography History in a View of Post-modernism	Xiang Yannan (101)
The Post-modernist Historiography: as a Passing Guest or a Sustained Echo	Zhao Shiyu (106)
Historiography Hermeneutics as a Probe to Break Out the Limit of Historiography	Xu Zhaoren (109)
A New View Angle in the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	Zhang Genghua (111)
A Review on the Thinking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under a Post-modern View	Jiang Mei (115)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and Global Vision as a Current Trend of Historiography History Studies	Deng Jingli (119)
Two Essays about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Educa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iterary Educa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Opera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o Yingde (123)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emale Emo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Oper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ie Yongjun (131)
Mr. Zhan Antai's Heritage and Revision of the Ci Poetry of Changzhou School	Zeng Daxing (138)
A Trial Talk about A Collection of the Poetry and Ci Poetry Written in the Shuiming Building'	Zhang Hai-ou (145)
A Reflection on the Classics and Vitality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 Discipline	Wang Kun and Lan Guoqiao (151)
The Main Points from the 6th Symposium on Ocean Culture Focuse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Xiangshan's Culture and Ocean Culture	Zhang Rongfang (156)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59)

融会与超越

跨文化批判与当代汉语哲学

——晚期福柯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德] 何乏笔

[摘要]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探索晚期福柯的研究在当代汉语哲学脉络下的特殊意义。面对兼具批判性与跨文化性的修养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作者由晚期福柯批判概念的两种向度出发（考古学向度与系谱学向度），来界定跨文化批判的运用范围。在批判的考古学向度方面，以区别比较哲学与跨文化哲学作为讨论的焦点。而有关系谱学方面的讨论所着重的问题则在于，跨文化研究如何摆脱己文化与异文化的比较逻辑，以及相关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询问：当代欧陆哲学的重要语言（如法语、德语）是否具备条件来发展批判性的跨文化哲学？此问题的重要性，若对比于当代汉语哲学的处境，便可初步阐明。

[关键词] 福柯 美学修养 跨文化哲学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B83-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05-09

一、批判性的修养哲学

修养与批判的关系当作“美学修养”的核心，乃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批判。美学修养一方面对比于传统的“精神修养”，亦即对比于一种作为单向度的向上活动的修养过程；另一方面又以“创意修养”及相关的越界美学为批判对象。对于美学修养概念的界定乃同时针对此两种单向追求批判：精神的升华与经验的强化。藉由相关分析思考美学修养在今日的发展条件，必须厘清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何在现代欧洲哲学的发展中，修养的领域及相关的工夫实践逐渐被排除在哲学领域之外；其二是当代欧陆哲学的哪些改变使得修养哲学的复兴成为可能（或说：从以“论述”为中心的哲学，转变为由论述与修养互动所构成的哲学）。

哲学作为大学学科（或学术理论）与哲学作为修养模式的关系问题，蕴含着强大的跨文化潜力。此潜力有待在西方与东方哲学的动态关系中充分展开，即“哲学”在今天是唯一能够充分面对认识知识与修养知识之关系问题的现代学科。^{[1](P5-27)}近几年有关哲学当作生活方式的讨论显示：当代哲学在欧洲仍然保存了有关论述与修养曾经构成哲学内部张力的记忆。^[2]如果说，哲学在欧洲不能化约为理论哲学，而且古希腊、罗马哲学本身，在大约一千年的历程中，是在一种修养典范的前提下得到发展的，这一点可以为“中国哲学”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启示。儒释道的哲学涵义与古代欧洲哲学史便显现出一种让人惊异的呼应关系。而某些中西哲学的刻板观念也因此被瓦解。

比较哲学的研究对历史资源的整理与探究有所贡献，但不足以面对修养知识在今天之可能性条件的问题，也无法展开修养实践的当代视野（如果修养不可能直接回归传统的精神修养模式，它还有哪些可能性）。在晚期福柯的著作中，一种批判性修养哲学的轮廓已经浮现。其中“批判”含有考古学与系谱

作者简介 [德] 何乏笔 (Fabiao Heubel)，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

学的双重方向。^① 此处，批判便置身于康德式先验分析与尼采式系谱学的张力之中。此情形乃意指修养哲学在方法反思上的历史厚度：其中对真理与主体之关系的历史分析，与一种基于生存美学的现代性态度互相交错。“批判”的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双重方向可与论述与修养的关系相呼应，因为在系谱学的面向上批判便包含产生修养的实践，而在批判的考古学面向上，同时得反省此一实践的历史条件。考古学与系谱学在方法上便产生呼应自我认识与自我修养所构成的复杂张力。当代修养哲学不得不面对此一张力。晚期福柯给予批判与修养的初步联系，在福柯研究的范围外也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如何开展跨文化修养哲学的问题：由此福柯对欧洲古代的着重便显得是一种不必要的自我窄化。

在 1970 年代，福柯的方法论反思由考古学往系谱学移动。同时“实践”的问题成为他哲学工作的核心；但他所关注的实践并非革命式的大实践，而是诸种权力的实践（技术），以及诸种自我的实践（技术）。系谱学的批判在福柯如同在尼采一般，是针对一种“在实践中且透过诸实践（Praktiken）所构成的自我”。^② (P295) 于是，此一批判的可能性与自我在实践上的转化是不可分的。在系谱学的转向之后，考古学的概念似乎失去关键意义，但并非全然消失。在《快感的使用》（《性史》第 2 卷）的导论中，尤其在《何谓启蒙？》，福柯透过批判的概念，开辟了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新关联。相关的说明如下：

这种批判就不是先验的，其目的也不在于使形上学成为可能：它在其合目的性上是系谱学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它是考古学的（而非先验的），因为不是要试着抽出一切知识、一切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反而将那些呈现我们所思、所言、所作的诸论述，同样当作历史事件来对待。这种批判是系谱学的，因为不将从我们的存在形式推断出我们所不可作或不可知者，反而从致使我们这个存在的偶然性抽出不再是、不再作或不再思我们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性。^③ (P574; P315-316)

“我们自身的批判本体论”在考古学方面要分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历史性界限”，而在系谱学方面则要“印证这些界限的可能跨越”。^④ (P577) (英 P319) 在笔者看来，这种双向度的批判概念可视为批判哲学极为反省性的表达。其中，哲学作为论述与哲学作为修养以一种动态的，而且似乎是不可能的平衡而被连接：就当代跨文化哲学的发展而言，康德哲学论述的激进批判性与尼采哲学生命的激进批判性，便具有典范意义。此另类关系逐成为可能，因为福柯对康德与尼采分别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给予康德有关真理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提问以一种历史性的转折，因而展开“真理的历史”作为研究场域（由福柯所谓“历史先天”的说法来看，考古学与先验论的对比指涉着康德式先验哲学的普遍主义方向，但考古学却可视为一种历史/先验的进路）。就康德和福柯而言，批判都牵涉到对于界限的分析和反省：对康德而言，关键在于知道应该放弃将跨越哪一些界限；福柯的考古学分析反而为了界限的“可能跨越”进行预备工作。不过，福柯的批判概念的确也承认某种必然的限制：

应当放弃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可达到一种视点，而由此则能够获得关于可能构成我们历史界限的完全且明确的认识。由此观之，我们与这些界限及其可能的跨越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本身往往是有限度的、特定的而且必须一再重来。^⑤ (P575) (英 P316-317)

在此一脉络下，福柯所提及的“哲学风骨”（ethos philosophique）理论涉及经验和实践方面的复杂关系。这种风骨的产生依靠无止境的练习过程，因而只能透过工夫修养的转化工作才能达成。这就可以理解，福柯是如何跨出尼采对工夫理念的系谱学批判：针对基督工夫（ascèse chrétienne）及其否定生命倾向的批判，被转移到自我实践的系谱学。其中，美学工夫的实践便意味着一种批判性自由实践的可能性。因此，哲学生命的面向从权力意志及超人的狂妄自大中转向为一种与在当下可实现的，且具有局限性和地方性的自由可能。

^① 此处无法详细讨论考古学与系谱学在福柯理论发展中的关系。就晚期福柯而言，《何谓启蒙？》一文在批判、考古学和系谱学方面提供最成熟的反思，由此本文的相关讨论以《何谓启蒙？》（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为主要参考依据。

二、考古学与“我们的现代性”

欧洲所引发的现代性在19世纪后，逐渐扩展到整个世界。然而，“西方”所迫使的“东方”现代性，已经在许多方面对现代化的原先推动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此影响主要出现在经济的领域中）。因此，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我们”对现代性的分析不再局限于欧美世界，更必须跨出欧美的范围，且朝向跨文化分析而发展。藉此才能使当代的问题反应在哲学的反思之中。问题在于：就哲学而言，其它文化圈的历史资源（如同中国的历史）对反省现代性如何可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倘若现代化已使整个人类成为内在性的关系网络，对“我们现代性”及其界限的历史分析，则要能够以同样的正当性连接到欧洲的或中国的历史资源。这乃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一种“异质空间”，不再是外在（于西方）的现代性，反而是内在（于全球）的现代性。就福柯的考古学而言，此乃构成思想的界限：思想的“不可能性”。在《词与物》的前言中，“中国”仅是以一种当作笑料的虚构“异质空间”（hétérotopie）而出现。福柯一生致力于思考西方世界及其理性的界限，他从未想过，“中国”的知识对进行“我们现代性”的考古学分析可能有任何意义。

由现代中国学者的角度观之，“西方”绝不可能仅当作“方法上的措施”、产生理论效果的“域外”（dehors）。^①此乃因“西方”透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强烈冲击“中国传统”，而“西方”更是成为现代中国的组成部分。“跨文化性”因而已成为当代汉语哲学的关键要素。于连（François Jullien）将中国视为“域外”或“外部性”（extériorité）是针对前现代的中国，亦即中国与欧洲在历史和语言上互相陌视而独自发展的那一长久时段。^②(PP32-35,85)此一策略性的研究首先着重历史的“本源”，而强调“我们”（欧洲人、西方人）在“我们原先框架”中的根源。就于连来说，确定中国的外部性极为“简单”，因为它不属于“我们”所成长及所置身的情境。但此观点看似过于简单，从而引起为何于连要应用福柯的“异质拓朴学”来加以说明的质疑。一旦于连进一步尝试以建构式的方式修正这一看似文化本质主义的立场，此关联的理由便逐渐明朗：他将在“比较研究的工地”上的工作视为一种“他性的建构”（construction de l’altérité）。^③(P86)藉由此一工作，那一原先被预设的“我们”便是解构的对象。于是，将中国视为“异质空间”与一种由域外所进行的解构（déconstruction du dehors）互相交错。^④就比较哲学的方法论反思而言，这种由地理和历史赋予的外部性与他性建构的双重进路的确是目前最为前卫的立场之一。

对于连将中国视为异质空间的质疑，乃其针对从历史的“互相漠然的状态”（in-différence mutuelle）到建构当代差异的理论过渡。让人感到奇异的是，一旦从欧洲与中国间的异质空间的关系，过渡到中国思想对当代欧洲哲学的重要性时，他对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却视若无睹。在于连有关当代哲学的理解中，当代汉语哲学显然缺席：它在欧洲等于“哲学”，于中国等于“智慧”的差异架构中被遗漏。因此，在建构式的比较工作中所展开的“共同质问”，^⑤(P44,87)便只有在欧洲当代哲学的框架中才有意义。于连无法思考法语当代哲学与汉语当代哲学面对的共同问题，并且产生动态互动的可能性。他无法思考中国哲学的现代性。若要跨越此一思考界限则必须更彻底地体认到，就中国而言，在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漠然状态”至迟自19世纪中叶后，便被一种对欧洲（西方）知识以及西方哲学的、带有危机意识的强烈兴趣所取代。“中国”因为“域外”的强烈冲击，而向“西方”学习已100多年，但在19、20世纪所产生的知识/权力局势之中，学习的方向大体上是单向的（举例来说：几乎所有欧洲哲学的经典著作已译成汉语；相较之下，单是汉语的康德研究在数量上已超过欧洲历来对中国思想的所有研究）。

在此情况下，跨文化哲学的某种看似吊诡的机会出现：这正因为汉语的当代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

^①Jullien, “De la Grèce à la Chine, aller-retour”, in: Le Débat, no.116, septembre-octobre 2001, p.136; 论文改版的中译本可参阅：林志明译（由希腊绕道中国，往而复返：基本主张》，收录于林志明、Zbigniew Wesołowski 编《舆言曲而中：汉学作为对西方的新诠释——法国的贡献》，台北县新庄市：辅仁，2005年，第71-87页。

过西方知识的挑战，而西方思想同时也逐渐摆脱了古希腊/基督教的形上学框架，并向后形上学思想而发展(尤其在当代法国思想中，此倾向以“力量哲学”的兴盛而显现)。就当代哲学而言，这就意味着一种崭新跨文化呼应的萌生。由此观之，文化间的“差异建构”可放在共同问题的跨文化建构中来加以定位(这些问题来自现代的共同内在性)。由当下的特定问题出发，考古学的历史分析同时可进入中国的和欧洲的资源，以凸显现有状况之必然性的限制。就跨文化的知识考古学而言，中国和欧洲同样都是“域外”，而成为域外思想的来源，以及当代界限经验的可能性条件。藉此“我们现代性”的另类批判成为可能。

一旦将晚期福柯理解为一种批判性修养哲学的先驱，则与当代汉语哲学的一种互动模式便可建立。此处无法就此作详细说明，只能以福柯和牟宗三的关系为例，来粗略描绘跨文化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简而言之，牟宗三试图以现代性的尺度来重构“中国哲学”。他以康德为现代哲学的主要代表，且通过对康德的批判性分析，而为中国哲学的修养典范及其所包含的工夫实践作辩护。吊诡的是，他以彻底理论化的方式使当代儒学成为学院哲学的组成部分，藉此拯救在20世纪已失去制度根底的儒家精神：他以理论化的方式为中国式的实践哲学辩护。因此，在当代儒学之中，现代修养哲学之可能性条件成为了急迫的问题。牟宗三要透过宋明儒学的历史资源，来分析康德在认识上所建立的界限，以凸显此一界限并非普遍的和必然的，反而是特异的和偶然的。在此意义下，他在进行一种考古学的问题化。在康德式“界限哲学”的框架之内，且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康德之解释的启发后，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关系问题成为他的核心关注。他所坚持的形上学方向使他能够在一个庞大的哲学系统中，连接儒学传统与现代西方哲学。但他终究只能提出一种实践哲学的理论，以召唤传统工夫实践的当代意义。^{[1] (P79-102)}直到今日，此困难导致了当代儒学的僵化倾向(这方面与日本京都学派的发展有所相似)。

牟宗三受到了现代哲学主流模式的阻碍(哲学的论述性与系统性)：理论发展一方面从传统的修养实践获得丰富的灵感和启发，但另一方面，这些实践在现代学院哲学之中又难以获得承认。牟宗三所面临的是哲学论述与哲学生命之间的张力。他因此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现代的“哲学家”。在此意义下，牟宗三与晚期福柯所面临的问题在结构上的相似性，便是进入当代跨文化哲学之动态场域的方向。就现代理论哲学的批判反思与修养实践在今天如何可能的探索而言，这两种方向便可产生相互批判的动态关系：以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可凸显牟宗三在修养论与现代性关系方面的盲点；以牟宗三的跨文化运作可走出福柯封闭于欧洲哲学范围内的倾向。

三、系谱学与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

就批判的考古学角度而言，美学修养如何可能的问题，便从论述性哲学的界限出发，而透过其历史性的探索，来凸显这种哲学模式的非必然性。系谱学的角度则涉及修养哲学在实践层面上的探讨：分析某些实践(尤其牵涉道德规范或伦理学实践)在历史资料中的痕迹，来确定当下的另类可能性。系谱学意味着历史与当下的独特呼应。以福柯的权力系谱学分析18、19世纪的规范化实践，来反思当下的政治抵抗的方向；自我实践(自我技术)的系谱学则透过古希腊、罗马与当下的呼应关系，来凸显美学修养的当代可能性。为此则进行双方面的系谱学式的批判：其一方面是针对基督教主要自我技术如告白、忏悔等，另一方面则针对古代自我技术对精神性的偏重。如此修养的美学转化才成为可能。就批判性的修养哲学而言，福柯的实践系谱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问题是：从一个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否试着以中国的古代取代希腊的古代、以中国的历史资源取代欧洲的历史资源，来进行“我们现代性”的跨文化系谱学？为了说明这一可能性，则必须厘清系谱学与比较研究在方法上的关键区别：比较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预设己文化与异文化的区分，以及存在回归到己文化之本源的“自然”倾向。但哲学系谱学却以“本源”(Ursprung)与“来源”(Herkunft)的区分来摆脱比较哲学的本质主义倾向。

福柯在《尼采、系谱学、历史》一文中特别强调此区分。^{[10] (PP137-138)}在尼采的著作中，此区分或许并

非如同福柯所陈述的那么明确。但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式的系谱学研究并非要回溯现有状况的本源，反而要透过现代理想之低俗来源的暴露，来冲击当下的僵化价值。藉此，原来与系谱学一词相关的血统观念及民族中心主义的方向被瓦解：哲学分析的出发点从对本源的寻求转到对当代问题性的着重。探索这些问题时，则不必提供历史连续性的重构，系谱学反而允许历史分析的非连续性和跳跃性。

比较研究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因为比较研究无法脱离己者与异己的逻辑及相关“理解”的诠释。就此，比较哲学是否以文化的相似性或文化的对比性为焦点是次要的：两种方式都无法充分响应跨文化哲学的动态发展。不过，难以否认的是，己者与异己的逻辑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几乎是一种“自然”的模式，因而当作比较研究的稳定基础。倘若自尼采以来，系谱学可视为一种非诠释学的研究进路，这并非意味着系谱学从一开始就能够摆脱己者与异己的对比。回顾系谱学在尼采著作中的发展反而显示，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原先被国族文化的观念所强力引导，而在发展过程中才逐渐走出了国族主义的阴影。据此可推论，哲学系谱学的发展隐藏着跨文化扩展的潜力，而有可能走出以国族或区域的方式被界定的文化圈及其比较的模式。

在尼采的著作中，对历史当下的系谱学研究已经由本土（德意志）文化系谱学发展到欧洲文化的跨文化系谱学（走出欧洲内部各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文化）。尼采的研究虽然仍未走出欧洲的范围，但在系谱学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中，跨文化的潜力便呈现。哲学系谱学在《悲剧的诞生》及《不合时宜的考察》萌生时，仍是以德意志本土文化为情感依据，但尼采在此所碰触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明古代希腊与当下德国的奇特呼应及其历史必然性。换言之：历史与当下的非连续性关系如何能够产生必然的历史组构（historische Konstellation）？尼采指出：

基督教（……）的影响减退之后，希腊文化的势力才又逐渐增强。我们体验一些使我们感到陌生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是跨过巨大的时空，来连接到希腊的模拟，这些现象将是无解地漂浮在空中。在康德和伊利亚学派、叔本华和恩培多克勒、埃斯库勒斯和瓦格纳之间有着如此的相近和亲合，直接让人想起所有时间概念极为相对的性质：有某些事物休戚相关，而时间似乎仅是一团云雾，使得眼睛难以看见相关性。^{[11](P446;P697)}

古希腊与当代德国的此一呼应关系，不可能以历史的本源及历史连续性来加以说明，因为必须跳过的是古希腊文化被基督教所掩盖的漫长时段。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在古代希腊与19世纪德国的当下之间能够填满所有的历史空缺，而指出完整且连续的系谱，仍无法解释当下的某一特定情境与古代的某一特定情境如何可能跳越历史间距而产生呼应关系。在尼采看来，这种呼应的产生乃展现德意志文化及德意志精神的“造形力量”（plastische Kraft）。^{[12](P251)}他显然认为，文化的造形力量与探索非连续性的历史来源是密切相关的。反之，以历史连续性为基础的历史研究乃是“原创性德意志文化”的障碍。^{[12](P164)}因此，历史过去的解释必须从当下最强的力量而出发（aus der höchsten Kraft der Gegenwart）。^{[12](P293)}尼采所关注的问题是：历史与生命将要产生哪一种关系，以使富有创造性的文化成为可能。

尼采有关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的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或许是尼采所出版的著作中最微不足道的作品。但从中可体会到后来的《论历史对生命的利弊》以痛心关怀“德意志文化”和“德意志精神”为背景。另一方面，自从《悲剧的诞生》（从瓦格纳回到希腊悲剧之双重起源的解释，因而产生古代与当代性的紧密呼应）系谱学式的分析已深刻怀疑民族主义的威力：尼采所恐惧的是，德意志精神将被德意志帝国所消解，^{[12](P160)}但同时，他却以某种绝望的激情要维护“文化德国”，而渴望独特德意志文化的来临。在此背景下则能理解，有关历史问题的第二篇考察为何不再仅是提出对“巨大危险”^{[12](P159)}的消极警告（1871年普鲁士战胜所包含的危险），而更积极地要透过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来发展“具生产力和风格的文化”。《悲剧的诞生》可视为系谱学的实验场，因为此书已清楚地连接当下危险的批判性诊断与另类实践的探究。尼采对于德国文化发展的失望终究使他放弃任何对于德意志精神的期许，而将使思想的批判力量开始瞄准基督教及欧洲的后基督教未来。^{[13](PP358-364)}无论哪一个时期，他都一贯呼吁历

史与生命、古代与当下之间的系谱学关系。虽然他在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完成后，越来越愤怒地表达对德国及德国人的失望与轻视，但仍无法摆脱被民族主义之恶劣势力所收编的命运。尼采以《道德系谱学》为代表的晚期的系谱学观念在这方面也并非例外，因为从基督教的批判连接到聚讼不休的“权力意志”。

福柯对于系谱学的转化或隐或显面对尼采系谱学的民族主义危机。他进一步开展《道德系谱学》的欧洲视野，往西方特定现代问题的系谱学发展。其中系谱学也避免历史过去的理想化，而以问题的相似性来促使过去与当下的历史组构。问题性乃是由当下危险与另类实践的动态关系所构成。在此，尼采与晚期福柯在系谱学运用上的亲和力便显而易见，因为在福柯来看，希腊、罗马的古代与现代性的关系也是由当下危险而界定的。^{[14](P386;P255-256)} 两场世界大战以后，他显然比尼采更能够反省（西方）现代性的界限，而深化系谱学的后民族主义方向。但他的跨文化系谱学也是在西方内部所进行的（以法国文化、德国文化、美国文化为主），而几乎未触及到非西方文化的领域。问题是：当代欧陆哲学的重要语言（如法语、德语）是否预备足够的条件，来跨出西方的范围而发展一种批判性的跨文化哲学？若以当代汉语哲学相比，此问题或许更好理解。

四、当代汉语哲学的独特潜力

经过上文的讨论，“跨文化哲学”(transcultural philosophy)的进路已初步脱离“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亦即跨出中/西或己文化/异文化的思想框架。笔者将“汉语”理解为一种可突破文化对比层次的媒介。由“当代汉语哲学”的观念出发，“汉字”做为书写媒介，将自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非沟通状态提供出路。“哲学”在现有汉语学术圈中的制度化，暂时足以构成两者在当代哲学脉络下的互动管道。而且，在当代汉语的领域中，西方哲学经过100多年来的被接受与转化已渗透到日常用语中。换言之，若从“哲学”在当今世界的现实出发（而非从哲学的“本源”），以汉语所进行的“哲学”当然是存在的。如同在西方一样，作为传统知识与现代知识之间的重要连接，“哲学”自从成为现代学科之后，不断地逼迫传统的知识和实践体制面对现代性的问题。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视为“智慧”而非“哲学”，视为“域外”而非“我们内在世界”的一部分，便会将之排除在现代性之外。

面对哲学在中国的现实存在，具有两种主要的回应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指控西方知识的暴力侵入，而试图重新回归到西方影响之前的“中国哲学”，甚至因为“中国哲学”不被西方哲学界承认的正当性危机，而放弃将某些历史中的知识内容与实践方式归类为“哲学”。另一种则在于将此现实存在看成开启多样发展方向的实验场域。然而必须留意的是，在欧洲哲学界对于非欧洲文化的思想史往往连最基本的认识都有所欠缺，正因如此，截至目前这类关于后者的回应方式的选项仍有所缺如。从另一角度来看，西方知识以强势方式进入东亚，在今天看来已转换为极其宝贵的优势，成为跨文化哲学的丰富资源：西方哲学文本的翻译、解释和转化，以及对于中国文本的哲学研究，便共存于相同的哲学平台。只要将两者理解为当代汉语哲学的不同面向，一种另类的发展空间便得以展开。

汉语学者已开始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创造性的转化。然而，就长期的发展来说，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对于哲学的认知不再能忽视“哲学”在汉语领域中所发生的转变。福柯曾经指出，“西方思想的危机等于是帝国主义的终止”。假如在“西方哲学的终止”后会出现一种“未来的哲学”，而且它将会在欧洲之外，或是透过欧洲与非欧洲的相遇和碰撞而产生，^{[15](P618-624;P110-114)} 那么在此一转变中当代汉语哲学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所构成的呼应关系很可能将会扮演重要角色。

就跨文化哲学与当代汉语哲学的关系而言，应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在此，笔者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的线索。跨文化哲学显然只有在特殊的语言中才有可能，而在特殊的语言中，特定的跨文化问题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充分的呈现。在此，所谓“跨文化”不应该局限于跨出范围极广的“文化圈”（如欧洲、美国、东亚等），而应包含跨越语言界限的“跨语言哲学”，其中的关键在于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

翻译关系。在笔者看来，欧洲语言的内部关系，以及欧洲语言与东亚语言之间的关系，不应被视为不同类型的关系；差别仅在于关系在历史中的长短及积累程度。两者就长期的历史发展而言，显然是相对的，而且不断地在改变（就此可参考德语哲学与法语哲学的关系在过去100年间所经历的演变）。对古典德国哲学的形成而言，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与法文的组构模式是决定性的要素。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德语曾经是一种“跨语言的语言”（或跨文化的语言），而以德语的特殊性能够呈现跨文化问题（亦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问题）。到了20世纪的后半段德语大体上失去了跨语言的实验精神，法语反而成为一种跨语言的场域，透过与德语哲学或隐或显的吸收和创造性转化，而展开当代法国思想。笔者揣想，当代汉语与东西方的主要语言（如日语、英语、德语、法语）早已产生复杂的翻译关系，也因此积累了跨文化哲学的潜力。

就笔者粗略观察来看，汉语哲学的跨文化潜力特别丰富，因为现代汉语一方面在西方知识的强力冲击下经历激进的转变，但同时，现代白话文又与古典汉语（文言文）的历史资源保持了联系。现代汉语不仅与中国历史资源的关系未全然切断，同时也与在前民族主义时代属汉字文化圈之区域（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文献维持联系。这些国家一旦将在其文化之内部所存在的汉字视为要排除的异物，或至少将之视为“已者”中的“他者”，则会造成与“自己”部分历史的断裂。文化本质主义及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经常分辨己者与他者，因此难以承认文化多样性和混杂性的现实，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分裂症。作为一种哲学语言，汉语经过现代化的冲击和挑战而自立自强。不过，抽象地呼唤汉语哲学的跨文化潜力是毫无意义的。此潜力必须在哲学工作之中被证实，并且必须面临当代哲学最严峻的考验。其中的重要挑战是，将哲学一再重新对自身所进行的界定活动，理解为一种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此意义下，当代欧洲哲学与当代汉语哲学的互动在汉语范围内的建立（目前汉语已具备了条件，来进入一种欧洲语言到目前为止所拒绝的互动），便意味着，汉语哲学可进行“我们”共同现代性相关的跨文化分析。若将西方哲学在现代汉语中的翻译视为当代汉语哲学当然成分，“当代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异便显现：当代汉语哲学与建立中国的国族哲学有所区别，因而具有批判性的含意。^①

五、福柯研究与美学修养的概念

现代欧洲哲学在启蒙的脉络下所养成的“批判风骨”，迫使哲学一方面给予当下一种高度的关注，就提出了并分析“我们”当下的历史先天，但另一方面也要求不被当下所捆绑，反而要透过批判性的实践来跨越当下的历史界限。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福柯所谓“我们自身的批判本体论”所需要的批判态度本身，是否也需要经过“修养”来成为可能？此问题一旦出现，修养与批判的关系问题便凸显。能否设想一种自我修养的可能：其目的在于增强对启蒙的坚持与对启蒙的批判之间的张力，并视之为应养成的“现代性态度”？

从既是批判又是跨文化的修养哲学观之，将福柯的著作根据“真理的哲学”（其围绕着真理与主体的关系）及其三发展阶段来加以解释的方向，可凸显相关的跨文化意义。^{[16](P11-25)}此一解释顺着晚期福柯自己所进行的尝试，以知识、权力和伦理之三轴线的区别，来赋予自己理论发展某种“融贯性”。福柯式真理哲学的三轴线如何可能当作批判性修养哲学的三种分析途径？必须留意的是，福柯三轴线说与康德三大批判所产生的相应关系：以分析“真知识”的历史构形取代康德的认识理论；以分析真理的历史政治取代康德的道德哲学，其中的焦点在于知识结构与权力技术的关联如何产生规范化（正常化）的效果

^①由此观之，为“中国哲学”而提出辩护的诠释学进路难以摆脱民族主义的哲学模式，尽管此一模式仅是以己者/异者之区别继续产生作用。笔者并非要否认诠释学与中国哲学之关系的重要性和益处，但要强调的是，诠释学与批判理论的思路在方法上是不同的（可联想到的是哈贝马斯或福柯对诠释学所提出的批判）。批判理论进入跨文化研究的领域时，难免与诠释学拉开批判距离而呈现。虽然跨文化批判与比较诠释学或许可产生互补关系，但诠释学与批判的关系不应该给予过于和谐的构想。如果在古典文献学与哲学诠释学之中已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张力，诠释学与批判之间也应当如此。

果；以一种生存美学式的伦理学取代康德的美学理论，其中自律的主体构成（自我创造）、界限态度的风骨与说真话的勇气（*parrhesia*）互相交错。每一种批判角度有助于阐明当代修养论的批判意涵。

（一）由历史先天的知识分析，可提出修养哲学在今日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在现代知识结构中，哪一些变化促使对哲学之界定的移动，使得对哲学的理解能够摆脱理论系统或学院的制约，进而将科学与修养之间的张力甚至冲突，理解为哲学发展的动态力量？福柯的考古学阶段以及对理性及主体的批判冲动所触及的问题是：自我修养的观念所预设的主体，或说在修养过程中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所构成的主体究竟是哪一种主体？批判哲学彻底质疑以理性主体为主宰单位的修养模式，因而，那一从精神习炼与精神进步之关联所出发的传统修养观念便瓦解。^{[17][P21]} 福柯对理性主体的批判深受启发于身体哲学以及现代艺术的美学经验。美学修养的观念由此萌生，进而哪一种主体模式符合这种修养模式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此处权力分析的角度开始产生作用。如果符合美学修养的主体模式是一种“能量主体”（其非单向度地偏向理性—精神的一边或身体—物质的另一边，反而进入两者的一种平等的颤栗关系），则相关的问题是：哪些“力量关系”和权力技术形构此一主体？

（二）所有的修养实践基于某种被看成真理的知识：此知识被看成是真理，但同时作为在历史中所产生的，而且可改变的知识。知识伴随着实践或引导特殊的自我转化，因而修养显得与权力技术息息相关。修养在自我对自我的工夫中被具体化，而此工作乃针对自己的既是要被控制又是要被增强的生命力量（修养的双重意义包含修治与养生）。较主动和自律意义上的修养开始之前，某些知识—权力的“装置”透过教育，而使主体习惯或强迫主体接受某种能量的体制。权力技术或所谓“生命的政治技术”在此触及现代创造力的观念（其也被视为既是要被控制又是要被增强的力量）。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创造力与生命力量的治理两者间的关系是否已变成为一种“生命美学”的装置，而以自我创造为核心的自我修养观念，是否已被此一装置收编到一种引起自我创造失去抵抗和自由之可能性的程度？由此则能连接到伦理的角度及其与美学的关系。

（三）一种由能量主体所出发的美学修养含有何种伦理意涵？福柯所提及的生存美学从尼采所开展的自由空间出发，但生存美学的困难在于无法充分说明美学与自我技术之关系的当代意涵。这是因为，现代美学在走出基督教之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切断了修养与艺术的关连。因此，一种既是美学的又是批判的修养观，遭遇相当严重的历史障碍。晚期福柯连接美学与工夫论，已然明显跨出尼采哲学在生活艺术与工夫主义之间所划出的分割线。但顺随现代美学的主要动力，福柯以“界限态度”作为美学与工夫论的当代交接。他透过波特莱尔式的美学观，来开拓“创意工夫”的可能性，但此方向却也代表着福柯晚期哲学在美学修养上的局限。面对此一特定的问题时，中国文人美学可提供另类的历史资源，与中国文人文化相比较，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欧洲文化反显得贫乏。

福柯以生存美学的名义所展开的新修养模式，似乎被夹住在两种极端选择之间：一方面清楚地承认回归到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精神修养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将主体性的概念（笔者将主体性理解为主体化与去主体化的动态关系）从越界美学的单向逻辑中解放出来。福柯无法摆脱“越界创造性”（*transgressive creativity*）的模式。问题是，美学修养如何摆脱界限态度的强制性，而同时又要避免重新陷入精神修养的传统模式？由当代欧洲哲学跃进中国哲学与文人美学的领域，的确也包含界限态度的介入，但同时要进行的就是此一态度的反省与转化。相关的研究工作则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透过中国文人美学的资源来批评一种单向度地着重越界的界限经验；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深刻探究福柯式美学修养的强处，以界限经验的概念突破中国哲学及美学研究的某些刻板观念。

此处，将“平淡”发展成当代哲学的概念，则将之纳入批判性修养哲学的可能性便涌现。^① 平淡若

^①有关“平淡”在中国思想和美学中的介绍可参阅 François Jullien, *Eloge de la fadeur, A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 Paris: É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1991 (中译本：于连 (François Jullien):《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台北市：桂冠，2006年)。

被视为界限经验，并且以作为界限经验的越界为对比，则在既是批判又是美学的修养观中，可获得精确的作用。由美学修养与中国文人文化在实践的系谱学向度上所产生的连接，可回到福柯与牟宗三在知识考古学向度上的关系，进而发现这两种线索之间的共同焦点：界限哲学的主题。在此，涉及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关系的本体论问题，与涉及越界与平淡之关系的美学问题便相遇。跨文化批判在方法上的双重方向（即历史先验与实践系谱的双重方向），在此意味着对美学修养之可能性的历史反思，同时也在展开修养实践的另类可能。

[参考文献]

- [1] 何乏笔. 修养与批判: 福柯《庄子诠释学》初探 [J].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15 卷), 2005, (3).
- [2] Pierre Hadot, 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tudes Augustiniennes, 1987;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5.
- [3] Martin Saar, Genealogie als Kr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ubjekts nach Nietzsche und Foucault,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7.
- [4]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in: Dits et écrits, Paris: Gallimard, 1994, vol.IV (no.339); 英译: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I,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ondon, Penguin: 2000.
- [5] Foucault,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 [6] François Jullien, Thierry Marchaisse, Penser d'un dehors (La Chine), Entretiens d' Extrême-Orient, Paris: Seuil, 2000.
- [7] Jullien, 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 Paris: Seuil, 2007.
- [9] 何乏笔. 何为“兼体无累”的工夫——论牟宗三与创造性的问题化 [A]. 杨儒宾、祝平次编. 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 [C]. 台北: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5.
- [10]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histoire", in: Dits et écrits, vol. II (no.84).
- [11] Friedrich Nietzsch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尼采全集之批判研究版本, 缩写 KSA),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München: DTV/de Gruyter, 1988, vol. 1 (以下简称 KSA 加册数, 如 KSA 1); 另可参阅 Walter Benjamin,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herausgegeben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vol. 1.2.
- [12] Nietzsche, KSA 1.
- [13] Nietzsche, Ecce homo, KSA 6.
- [14]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vol.IV (no.326) : "À propos de la généalogie de l'éthique: un aperçu de travail en cours"; 英文原文收录于: 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 volume I,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London, Penguin: 2000.
- [15]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vol.III (no.236) : "Michel Foucault et le zen: un séjour dans un temple zen"; 英译本: "Michel Foucault and Zen: a stay in a Zen temple", translated by Richard Townsend, in: Religion and Culture/Michel Foucault, selected and edited by Jeremy R. Carrett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16] Frédéric Gros, "Michel Foucault, une philosophie de la vérité", in: Michel Foucault, Philosophie, Anthologie établie et présentée par Arnold I. Davidson et Frédéric Gros.
- [17] Pierre Hadot, 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

责任编辑: 雨田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中国转型的新阶段：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拐点

颜鹏飞 甘鸿鸣

[摘要] 世界各国自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降，凸现出合作、和平、发展以及变革、调整和转型的时代特征。中国现正处于具有双元化特征的社会转型期，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什么是市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是政府，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正位于一个重大的转折临界点，涉及到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机制、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这四大新拐点跨越之日就是可持续改革开放腾飞之时。

[关键词] 可持续 改革开放 新拐点

(中图分类号) F12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14-07

自上个世纪中叶迄今，世界各国处于不断地变革、调整和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中国现已进入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全面小康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具有双元化特征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位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并日益呈现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机制和新特征。

一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社会经济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它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历史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遵循“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李嘉图定律的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与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劳动群众的利益相矛盾并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而库兹涅茨所谓的倒“U”型曲线规律把这一定律模型化。美国资本主义“镀金时代”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完成了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但社会动荡伴随其中。为构建所谓“伟大时代”而着重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和“库兹涅茨假说”阴影，西方发达国家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作了局部改变、调整和变革，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展了“国有化”运动和“福利国家”运动；而在“漫长的 60 年代”(Long Sixty)，又大都经历了以更多地注重平等及贫困为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和调整，实现了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的平稳过渡；这无疑是对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所奉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原则”的重大修正。以至于在西方世界范围内形成了

作者简介 颜鹏飞，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甘鸿鸣，武汉大学博士生（湖北 武汉，430072）。

一股从对立和冷战思维趋向于合作、和平和发展的思潮。举其大要，这些变革的理念、政策和措施主要包括：

- (1) 发展生产力和全球化扩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2) 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扩张使社会结构呈橄榄状，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
- (3) 重视 NGO 和慈善事业。NGO 和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
- (4) 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工会立法、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 20 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以及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
- (5) 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
- (6) 西方国家尤其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

美国为此耗费了近一个世纪，而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自诩“一亿中流”的“均质社会”），韩国大约 1/4 世纪，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但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跳不出“李嘉图定律”的怪圈。中国正处在从人均 GDP 大约 1000-3000 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既是经济的加快发展期，又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和非和谐期。西方国家的和谐思潮及其缓解社会矛盾因素的若干举措，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狂飙突进，凸显实践、创新和借鉴以及不断“试错”、反思、争论和“纠错”的重要历史时期。一般而言，处于从人均 GDP 大约 1000-3000 美元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呈现两元化特征，即它既是经济的加快发展机遇期，又是各种矛盾凸显期和非和谐期。这已为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所证实，甚至被称为“狄更斯悖论”或“双城记情结”。但是，“李嘉图定律”和“库兹涅茨假说”的阴影正在中国游荡。^①但是，改革开放这一大方向和基本国策是不能动摇的，而在实践推进的各个具体阶段上，都有一个正确认识“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什么是市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是政府，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及不断解决“改革什么、怎么改；开放什么、怎么开放”的问题，并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动向具体调整政策导向。应该强调指出，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正位于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并日益呈现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机制和新特征。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应该转向有选择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应有选择地程度不一地退出纯市场化改革）、配套的（辅之以宏观调控、微观规制和中观层次区域协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干预和法律支撑体

^① 中国改革已经从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从保持比较优势（如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到追求竞争优势，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体制外渐进式改革跨入体制内激进式改革，以及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深层次矛盾尤其分配问题凸现，从而使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这就需要在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解决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而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生产问题十分突出。“在这 25 年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 2.0%。”（朱庆芳：《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见冷溶主编，夏春涛副主编：《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6-72 页）有统计表明，中国 10% 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 40% 以上，而 10% 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只占总额的不到 2%。基尼系数超过搞“休克疗法”的俄罗斯，超过 0.45。此外，2002-2005 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 3.3 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 4.6 个百分点。

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并且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市场导向的改革。

第二，应该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阶段。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借鉴、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我们必须创造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知识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样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第三，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制造业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应逐步转换到以技术创新驱动、生产效益提高和内需拉动为主的，并且又好又快的发展模式上来。

第四，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战略转型问题。从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已到达向纵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点，从增量改革、循序渐进、单点突进转向存量改革、全面推进和综合改革，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改革转向旨在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和谐社会建设的多元化综合改革。这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走进改善民生、更加关注公平的新阶段。

四大历史拐点转折之日就是可持续改革开放腾飞之时。

三

不可否认，对于传统体制的破坏和新体制的构建，大规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改革扮演了“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语)的角色。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制度能量的扩展，市场缺陷也在放大，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中国不能走完全市场化或泛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道路，而是要着力打造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模式。尤应审时度势，全面准确地界定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和政府干预机制各自的边界和作用范围。市场和政府都要各得其所，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缺位”、“错位”和“越位”。大力预防和纠正诱发市场缺陷的“泛市场化”以及导致政府缺陷的“泛行政化”倾向，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政府的调控、协调和公共服务职能。否则，就会产生市场发育不足和政府治理不足双交织的坏的市场经济，甚至转向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双凸现的权贵市场经济。要破与“泛市场化”或“市场决定论”相关的理论误区。

第一个误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领域也应该搞市场化改革。

一般而言，社会产品可划分为三大类，即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包括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科学教研等)和准公共产品(包括高等教育、文化卫生、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事业)。其中私人产品市场能有效提供。而公共产品则不能通过市场有效提供，必须由政府通过税收和公共财政来提供。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涉及住、行、信息对称、司法公正、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尤其是医疗保险、^①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都属于广义的公共品范畴。而完全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关系民生和公共利益的公共品的支出，一般达到GDP的30%，这也是对20世纪下半期各国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和总结，并在《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中所制定的各签约国需遵守的底线。

例如，房屋既是商品、投资品；又具有资源非常稀缺、高度自然垄断、非同一般商品的特性；并且，它也是准公共产品。因此，尽管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推进了中国房地经济的繁荣，但是，其市场的缺陷也日益膨胀并势必诱致社会的不和谐。因为仅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住房领域的社会不公平问题。任由市场力量主导房地产行业的所谓“不干预”的香港模式的教训(香港房市价格高走并且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商)，以及政府房屋建设局提供微利房(占房屋总体供应量的80%)的新加坡模

^①例如，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对世界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体系绩效做出评估，中国被列为144位。中国在事关社会的关怀程度和公民生命健康的公共医疗服务和资源的分配上，其公平性落到了全球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

式的启迪值得借鉴和反思。

此外，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是失败的，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试验问题丛生，社会保障覆盖面有限。毫无疑问，市场化改革并不适用于普通民众的基本医疗保障和普及教育。而后者正是以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为己任的政府大有作为的领域。

第二个误区：推崇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这是泛市场化改革思路的逻辑延伸：完全市场化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

西方学者波特对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渊源于李嘉图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作了温和的批评，强调应该从低级阶段的比较优势转向高级阶段的竞争优势。拉美依附学派尤其激进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这种曾经把拉美国家拖进依附型发展道路的“比较优势陷阱”；而在伊曼纽尔看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换是形式上的等价交换而实际上是不等价交换。但是，8亿件衬衫与一架空客的交换，被有些人称为“双赢”或者“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这种交换的代价无疑是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并最终将被发达国家锁定在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业的位置上。这只能是一种依附型“双赢”。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早期阶段，偏重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使之凝固化和极致化。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上，应该从比较优势阶段转向竞争优势阶段或者转向两者并存阶段。

至于木桶效应理论则是市场配置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衍生品，是美国学者斯蒂格里兹所批判的“市场神话”的新翻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用市场换技术”则是用中国式话语对这一理论的诠释。事实证明，这种理念使民族工业（如国产大飞机、国产轿车和国产核电设备产业）被“边缘化”了，民族创新能力冻结了。由此可见，单纯依赖市场化，用市场交换核心技术不行，而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是目前可行的现实理性选择。应该用竞争优势及自主创新理论取代比较优势和木桶效应理论。

如何看市场经济制度？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斗了几百年。英国人约翰·穆勒在150多年前，就阐述了包括市场缺陷论和国家缺陷论在内的“双缺陷论”。市场失灵表现为狭义的市场失灵（指交易成本、信息交流的障碍以及知识和理性的缺乏）、宏观失灵、信息失灵、外部失灵、公共失灵和分配失灵。从而有它自身不可逾越的八大界限如垄断、外部性、伦理、生态等界限。博兰尼的《大转折：当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不可不看。它提供了另一种迥异于经济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崇拜性解读之外的有价值的文本。在他看来，一切灾难的源头在于自发性市场经济制度兴起，及其和社会秩序之间产生的激烈冲突的双向运动，作者启迪人们如何在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中寻求秩序的平衡，如何在经济进步的同时减轻对社会的震荡，从而揭开了国家作用在这种冲突和促进社会平衡中的作用——而这是被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新自由主义所遮蔽的主题。

如何看政府干预制度？政府要扮演调控人、管制人、公益人，以及斯蒂格里兹在《政府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保卫者、司法者、分配者、保险者、生产者、消费者等角色。政府的非市场机制，旨在使政府起到维持社会公平、经济效率、社会稳定及经济成长的作用。由此，要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合适的制度框架和制度条件，决定和影响每个市场主体的机会集合和行为边界，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实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微观经济政策（对市场失败予以矫正，实施微观规制，并有效配置资源）、区域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以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社会再生产为基本目的，保护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或以经济效率为目标，刺激和鼓励生产、工作的积极性）来具体实施。

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现已呈现融合的趋势——第三条道路理论、混合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由此应运而生，而以“市场决定论”、“唯市场化”形式出现的老“市

场原教旨主义”，跟随者寥寥；而新“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新经济自由主义，也是以两种标准示人。^①在融合学派看来，政府干预或管制和市场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两种调节经济活动的方式。因为市场失灵与政府或管制失灵在实际上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其动态演变决定了政府干预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相互替代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健康运行需要政府规范和系统的管制。但是要求政府管制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动态调整和管制绩效的变化做出灵活及时的相应调整。并不断探索政府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模式以更好的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总之，市场经济制度是一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并未穷尽，尤其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据统计，中国的经济自由度为 54%，低于平均标准，美国则为 82%，而产权自由度、金融自由和投资自由也仅为 20-30%。

其二，政府是一国经济崛起的又一个必要条件。要正确处理具有发散型、开放型及风险型特征的市场改革与带有集中及凝聚型倾向的政府改革之间的关系。中国政府不能是一个“万能的政府”，不能成为“经济发展型政府”，要完成从经济主体到管理主体、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转型。许多地方政府的弊端和通病是：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领域（诸如医疗卫生、环境、公共交通、社会保险、教育等），它祭起“搞活市场经济”的法宝堂而皇之地退出；至于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它又用“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的话语堂而皇之地进入。因此，“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至关重要。应该弄清楚哪些行业可以市场化，哪些是处在市场和政府接合部的行业，哪些是要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扶持乃至需要运用国家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产业。因此，改革决不是单维度的市场化、民营化和开放化。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行程，已经逼近到这样一个历史拐点：应该转向有选择的、有国家干预体系和法律制度予以配套的、并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且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转向涵盖包括非经济领域在内的多元化的综合改革。

四

应该从西方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大规模的移植、引进和模仿，进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阶段。

西方先进的理论和制度是值得借鉴的。近代全球化时期的西学东渐送来了“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其实还送来一位“富”先生（Wealth），现代全球化时期的西学东扩送来马先生（Market）、猴先生（Humanitarian）和驴先生（Green）。但是，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而借鉴、移植和应用西方经济学说及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成果，也要尊重理论移植和制度移植的原则和规律。第一，这种移植、兼容和融合，主要限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护带”层面而并非“硬核”层次；第二，以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为前提，不能凡是合理的就移植；第三，制度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制度规则及其支持或“配套”要素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能否进行有效的制度移植，在于这两者整体的协调配合。因此不能忽视制度的系统性，不能忽视隐性制度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谨防跨国移植诱发的非兼容症，即社会有机体因移植外来“器官”而产生的“排异”现象。此即所谓“马头”不能按在“牛身”上的“严复悖论”，即单独移植西方的个别制度

^① 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不搞斯密式古典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套在发展中国家的紧箍咒，他们自己是我行我素，双重标准。美国以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施价格补贴为由，拒绝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上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又持另外一种标准。统计数字表明，仅占全国人口 1.8% 的美国农民，不仅养活了近 3 亿美国人，而且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2001 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高达 535 亿美元。但是高度发达的美国农业又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的传统行业。一是与其他行业如工业、服务业相比，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的税种。二是联邦政府还直接对农业进行补贴。2002 年布什政府颁布的新农业法规定，在以后 10 年里，政府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和财政支持达到 1900 亿美元，平均每年投入 190 亿美元，正好低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每年农业补贴不得高于 191 亿美元的上限。美国农业补贴的集中度很高，这有利于提高大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无济于事，而全方位地移植该制度赖以存在或配套的支持系统，又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也指出，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说到底，这种外来制度规则与本国相应的“配套”要素之间的排斥反应，实质上是一国的基本制度与移植过来的新制度的矛盾或非相容性的表现。**MBO**引进所造成的国有资产大流失现象，就是一个典型。同时，要谨防实用主义接轨，即根据自身（或集团、企业、部门、地方或局部）利益来挑选国际游戏规则。或者以国情和“中国特色”为幌子拒绝引进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国际游戏规则。

大规模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是必要的。而“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在一定层面上取得了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大国的科技进步问题，并且滋生技术依赖症。而核心技术、设计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战略性产业核心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工作团队及其创新能力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它们是藏身于全球化市场交换体系之外的。据统计，2002年，欧洲、美国、日本三方专利中，美国占35.6%，欧盟占31.5%，日本占25.6%，中国仅占0.3%。我国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到50%。可见，中国如果单纯依赖移植或亦步亦趋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是不能成为真正崛起的大国的，只能沦为“世界加工厂”、“OEM大国”，或者扮演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加工产品的附庸经济、打工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躯干型国家”角色。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移植、启蒙、引进和模仿阶段。大规模的借鉴和移植已经走到尽头。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拐点，我们必须完成从启蒙型、模仿性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转向自主创新经济而不是依附型经济，转变为“世界工厂”、“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实验室”而不是“世界加工厂”，转变为大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而不是躯干型国家；并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话语权和体制这种舶来品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创造中国自己的转型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有望进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里所说的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理论、制度和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创新。

五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推崇以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或外贸导向型）为主体、并以外资投资唱主角以及GDP至上的发展模式。应该强调指出，基于对外开放理念之上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1978年排名第32位贸易小国上升为2005年排名第三的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已破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前茅。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近6600亿美元，已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中国经济正日益形成一个依赖外资、外贸和外需以及制造业比重过大的结构。平均每年9%的增长中，外资驱动部分占1/3弱（2.7%），中国外贸依存度现在接近80%，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稳健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此外，对外资给予一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也带来了许多弊病。注重引进外部资本却对利用国内民间资本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中国高储蓄率的优势，国内资本外逃现象极为严重等。尤其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并热衷于“用市场换技术”，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和R&D的贡献则很小。中国新增投资对GDP的贡献从2000年的35%，上升到了2006年的50%。目前我国的投资率已接近50%，每年生产出来的利润有一半又进入投资领域，而日本当年高增长时投资率也只有25%。投资比重过高，导致能源、资源消耗量过大，环境污染加重，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62%左右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1978年，家庭消费约占全部开支的2/3，而今天只是全部开支的2/5。因此，在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99%的情况下，中国只是供给意义而非需求意义上的大国。而且，目前国内消费率的低迷已经危及到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

出口贸易) 的平衡。

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已进入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一国崛起大体有五种模式：欧美型、拉美型、苏联型、俄罗斯型、东亚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东亚发展模式。^①但是，问题在于：小国可以搞外向型或外贸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中大国能否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出口牵引型经济基础之上？

这种以投资、外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其特征是外生型、外源型、风险型和GDP嗜好症；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变幻莫测的国外市场和国外需求；易滋生外资依赖症、市场依赖症、经济依附症、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出口依赖”与“引进依赖”并存症、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症，以及破坏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由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外部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拉动而不是国内需求和消费拉动，所以很多结构性的矛盾、长期性的矛盾和总量矛盾、短期问题交织在一起。厚积而薄发。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未能使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从而酿成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的教训，仍值得中国借鉴。

因此，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促成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内需导向型生产部门与外需导向型生产部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等一系列的平衡，^②采取与新时期中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相匹配的对外开放取向、对外经贸战略和政策。

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战略调整期，把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用作“现代化跳板”的机会稍瞬即逝，主要由投资、出口、低端制造业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我们既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要从工业化初期以投资依赖、资源依赖、出口依赖和制造业依赖为特征的粗放发展模式和外贸拉动的东亚出口模式（要素的低成本、无视环境因素、低税政策起支撑作用），逐步转换到以技术创新驱动、生产效益提高和内需拉动为主的，并且又好又快的增长模式上来，实现从外向型或出口拉动型经济以及投资主导型增长向消费主导型增长的转换，而最终形成那种旨在追求速度、质量和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内生型、内源型和协调型发展模式。

六

全球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社会发展战略模式的战略转型问题。从社会发展模式的大视角上看，中国改革开放已处于向纵深化、系统化和全面化发展的战略转折点，从增量改革、循序渐进、单点突进、转向存量改革、全面推进和综合改革，减少不协调成本，发展—改革—稳定

(下转第75页)

^①欧美模式是先行的现代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但它赖以再造的时代和历史环境不可能再复制。拉美模式在错误的时代区段模仿欧美模式，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造成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却成为社会矛盾激化、“有增长而无发展”、“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和依附型经济的典型。苏联模式的特点是通过计划经济手段高强度动员资源的典型，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普京执政时期的俄罗斯发展模式已经摒弃了照搬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休克疗法”，提出“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旨在完成市场经济领域六大任务的国家调控体系。俄罗斯2006年GDP得以超过1990年前苏联时期。韩国的崛起得力于“双手并举”的理念，政府正确的发展战略、强有力的政治推动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值得借鉴的一种可行的借鉴发展模式。亚洲“四小龙”就是依靠这一模式创造发展和起飞的经济奇迹的。

^②例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的局部调整。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国退民进”、“靓女先嫁、一卖了之”和MBO，而是要如何完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战略布局和整合这一重大任务，从而把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物质载体和宏观调控工具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在国家控制下高效运作。而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的平衡，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不能搞非理性的开放。重大的外资并购行为必须经过有关国家机构（如美国就有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批准。

哲 学

·儒学与当代社会·

国学与时代精神

李宗桂

[摘要] 百年来的国学论争，和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是本国文化、民族文化的代称；近 20 年人们所热谈的国学，是传统文化的别称，包括古代和近现代，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国学论争的实质，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学是中性概念，但国学研究和实践有价值取向。清末民初关于国学概念的争鸣，东西文化论战背后的国学价值理念的交锋，现代化问题论争中的国学观，中国文化出路论争中的国学观，近 20 年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国学理念，都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百年来的国学发展，其明显的思想轨迹和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与国学的双向互动。国学反映着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推动着国学，引领着国学。近年的国学热潮，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不能把国学当成包医百病的灵药，更要反对用国学等同、取代当代新型文化建设的企图和做法。国学的研究和应用，应当在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引领之下进行，并且在时代精神的烛照下焕发新的生命。简单否定、排斥国学，固然不妥；而盲目推崇、迷信国学，也缺乏理性。

[关键词] 国学 传统文化 现代化 时代精神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02; 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21-12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学热”逐渐兴起，至今遍及神州，而且大有进一步升温的趋势。在文化建设日益重要的今天，在特别需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候，如何厘定国学的内涵和范围，如何看待国学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因此，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对其作一辨析，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国学的内涵、内容和范围

如果从历史时限划分，大致说来，国学内涵、内容和范围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即古代、近现代、^①最近 20 年。^②

(一) 古代的国学

作者简介 李宗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①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期，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是近代；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现代。前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另一种认为，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近代，理由是整个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一样的，而判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据关键在于其社会性质。因此，中国近代史应当“近”到 1949 年。我认为两种说法各有道理。本文所论涉及到清末和民初，故在这里使用“近现代”一词。

②本文所谓“最近 20 年”，是指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的时间。

国学作为单一名词，其实古已有之，早在《周礼》中就已出现。^①《周礼·春官·乐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此后，国学在中国古代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比如汉代的太学，晋代的国子学，隋代的国子监等。曲阜孔庙留存的元朝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的“大元重建至圣文宣王庙之碑”的碑文中，就曾谈到“国学”：“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义洽。九域混同，文物焕然可观。内立国学，外置郡邑学官，而于先圣之后，尤所注意遴选，师儒训迪，作成儒贤，以嗣封爵，……”。^{[1](P248)}这里的“国学”，就是中央政府主办的学校，“国家”之“学”。

（二）近现代的国学

近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词，源于清末民初。1902年秋，梁启超在给黄遵宪的信中，商议创办《国学报》，并强调该报应“以保国粹为主义”。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多次提及“国学”一词。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国学”实际上就是他此前屡屡论及的“中学”，但更多地注意到了“中学”的精粹一面。章太炎1906年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继而成立“国学振起社”。国粹派学者邓实1906年在《国粹学报》发表的《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章太炎1922年上半年在上海讲授国学，其内容被曹聚仁整理成《国学概论》出版。该书认为国学的本体是经史、诸子、历史，国学的派（类）别是经学、哲学、文学。章氏在其创立的国学振起社的“广告”中说，国学振起社将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分别是：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胡适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②吴宓认为：“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③蔡尚思在其1931年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一书中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这些学者所谈的国学，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上述表述不同，一些学者对国学概念表示了质疑。陈独秀在1923年7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一期、题为《国学》的短文中，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4](P516-517)}半年多后的1924年2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同样题名为《国学》的短文，尖锐地说：“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一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4](P604)}郑伯奇批评道：“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词，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⑤曹聚仁虽然赞赏认同国学研究，但也对国学概念表示了质疑，他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4](P517)}钱穆在其完成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⑥

^①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主要观点有：汉代刘歆的“周公手作”说，亦即成书于西周初年；近人刘起釪的春秋说；东汉何休，近人钱穆、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等的战国说；宋儒魏了翁、近人梁启超等的周秦之际说；近人胡适等人的西汉初年说。即使最晚年代的“西汉初年”说，距今也已2000余年。“国学”一词，渊源甚久。

^②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页。钱氏该书初版于1931年5月，这里引用的是台湾第十四版，其内容和初版无异。

上述争论，其症结在于三点：一是国学概念的清晰与否，二是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三是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认为无可争议者看来，国学就是本国之学，是既往之学，是固有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认为大有问题者看来，国学不能纳入既有的学科范式。陈独秀指出，胡适长于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振玉长于金石考古学，王国维长于文学，这都是具体的学问，“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4](P516)} 质疑者还从学术无国界的视角，反对国学概念的提出以及国学研究的进行。其实，胡适所说的国故，本质上是个中性概念。在胡适心目中，国故并非就是好的东西，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他曾明确说过：“‘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它又包含‘国渣’”。^[5] 当然，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发掘国粹，抛弃国渣，其研究本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亦即要通过国学研究，弘扬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而陈独秀反对国学，则是认为国学是“粪秽”，不必从中寻找“香水”。这实际上是从价值系统层面否定传统文化。这样，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包蕴着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之争。

（三）近 20 年的国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论争，与上述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亦即同样出现了对于国学概念的厘定、国学内容范围的划分、国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争论。不同的是，两次论争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国家发展目标不同。

关于国学概念的内涵，学术界众说纷纭。张岱年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而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国学是本国学术之意。”^{[6](P1-3)} 张岱年在其《如何研究国学》、《漫谈国学》、《国学与时代》三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7](P468-470,520-521,561-564)} 金景芳、吕绍纲认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就是国学”。^[8] 楼宇烈认为：“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做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9] 张立文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与时偕行的创造，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10] 李中华认为：国学“是指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积淀的思想文化的总和”。^[11] 纪宝成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明之根。^[12]

质疑上述人士的国学概念者，大有人在。舒芜曾撰专文质疑国学。他说：“所谓‘国学’，实际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狭隘、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完全是顽固保守、抗拒进步、抗拒科学民主、抗拒文化变革这么一个东西。”“所谓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国学’是什么？就是讲儒家的那点东西，封建的那些价值观念。”国学里面所包含的哲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应当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为什么“非得要说‘国学’不可呢？”^[13] 针对舒芜的质疑，蒋国保提出要为国学正名。蒋国保认为，晚清、民国学人所谓“国学”，固然不是泛指中国传统文化，但也并非特指儒家学术，“应该说它是用来统称中国传统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14] 王生平认为，改造和扬弃国学概念，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从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中国近现代文化也是国学，而且从本质上讲是比国学家们规定的国学更高级的国学。”^[15] 朱维铮批评现在讲的国学没有一个衡量尺度。他指出，讲国学必须先确定两个前提：第一，我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包括台湾在内，这是我们“国”的空间范围；第二，要承认中华民族是个复合体，“国学”一定要包括各个民族群体。“不能说国学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国学’一词，指各国本国之学，是个泛称，不是专指中国的。”^[16] 有趣的是，质疑国学的舒芜，其反对理由之一，就是世界上别的国家都不讲国学，只有中国讲国学，故国学概念说不过去。^[17] 苏双碧认为，“‘国学’这个概念的含义说不清楚。”“‘国学’含义既然不清楚，也就未必是科

学之说了。”欧美各国并没有把有本国特点的学术文化称为“国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德国，但它却是时代的产物，而不仅是一国的产物。^[18]

(四) 国学概念论争存在的问题

综观百年来特别是最近20年关于国学概念的纷争，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问题一：概念不清。本国学术，本国的学术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本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国学，国粹；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等等，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但论者往往将其混为一谈。本国学术，是研究的文本（对象）；本国的学术研究，是对本国学术文本进行的学理性探讨。同理，本国历史文化是本国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明样态，而本国历史文化研究，则是对这个本然的样态进行的分门别类的探讨。换言之，前者是“本来”的历史，后者是“写”的历史。至于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并不是同义词，在经过多年的文化研讨后，已经成为常识。^[19] 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孔子思想，这些显然不是同一层面意义的概念，自然也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国学、儒学、国粹等概念，其区别更是明显，但不少论者硬是从价值判断优先的立场，将其同质化、同文化。遗憾的是，在近百年特别是近年的国学论争中，不少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内涵极为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先设定一个模糊的概念，再虚拟一个话题，就自说自话地论证起来，于是把国学概念搅得混乱不堪。

问题二：内容和范围模糊。国学的内容和范围究竟何在？论者之间并无共识，基本上是各说各的。就内容而言，有说指经史子集的，有说主要指经学的，有说不包括经学的，有说包括经学哲学和文学而不包括史学的；有说包括古代诸子学说的，有说特指儒家学说的；有说主要指古代人文学科内容的，有说应当包括古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有说泛指传统文化的，有说专指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就时限而言，有说指古代之学的，有说不仅包括古代而且更应包括近现代的，还有说应当包括当代的。等等，真是不一而足。由于范围模糊，内容当然也就不便确定，从而研究和争论也就成了张飞打岳飞。

问题三：思路不清。国学是事实判断，中性概念；但论者中不乏过于强势的价值判断推行者。视国学为精粹者，把国学看作纯粹的、优秀的价值体系，顶礼膜拜而盲目推崇；视国学为渣滓者，把国学看作洪水猛兽，必欲彻底除之而后快。这种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混淆的做法，导致无谓的争论。此外，论者中有的缺乏充分的根据，只是凭个人意愿甚至主观推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有的论者凭主观想像，认为别国没有国学之说，因而中国也就不应也不能有国学之词。姑且不说别人没有的，是否自己就一定不能有，这种逻辑实在过于简单，实际上，别国也有国学。日本就有国学之说。我国的国学国粹概念，本身就是从日本引进的。日本在其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基督教文化在日方的胜利，就曾有“国学复兴”思潮的崛起，而“日本国学的复兴，是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省的一种新的世界观”。^{[20] (P74-81)} 不仅如此，韩国也有国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李天承教授就指出，为了收集、保存韩国学资料，加强对韩国学的研究和普及，在退溪学的发源地——安东的陶山书院附近，还成立了韩国学专门研究机关——韩国国学振兴院。^[21] 可见，并非外国不讲国学、没有国学，而是有的论者并不了解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所谓国学，就是其本国之学，就是该国的民族传统文化。李天承教授指出，早在1965年，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以民族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和畅达为目的成立了民族文化推进会，积极推进古典国译者的培养和韩国古典的翻译（代表性的便是《韩国文集丛刊》工作）。……韩国古典翻译院这一新的教育机关也在酝酿之中。”^[22] 有学者指出，土耳其也有国学，所谓“突厥学”便是。类似的还有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23]

(五) 国学应有的内涵、内容和范围

显然，对于中国古代作为“国”家之“学”的中央政府举办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国学”，人们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于清末民初逐渐流行开来的国学，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其内涵、内容和范围，在百年来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论争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大致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时期学者所讲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古代）人文学科范围内的学术思想文化。所谓“国”，当然是指本国，中国；

所谓“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范畴的学术和历史文化。即使如陈独秀、郑伯奇、钱穆等反对者、质疑者，在这点上实际上也没法否定。陈独秀从哲学、史学、文学等角度指出国学倡导者和研究者的某种专长或不足，其实是在客观上承认了国学内容和范围是指中国的传统人文学科和历史文化。钱穆一方面质疑国学概念不够科学，另一方面也承认国学是某一特定时代的名词。而在他有名的《国学概论》一书中，其内容和范围不外是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两汉今古文经学、魏晋玄谈、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之类的学术思想史，这表明，钱穆所谈的国学，就是本国之学，就是本国的历史文化。

其实，如果抛开成见，以平和之心来讨论问题，我们则可在国学的内涵、内容和范围的问题上取得大致接近的意见。古代意义的“国学”，作为中央政府主办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论者间没有争论。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清末民初兴起的国学，主要是指古代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学术历史文化。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新学而言是旧学；相对于当代而言是古代；相对于实践而言是理论。最近20年所讲的国学，既有指古代而言者，也有指包含古代和近现代而言者；既有指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范畴而言者，也有指既包含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也包含自然科学在内者。所谓国学，是指本国之学。这个学，既指传统文化，也指传统文化研究。《四书》是传统文化，《四书章句集注》是研究传统文化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四书章句集注》后来也成了研究对象（也成了传统文化），而《四书集注简论》是研究传统文化的了；^④传统文化固然是国学，而数十年前章太炎的《国学概论》、钱穆的《国学概论》，在当时是研究国学的论著，而今却也已成为国学研究的内容。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就时限而言，包括古代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传统文化（不包括当代文化）；就学科门类而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国别而言，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世界而言是国学；就内容而言，《十三经》、《诸子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周髀算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二十四史等是国学，民俗风情、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也是国学。道理很简单，这里所谓传统文化，是广义的说法，既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信仰，而不仅仅是某家某派学说。

二、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百年来的国学论争，特别是近20年的国学论争，其实质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当今，10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看，就是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进程。在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下，各种主张、各种思潮，都离不开对是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主题的回答。以国学论争为表现和重心的思想文化运动，集中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宏观地看，晚清以来关于国学问题的论争，如果集中于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出现以后，^⑤则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国学概念论争（清末民初，大约1900-1915年）、东西文化论战（大约1915-1927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19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论战（1930-1940年代）、“文化热”和“国学热”及其论争（1980年代中期至今）。

（一）东西文化论战背后的国学价值观

清末民初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前文已经阐述，此处不赘。后来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论争，所反映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看待国学，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树立民族文化意识的战略高度上，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国学采取何种态度，认同赞赏也罢，否定批评也罢，其实都是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

大力倡导国学弘扬国学的梁启超，于1902-1903年间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此时，他正在大力倡导国学），阐发了以根本改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新民”论。梁启超新民论的基本思想，是要铸造新的民性，提出了自由、进步、自治、自尊、公德、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现代国民的基本品

^④近代关于中体西用问题的论争，本质上也是国学论争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并为了论题的相对集中，此处略去。

格，作为“新民之道”，以实现“国之安富尊荣”。梁启超自己解释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所其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24](P206-268)}可见，梁启超所要弘扬的国学，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思想，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提升固有文化的精华、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而融铸新文化、铸造新国民，实现现代化。梁启超后来在《欧游心影录》中明确宣布，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应当“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利用中国传统经典《大学》的“新民”概念和思路，阐发在当时具有强烈现代化气息的全新思想。这本身就显示了国学优秀成分在新时代的启蒙思潮中具有合理的价值，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吸纳西方文明优长之处时，并不彻底否定本国文化。可见，弘扬国学优秀成分，认同国学的合理价值，与认同西方先进文化，改造国民品性，实现现代化，并不矛盾。

西化派的胡适，提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追赶西方，以尽快实现现代化。胡适认为，中国未来必定应当而且可以实现“科学化和民治化”。^[25] 西洋文明能够解放人的心灵，改造物质环境，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满足人类精神需求，是理想主义的，是优秀的精神文明。^[26] 可见，整理“国故”，推崇“国粹”，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用西洋“优秀的精神文明”批判“国渣”，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

极力反对国学的陈独秀，继梁启超1902年的新民说之后，于1915年提出了“新青年”所应具备的特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27] 这种思想，显然是具有明确现代意识的人学思想。一般认为，胡适和陈独秀在当时都是西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但同样属于西化思潮阵营，胡适和陈独秀对于国学的态度大异其趣。前者认同国学，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通；后者否定国学，认为中西文化截然相反。但是，在中国一定要而且必然能实现现代化方面，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方面，二者的认识却又殊途同归。真正意义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曾经批评胡适和陈独秀的西化论并不彻底。他指责说：“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28](P80)} 应当说，陈序经对胡适的批评是中肯的。胡适早在1919年，就明确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29] 这个主张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整理国学，构建中国新文化，已经是中西结合、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现代学术思路，是在文化现代化方面的创造性思路。从胡适后来的学术发展和社会实践来看，他是恪守了这样一种现代学术观的。因此，胡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西化者。陈序经还批评陈独秀的西化论：“陈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之外，别无所要，则陈先生所要的西化，恐怕非全部的西化。……积极地主张接受全盘西化的工夫，陈先生还做不到。陈先生的在中国思想上能别开一个纪元，却在他根本地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30] 可见，即使当年西化如胡适陈独秀者，实际上也不可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盘否定国学。

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了自承是“归宗儒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该书通过对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孔化还是欧化）问题的阐述，通过对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提出未来世界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论断。该书展现了具有世界意识的多元文化观，打破了当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认为，该书“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矛头是反儒学的，而正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了儒学现代化的第一部论著。”^{[30](P9)} 应当说，罗荣渠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可见，对国学“保守”如梁漱溟者，没有也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潮流。相反，作为现代新儒家重镇的梁漱溟，正是儒学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这本身就表明，对国学的护持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从上述人物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论辩可以看出，无论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如何，都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症结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其

间，对于国学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梁启超的“新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演变出的“乳化”），胡适、陈独秀的“西化”，梁漱溟的“乳化”，无不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相连，无不与如何直面国学有关。因此，我们说国学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向问题，并不是夸大之词。

（二）现代化问题论争中的国学观

东西文化之争后，继之出现的是30年代的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根据历史文献，“现代化”作为专有名词，在“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观论争中已经出现。20年代，严既澄、柳克述等人已经明确使用了现代化概念。胡适1929年在其有名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明确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命题。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刊发特大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该刊编者在前言中剀切陈词，认为今后中国如“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31]这个专辑的编印至今已近80年，今天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回想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举国上下的共识是：落后就要挨打！如不迈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我们中华民族就会被开除“球籍”！当年的“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的警语，与数十年后将被“开除球籍”的警钟何其相似！该专辑发表的20多篇文章，集中讨论的问题，一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困难和障碍，二是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次讨论的背景，一是对民族危机的急切认识，二是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源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反省及对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认知；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源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西洋文明片面认同的反省和超越，特别是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这样一种认识的逻辑归宿，必然是对本国国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反思，对西方文明弱点的认识。可以说，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辩问题的深入。此后，关于现代化的思考越来越广泛深入，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参与进来。胡秋原写于1938年、出版于1943年的《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其专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思路，就是现代化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于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我们抗战，是要打破现代化的障碍；我们建国，就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基础。”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中国必须现代化，才能生存于现代国际环境中，才能洗刷我们的落后和污秽，浅薄和玄虚。而现代化也是中国自然前途。”^{[32](P148-151)}全盘西化的极力倡导者陈序经，1932年撰写了《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发表于1933年），批驳当时流行的教育中国化观点。他认为，所谓中国化，实际上是抵制现代化，是以国情论来抗拒现代化，是开倒车。他的结论是：“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只有现代化的教育，才是活的、生的、新的教育，因此必须“赶紧的，认真的，彻底的现代化”。^[33]而他所谓现代化，就是彻底的西化：“全盘西化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所要明白的，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到他人来化我们。”^{[34](P151)}胡秋原和陈序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颇为不同，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国学的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但他们在关于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而且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却是相反相成。可见，无论论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国学（传统文化）问题的论争，渗透着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其实，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并非在时间上单线发展、前后相继，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正面讨论，从1930年代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末期。根据文献，仅仅直接以“现代化”命题的论著，就有相当数量。例如，杨幸之的《论中国现代化》、亦英的《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1933年）、张素民的《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1933年）、董之学的《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1933年）、陈高墉的《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1933年）、^①周宪文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化”》（1948年）、吴世昌的

^①以上5篇文章都发表在专门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专辑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1948年)，等等。

(三) 中国文化出路论争中的国学观

与现代化问题讨论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探讨随之而来。1935年初，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黄文山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认为文化意义的中国不见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和形式，都已失去本来的特征，在此状况下的人，也已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我们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作者认为，“要使中国能够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①“宣言”认为，要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讨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为此，复古、西化(模仿英美、意德)、俄化，都不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因为这些主张“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和时间的特殊性”。“宣言”提出，“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徒然赞美或者诅咒中国的制度和思想，都没有意义；对待过去的一切，应当用检讨的态度，“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把过去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把过去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在这样一个价值原则立场上，吸收欧美文化中所应当吸取的，而不应当不加分辨地全盘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应有基本的立场：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既不守旧，也不盲从。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若流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最终，“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②这篇“宣言”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其间的是是非非此处姑且不论，如果单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考察，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考察，从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的角度考察，则这篇“宣言”所强调的文化建设应当注意主体意识，提升主体精神，从本国国情出发吸纳外国优秀文化，增强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并关注时代性，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里的关键，是作者们对于本国文化分析的态度，对于本国固有文化优秀成分的肯定，同时对其糟粕的严肃批评以至抛弃的态度。可以说，在如何对待国学的问题上，^③“宣言”还是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高度，从中华文明复兴的良好愿望出发，因而值得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之所以如此，在于“宣言”的思想脉络，是中国如何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保持文化层面的民族自我意识，弘扬文化建设的主体性。^④这篇“宣言”所论辩的“本位文化”的“本位”问题，实际上关涉到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亦即中国化问题，这个问题，在继后的文化讨论中，进一步凸现出来。张申府专门撰写了《论中国化》(1939年)一文，艾思奇著有《论中国的特殊性》(1939年)，嵇文甫写了《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1940年)，^⑤至于其他虽然题目没有出现“中国化”而实际内容是研讨“中国化”问题的论著，则在在多有。当然，论者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相当矛盾对立，例如张申府、艾思奇和嵇文甫之间，其观点就很不一样。但是，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化”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如何实现中国化问题，则是无可争议的关注重心。这本身也反映出国学论争的本质，反映了国学与现代化进程、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关系。

①楼宇烈教授说：“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

②张申府曾在《论中国化》一文中说：“根据自觉、自信、人化、中国化的必要，前几年一度提倡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在大体上，在本意上，本是对的。当时反对或嘲笑之的不免是由于不了解，由于感情用事，而未就事论事。”(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原载1939年2月10日《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

③嵇文甫于1939年，发表于1940年。

(四) 近 20 年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国学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最初数年，国学的存在和发展似乎并不是问题。原因在于，在最高领导人的认可下，国学被当作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6](P499)}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问题做了颇多阐述。在他当时看来，“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36](P667-668)} 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历史理性，在建国初期，国学被当作可以“批判性继承”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受到相对的重视。但是，随着上个世纪 50 年代后期国内情势的变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彻底否定的极端表现。这个时期，传统思想文化是被作为彻底否定的对象、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怪诞的是，即使在“文革”这样大革文化之命的时期，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思想文化，也一度受到“重视”，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典型的如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之类，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糟蹋，举世罕见。这从反面证明，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其生命力是极强的，无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客观存在，并且不可回避，甚至会影响到现实的社会文化建设。区别只是在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概念来指称而已。在“全面专政”的“文革”时期，用的是“封建主义文化”、“反动文化”之类的名词，而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分别用的是“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民族文化”）和“国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启动，80 年代中期，文化热开始出现，至今已持续 20 余年。20 多年的文化讨论热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80 年代以激进色彩为特征、具有明显西化调子的文化热，二是 90 年代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具有明显保守色彩的国学热，三是新世纪以来大众传媒介入、大众参与度甚高的国学热。^①

80 年代的文化热，没有使用国学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度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文化热遍及神州，影响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传统反思的结果，希望了解并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国门，形成对本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理性应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结果，需要解放思想，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建构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体系；四是对于“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文革”全盘否定传统的后果做合理的评析。^{[37](P364-382)} 在这种背景下，80 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的主调，基本是反传统，具有比较强烈的西化色彩。90 年代的文化研讨热潮，明确使用了国学概念，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有强烈的“保守”色彩，与 80 年代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各种各样“弘扬”传统文化的图书、影视作品，各色各样的国学讲座，纷纷登场。重新包装印刷的传统文化启蒙读物，新编的各种具有国学特色的书籍，从单本书到丛书，从原版古籍丛书到研究性的国学丛书，从数千字、数万字到数十万百万字，乃至千万字数亿字的“国学”图书，接连不断地问世，真正是你未唱罢我登场！在商场，在官场，在校园，在工厂，一时之间，似乎大家都在关注国学，人人都在弘扬传统，国学热真正到了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这个时期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作为历史资源的清理和发掘，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本国历史文化价值的新的认同。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继续高涨。这个时期国学热的盛行，在具有此前 90 年代国学热的种种特征的同时，还具有了新的特征，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广泛介入，以及学术界之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成为传播国学的重要基地。于丹讲《论语》、《庄子》，易中天讲《三国》，以

^① 其实，从近 20 年来的研讨内容看来，都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可以统称为“文化热”；但由于 80 年代普遍使用“传统文化”概念，而 90 年代和新世纪普遍使用“国学”概念，故本文从众。

及其他学者讲历史文化，推波助澜，兴盛一时。北京大学的乾元国学教室，北京大学、光明日报和新浪网联合推出的“乾元国学博客圈”，首批邀请全国100位国学界的一线学者加盟，“共同组成国学第一方阵，共同打造通过网络向大众宣传国学、普及国学的第一平台。”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在致新浪乾元国学博客圈教授“博主”的信中强调：“促进国学大众化是当代每一个国学学者的历史责任”。光明日报专门开辟了“国学”专版，研讨国学，宣传国学。至于冠以国学之名或者虽不以国学冠名但实际上宣传研讨国学的网站，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由官方支持甚至直接主办的各种类型的国学会议、国学讲座，接二连三；由学术界主办的全国甚至国际性国学学术会议，比比皆是；由实业界操持的国学活动，花样繁多；由中小学开展的国学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①这个时期的国学热，相对于90年代而言，更加理性，参与面更广，群众性更强，实践性也更强。人们既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从国学的具体内容出发，从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需求出发，考量国学的价值和功能，从建设性的一面衡量发掘国学资源。^②

如果说，80年代文化热中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西化调子较高是一种偏颇，90年代在弘扬传统文化旗号下高涨的国学热有盲目认同的倾向也是一种偏颇，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显得较为理性，更为实际，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一面认识国学的价值，从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高度，审视国学，扬弃国学，使国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③套用正、反、合的三段式，80年代是正，90年代是反，新世纪是合。这个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跃升。

三、国学与时代精神的双向互动

纵观百年来的国学发展，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思想轨迹和时代特征，这就是时代精神与国学的双向互动。国学反映着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推动着国学，引领着国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近现代中国时代主题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设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国。其间，贯穿始终的时代精神，是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从不同阶段的发展来看，20世纪前半叶表现为御侮图强、振兴中华；近20年来，是改革创新，振兴中华。

从20世纪初年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由日本引进中国，国内展开了关于国学的争鸣，东西文化的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整个20世纪前半叶，国学在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辩，贯穿始终。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要不要振兴中华、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而在于如何振兴中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胡适、陈独秀固不必说，就是被认为保守的梁漱溟之类的现代新儒家，又何尝不是要走现代化之路，要复兴中华文明！东西文化论战的实质，实际上是怎样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而不是坚持或者反对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质上，也是探讨在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应当走什么道路，应当有什么样的模式，应当具备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文化出路论战，其症结也同样如此。所谓本位文化建设，在今天看来，不外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既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又适合中国国情；既参与世界文明进程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弘扬文化建设的民族意识，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学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④因此，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国学论争，本质上是时代进步使然，反映了御

^①即使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颇有成效的今天，也有一个在文化建设中如何保持民族性的问题。参见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日报》2005年2月4日。

^②相当数量的中小学开展了古典诗文诵读活动，有的还自编了国学读本，有的开展了课外活动。如华南师范大学附中不仅有国学课程，而且在2007年承办了“两岸四地中学生国学夏令营”，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到场讲国学，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到场讲话，支持夏令营开办。笔者曾应邀讲授《岭南文化与时代精神》专题。

^③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编写的《公民道德格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社会公德四字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就在宣传现代公民道德的时候，吸纳了国学中的合理成分，例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侮图强、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 20 年关于国学问题的论争。从上文可以看出，近年的“国学”是个特殊的、误解纷呈的概念。否定国学者，指斥国学是保守、僵死的东西，是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甚至是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工具。肯定、钟情国学者，认为国学是本国文化精粹，是当今救世之学；也有对国学抱持平态度，认为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应当把国学作为传统资源加以利用和改造，批判性吸收并创造性转化其优秀成分，理性超越并抛弃其糟粕。当然，也有各种各样利用国学以谋利的机构和人士，把国学摩登化、商业化、恶俗化，但毕竟不是主流。近年质疑国学如舒芜、苏双碧等人，其关注的要点，在于国学能否促进现代化，而不是一般意义地反对国学、质疑现代化。应当说，近 20 年的国学论争，刚好反映了国学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一致。将国学作为传统资源，合理地予以阐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增添思想资源和价值选择，为本土文化的改革创新，适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而努力，正是与改革创新、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表现。近年的国学热潮，特别是学术界的国学研究，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较之近代的“国学”而言，它是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更高层次上的对民族文化价值的开掘和认同。近代“国学”的产生是“防御”，当今“国学”的出现是“自主”。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历史表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全盘苏化是失败的，全盘儒化是不现实的。在建设当代中国新型文化的时候，以现代化为目标，坚持中国化，坚持中国特色，是有极为正当的理由的。为此，正确对待国学，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和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考察，“国学”研究应当弘扬时代精神，防止不良倾向。一是要反对复古守旧，防止封建主义沉渣泛起；二是要反对把“国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三是要反对把“国学”商业化；四是要防止把“国学”儒化（亦即把“国学”片面归结为儒家思想，把“国学”等同于儒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掘、弘扬国学优秀成分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停留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考虑问题。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目标，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让国学在这样一个思维框架中立足，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是我们应当清醒认识的问题。不能把国学当成包医百病的灵药，更要反对用国学等同、取代当代新型文化建设的企图和做法。

改革创新是当今的时代精神。国学的研究和应用，应当在这个时代精神的引领之下进行，并且在这个时代精神的烛照下焕发新的生命。简单否定、排斥国学，固然是不妥的；而盲目推崇、迷信国学，也是缺乏理性的。我们需要的是平和的心态，广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对国学这个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清理，让其具有合理的民族性的一面，特别是其人民性、现代性的一面呈现出来，转化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合理成分，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港台活跃的现代化问题专家金耀基曾经说过：“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39][P8]} 国内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说：“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新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30][P33]} 反省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从“文化热”到“国学热”的论争过程，特别是考察 20 多年来的文化建设实践，放眼全球文明发展态势，我想，金、罗二先生的见解应当可以成为我们对待国学与现代化、国学与时代精神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有了这种方法论原则上的共识，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地对待国学，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才能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骆承烈. 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 [M]. 济南：齐鲁书社，2001.

- [2] 胡适.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J]. 国学季刊, 一卷一号, 1923, (1).
- [3] 吴宓. 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 [A].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第 1 卷) [C]. 转引自罗志田. 国家与学术: 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4]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5] 郑伯奇. 国民文学论 [N]. 创造周报 35 号, 1924-01-06.
- [6] 张岱年. 《国学丛书》序 [A]. 张岱年等. 国学今论 [C].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 [7] 张岱年全集 (第 7 卷)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 [8] 金景芳, 吕绍纲. 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 [J]. 哲学研究, 1995, (1).
- [9] 楼宇烈. 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 [N]. 光明日报, 2007-01-11.
- [10] 张立文. 国学的度越与建构 [J]. 理论视野, 2007, (1).
- [11] 李中华. 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 [J]. 理论视野, 2007, (1).
- [12] 纪宝成. 重估国学的价值 [N]. 南方周末, 2005-05-26.
- [13] 舒芜. “国学”质疑 [N]. 文汇报, 2006-06-28.
- [14] 蒋国保. 为“国学”正名 [N]. 文汇报, 2006-07-24.
- [15] 王生平. 跳出国学 研究国学 [J]. 哲学研究, 1994, (8).
- [16] 朱维铮. “国学”答问 [J]. 书城, 2007, (9).
- [17] 舒芜. “国学”质疑 [N]. 文汇报, 2006-06-28.
- [18] 苏双碧. 从“文化热”到“国学热”的反思 [N]. 北京日报, 2006-08-28.
- [19] 金冲及. 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不是同义词 [N]. 人民日报, 2005-02-04.
- [20] 程伟礼. 全盘西化的外衣与东方文明的躯体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
- [21] 李天承. 韩国对儒教的关心以及儒教对韩国的影响 [A]. 澳门: 《儒学理论的实践》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C]. 2007.
- [22] 连博. “国学”与各国特殊学问 [N]. 文汇报, 2006-08-01.
- [23] 邱汉生. 四书集注简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24] 李华兴, 吴嘉兴编. 梁启超选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 [25] 胡适.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J]. 读书杂志, 第八号, 1923-04-01.
- [26] 胡适.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J]. 东方杂志, 第 23 卷第 17 号, 1926, (7).
- [27] 陈独秀. 敬告青年 [J]. 青年杂志, 第 1 卷第 1 号, 1915, (9).
- [28] 陈序经. 中国文化的出路 [M]. 陈序经学术论著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 [29] 胡适. 新思潮的意义 [J]. 新青年, 第 7 卷第 1 号.
- [30] 罗荣渠主编.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31] 申报月刊, 第 2 卷第 7 号.
- [32] 蔡尚思主编.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第 4 卷)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 [33] 陈序经. 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 [J]. 独立评论, 第 43 号, 1933, (3).
- [34] 陈序经. 东西文化观 [M]. 广州: 广州岭南大学, 1937.
- [35] 文化建设, 第 1 卷第 4 期.
- [36] 毛泽东选集 (一卷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
- [37] 李宗桂. 中国文化概论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8.
- [38] 李宗桂.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 [J]. 哲学研究, 2001, (1).
- [39] 金耀基. 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 [M]. 香港: 时报出版公司, 1984.

责任编辑: 罗 萍

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原因与影响 *

李维武

[摘要] 文化保守主义在新世纪之交的再度兴起，已成为今天中国思想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一思潮的基本实质，在于力图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以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一思潮再度兴起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近 30 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所造成的思想空间的开放、主流价值观念的重建及对民族根性与民族身份的认同和保持。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巨大影响所具有的复杂性，我们要把它放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背景下予以深入而辩证的分析，既要看到其中所具有的合理的积极的内容，也要看到其中所具有的不合理的负面的内容。

[关键词] 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价值观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61; B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33-06

如果说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曾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话，那么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世界，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被研究者们普遍地视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向。从儿童读经运动到国学热，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到政治儒学的兴起，在这些近 10 年来所出现的学术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大思潮的强有力的涌动。如 2004 年，由于发生了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原道》创刊 10 周年的纪念三起引人注目的事件，被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抬头年”。^{[1](P163)} 至于以文化保守主义为自己的思想旗帜者，也大有人在。尽管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没有像 20 世纪前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产生出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更没有像这些思想前辈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什力语要》、《新事论》等具有原创性的文化保守主义哲

学代表作，但也以不同的形式作了理论形态的表达，已显示出自己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征，并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和影响，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存在和发展。这样一来，如何看待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对这一思潮作出深入的衡论，就成为当前中国思想世界研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试通过对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原因与影响的探讨，来对这个大问题作一初步的说明。

一、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

如果说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已是一个无须争议的问题，那么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则是一个还在继续探讨中的问题。研究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了不少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有的研究者把时下的读经热、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都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进而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而事实上仅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还只

* 本文系 2005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20 世纪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05JJDZH24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430072）。

是对文化保守主义所作的一种现象性把握，更何况这些热潮的参与者并不都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也有的研究者涉及到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意识到这一思潮的再度兴起关系到当代中国价值观选择问题，但却往往过于突出了其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甚至把文化保守主义视为政治意识形态中的敌对思潮，而没有注意到文化保守主义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文化观问题，即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反复探讨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从而也未能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作出准确深入的把握。

文化保守主义既然主要是回答文化观问题，那就首先必然要涉及到价值问题。这是因为，价值是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化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李凯尔特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说：“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21][P20]}在他看来，“如果把价值和文化对象分开，那么文化对象也就会因此而变成纯粹的自然了”。^{[21][P21]}因此，文化保守主义作为对文化观问题的一种回答，就是要重新估价文化价值；而具体到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作为对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的回答，其核心就在于面对西方文化而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的价值，面对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由此来看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就会发现这一思潮的最基本的实质，在于力图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以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内核，在于批判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否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与接受，强烈认肯中国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和今日世界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今日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观念，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能够起到

补偏治弊的作用。这一点，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已经很明确地讲出来了。如盛洪即言：“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说自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原来不是这样。‘保守’是一个很负面的词。为什么现在‘保守’是一个好词了呢？保守意味着珍视传统的价值。传统为什么好呢？当一种原则历经沧桑仍被人们遵循，当一种学说倍受打击后仍有人传承，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一定有什么道理。时间长，说明它已经经过试错，磨练得超越个别私利从而为社会整体带来好处；也说明它得到了世世代代人的同意。当然正如哈耶克说自己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时的心情，珍视传统价值并不意味着不变革，因为环境在变，技术在变，视野在扩展，交往在增加，但变革应是‘在传统边际上的创新’。只是在人类历史中的某些阶段，人们更多地犯抛弃传统价值的错误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应该举得高高。”^[22]

当然，在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对于新的文化价值观如何确立，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表现为不同的价值观选择。一种是极端的主张，提出重建儒教，并定儒教为国教，来重新确立当代中国人的主流信仰与主流价值。持这种主张者认为：“从当今世界上的国家来看，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主流文化起到国教的作用，来为这个国家提供主流信仰与主流价值，起到安顿人心与稳定社会的作用。在古代，儒教的国教作用是自发的，是通过民间教化、礼乐，以及士大夫对政治的参与与转化而实现的，士大夫实际上担负了西方宗教教士的功能。近代以来，因为中国文化崩溃了，儒教不可能再自发发生作用了，所以现在需要借鉴其他一些宗教的形式来重建儒教。只有重建了儒教，并且定儒教为国教，儒家价值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载体，这一组织载体（儒教）才能担负起中国文化复兴的重任。”^{[23][P30-31]}另一种是比较温和的观点，主张由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由儒学来提供民族主体价值，两者相辅相成，来重新确立当代中国人的主流信仰与主流价值。持这种主张者认为：“正如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最后范式为学主教辅一样，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也将继续维持这一格局，即以儒学为主干，以华教为辅助。当然，华教也应根据时代的需要做

适当的改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改革的儒学不但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而且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作为西方文明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结合，预示着中西文化融合进入实质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共同构成的基本价值体系的推动下，中华文明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⑨尽管这些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有所不同，但从中都显示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在于力图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以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由此来看近 10 年来中国思想世界的种种思想动向，如对“五四”以来传统的颠覆性评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的寻根性回归，读经热、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发展，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政治儒学的兴起，等等，就不难把握其间的一以贯之的实质性的东西了。尽管这些学术文化动向，主张各异，特征不同，其表象形态有的相距甚远，但究其指归，其实都在于对文化价值观的重新选择和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重新建构。可以说，只有抓住了这一关键，才能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实质作出准确而深入的把握；而其他的种种相关的学术文化现象，也就能够据此得到本质的说明。

二、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原因

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的原因，近年来研究者们也多有探讨，仁智各见。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从整个世界范围看，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二元化，亦即现代主流价值和民族主体价值并行的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从而促成了非西方民族对自己民族主体价值的重视与回归。也有的研究者认为，近 20 年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以至近年来现代新儒学研究与尊孔崇儒的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已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海外及中国港台新儒家带着政治目的“反哺”中国大陆和大陆知识界一些人与之呼应的产物。这些见解，可以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未能真正揭示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本原因。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的根本原因，其实应当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指示，到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去寻找。

从根本上说，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大思潮的再度兴起，是与近 30 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所发生的大变迁相联系的。近 30 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对促成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本原因。这种影响，择其大者，有三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近 30 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逐渐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空间，使之由原来大一统的格局转变为多元的格局。这种思想空间的开放，其间经过了许多的曲折，但从大的走向上看，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的深化，对外开放的格局，多元经济的出现，网络时代的到来，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在促成思想空间的开放。在今天的中国思想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这些思潮既相互激荡，又彼此吸取。这一点，不论是对学术界还是对执政党，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从学术界看，一些研究者已经从理论上对此作出了分析，如许纪霖指出：“1980 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知识圈内部，基本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化权力场域：以重新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以现代学院体制知识分子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学术界和以民间的、跨学科的公共领域为活动空间的公共思想界。”^{⑩(P1)} 这就相当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思想空间的多元化现实。从执政党看，同样没有回避这一现实，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⑪ 这是就中国思想空间的多元化提出的总体对策，其前提当然是中国思想空间的多元化现实。正是由于中国思想空间的这种新变化，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思想空间，使得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再度兴起成为可能。

其二，近 30 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使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首先是在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随着近 30 年来改革开

放的逐渐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首先由以政治生活为中心转向了以经济生活为中心；而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又很快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系列的大变局，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一个重个体、重利益、重效率的多元的开放的新的生活世界。这个新的生活世界，与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长期生活于其中的那个重整体、重精神、重平等的统一的半封闭的生活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随着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原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价值体系，本是在原有的生活世界上建构的，本是适应于原有的生活世界的，现在已不能适应新的生活世界，而出现了动摇和解构。这一点，邓小平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已敏锐地指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8](P306)} 所谓“一手比较硬”，这是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生活的大发展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大变化；所谓“一手比较软”，则形象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价值体系由于生活世界的巨大变迁所遭遇的困境。如何来解决价值观念的危机？用什么来代替那些已经动摇和解构的主流价值体系？这就成为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大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就反映了这种价值观念的危机，反映了面对这种危机的焦虑、不安与新的寻求。由于中国的思想空间的逐渐开放，使得这种新的寻求有可能以多元的形式展开，即不再只是原有的主流价值体系的自我调整与重建，而会有新的思潮起来参加重建主流价值体系的竞争。如实而论，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一新形势，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建构适应新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及时地重建主流价值体系，因而没有能够有效地增强自己在中国思想世界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正是这样，人们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之外去寻找新的途径和新的资源，来实现主流价值体系的重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目光投向与中国人联系最为密切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主流价值体系的儒家思想，从中寻找重建主流价值体系的途径和资源。文化保守主义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而再度兴起，并在这种思想

竞争中逐渐扩大影响，发展起来的。

其三，近 30 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使中国面对世界，开放门户，加速融入到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这一进程对于发展中的非西方民族国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运动。特别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更使得这一进程成为世界历史的唯一主流运动。它给进入这一进程的非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两重性：一方面，发展中的非西方民族国家可以通过这一进程充分吸取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合理内容和积极成果，包括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加速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发展中的非西方民族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必然面对西方文化的优势和霸权，自觉或不自觉地全面认同西方文化，消解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而失去自己的民族根性和民族身份。正是这样，发展中的非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在尽可能地吸取西方文化的一切长处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包括保持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提问与思考的方式、自己的民族精神，即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文化内容与文化传统，以认同与保持自己的民族根性和民族身份。面对世界历史运动的这种情势，不可避免地触发非西方民族国家中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保存民族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对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反抗。这个问题，当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即已明确地提出：“到了此时，已然问到两文化最后的根本了。现在对于东西文化的问题，差不多是要问：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咽喉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9](P335)} 梁漱溟所关注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首先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优势和霸权下的生存问题。而梁漱溟当年所面对的问题，在今天更加融入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同样严峻地存在着，从而引发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回归，促使文化保守主义不可避免地再度兴起。著名学者庞朴

在宣布自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时，就明确地表明自己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的。他说：“全球化这个东西要分析。现在有人说全球化是‘双刃剑’、有两面性等等；有人认为这是历史趋势、大势所趋。我认为，全球化在经济、科学技术上正面因素是主要的，在文化上负面因素是主要的。我们的对策就是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去接受，在文化上一定要清醒，要注意保持、建设我们的‘软实力’。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美国的那些东西就是全球的，那其实是美国文化。你如果误认为那是全球化，去顶礼膜拜，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找不着自己了。对全球化，我们在文化上一定要抵制，一定要保住守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要树立文化上的强势心理——我承认，在经济、科技上我们是比你差，但我们在文化上并不比你差。”^[1] 在今天主张或赞同文化保守主义的人们中，庞朴的这一心态和看法是颇有代表性的。

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本原因，实存在于近 30 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大思潮的再度兴起，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展，更不是几个海外或台湾新儒家人物来中国内地讲学作报告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李大钊当年用唯物史观论析新文化运动产生原因时曾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11] (P147)} 我们今天看待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再度兴起时，也应当持这种唯物史观的态度，从社会历史变迁中发现这一思潮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作出正确而深刻的说明。

三、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既然根源于近 30 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因此就必然不会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而能够产生相当强的生命力与相当大的影响力。事实也正是这样：经过近 10 来年的开展，文化保守主义已成为中国思想世界一大有影响力的思潮。但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除了从社会历史根源上作出基本的说明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作更具体的分析。

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今天的文化保守主

义的影响力之巨大，已远非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力所能比拟。为什么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既没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又没有写出具有原创性的文化保守主义哲学代表作，反倒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这里既有思想走向上的原因，也有传播工具与传播手段上的原因。

从思想走向上看，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在思想走向上呈现出相反的方向。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对文化观问题作出探讨后，着重由此而向上开展，进入到本体论问题的层面，试图通过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来抽象地说明他们所要探寻的新的文化价值观。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以及熊十力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都是如此。唯独梁漱溟是一个例外，曾走出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斋，长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和民主政党运动。而这种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工作，尽管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但对于社会生活、对于广大民众确实影响不大。而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在对文化观问题作出探讨后，便直接向下开展，立基于现实生活世界，来落实所要确立的新的文化价值观，或进入到政治哲学层面，提出一套政治儒学的主张；或进入到教育活动领域，开展从倡导儿童读经、创办书院讲学到推动建立大学国学班、国学院、国学专业等多种教育活动。这一向下的开展，立基于现实生活的开展，使得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直接切入到中国人当下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人生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与社会生活、与广大民众有了直接的联系，从而促成和推动了时下的读经热、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产生了比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要大得多的影响。仅从儿童读经运动看，在近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深圳等地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万儿童先后投身其中，受其影响的成年人超过六百万人”。^{[12] (P14)}

从传播工具与传播手段上看，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比，已不再停留在哲学专著、大学课堂上，而是充分运用了电视、电脑、光盘与网络，自觉而迅速地实现了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现代化与大众化。在

今天，各种蕴含文化保守主义意味的人文讲座，已成为重要的电视节目，以其既理性又生动的形式，给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光盘在胎教读经中的重要作用，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中有专门的说明：“怀胎母亲即可有选择地诵读《诵本》，特别是有选择地反复聆听随《诵本》发行的CD光盘课文朗读，让胎儿在生命的最初形成阶段就受到圣贤经典的熏陶，就感到圣贤声音的抚爱，从而对圣贤及经典产生亲和力与仰慕心，出生后诵读圣贤经典无难矣。”^{[13][17]}互联网的出现与网络写作的迅速发展，则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由地发表议论、开展争论，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载体和传媒，使之迅速地在不同人群中传播，造成远非纸质的书籍报刊所能比拟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如胡晓明编的关于读经问题争论的文集《读经：启蒙还是蒙昧？》，其中大多数文章即来源网上，因而又以《来自民间的声音》为文集的副标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时代的到来成为促成中国思想空间开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尽管文化保守主义以保守中国传统文化为旗帜，但并不排斥使用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与传播手段，甚至可以说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凭借这些工具与手段来发挥其影响力的。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具有复杂性。对于这种影响的复杂性需要放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背景下予以深入而辩证的分析，既要看到其中具有的合理的积极的内容，也要看到其中具有的不合理的负面的内容。

文化保守主义面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以寻求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至少在三个方面发生了合理的积极的影响。其一，尖锐地揭示和批判了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主张以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来对抗西方文化的软实力。这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根性和民族身份是一种有力的强化，对于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是一种有力的鼓舞，对于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

文化霸权主义是一种有力的消解。其二，明确地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重构，必须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承继相接续，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其三，促进了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也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关注与爱好，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对于中国大众的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时，文化保守主义又具有不合理的负面影响，这在一些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明显地表现出来，尤其在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当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作高扬与凸显时，由于其鲜明的保守性，往往遮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遮蔽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意义，遮蔽了中国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背景下由传统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生成的中国新文化及其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作了根本性的否定，而力图割断并抛弃这一段文化发展，而把今天的中国文化发展与前近代的中国文化发展直接衔接起来。其二，与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生成的中国新文化及其传统的根本性否定相联系，一些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与发展亦视为“西化”的产物，而持贬抑、排斥甚至否定的态度。这就从文化保守主义中进一步向下发展出了政治儒学，力图对当代的中国政治制度作出重新设计。^[14]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儒学，两者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相同。前者是回答文化观问题，后者则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紧张关系也是不同的，但两者间的密切联系却又是明显易见的。

总之，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要作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方面要认肯和重视文化保守主义的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另一方面要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合理的负面的内容进行批判。那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我们都是不赞成的。

(下转第 45 页)

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及儒学 *

陈卫平

[摘要] 从历史经验、解读方法、思想内容、价值取向、主要渠道等方面来看，当代中国普及儒学需要注意以下五方面问题：一、制度层面与义理层面；二、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三、通俗性与深刻性；四、学做圣贤与平民化人格；五、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文章由此对当前的儒学普及作了分析，批评了某些倾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儒学普及 历史经验 解读方法 思想内容 价值取向 主要渠道

(中图分类号) B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39-07

现今所谓的“国学热”，重头戏是儒学的普及。央视“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是儒学普及的典型。由此引发的种种议论，涉及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普及儒学？我以为这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历史经验：制度层面与义理层面

儒学曾经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整个社会认同的核心价值。从历史上看，如此的认同过程与儒学的有效普及是分不开的，而这样的有效性来自于制度层面和义理层面的结合。

儒学在先秦只是诸子之一，将其确立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起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然而，正如帕森斯所说：“价值系统自身不会自动地‘实现’，而要通过有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1] (P141)} 实际上，“独尊儒术”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设计。陈寅恪曾经指出儒学在汉唐间通过制度安排得到普及，从而确立了核心价值的地位：“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易》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之具体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2] (P51)} 事实上，汉代在“独尊儒术”之后，从义理层面阐释儒学的普及读物不流行。受到汉初黄老思潮的影响，道家著作倒是当时流行的普及读物。《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拿出《老子》问儒生博士辕固生：“这是什么书？”辕固生答曰：“此是家人言耳。”所谓“家人言”，就是平常百姓看的普及读物。这不仅表现了汉儒对道家的藐视，也表现了汉儒对普及读物的不屑。确实，汉代最具权威的阐释儒学义理的著作《白虎通》俨然是一副高头讲章的面孔。《白虎通》的宗旨是树立三纲六纪，但这三纲六纪是通过制度层面而真正得到普及的。

* 本文系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T0406)成果。

作者简介 陈卫平，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对此陈寅恪说道：“晋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失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9][P6]}这就点出了汉唐间儒学普及与制度层面的紧密关联。

汉魏以降，佛学传入，至隋唐而大盛。所谓“三教鼎立”其实是儒学消退，而佛道二教的影响力增大，儒学作为核心价值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佛学善于从义理层面上普及自己的学说，其手段就是运用韵文体的偈颂以及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而儒学依然拘泥于南北朝以来的正义疏之繁琐章句，如陈寅恪指出的，唐代“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10][P28]}正是有鉴于此，宋明理学十分重视从义理层面上普及儒学。比如，兴办书院，举行讲会，向民众宣讲；编写《温公家训》、《家礼》等家庭教育的读本；编写《三字经》、《童蒙须知》、《小学韵语》、《蒙学诗教》等童蒙读物。这些读本往往采取了韵文体，便于口诵记忆，很快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同时，宋明理学也进一步对制度层面的儒学普及作了补充。这突出表现在乡规民约的创制，著名的有吕大钧的《吕氏乡约》、王阳明的《南赣乡约》等。由于宋明理学的儒学普及较好地做到了制度层面和义理层面的结合，因而卓有成效地使得儒学再度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当下对于儒学的普及多侧重于义理层面，然而，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儒学并不能改变其现代的“游魂”命运，即只是一种论说，而离现代的人伦日用越来越远。余英时认为，要摆脱这种命运，应当考虑“怎样在儒学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而这“将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11][P7]}所以，我们今天普及儒学更需要探讨怎样解决这个不易解决的问题。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如何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上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12]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儒学在制度层面上的普及才有可能。

二、解读方法：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

普及儒学自然离不开对儒学经典文本的解读。儒学经典的解读在历史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方法：“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前者倾力于历史的客观考证，以确认文本的本义；后者注重于解读者的主观领悟，以引申出文本的现时代意蕴。自汉代至清末，儒学经典正是在这两种方式反复交替、双向同构的过程中，获得了历史典籍的客观性和不断注入时代精神的常青性。这两种解读经典的方法，如果借用西方诠释学理论来讲，“我注六经”近似西方古典解释学和19世纪传统解释学，“六经注我”则与西方伽达默尔创立的现代解释学相类。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为“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13][P422]}这意味着“六经注我”的方法认为阐发儒学经典的意义要比确证文本的本义更重要。普及儒学的文本解读方法，显然主要不是细密繁复考据的“我注六经”，而是着眼于现代实际意义的“六经注我”。于丹在其《论语》心得里提到了这两种方式，并认为后一种方式“是更高境界的学习”，因为其“目的是以经典所传达的精神来诠释自己的生命”。^[14]事实上，她的成功就在于采用了这种方法。

由于是“六经注我”，不可避免地在解读文本意义上会出现一些失误。这就是于丹批评者所指出的“硬伤”。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六经注我”作为解读儒学经典主要方法的理由。因为即使是强调考证文本本义的“我注六经”，所做出的解读也不可能都是绝对正确无误的。对于《论语》来说，要求解读者所说的全是千真万确的本义，更是不可能。《论语》由语录组成，若要确证其本义，必须还原其具体的语境，因为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含意是不同的。而要还原语录的具体语境，必要条件之一，是对对话双方的经历、身份、关系，对话的主题和背景有确切的把握。但是，《论语》中很多语录只有“子曰”而没有对曰者和对话的主题，也有很多语录有对曰者和对话主题，但对曰者的身世以及与孔子的关系已经无从查考，因而对话主题的具体指向也就不甚了了，有的对曰者的身世以及与孔子的关系，我们略有所知，但不清楚对话的具体背景（时间、地点）。就是说，要完全还原具体语境是做不到的。因此很难

^①本文所引《于丹 论语 心得》，均以中华书局2006年版为准。

断定哪一种解读是最合乎本义的。其实，任何历史文本的原貌都无法绝对重现。黑格尔对此有过形象生动的说明：流传下来的古代艺术品，“是已经从树上摘下来的美丽果实，一个友好的命运把这些艺术作品传递给我们，就像一个少女把那些果实呈献给我们那样。这里没有它们具体存在的真实生命，没有长有这些果实的果树，没有构成它们的实体的土壤和要素，也没有决定它们的特性的气候，更没有支配它们成长过程的一年四季的变换。同样，命运把那些古代的艺术品给予我们，但却没有把它们的周围世界，没有把那些艺术品在其中开花结果的当时伦理生活的春天和夏天一并给予我们，而给予我们的只是对这种现实性的朦胧的回忆”。^{[8](P231)} 就是说，由于与古代艺术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背景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得到的只能是对它们的“朦胧的回忆”。

不过，作为回忆哪怕是朦胧的回忆，总是对原貌的回忆。因此“六经注我”也需要以考究文本本义的“我注六经”为前提。所以，确证文本本义的困难，不意味着可以对文本作随意的解读。以《论语》来说，其每字、每词的确切涵义以及每段语录的基本精神已有得到公认的“我注六经”的很多成果。如果释义完全不顾这些成果而恣意发挥，那是一定会曲解《论语》的。唐代高泽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蒙琐言》都记载了唐代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把“三十而立”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这样的错误是不能以“六经注我”来辩解的。总之，普及儒学的解读文本方法应该是：在尊重“我注六经”基础上的“六经注我”。

三、思想内容：通俗性与深刻性

普及儒学的对象是非专业的学术研究人员，面向“下里巴人”的大众，当然要注重思想内容的通俗性，否则就谈不上普及。然而，儒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主要在于其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如果我们的儒学普及完全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儒学普及就和听评书、讲故事差不多了。事实上，现在充斥媒体和书市普及儒学的讲坛、读物，已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娱乐化倾向。

于丹的《论语》心得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在于改变了以往人们把经典看作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的观念，使得《论语》亲切地走向寻常百姓。这是值得肯定的。之所以能如此，是于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俗地把《论语》的思想内容娓娓道来：轻松的话语和文体，不时穿插一些有趣浅显的故事、寓言和生活事例。可惜，于丹的《论语》心得只停留于这样的技术层面上的通俗化，而缺乏思想的深度。罗素研究西方哲学史时说过：“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9](P143)} 这告诉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最富有结果的哲学流派——孔子创立的儒学，只有揭示其内在的思想矛盾，才能真正认识其部分正确之处。但我们在于丹心得中看到的，恰恰是躲开了《论语》中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她可以讲“天何言哉”的无言之教而不理会“有德者必有言”的德者言教；可以讲孔子对待学生“很少疾言厉色”的和蔼可亲而不提用“朽木、粪土”来评价学生的粗鲁训斥；可以讲孔子推崇“贫而乐”的超脱境界而回避“我待贾者也”的功利追求；可以讲“孔子从来不主张你去结交富豪和有权势的人”而不管“子见南子”的依附权贵……。这和《西厢记》里的红娘引《论语》倒很相似。由于不愿剖析《论语》的内在矛盾，于丹的心得就没有了深刻分析的思想力度。如果这样来普及《论语》，那么大众对《论语》的认识也许不会比700年前的红娘们提高多少。

这就是说，通俗化解读儒家典籍，不仅要顾及技术层面的语言鲜活、叙述生动，更要体现思想层面的深刻内涵。于丹的《论语》心得，讲了一个豪猪的寓言：豪猪们经过多次磨合，找到了彼此既不伤害又能取暖的最为适当的距离；以此说明孔子“过犹不及”的中庸，体现了“距离和独立是对人格的一种尊重”的处世之道。无独有偶，鲁迅在《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中也把这个寓言和孔子的中庸连在了一起，他说：叔本华在这个寓言里把绅士比作豪猪，使豪猪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

让’和‘生流的风习’。有不守这距离的，在英国就这样叫，‘Keep your distance!’但即使这样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间才有效力罢，因为它们彼此的守着距离，原因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有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这里指出了弱者只有用“刺”去抵抗强者的压迫，才能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孔子的“礼让”、“中庸”则缺乏这一点。以同样的寓言来通俗地说孔子，鲁迅比之于丹显然要深刻得多，因为他让人们洞察了儒学“礼让”、“中庸”包含的人道与非人道的内在紧张。这里的本意不是要比较鲁迅与于丹的思想谁深刻，而是要说明通俗地解读《论语》，并不一定非要以牺牲思想的深刻性为代价。

这是因为通俗性和深刻性并不矛盾。通俗就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对所论述的对象有通透的把握，而通透正是深刻的一种表现。因此通俗不是对深刻的弃置，恰恰是深刻的出发点。当然，通透是需要学术功力的。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缺乏深刻性，学术功力肤浅是重要的原因。比如，于丹两次提到陶渊明，把他作为在孔孟之道照耀下成长的典范，说他将“儒家思想传承下来”，成了“中国的隐逸之宗”，“生活的条件虽极其简陋，但他活得却很快乐”，是“内心富足的君子”。其实，尽管陶渊明早年崇拜孔子，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但他既以“隐逸之宗”闻名于世，其人格形象显然主要是道家的“隐士”，而不是儒家的“君子”。于丹把“隐逸之宗”与“君子”拉扯在一起，恐怕不仅是与其不知晓学术界关于儒、道两家理想人格基本分野的共识有关；恐怕也与其没有通读陶渊明的作品有关。其实，陶渊明本身很清楚自己向往的“隐士”是孔子所反对的。《论语》中所出现的“隐士”荷蓀丈人、长沮、桀溺均与孔子的人格理想不合，这是明白无疑的。而陶渊明在作品中则表示了对他们的向往与赞叹：“宿昔不梦寐，欣然起彷徨”；（《归园田居·其一》）“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四》）“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五》）“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六》）反复歌颂这三位被孔子拒斥的“隐士”，表明了陶渊明是以他们为理想人格的。如果于丹认真读过这些诗作，怎么也不会把陶渊明当作遵循儒家思想的人格典范；相反倒是有可能从陶渊明的由儒入道来深刻地揭示儒学的人生理想的内涵。

这里指出普及儒学中做到通俗性和深刻性的统一，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力作基础，意在强调把普及儒学所需要的通俗性异化为“草根儒学”是不足取的，因为所谓的“草根儒学”实际上是有“俗”而不“通”。但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学术功力达到什么程度当作是否能够成为儒学普及者的“入门线”，而是要求儒学普及者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学术功力，千万不要以为是通俗而掉以轻心。

四、价值取向：学做圣贤与平民化人格

任何时期的普及儒学总是有着某种价值取向的。那么，我们今天普及儒学应当有怎样的价值取向呢？于丹“心得”扉页上，首先写的是“道不远人”，表明其重在阐发《论语》的人生智慧。现在的儒学普及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路子。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论语》以致整个儒学都是以“成仁成德”即“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根本的。

儒学推崇“孔颜之乐”，要求人们学做圣贤。于丹以此为价值取向，其“心得”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在圣贤的光芒下学习成长”；“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在我看来，把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笼罩在儒学圣贤人格的光环之下，将前者的培养视为学习、践履后者的过程，并不是正确的价值取向。且不说儒学圣贤人格有着戕害、扭曲健全人格的一面（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雷雨》，都对此作了形象的揭示），即便没有这一面，我们也不能把儒学圣贤人格树为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冯契在考察了中国近代（1840-1949年）哲学史之

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于“新人”、“新民”的呼唤，就是要树立新的人格理想，其趋向是用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来取代儒学的圣贤人格。^{[10](P580)} 中国人格理想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圣贤人格隐退而平民化人格涌现的过程。事实的确如此。1934年胡适发表《锐儒》，肯定孔子有高尚的人格，然而针对当时以孔子之道救治人欲横流之世道的主张，他指出近20、30年已经涌现出了比儒学圣贤更伟大的人格，如孙中山、蔡元培、张伯苓等，而这“不是孔夫子所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有成功的”。^{[11](P418)} 在现代中国坚持儒学圣贤人格理想，并作了最深入哲学论证的是冯友兰的《新原人》。但他感到了把儒学圣贤作为理想人格在现代社会的困境，因而写了《新世训》。此书又称“生活方法新论”，其“新”之所在，就是不同于宋明理学道德（天理）与不道德（人欲）的两极对峙，突出了“非道德”即介于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道德中性的生活方法的意义；实现了“完全道德底”生活方法，就是圣人，而“非道德底”生活方法则是“为一般人说的”。就是说，《新世训》强调的是适合现代普通人的生活方法。可见，他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保持传统儒学的圣贤人格，是不适合绝大多数人的。《新世训》和《新原人》的不同人格设计，反映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人格理想变迁过程的深刻矛盾：既希望规范现代社会的人生行为，又试图延续儒学的圣贤人格。正是因为解决不了这样的矛盾，《新原人》延续儒学圣贤人格的希望只能是与现实疏远的空洞境界。正如张申府评论《新原人》时所说：“‘与境为乐’不能说不好，但中国过去一些哲学家却常是耽于自己的幻想。在国家民穷财尽、兵荒马乱的时候，而徒自觉‘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正是陷入此等幻境中。说宋儒达到中国一种极境，其实是由一种偏好”。^{[12](P616)} 这意味着如果以儒学圣贤为现代人格理想，那么就不可能“道不远人”，而是“人远离道”了。因此，今天普及儒学不是要以重新学做圣贤为价值取向，而是要以汲取儒学的人生智慧，进一步构建中国近代以来的平民化人格为价值取向。

事实上，儒学圣贤人格理论蕴涵着值得平民化人格理想重视的思想资源。儒学圣贤人格将圣人和君子作为理想人格，不过，现实中是看不到作为人格最高典范的圣人，看到的只是君子，“圣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之所以要设定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圣人，是为了强调人格完善是无止境的，使社会成员始终具有超越现实之我的动力。而君子并非完美无缺，但对于过错能勤于反省和勇于改正。君子亦会犯过错，这使得其具有平易的现实性品格，但如果对圣人人格的追求，就不可能勤于反省和勇于改正。可见，圣人和君子作为理想人格具有互补关系：前者使其具有超越性，而正是这样的超越性使后者得以落实，后者使其具有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使得前者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其实平民化人格构建借鉴了这样的互补关系。所谓“平民化”是指向现实和大众的，而作为理想人格，又不是现实大众直接现成的，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从历史嬗变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的平民化人格对于儒学圣贤人格是接续式的取代。这就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可以而且应当是对传统的“接着讲”；如何实现这样的“接着讲”才是儒学普及的价值取向。

五、主要渠道：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

大众传媒在今天已经成为最为有效的信息传播载体。它们在当下的中国也成了儒学普及的主要渠道。于丹如果不是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说《论语》，她的“心得”很可能没什么人问津。随之而起，众多的电视媒体都在炮制类似的普及儒学的老酒，听众同样听得如痴如醉。这对于现代社会如何普及儒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然而，大众传媒充当儒学普及的主力军，这映照出当代学校教育的一大明显缺失，即缺少良好的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现在不要说中小学生，即使是受过大学文科专业教育的，传统文化的知识也非常匮乏，绝大多数不具备直接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能力，一旦离开学校，就不知道如何提高传统文化素养，读什么传统典籍。正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人痴迷于《百家讲坛》的坛坛“好酒”，心甘情愿地喝着从别人嘴里吞吐出来的老酒，而无法品尝原汁原味的琼浆玉液；才有那么多人倾心于讲故事式的解读文史经典的读物，咬着别人咬过的馍舍不得放下，而不能咀嚼先辈

笼屉里的香饽饽。其实，在现代社会，学校应当成为普及儒学的主渠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商业化时代的大众传媒不管做什么节目，总免不了有炒作的成分，而炒作或多或少会使儒学普及沾上娱乐化和恶俗化的灰尘；更主要的是因为使学校成为儒学普及的主渠道，正是上述在儒学价值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建立制度性联系的重要方面。

从历史上看，宋代以后儒学得到有效的普及，再度成了社会核心价值，这和学校教育作为儒学普及的主渠道有着紧密的关系。宋代以后官学系统主要由府学、州学、县学组成，但它们实际上是科举预备班，没有承担普及儒学的任务。对儒学进行普及的是执行初级教育的村学、乡学、社学、义塾。吕坤《社学要略》对此有记载：“掌印官晓喻百姓，今后子弟，可读书之年，即送社学读书，纵使穷忙，也须十月以后在学三月以后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无可望，省令归业。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即使家贫农忙，冬闲期间也须在学，而所学的主要内容是“教化”，即普及儒学思想。如《社学要略》所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先读《三字经》，以广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还讲授“近世教民俗语，及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其实，《三字经》、《百家姓》同样渗透了儒学义理。由此可见，宋代以后初级教育成了儒学普及的主要渠道。

从东亚比较成功普及儒学的国家新加坡和韩国来看，也是以学校教育作为儒学普及的主渠道。1982年2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宣布，要把“儒家伦理”作为中学三、四年级学生道德教育的选修课程。为此邀请了杜维明等8位儒学研究者进行规划。从杜维明的《新加坡开设中学儒家伦理课程方法刍议》中，可以看到这门课程在普及儒学方面是非常系统的。第一，“根据合乎逻辑的次序讲授儒家伦理”，不能“误认为儒家伦理体系缺乏其内在逻辑”。第二，“注意力应集中于基本资料，即与整个儒家传统的缔造者密切相关的儒家典籍遗产”，并且对这些基本资料的比例作了分配，即“古典儒家思想，60%；新儒家思想，30%；现代儒家思想，10%”。第三，“为了使教材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形式出现，应当避免仅仅罗列‘汝应’和‘汝勿’，而对于这些嘱咐里包含的道德推理不加以适当解释的教条主义做法”。此外，还要进行师资培养、获得学术界的参与和社会支持等。^{[13] (P226-242)} 在韩国，乡校、社学至今依然是学校教育的一个方面，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普及韩国的儒学传统。现在韩国大约有234所乡校，每逢假期，乡校为7岁到14岁的少年开设忠孝礼仪体验课程，学生必须穿着传统韩服上课，学习传统的生活礼节；也为成年人举行传统成年礼仪和传统婚礼，还举办耆老宴并表彰孝行者和善行者。总之，“乡校通过各种中小规模的课程和传统仪式，为当地居民提供实践传统儒家礼节的标准，使得一般韩国人能够体会到儒教的生活方式与儒教的价值观念”。^[14]

如果说上面是从正面表明了应当以学校教育作为儒学普及的主渠道，那么下面的例子则从反面表明了这一点。儒学也被称作“礼教”，这实际上是道出了礼仪教育对于普及儒学价值观念的重要性。从孔子开始，儒学就把礼仪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据《论语·季氏》，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特殊的传授吧？”孔鲤回答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大家是一样的”；这一样的教育中就有“不学礼，无以立”。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批判儒学礼教以来，传统的礼仪教育在学校里消失了。于是，传统礼仪很快就被遗忘了。最显著的例子是，1925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的鲁迅收到该校学生许广平的信，鲁迅在回信中称“广平兄”，许广平疑惑不解，在接着的回信中问道：“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15] (P17)} 其实鲁迅并没有与其开称兄道弟的玩笑，“兄”在传统书信礼仪中，和“同学”、“弟”一样，也是老师对学生辈的普通称呼。当时离开清朝的推翻只有14年，离开“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多也只有10年光景，许广平已经完全不知道这一传统师生礼仪的称呼了。可见，由于传统礼仪不再成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其流失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依然不把学校教育作为儒学普及的主要渠道，那么尽管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把儒学普及搞得很有声势，但这并不能使儒学得到真正有效的普及。

[参考文献]

- [1] 帕森斯. 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过程 [M].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8.
- [2] 陈寅恪.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A].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3] 陈寅恪. 寅恪先生诗存 [M]. 寒柳堂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 陈寅恪. 论韩愈 [A]. 胡晓明, 傅杰主编. 释中国 (第2卷)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 [5] 余英时. 现代儒学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6] 陈卫平. 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6, (6).
- [7]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 [8]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下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9]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下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 [10] 冯契.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11] 胡适.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A]. 胡适文集 (第5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2] 张申府. 新原人与新原道 [A]. 张申府文集 (第2卷)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杜维明. 新加坡开设中学儒家伦理课程方法刍议 [A]. 杜维明文集 (第2卷) [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 [14] [韩] 金惠林. 韩国儒家文化的保护及弘扬 [N]. 社会科学报, 2007-04-26.
- [15] 鲁迅全集 (第11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罗 萍

(上接第38页)

[参考文献]

- [1] 陈壁生. 2004: 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 [A]. 读经: 启蒙还是蒙昧?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2] 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3] 盛洪. 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应该举得高高 [Z].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07-16.
- [4] 读经、儒教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访谈录 [A]. 读经: 启蒙还是蒙昧?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5] 郭沂. 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 [J]. 哲学动态, 2007, (3).
- [6] 许纪霖, 罗岗等. 启蒙的自我瓦解: 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
- [7]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 人民日报, 2007-10-
- 25.
- [8]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9]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M]. 梁漱溟全集 (第1卷)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 [10] 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庞朴先生访谈 [J]. 博览群书, 2004, (9).
- [11] 李大钊.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A].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2] 读经运动: 重寻古典智慧——王财贵博士访谈录 [A]. 读经: 启蒙还是蒙昧?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13] 蒋庆. 《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 [A]. 读经: 启蒙还是蒙昧?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14] 李维武. 政治儒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 [J]. 求是学刊, 2006, (6).

责任编辑: 罗 萍

20 世纪儒学的三次转折

景海峰

[摘要] 儒学自清末以来，经历了西学的冲击、学科化的置换过程和哲学性的洗礼。在现代社会结构根本改变和政治化的强力批判之下，儒学失去了它原有的形态，先是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中化为古典材料和国故，成就了所谓“国学”；继而脱开历史学的有限庇护，通过哲学思辨体系的创造，突显和凝固了超越时代性变化的那些永恒价值。在全球互动与文明对话的新形势下，儒学又获得了打破封闭、走出书斋的机遇。随着中国的崛起，它将逐步走向世界，也将终究回归于现实的生活。

[关键词] 儒学 经学 国学 中国哲学 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46-07

儒学在近百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现实境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工业化、都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思想决裂、意识形态批判的反复挤压之下，儒学已经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一变而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并极度地边缘化和隐匿化了。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之中，儒学遭遇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其一，工业化过程逐步瓦解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村社结构和它的宗法形式均出现崩裂，聚落、宗族、家庭，以及人际间的关系，都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建立在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态基础之上的文化原核和它的宏大叙事，在本根上遭到了质疑和颠覆，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由原本丰沃变得日渐贫瘠。其二，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流行儒学的东亚地区都经历了类似的工业化冲击，而致使传统儒学遭遇到危机乃至解体的话，那么，中国比之韩国、日本等就更多了一重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使得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命运更显得凄凉和悲惨。

一、经学时代的结束：从经学到国学

儒学自汉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上自王朝政治，下至百姓日用，无不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作为运作和操盘的准绳；而在相当长的时段内，甚至百术尽黜、一家独显，取得了至尊之地位。儒学的基本理论以“五经”为依归（宋以后是“四书五经”），以经学为外在的攀缘形式，代相传递，延迤展开，虽时有调整，但质无变更。这样一种形态发展到清末，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考据学术的衰落和经学的逐步瓦解，使得儒学处在了破碎和漂散的状态。当时，清政府的新政举措、废科举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出现，在社会动荡和近代化过程冲击之下农业村社的逐渐解体和宗族制度的趋于瓦解，特别是在如潮之西学中开始产生出来的新型知识阶层，这些因素使得儒学一下顿失其所、无处依止，在变化了的社会结构中再也找不到消除危机、走出困境的资源。陈黻宸（1859-1917年）在《经术大同说》（1903年）中有一段话颇能道出当时的情景：“况于今日，时势所趋，而百家诸子之见排于汉初者，今日骎骎乎有中兴之象，则皆与我经为敌者也。环海信道，学术之自彼方至者，新义

作者简介 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广东 深圳，518060）。

迥出，雄视古今，则又皆我经所未道者也。”^{[1](P539)} 所谓来自内部的“为敌者”，当然包括了晚清诸巨子。今、古文两家，除了表彰诸子、涉猎佛学之外，无一不仰慕西学。康有为（1858-1927年）在1879年之后便已努力不竭地吸收着西方的知识。^{[2](P432)} 章太炎（1869-1936年）至迟在《訄兰室札记》（1893年）中已经引用了西书来诠释诸子，^① 其后走出诂经精舍，到上海参加维新活动，接触和吸纳西学的天地更是洞开。他随后两渡扶桑，新知大增，以诸子批儒、“激而诋孔”之时，也是其学习西学最为勇猛精进之日。所以，从经学阵营中冲杀出来的诸今古文大师，一手复活了“见排于汉初”的百家诸子，一手援引了“自彼方至者，新义迥出，雄视古今”的西学。

当然，在内外夹击的火力当中，最具杀伤力的还是来自“新学”阵营的人物。以孔子缘饰改良，以国粹激励保种，总还有一点儒学的话语权在里面；而“新学”则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甚至可以和中国传统学术了不相涉，这就使得儒学完全处在了无从置喙、瞠目结舌的失语状态。清末渐次输入的西学，戊戌变法之后慢慢地系统化了，开始出现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客观性描述著作和引进这些学科的强烈呼声，这就和戊戌之前笼统地将西学称之为“格致之学”、以与中学相对应的情景有了根本的不同。纯西化的“新学”，可以避开以中学来“格义”西学的尴尬，以及比较中西之时难免陷于“附会”的无奈，而直截了当地将西方学术做全盘的引进。清末的新式学堂原本已传授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流风所及，“格致镜原”、“地球韵言”一类的课目在社会上开始得到相当的普及。而到20世纪初年，向往将西方的社会科学也如法炮制地引入国内的更是大有人在，随着严复（1853-1921年）数种译著的出现，这些相关的科目也渐渐地为人们所熟悉。严复所谓“窃愚”，“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名义上无分中西，实则是去中就西。因为只要能“疗贫起弱”，“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3](P560)} 这在儒学极度衰微、人文学术层面出现真空的状态下，西方的各门社会科学极有可能是长驱直入，反做“生公”。传统学术不但丧失其实，名分亦难保，面临着被彻底遗落的局面。旧派人物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纷纷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如张之洞（1837-1909年）等人陈学务折，历数西术、西语之弊，谓哲学等为无益有害之学。王国维（1877-1927年）则针对此问题专门写了《哲学辨惑》（1903年）一文，用全新的知识视野对西方自然科学中“纯粹科学”与“适用于人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诸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说明，清晰勾勒出了西学谱系的图景。

如果说当时较为“西化”的知识分子，如严复、王国维等人，能够比较自如地进入到西学的领地，用西方学术的话语来谈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新知识，可以不受旧学的羁绊，因而显得应付裕如、负担甚小的话，那么，更多本属于旧学阵营中的人物，在传统学术零落的境况之下，尚有一点点突围的意愿，于是便“不中不西”地夹杂其间，那情形便艰难曲折得多。譬如，第一个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的陈黻宸就很有代表性，他当时在京师大学堂（后改北京大学）主讲“诸子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并且留下了相关的四部讲稿。^② 从这些讲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旧式学者试图用新的学科理念剪裁和淘漉传统学术的艰苦努力，以及未为完善的“新瓶”难以盛装略加改造过的“旧酒”之困境。其《诸子哲学》以老庄为重点，兼及先秦各家，可以看作是民国初年“子学”研究的先驱之作。但他认为，“经子异派，而百家诸子之书，等诸小邦”。^{[4](P3)} 在观念上，仍以儒学为中国学术之宗主，虽肯定了诸子，但仍旧不忍心看着经学在屈尊。他的《中国哲学史》始于伏羲、终于姜太公，应当是一未完

^① 如《何运至野者》引了英人雷侠儿的《牠学浅释》以释《管子》侈靡篇；《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引了候夫勒的《谈天》和赫士译的《天文摘要》以释白心篇等。详见《訄兰室札记》卷三，《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9-262页。

^② 关于陈黻宸民国初年在北大教课的情景，当时的学生陈钟凡、冯友兰等人都有回忆，记叙得十分生动。见陈钟凡《自述读书时事》和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他授课所留下的四部讲稿是《中国通史》（1913年）、《诸子哲学》（1914年）、《老子发微》（1915年）和《中国哲学史》（1916年）。

成的作品。但八万余字，尚未说到周、孔，真不知往后是个如何的写法？假如要名符其实，成一完整之通史，又不知那将是一个多么浩大的篇幅？他说：“欲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而“尽力于道术，得其全者”便是儒学。所以，“儒术者，乃哲学之极轨也”。^{[1](P415)}而“东西异境，此心此理，闻名故创，按实则同”，哲学和儒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若论形而上学，中学的智能甚至在西学之上，故按照西学之名词的讲法，仍不能排除掉中学（特别是儒学）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中国现代学堂中的第一讲者以及首部讲稿，陈黻宸和他的《中国哲学史》终因仅有其名而无其实，被后人给遗忘掉了。随着他在北大的教席之继任者胡适（1891-1962年）的出现，被现代学术界所认可的“中国哲学史”似乎才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从此，新旧两学，截然剖分。蔡元培（1868-1940年）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序中，特别称赞胡著的“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平等对待诸子百家。另外就是有一套新方法，能把学术思想“递次演进的脉络”显示出来。^{[1](序)}而这些恰恰是陈黻宸他们所最不具备的。作为旧学营垒中的人物，陈的转变终究是有限的，他的知识背景也不可能使之在入民国后仍能在学术上做出一番开创性的业绩来。这些处在新旧学术置换之漩涡当中的人物，虽然真切感受到了这一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并且试图用新学之名来改造旧学，以保住儒学之精华，不至于被西学所全部取代。但终因方法过时、资源陈旧，跳不出传统学问的根本束缚，所以欲振无力、回天乏术，还是阻挡不住儒学被彻底边缘化的结局。

面对经学的解体和西学整体上的攘夺之势，有限保存传统学术的努力，激发出了所谓“国学”的意识，有了与西学相对应的“国学”之观念。当时的知识人，普遍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心态，于内“复汉排满”，于外“保国保种”，对西学则“将迎还拒”，始终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学大获全胜，中西对阵，渐渐地鸣金收兵了。被彻底边缘化了的中国传统学术要想在新的文化格局之中和学科体制之内谋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要“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身份性，按照西方（现代）学术的规则和要求来重新地表述，乃至“改头换面”，只有这样才能融入到现代的学术体系当中。而“国学”也渐渐地变成了“历史遗产”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材料性”的存在，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被整编到现代学术的阵列之中，跻身于边缘角落，成为学院内部少数人经营和操持的艰难事业。从学术形态的转换来讲，“国学”实际上扮演了中国传统学术（如经学）向现代化演进的中间角色，是旧学问向新学术过渡、“中学”向“西学”腾挪的中介形式，是由“四部之学”的架构转向“七科之术”的预演。所以当体制化的学科形态业已确立、新的学术形式逐渐地平稳运行，“国学”这一过渡性的中间环节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必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普及化，西学的冲击力变得更为强劲有力，传统学术不但完全丧失了回应的能力，而且面临着被连根拔起的灭顶之灾。如果说清末的“烧经”之说尚是空谷足音，让人感到震惊；那么，此时的“废孔学”之议已是连响成片，无需丝毫的诧异了。传统学术体系的全面崩溃，使得儒家思想之核心，屏障全失，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在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强力围攻之下，儒学真可以说是气绝命丧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在渐具规模的新学术形态（以大学为大本营）之中，儒学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名词，至多不过是一些断裂的碎片，撒落在若干个学科的边缘地带，或者沉积于这些学术领域的隐层。而经学则更是成为绝响，只是短短的10、20年时间，便已恍若隔世。

二、儒学的现代化：从国学到文、史、哲

衰微已极的传统儒学最后消失在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学术体系冉冉升腾的霞光之中。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稳固和知识学科化的普及，儒学再也不可能回复往日浑沌的景象。被彻底置换了的西方化学术坐标，格限着儒学话语的复记和观念碎片的穿缀。向西方看齐所必然引发的学术形态的革命性变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儒学的命运。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体系之中，儒学必须被打磨成一种合乎某种规格的“知识”，才能进入到言说的话语场。它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哲学，还是历史学？已彻底普遍化了的学科意识，成为所有思想活动的前提，假如心存僭越的非分之想，不甲不乙，那就会被判为“不

科学”。因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5][P2]}假如把儒学看成是已经完结了的一段历史，那么在学术化的观照之中，历史学的方法、史学的学术规范、历史学者的职能和责任伦理等等，这一大套作为学科附件的东西便会随之而来。儒学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只是一种史迹，是知性分析的材料，可以通过叙事勾勒出一些线索和表达为一堆概念，仅此而已。假如不用历史学来研究它；那么，你总得要找到另外一个什么学科。没有学科，便难成其为学术，那一定是“知识”的孤魂野鬼。华勒斯坦（I.Wallerstein）等人分析了现代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建构的历史，指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6][P8]}这一发源自欧洲的制度化建构，随着西潮汹涌，也已牢牢地扎根在中土。“五四”时代的全面性反传统，从结构层面而言，实际上就是知识形态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置换。随着学术领域普遍地划疆分界，作为古典学术形态的儒学所赖以生存的、可供其根系蔓衍芜生的土壤也被彻底地铲除掉了，超学科的儒学形式不是变成了历史经验，便是已成为奢侈的想象。

面对学科化的知识图景，传统学术的残片要想起死回生，重新恢复到“在场”的身份，就必须要经受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在某一领域内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新文化运动前后，解体漂散了的儒学资源所最易于“落脚谋生”的领域便是历史学科。在历史学中，儒学作为丰厚的文献资料被做着切割整理的工作，或做着现代的转述，成为对应与比照即在的生存境况的某种资具。悠久的历史和浩瀚的典籍在这一领域内倒也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在现代知识人的心中滋长出了某种普遍的理得心安的慰藉情绪。大量的旧学营垒中的人物摇身一变、成为响当当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古文经学家和具有浙东史学渊源背景的一批儒生（如民国初年尽驱桐城派后，独占北大文科讲席的章门弟子）。就连晚清今文学的主将梁启超（1873- 1929 年）也轻而易举地超化成了现代史学的著名开山。新学人物也不甘示弱，只要稍稍涉猎传统，有些中国意识，便极易落脚在史学领地上。王国维由“可信不可爱”的西方大哲康德、叔本华之理境回转到最古老传统的殷商古史之考证。胡适始于“科学方法”的大胆假设，却最终落得个“历史考据癖”的形象定位。^①易于存活谋生的史学领域，安顿下了转型之后的千军万马，使得治史一时间火爆异常，史者麇集，大家辈出，历史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按照华勒斯坦的分析，19 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便是历史学。^{[5][P16]}科学和古典哲学的较量，揭开了制度化知识建构的序幕，史学和科学在反对思辨哲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学术形态中，历史学首先获得了“现代知识”的准入证。史学家的拒斥形而上学，来自经验资料的具体化情景对“规律”探索易生谬误所产生的某种恐惧，从而导引出一种注重个别性的反理论化姿态。“五四”时代的学术转型和学科化知识形式的确立，历史学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化过程当中，科学的使命是由历史学来协同完成的。史学的“准科学”身份之荣耀，无疑成为传统文化最好的避风港，儒学碎片纷来凑泊，这是极合情理的事情。

但历史学所能提供的庇护是极为有限的，根本不可能满足儒学置之死地而后新生的最终要求。这一点，在唐君毅（1909- 1978 年）等 1958 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无需赘言。一个可能的转换向度就是重新回到观念史，在情形特别复杂而界线又极其模糊的哲学领域内为儒学找到一个栖身的空间。熊十力（1885- 1968 年）的殚精竭虑，无疑为之开启了一点微明，其嫡传弟子们都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的。20 世纪的新儒家主流人物都走了一条“哲学”之路，用思想提纯的方式，将儒家经典原有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尽量地撇去，有意地抛离开传统儒学的特定语境、叙事脉络和外在形式，而着力拔举儒家的精神性因素，来突显它的思想性，以展示其能够适应现时代要

^①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对胡适的学术转型和思想范式做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胡适把杜威的思维术和清代的考据学做了成功的嫁接”。在 30 年代以后，“胡适不自觉地日渐汉学化了”。见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89- 192 页。

求的永恒价值。实际上，作为一种现代知识的叙述方式，学科化、专家化侵蚀的结果，同样也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的面貌，哲学不再是具有某种普适性特征的一般化思考，而是成为必须经过程序化的训练方能进入的一堆特殊技巧的集合体。熊十力虽没有接受过西方哲学的系统训练，但支那内学院佛家逻辑的艰苦叩问和张东荪（1886-1973年）等现代哲人的不断指点，也使他约略窥得了制度化哲学的门径。所以，他的“新唯识论”体系具有了专业化哲学学科的某些特征，从《新唯识论》文言本到语体文本的改写过程，也就是这些特征得到强化和突显的过程。在他写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的《知惑显宗记》一书中，有两篇附录专门谈了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看作是他对制度化哲学的一个响应。熊十力特别强调，“新唯识论”体系是一个“玄学的本体论”，“宜将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融成一片”。^{[6](P539)}这样，他的学说体系在形式上便符合了专业化学科类别的基本要求；同时，又为儒家观念的现代阐释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像艾尔曼（B.A.Elman）所指出的，“新儒学开展”的研究议程逐渐支配了中国思想史领域的讨论，而它的问题根芽和理论活力来自于观念史的复活。“观念史的取向在方法论上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重构儒家和新儒学思想的内在完整性”。^{[7](P8)}熊十力被称为现代新儒学的“中心开启性人物”，意涵之一应该是他重构儒家观念史的尝试。自熊十力以下，核心的新儒家人物均出自哲学领地、兼有哲学家的身份，这应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传统儒学向哲学的“靠拢”，有其时代的必然性。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使得儒家思想赖以扎根的“土壤”日渐地贫瘠，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儒学越来越成为了遥远的记忆，“悬置”的边缘状态使得儒家资源已经变成了一些“思想的碎片”和“漂浮的观念”。而面对现实生活的欲振乏术和实际影响力日渐隐退，也迫使儒学研究走向更为观念化的创作之途，以思想的“抽离”与“提纯”作为应对现实挑战的基本方式。在场域收缩和思想游弋的过程之中，现代的儒家人物重新挑拣和串缀着散裂了的文化片段，以编织为新的系统；而他们的工作也必然地趋向于高度的玄思化，从而日渐地远离了儒家的“草根性”，变成一种纯粹学院化的形式。作为现代学科制度体系之一的哲学，比较适宜于儒家思想形态之转变的需求，提供了容纳儒学素材的“庇护”形式和儒学家们的安身场所，故尔成为儒家诠释学尝试着延续其生命力的首选，所以当代新儒家人物多为哲学家就并非偶然。就学科形式的预期值而言，比之历史学，哲学所展开的思想诠释显然更能拓展出文化传统可以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也更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到某些观念的契合点，所以，蕴藏乃至培育儒家文化之新的生命力的期盼也就落在了哲学的头上。事实上，熊十力、牟宗三（1909-1995年）等人一再高扬“哲学”的旗帜，用意之一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一点儒家思想的“活性”，而不至于使之完全地被历史化、材料化，以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终归能够唤起一种现实的精神延续的联想。

三、儒学的复兴：从书斋走向生活

在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和意识形态威权的双重打击之后，儒学的现实生命力已经是微乎其微了，特别是在当下体制化的学术形态的强力挤压之下，儒学的生存空间早已经变得十分的狭小，只能在边际化的缝隙之中游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儒学被认定是中国积贫积弱、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罪魁祸首，集诸多的负面价值于一身，是落伍、保守、封闭的象征。要想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告别儒学，因为儒学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几乎没有了儒学的立足之地，儒学已成为历史，沦为“材料”的身份，或者像列文森（J.R.Levenson）所说的，只是珍藏在博物馆中的“历史收藏物”。^{[8](P338)}曾几何时，对“活的儒学”的要求重新又浮现出来了，并且逐步地由“远山的呼唤”变成为生活中的现实。面对新世纪种种复杂的挑战，儒学显然需要审时度势，重新来做定位。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各种文明形态跳跃、纠葛其间所构成的既相互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这些新情况为儒学的重新倡扬和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批判性话语所范型的儒学，已经不能应对这一新的世界图景。要想把握住机会，迎接时代之潮流，顺势地复兴儒学，就必须对它进行新的形象诠释和身

份建构。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地破解，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地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的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亨廷顿指出：“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9](P129)} 所以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之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此情形下，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识别角色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七种文明划分，^① 还是贝克 (H.Belk) “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10](P15-44)} 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从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到今天的“儒教中国”，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被彻底置换了，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学已成为了中国新的阵营标签。

这一变化的发生，并非是回顾历史的结果，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响应。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继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亚洲四小龙接踵而行，随后东盟诸国、中国大陆、越南也开始了这一经济腾飞的进程。到 90 年代中，“亚洲的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了西方文明最强劲有力的挑战者。随着经济的强盛，价值的抒发和文化的伸张日益显得急迫，也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所以逐渐形成了所谓“亚洲的声音”。在东亚社会复杂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背后，华人经济和华人文化是人们最容易把握的共性。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11](P183)} 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形之下，自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亚洲价值便被与中华传统联系在了一起，儒教也就自然成为一种区域文明的标识。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12](P107)} 东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理所当然地被推拥到了前台。

从表面上看，将东亚现代化与儒家捆绑在一起，似乎只是某种历史的联想，至多不过是求援于传统的策略。但实质上，这一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最为前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回到历史。正像哈贝马斯 (J.Habermas) 所说的，“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13](P360)}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儒学话语已经开始了新的身份建构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它的语境已不是对西方中心的倾慕、拜服和反观自省，而是试图重置中心与边缘，将东亚价值的普遍性放在西方价值的普遍性之上。萨义德 (E.Said) 指出：身份的建构与社会中的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身份建构决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随着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西方价值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蕴含着优越性、先进性的“西方”观念开始动摇；而长期臣服于西方霸权的“东方”急于寻找自我伸张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萨义德说：“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和‘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14](P426-427)}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儒学复兴的话题重又浮现了出来，并且在新的身份建构之中找到了它当下的根源性。

儒学的重新定位标志着儒学价值的自觉与自悟，标志着民族文化向自身传统的回归。一种文化，若

^① 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亨廷顿所列 7 种文明为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印度教、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略改为中华、日本、印度教、伊斯兰、西方、拉丁美洲、非洲。

长期处于迷茫的状态，跟风逐臭、无所依归，甚至模糊掉了自己的身份性，丧失自我，那一定是没有前途的。近百年来的危机，使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丧失殆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性都降到了最低点。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必先要有文化之自觉，必先寻回失落了的精神家园。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部分的儒学，其价值的自觉和重新诠释，关乎到未来中国文化的前途。我们要从近代以来一维单向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重新发掘儒学传统中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或者从时间、空间的“虚空化抽离组合形式”（社会学家吉登斯描述“现代性”的用语）来重新绾结儒学的思想因子，使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同时，我们也要扩大文化的视野，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中来省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一个普遍性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历史的回眸，而且日益成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经济上的“大中华”概念和意义更为广阔的“文化中国”概念，已经明确无误地透显出了这方面的消息。

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在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明形态高度融合，各种文化模式也错综交汇，这就决定了任何的排他性都是不可行的。所以今天所谓“儒学的复兴”，和近代以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它并不是要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更不是要拿儒学作为排拒外来文化的口实。恰恰相反，这样的儒学需要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来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优秀成果。特别是在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和深刻洗礼之后，它的开放性、坚韧度、鉴别力和取精用宏的能量都应该是以往的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它也必能担当得起任何的考验。同时，这样的一种儒学，并不是局限在讲堂之上的喧闹，而完全是基于现实的要求，是和世界变幻的风云、时代发展的脉搏和社会大众的意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知识人在传统文化花果飘零之秋、画地为牢的自我保护，也不是面对典籍化、材料化的“传统”，空叹无奈而遁入书斋的自我“放逐”。恰恰相反，这个儒学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是作为学术研究之对象的身份性，试图从书本走向生活、从学堂走入社会，由学者说辩于口、皓首穷之的“材料”，变成大众默会于心、倏然从之的“行动”，从而成为一种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形式。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儒学研究，时人以示与旧学问的区别，有了“新儒学”之说，那个“新”是学术面貌的新，是研究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之新，说到底是“书本”上的翻新。而今天的儒学，可以说是“新之又新”，它的“新”不是纯粹学术意义上的，而是面向大众生活的根本转向，这是它与此前的根本不同。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典籍化、材料化的“悬置”之后，儒学渴望走出书斋，重新地回到大地，找到它深深扎根的土壤，在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发出新的耀眼的光芒。而当儒学彻底地摆脱掉纯粹历史材料的身份，从书斋、课堂、博物馆中昂首挺胸地走入社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之时，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

[参考文献]

- [1] 陈黻宸集（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萧公权.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M]. 汪荣祖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 [3] 严复集（第3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胡适. 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 [M].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 [5] 华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 [M]. 刘锋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6] 熊十力. 推惑显宗记 [M]. 熊十力全集（第5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7] 艾尔曼.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M]. 赵刚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8] 列文森.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M]. 郑大华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9]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10] 贝克主编. 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 [M]. 吴向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1] 哈贝马斯. 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 [A]. 文化与公共性 [C]. 汪晖等编.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2] 萨义德. 东方学 [M]. 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

责任编辑：罗 萍

经济学 管理学

基于中国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构建

周 冰

[摘要] 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体制转型是社会的理性构建和自发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发国家的体制落差是转型的动力基础，而“学习”的性质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转型的实质是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调整；通过构建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知识约束建立政府的决策模型，就可以解释政府的改革行为及其差异；中国平滑式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相互替代，这是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它不仅为自身提供了动力，而且在结构变化的同时保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关键词] 转型经济学 中国改革实践 体制改革 体制转型

(中图分类号) F06;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53-08

一、基于中国实践构建转型经济学理论

转型研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热点领域吸引了众多学者，但是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从而使得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与经济学的众多分支重叠交错，呈现出斑驳纷乱的景象。因此有必要对转型经济学的性质、它所研究的问题和对象领域进行界定，因为这是引导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深化和走向成熟的一个基本条件。

首先涉及的是转型经济学的概念。与它对应的英文概念是 transition economics，国内经济学者分别使用过“转型”、“转轨”和“过渡”三个词。尽管三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它们各自突出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其中，“过渡”突出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着的过程，“转轨”则注重了变化的内容是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的转变，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是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显然，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问题领域和研究对象的术语，因此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主流经济学家通常把转型看作主流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应用。然而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资源配置，经济转型虽然与资源配置有关，但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是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利益结构的调整问题。资源配置依赖着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标准——均衡价格，而转型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恰恰是决定价值的这个标准是如何变化的问题。因此，转型显然并不是一个宏观经济变量如何决定的技术问题，在这里，“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都反映出主流经济学的局限，很显然，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创造出一种更加适合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领域的理论范式。

一个非常流行的转型定义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1][2]}这是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然而，转

作者简介 周冰，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转型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两点重要区别：第一，它是着眼于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整体变化，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着眼点是一项具体制度安排的变化。如果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称为制度变迁的微观分析，转型经济学则是制度变迁的宏观分析。第二，转型是指一个相对较短时期内体制的急剧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其间往往包含着秩序的崩溃、中断、跳跃和转变，而新经济史学所研究的制度变迁则是在一个相对漫长过程中制度的连续性变化。与历史长程中相对平滑的制度变迁相比，转型是一种急促而剧烈的变化。正因为变化程度剧烈和显著，使得改变之后的体制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体制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

如果与演化经济学作个对比，这一点就更清楚了。事实上，演化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系统的经济学说，而是具有社会经济系统动态演化思想的非常庞杂的一种理论潮流。尽管它把创新、不确定性、异质性假定和复杂系统及其动态演化这样一些概念引入经济学的研究，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所谓演化指的是一个由经济系统内在原因自发的漫长的逐渐变化的过程；而转型则不同，它是指制度发展轨道的跃迁，甚至方向的改变，因而是急剧的和骤烈发生的。转型的原因和动力并不全是来自系统内部，也可能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变化。转型只是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打个比方来说，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比较，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因此可以说，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

西方和东欧的学者一般是把转型与改革区分开来。诚然，改革（reformation）和转型（transition）这两个词的含义的确存在着不同：^⑨首先，在变化的程度上，转型是指体制模式的转换，是体制的结构和状态的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则不一定。其次，在变化的方式上，改革表述的是一种主观掌控着的变革过程，转型则是对变革过程的客观描述。再次，就二者的关系来说，转型可能包含着改革，并且通过改革来完成，在这里，改革是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转型的方式和手段；但是转型也可能经由其他途径来实现，譬如崩溃或者社会革命。改革可能把转型作为目标，并且最终导致体制模式的转型；但也可能只是转型的序曲和前奏，或者半途而废，不能使转型最终实现。在中国，体制转型始终是在改革的推动下完成的；但在前苏联和俄罗斯与东欧，以原来国家的宪法性秩序崩溃为界线，可以清晰地划分出前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样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改革理论研究是以指导和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为目的的政策和策略；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性的理论研究，其目的不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是要对改革和转型的客观过程做出科学的理论解释。

比较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同样都是研究社会的经济体制，但它是立足于社会经济体制的多样性的基础上，着眼于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对比。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体制的形态学和分类学上的区别，而是着眼于经济体制自身的生理和解剖机能，探讨其内在矛盾和外部环境的关系，以揭示体制发生转型的根本原因、动力机制、转型方式和推进机制、转型的风险控制和绩效评价等问题。青木昌彦等人运用进化博弈方法发展出新的比较制度分析理论，^⑩成为一种探究体制内部机理和动态演化的有力工具，但其关注的重点仍是多样性的体制和制度如何演化的问题，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是体制形态和结构的转变过程。虽然二者存在诸多重叠，但是在侧重点上还是有差别的。

欧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是把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学放在一起，甚至当作一回事，区别仅在于前者是指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转型国家经济问题的研究，后者是指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研究，认为它们都是正在向着市场经济转化的、不发达或者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此，他们是把转型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或者分支来看待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双重转型中，即从发展角度来看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两种转型交织在一起，因此有学者提出“转型期经济学”的概念，^⑪即研究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问题。欧美学者从发展角度来看的转型是一个空间范畴，中国学者所说的转型期则是一个时间范畴，二者都没有把转型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特定的对象或者问题领域来看待。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的交织和相互作用并不应当成为妨碍对转

型问题独立进行研究的理由，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依赖着对研究领域的抽象和分离，因为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对对象进行提纯和简化，从而达到对对象认识的深化，建立起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一般性理论的目的。

综上所述，转型经济学是经济学科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尽管它与多个分支学科和多种理论存在着交叉，它们之间不仅可以并行发展，而且各自的理论成果可以相互吸收和借鉴，但是转型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体制在性质、结构和模式上转变的原因和过程，而这是其他相关学科都没有专门加以研究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扩展，转型的含义已超出了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范围，出现了多种含义各不相同的转型概念。^①为了便于理清问题的范围和性质，我们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经济转型，指从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心。第二个层次是国家或者说社会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再加上政治体制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这是历史长程意义上的转型，它是指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可以称为广义的转型。按照转型概念的三个层次逐步扩展，即在经济或体制转型的基础上进行国家或社会转型的研究，进一步再从事文明转型的研究，这就使转型研究发展成一种跨学科和综合的研究。

二、转型中的理性与演化

转型研究中也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一样，存在着理性构建和自发演化两种力量的作用和两种对立的理论主张。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政府主导一切，因此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性构建观念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自由主义思潮迅速传播，演化论的思想拥有了广泛的市场，^③两种观念的对立和冲突严重地影响甚至左右着转型理论的发展取向。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制度选择中理性构建思想的伟大试验，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也就被认为是理性构建思想的失败。人们一般是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当作制度自发演化的范例来看待的，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却是，市场经济体制最成熟完善的美国恰恰是在法国启蒙主义社会契约论思想的指引下建立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④这应该看作理性构建思想的成功。因此，问题就不是在制度选择中应该不应该进行理性构建，而是理性构建的不同实践为什么会有如此悬殊的两种不同结果？二者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念是要用社会的理性取代和消灭自发演化的力量，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不给市场的自发力量留下任何一点作用的空间；而契约论的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市场自发作用的基础上，所以美国宪法设计的初衷根本没有要取代市场自发演化的力量，反而是要依赖和利用这种力量。由此可见，如何对待社会中的自发因素是理性的制度构建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契约论和计划经济理论同样都是构建一个理想社会，但是却对自发因素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深层的原因，则是两种理论对人性和权力分别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假定。契约论是建立在霍布斯人性恶的假定上，因此对权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心理，美国在最初的制宪过程中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成了中心环节。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定上，对于现在人的恶可以通过思想改造使其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并且天真地认为国家权力将会消亡，因而在制度设计的理论原则中没有任何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特别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上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

①转型三个层次的概念是靳涛的博士学位论文（2005）中首次提出的。

②在我国一种普遍的误解是把演化主义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然而这是不正确的。例如，同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奥国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在转型问题上就分别抱持两种完全对立的政策主张。奥国学派在其演化论的思想基础上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而反对激进的突变式改革；而芝加哥学派一方面根据新古典货币主义的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是另一方面又受机制设计理论的影响试图对改革进行全盘规划设计，因此才会形成“华盛顿共识”这种存在着内在逻辑矛盾的政策主张，提出非常愚蠢的“休克疗法”。

③这一点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潘恩的著作和研究美国历史的著作中都有反映。

理论，反而赋予国家以历史上空前强大和集中的权力。这或许是计划经济在与契约论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竞赛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准确地说，演化论者与理性构建主义争论的实质并不是承认不承认理性在人类社会制度选择中的作用，而是理性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分布状态。理性构建主义强调制度设计和计划管理，是因为他们把理性完全赋予了国家，而演化论者则把理性百分之百地给了独立的个人，这也就是哈耶克特别强调分散的个人知识的原因。然而事实上，国家、个人和每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都是具有理性的，但又都是不完全的有限理性。不同社会主体的选择对社会制度的发展和演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不是他们各自的理性程度，而是他们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演化论者否定国家在制度选择中的主导作用，原因是他们否定作为社会整体存在着的集体理性。不可否认，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整个历史中是自发演化的盲目力量在起主导作用，但是随着文明的曙光初现，人类就一直是在追求理性的道路上探索发展的，人类的理性在精神领域表现为科学理论，在实践领域表现为政府的自觉行动。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具有一种整合与协同的功能，各种制度和组织的作用就是把个体理性整合成集体理性。尽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到能够完全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程度，但是人类总是力求更加自觉，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影响和控制环境，把握自身的命运。如果否定了社会集体理性的作用，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的文明本身。

三、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多数研究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都把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和向市场经济转型视为理所当然，似乎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但这并不符合转型的实际。转型过程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1](P25)} 包括改革的目标和转型的方向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而向市场体制转型是制度发展方向上的 180 度的大转弯，其间必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剧烈的冲突，决不是一个自然和简单的过程。因此，改革的目标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向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转型经济学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把转型和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产生作为两种不同的制度变迁类型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先发国家的变迁是一种自然自发的演化过程，而转型则不同，它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目标，变迁路径往往有一个基本的指向，存在着尽可能缩短接近或达到目标模式的时间要求。由此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般地，转型总是发生在一个相对落后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改变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局面。先发国家是不会发生这种转型的。因此，后发国家的体制转型可以称为“学习型体制转型”。^[2] 其含义是：转型是在强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转型的方向主要是受外部强势规则的牵引，是以先发国家的经济实绩为参照系，为了缩小体制落差通过制度学习而形成的；与先发国家自然自发演化的制度变迁相比，转型具有更多的可判断性，经济主体之间具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转型目标是在意识形态的局部调整、及其决定的潜在改革度、新制度知识的习得量和社会利益博弈的公共选择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每一个阶段的具体目标，长期目标是在阶段目标的递进累积中逐步形成、逐步清晰的，它是一个序列目标的自然延伸。

提出转型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和国际地位问题，除了有利于区分和深入认识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特殊类型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加明确地确定转型起步时特殊的初始条件。这可以用“体制落差”的概念来刻画。^[3] 国家的竞争地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地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把各方面制度因素的作用都集中在其共同的结果国家竞争的优势或劣势上，就可以用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来准确衡量各个国家之间的体制落差了。在体制落差基础上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及其结合构成转型的动力结构，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对应的体制落差是转型的外部压力，促使行为主体对基于体制落差而存在的潜在利益的追求是转型的后发性内生动力。体制落差越大转型的动力也越强，反之则越弱。当然，这还只是转型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至于有一些甚至更为落后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进行

改革从而发生体制转型，则需要用经济以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原因来说明。

需要指出的是，转型的成功既是制度学习的过程，但也离不开自己的创造。这一方面是因为从外部引进的规则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所谓本土化是指通过对新制度知识的有选择利用，使得其真正成为符合主体内在利益追求的自组织过程。因为一切外部引入的制度（主要是正式制度），要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匹配、与既有制度系统相互融合，从而真正能够在转型国家的自然历史文化土壤中有效地植根，就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单纯的学习不可能引导转型国家实现超越先发国家的民族振兴的梦想。如果放弃了自主进行的制度创新，一味地与国际接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会成为外部强势规则制定者的附庸。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才能创造出更加适应本国国情和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先进的体制，才能实现超越和做到后来居上。这是转型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利益动机和权利结构与转型的实质

人们一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但是严格地说，转型的实质是在人们的利益动机驱动下对权利结构进行的调整。^⑩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权利结构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利结构中退出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微观主体之间的权利重新配置的过程。

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不同的行为主体合作生产共同创造财富时，主体的利益与权利变化的方向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反，当二者相同时，主体就有可能主动推动使自己权利减少但利益增加的制度变革，这就是政府进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原因。^⑪在多方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下，各个行为主体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行为主体也就是直接生产者，他的利益变化对合作生产的财富总量大小起决定性的作用，变化方向必然会与其权利变化方向一致。如果行为主体的利益变化方向和权利变化方向相反，那么就可以断定他不是其中的直接生产者，或者在财富创造中并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行为主体。

另一种情况是当主体所分享的利益并不是他们合作生产的结果时，利益与权利变化的方向相同，行为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要争取更大的权利。如果社会利益总量不能随着权利结构的变化而增加，行为主体在利益上的对立就会直接导致权利的对立，不同权利的拥有者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直接的对抗。这种情况下权利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可能以两种形式发生：其一，双方以市场的方式对权利进行交易，这就是“科斯定理”所揭示的情况；其二，只能通过第三方强制力量实现权利结构的变化，而具有这种强制力的合法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的强制可以避免出现体制的革命性变迁。中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双轨体制的实质，是国家在改革中对既有权利结构的一种保护，双轨之间的价差可以称为“体制租金”。^⑫人们普遍认为承认既有权利结构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因此被作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但是，当体制租金并不能随着经济增长或者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而缩小，缺少权利的行为主体同时也缺少足够的财富来赎买对方的权利时，权利在社会主体间的重新配置就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这种条件下，对既有权利结构的保护就会使转型难以继续进行。由城乡户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正是如此。

五、转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分析

在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一个突出而又令人困惑的事实是，无论是成功维持了原有政权的平滑式转型，还是宪法性秩序断裂、发生政权更替的突变式转型，最初都是由政府发动的改革而启动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各国政府例如中国和前苏联却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当然二者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中国的改革基本达到了决策者的目的，而苏共却因此丧失了执政地位。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呢？

以往对政府职能和政府改革的研究，大多都忽视了对政府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就是从增进经济效率或社会福利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种企业本位论或者社会本位论的政府研究当然

无法解释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只有确立以政府为本位的研究视角，对政府的改革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才能回答这一问题。这就是要坚持自利和有限理性的假设，通过分析政府的偏好和目标，以及政府受到的现实约束，来探讨政府在体制改革和转型中的决策行为及其特征。就政府的决策行为来说，其目标函数提供了政府行为的动力和目标指向，知识约束主要影响可选策略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行为。政府的决策模型可以解释转型中政府的诸多行为特征，可以用同一原因来解释中国和前苏联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改革策略。⁹¹

政府的目标函数呈现出“核心—保护带”的体系结构，维持既有统治地位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处于核心层的价值目标，保障民族利益、特定的制度偏好和其他目标三者共同构成了第二层的保护带目标。一般情况下，各种冲击首先通过影响保护带目标的实现，进而传递到核心层，政府通过监控其目标体系的实现程度来感知压力，判断冲击的方向、性质和程度，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在政府目标的达成出现困难时，政府会通过对制度运行绩效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调整自己的偏好结构和进行体制改革。有限理性决定了知识具有重要价值。对于政府决策行为至关重要的是有关制度的知识、有关风险的认识和决策技术的知识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了解。尤其对于处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来说，这些知识更是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知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策略集的约束作用上，它决定了何种策略选择能够进入政府的视野，直接决定了可供政府选择的策略集的大小，从而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行为。对知识的掌握状况和获取知识的不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方式、路径和最终结果。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始就进行企业改革，从 1990 年代中期正式推动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已有十多年了，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存在统一的经济逻辑？如果存在的话，它是国有企业及其产权制度本身改革内生的要求，还是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且，这种内生的产权改革又会收敛到一种什么状态呢？探寻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演化的内生机制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赵志峰运用动态演化方法建立了一个最高（政治）决策者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之间的二元博弈模型，二者主要围绕着是否解雇企业冗员展开博弈，而最高（政治）决策者的成本最小化决策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他的结论是，在给定初始条件下，包括当时的失业状况、意识形态状况和制度知识水平，模型最后将收敛到完全的民营化。加入主管政府的三元博弈模型，由于加入了社会公平和腐败的因素，最后不会收敛到完全民营化。⁹² 然而事实上，失业压力并不是决定政府对企业改革与否的关键因素，而只是一个对企业改革的速度起调节作用的变量，关键的因素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功能的定位，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内生机制恐怕还应当从国有产权制度的性质和特征，即其内部结构中去寻找。

乡镇企业是中国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主体，它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启动而迅速崛起，90 年代中期以后又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成型和竞争的加剧而普遍改制，转变成一般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作为中国体制结构变动中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企业组织制度，它的出现和发展演变具有促进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意义，因此是联结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枢纽。乡镇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社区性质和内在的市场取向。社区性质具体表现在生产要素的获取和使用、企业经营目标、经营管理三个方面的社区性上，概括地说，它是通过社区关系来获取和经营社区资源以实现社区目标。乡镇企业的产权可以定义为社区所有制，一方面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并不是明确界定的，无论农民与社区政府，还是社区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他们的权益都存在较大的弹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权益又都局限在社区的范围内，一旦脱离本社区，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它实际上并不像一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模糊不清，而是能很好地发挥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乡镇企业内生的市场取向是指它明显的获利目的和受到较硬的预算约束，因此具有一种国有企业不具备的优势。乡镇企业包括乡镇（村）集体企业和乡村个体私营企业两种类型，前者的社区性更为典型，与后者相比，在获取社区资源上具有较低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使用效率上的劣势。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逐渐削弱了乡村社区的资源优势，从而改变了二者之间的竞争地位。这正是随着经济体

制的转型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改制的一个重要原因。^[1]

六、平滑转型推进的动力与机制

苏联和东欧在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宪法性秩序的崩溃和重建，因此我们把它称为突变式转型，而把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动荡过程的中国的转型称为平滑式转型。平滑式转型最一般的特征是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相继替代。过渡性制度安排产生的原因，从决策者的主观原因来说，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出于控制改革风险的考虑，采取了试验和探索性质的改革策略；从客观原因来说，则是由于转型过程中利益结构的调整出现了利益结构非均衡，利益关系还没有达到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过渡性制度安排可以划分成四种类型：（1）作为目标搜寻机制的搜寻型过渡性制度安排；（2）由于未能预见到后来的发展而作为改革目标推出的正式制度演化成为过渡性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目标型过渡性制度安排；（3）作为分步骤推出的改革措施的阶段型过渡性制度安排；（4）作为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而实行的策略型过渡性制度安排。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一种降低改革成本、减小改革阻力和控制改革风险的机制，它可以使整个体制改革达到平滑转型的目的。改革决策是决策者在不确定性，包括参与人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与信息不充分条件下进行决策的问题，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即决策主体在制度选择中的信息搜寻问题和改革决策者对利益冲突的协调和风险的控制问题。根据新的制度知识的来源渠道和变迁过程风险的大小，可以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成设计发明型、学习引进型、试验推广型、经验总结型四种类型，它们对改革决策者理性倚重的程度和其中所包含的风险都是依次递减的。但是，只有生产性改革才能创造出转型持续推进的动力，实现平滑转型的目的。任何一项改革都有分配效应，但是只有能够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改革才具有生产效应。生产性改革需要满足速效、向生产者倾斜和改革措施后向可加等三个条件。^[2]

转型不只是设定目标之后如何达到目标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在转型过程中从经济体内生出来的，一个适宜于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长期的转型过程才能形成，这就牵扯到转型持续推进的动力问题。这意味着转型不可能“一步到位”，而且必然内含着一个转型中的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最独具特色的是在制度变革的同时兼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渐进改革措施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是速效的，即能够在当期创造出一个增大了的经济剩余，从而使改革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改革成功的绩效就是推动转型深化的动力。经济变化与制度变革的适应性或者契合，是经济增长与体制转型双向协同的原因，经济增长是改革和转型持续推进的内在动力。^[3]

适应性分三个层次，分别是利益主体的适应性、契约的适应性和制度的适应性。^[4]其中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收益增加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又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既有制度给定的选择集内的偏好调整，另一个层次是扩大选择集的调整。利益主体扩展选择集的适应性调整是借助契约进行的。因为利益主体的行为，既有生产性行为又有分配性行为；而通过契约形成的合作组织，既有创利集团又有分利集团，而且还存在着创利集团蜕变为分利集团的倾向，因此，总体经济剩余的获得要以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为保障。因此，对体制转型的绩效则应以适应性效率^{[14](P108)}来评价。

七、结构动态变化中的稳定和秩序

转型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一个结构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经济体如何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转型成功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这就是稳定性和延续性的问题，也就是秩序问题。秩序是社会的动态稳定性，而非僵化的静止和不变性；只有在此意义上的持续的稳定性才能带来秩序，而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形成秩序。

包括情绪变量在内的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机制，提供了分析制度变迁和转型的微观基础。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有依照某种“经济”原则做出选择性反映的倾向，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会（往往是不自觉地）依照信息状态和其他环境因素来调节情绪和推理在选择行为中的作用，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最优决

策”。所谓的制度约束，本质上是群体的约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个体选择的过滤作用下，制度只能影响行为，而并非决定行为。从长远来看，个体的选择模式同时亦改变着行为规则，改变着社会结构。^[15]

按照制度的实施方式或强制的性质及范围将制度结构划分为法律和规范两个部分。前者指由一套强制性机构来保障其施行的社会行为规则的总和；后者指为社会成员所共同遵循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其他社会规则。社会结构是根据群体成员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互动以及互动的有效程度划分为单群和复群。前者主要通过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来维系，并完成群体目标，例如家庭；后者是由单群组成的复合体，其群体成员可以是单群，也可以是较小的亚复群，例如国家和企业集团。单群构成社会的基础结构，同时它们所奉行的规范是形成社会价值共识的基础。单群可以无需法律制度的介入而仅依赖一套规范体系来维系，而复群则需要明确的法律制度的保障才能存续和运转。但法律只有与（社会）规范相互适应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因此制度的变革需要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互适应，才能形成有效的秩序。

制度变迁过程具有多向性，而且很难达到“有效”的渐进均衡。国家如果在社会变迁中没有受到彻底削弱的话，不仅对制度的“效率”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同时，通过随机动态博弈阐明不确定条件下规则遵循与理性选择在人们决策过程中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助于解释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转型过程中秩序形成的影响。^[16]

[参考文献]

- [1] 罗兰. 转型与经济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 周冰. 经济体制转型的平滑模式与突变模式 [J]. 财经论丛，2005, (1).
- [3]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 [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4] 谷书堂主编. 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 [M]. 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5] 张宇. 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6] 景维民主编. 转型经济学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 [7] 卢新波. 学习型体制转型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8] 商晨. 利益、权利与转型的实质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9] 曹红钢. 政府行为目标与体制转型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0] 赵志峰. 转型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演化逻辑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1] 谭庆刚. 双重转型中的乡镇企业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2] 周冰等. 过渡性制度安排与平滑转型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3] 王玉海. 平滑转型的动力机制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4] D·North.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Cha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1N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0.
- [15] 郭旭新. 经济转型中的秩序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雨田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变迁与秩序生成

——近代以后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生成的考察 *

张 镛

[摘要] 人类社会自从法律形成以后，社会秩序就一直表现为习惯—法律的二元秩序样式。近代以来世界秩序的变革受两种模式的经济变迁的决定：一种是一元的经济变迁，一种是二元的经济变迁。由此形成一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和二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前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单一的，后者面临的秩序矛盾是多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二元社会秩序的生成是由中国的传统—现代二元经济所决定的，这种二元秩序中的规则关系表现为法律和习惯两种规则体系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承认当下中国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现实，就应当承认传统经济下习惯法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当承认在这种传统经济中形成的习惯规范的合法性，继而协调法律与习惯的矛盾关系，俾使当下中国的秩序治理走向和谐。

[关键词] 社会秩序 经济变迁 习惯 法律

(中图分类号) D92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61-15

一、理论背景：秩序变革与经济变迁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是社会秩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过程。从经济的角度看，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进化；从政治来看，是从专制的政治模式向民主的政治模式的进化；从秩序治理的角度看，是从以习惯为主导的规则系统向以法律为主导的规则系统的进化；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从依附性的个人观念向独立性的个人观念的进化。本文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进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因素是自变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原动机，它在社会生活中的这一功能愈来愈大。”^{[1](P227)} 所以，经济的变迁是现代化最终的决定因素，本文将由习惯规则系统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秩序称为习惯秩序，将由法律规则系统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秩序称为法律秩序。因此，从秩序治理变迁的角度来说，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由于社会经济变迁而引发的，社会秩序从习惯秩序向法律秩序的转变过程。

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颇为不同，而且，它们之间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不同的样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同样是一个多面的问题，若干因素决定了这种不同，本文认为，经济变迁的不同模式最终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模式的不同。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都经历了从习惯秩序向法律秩序的秩序变迁过程，也都或快或慢地形成了习惯和法律共生的二元社会秩序，但是不同的是，由于经济变迁模式的不同，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秩序实际上是有差异的。而对经济变迁模式的认识同时也是通过对现代化模式的认识逐步展开的。对模式的分类主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间习惯与和谐司法研究”（项目批准号 07FXB009）、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民间习惯与农村民事纠纷的司法化解”（项目批准号 07SFB2008）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间习惯与基层民事纠纷的司法化解”（项目批准号 07JD82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镭，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江苏 南京，210097）。

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变和突变的分类法；一类是连续和断裂的分类法。

罗荣渠先生从现代化发源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以及现代化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角度出发，提出“社会的巨变是一种长期性变异，它可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创新性的巨变，这是独特历史条件凑合下发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一种是传导性的巨变，这主要是受外因诱导发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1](P116)} 按照这种观点，现代化本身显然是一个社会巨变过程，创新性的巨变属于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最终发生的；传导性的巨变是内部和外部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与这个思路相似的是将现代化的发生类型划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我们今天说的以现代化为名称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迁“自其发生的源头来说，则照一般学者的通论有二：一是自我本土的发展或内发性的（indigenous）现代化；一是外力促逼而生或外发性（exogenous）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说，可以发现“自我本土发展之现代化，……欧西的社会一般属于此一现代化的型模”。^[2] 而外发性的现代化，“非西方社会大都属于此一现代化型模”。^[3] 美国学者列维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将其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两种主要形式。前者包括英国、美国、法国等等；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4](P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在西方起步源于西方近代社会秩序的“断裂”，而东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则是连续的，所以，西方社会与传统社会截然而分，东方社会却藕断丝连。伯尔曼认为，1075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颁布的《教皇敕令》最终将教会和世俗社会分离了，从而使得当时欧洲的传统社会发生了断裂，社会的二分引发了欧洲社会的革命，从而引起了法律的巨大变化，最终形成西方的法律传统。“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和各种新的世俗法体系，附带产生的有：一个职业的法律家和法官阶层，分等级的法院制度，法学院，法律专著，以及把法律作为一种自治的、完整的和发展的原则和程序体系的概念。”^{[5](P140)} 实际上，伯尔曼是将11世纪的教皇革命看成是欧洲新旧秩序变迁的导因，从而建立了欧洲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秩序断裂理论。英国学者吉登斯也是断裂论的支持者，不过他似乎没有将时间推到如此久远，而是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开始的，“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乃是现代史断裂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6](P38)} 据此，他认为现代欧洲世界的现代化应当看成是经由一种断裂的模式而形成的。“与其将现代世界看作是对阶级分化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条件的逐步削弱，不如把它看作是与传统世界的一次断裂更有启发，而传统世界似乎在这一过程中无可挽回地土崩瓦解了。现代世界是从和以往的世界所发生的断裂中诞生的，而不是后者的延续。工业资本主义最初发源于西方世界，并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伴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就此到来。这个新的世界的独特面目正体现在这种断裂中，而社会学事业所倾力解释的，也正是这种断裂的实质。”^{[7](P355)} 不过，有学者认为断裂论不足为道，认为“断裂论者”只看到拔地而起的新景观：城市和商业不同于以往的巨大发展，银行业、保险业、信用制度等新的商业运作方式和法律部门的不断出现。但他们忽视了这些新的现象产生的根基：产生这些新的现象的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以及法律自身的根源。^{[8](P59)}

本文认为，从西方和东方现代化的发生来看，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将原有的农业经济和早期工业、贸易经济进行整合以后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经济秩序，并通过这一新型经济秩序的生成带动整个社会从近代向现代转变，最终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形态。本文将这种经济变迁的模式称为“一元经济的变迁模式”。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国家冲击的情况下逐步展开的，整个过程呈现出一种对原有农业经济的冲击和改造，而这种改造最终并没有形成像西方社会那样的市场经济秩序，反而出现了传统农业经济秩序和现代工业经济秩序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并通过这种二元的经济结构影响了社会其他诸方面。这种经济变迁的模式可以称为“二元经济的变迁模式”，本文着重考察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是如何通过二元经济的变迁实现秩序的变革的。

二、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与秩序变革

(一)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变迁

从经济格局来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总体的经济秩序是封建的农业经济秩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农业经济已经具备了非常稳固的形态和特征，只不过，这一切到了 1840 年前已经发生了改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步伐依然缓慢，工业化在国内的发展呈现极端不平衡的状况，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增收的实际能力，市场的单一化现象改善不多，人口结构距离现代化的要求依然遥远。

1. 农业。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为本的一个相当自足的社会系统。生产主要靠人力与兽力。”^[2] 同时，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其特点是“小农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社会分工水平低，生产量小，消费量小，又实行家族子嗣分产制而不是长子继承制，多数家庭都只是一种仅足糊口的经济。”^{[1](P278)} 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前，每一个家庭实际能够拿出的剩余资本很少，“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一是钱。”^[1] 这在鸦片战争前夕是难以想象的。

“进入 20 世纪以后，现代工业部门经济虽有增长，但到 30 年代中期仅占全国总产值的 18.9%，加上第三产业也只有 37.1%。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1](P5)} 同时，作为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农业的状况基本上与鸦片战争以前没有什么区别，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依然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严重障碍，生产力的低下、人口的膨胀、分散的市场状况都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民国时代，“在 1932-1936 年之间，整个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 1%。虽然在少数几个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但这是由当地进步的利益集团所指导的，与中央政府很少关系，并且对整个经济没有决定性影响。”^[8]

从 1949 年开始，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政治秩序和生产关系。不过，50 年代以后，农村生产力低下、人口继续膨胀，仅有的市场也被取消了，农业生产是统购统销，农民的负担依然非常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70 年代前，“中国仍然保持着它的特征：贫穷。”^{[1](P426)} 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本文后续部分将讨论这一时期的问题。

2. 工商业。

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不仅产生较早，发展也比较成熟。但是，中国传统手工业工场的雇佣关系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场的雇佣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短雇工才接近自由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但这种短雇工自然也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不同，因为他们的自由身份是暂时的。”^{[10](P349)} 因而，在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并没有出现可以演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商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很发达的，不过，“从结构上说，商业是依附于农业—地主经济的。……没有保护商人的法制。”^{[2](P278)} 同时，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于农业税收，而不是商业税收。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商帮与马克思所说的‘纯商人’尚有一定差距，其社会影响太弱。而最重要的，……没有商人的权利。”^{[11](P27)} 在农村，商业的发展与单个家庭的小农经济模式相关联。“虽然商品化农业已很盛行，但流通模式一般偏向于使交换集中在集聚一团的小村镇，而没有加强与大城市的联系。”^{[1](P207)} 这种情况的综合形成了中国商业与西方近代早期城市内部出现的商业完全不同的景象。

现代工业在鸦片战争之后是有明显的发展，但由于殖民主义对工业发展的限制以及民族工业在资本投入方面的困难，“成千上万的中国地方企业所使用的工具依然主要是依靠人力而不是资本。……而手工业生产始终与农田耕作的忙闲相关。”^{[1](P422)} 政府受到巨额外债的束缚，基本上不再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发展和扩大工业化的进程。^[9] 由于工业发展过于缓慢，因此不可能对农业产生反哺作用，“到 1930 年代初，现代部门只提供国民生产大约 3% 的份额。……资本形成的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农村生产率也没有出现持续的增长。人均产量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1](P639)}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初期，这种情况没有根本变化，“在几乎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里，苏联式的资源分配可能把一些现代要素传播到内地大城市，但这没有根本触动社会分割开来的巨大鸿沟。”^{[1](P490-491)} 工业发展依然没有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产生革命性的动摇。

3. 市场。

一般认为，大的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自古就有交换，就有市场，就有市场调配。”^{[11](P20)}但是，中国传统经济下的市场大部分是孤立的，不定期的市场，交换的对象大多是农产品或者农副产品，交换的主体主要是相对固定的村民或者城镇居民。统一的市场为什么不能形成，有人认为是因为“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受交通工具的制约。”^[12]实际上是自然条件的束缚制约了中国传统社会大的区域市场的形成，本质而言还是由单个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经济模式所制约的。

“16-18世纪西欧的现代化过程，是由市场需求引起的，需求牵动生产，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这已成共识。中国其实也是这样。”^{[11](P9)}进入20世纪以后，通过外资的引入和民族商业资本的投入，“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阶段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地方市场，反而成了买办资本和地方军阀政权得以存在的基础。”^[12]这就是政治因素对于经济秩序变迁的巨大影响的一个结果。还有因素就是出口产品的结构无助于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要中国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国外需求就不能有效刺激新兴的制造业，因为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并不依赖于其他部门。中国的进口主要是消费品，而这仅只满足最终需求，且正如罗伯特·得恩伯格所言，既无助于中国生产的投入，也不能作为中国生产能力的基本工具。”^{[19](P422)}另外，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显得非常艰难，这主要也是自然环境的因素和技术发展缓慢的因素的综合影响，“‘绝对主义’国家产生在国内统一市场的基础上，依靠交通工具发展中央集权化。可是，就当时中国版图的范围来说，是不可能有这种中央集权化的。”^[12]总之，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中国的经济秩序中通过市场进行资源分配的能力依然非常薄弱的。

4. 人口。

人口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在农业经济生产中尤为重要，但是人口太多就会形成农业剩余人口。如果这些人口不能被其他行业消化，就会严重消耗农业经济的增加值，其结果要么就是农村人口饿死或者流亡，要么就是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二者都会引发社会秩序的不稳定。^①1400年，中国的人口在6500-8500之间，1770年达到2亿7千万，到1850年已经窜升到4亿1千万，后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略有下降，到1913年再次达到4亿1千万。这一数据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耕地的承受能力，“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也呈饱和状态。”^{[13](P115)}人口爆炸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村出现了巨大数量的剩余人口，其结果是“到19世纪中叶时，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潜力虽不能说已经用尽，但由于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极不协调，导致可怕的潜在社会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这就是说，在西方的外压力产生之前，中国社会产生的内压力已造成农村人多田少，人口从稠密地区向稀少的周边地区迁移，大规模游民流徙，大量穷人偷偷出洋谋生，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机。”^{[11](P257)}罗荣渠先生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启动的前夕面临过如此严峻的形势。当时是内部的瓦解力与外来的冲击力两者交织在一起，给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大变革奏出独特的双重变奏曲。”^{[11](P259)}

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外资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得一些现代性的因素在大的城市逐步出现，并且带动了大城市周边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一些乡村经济产生了从传统经济中挣脱出来的迹象，但是，“占五分之四的农业人口结构没有变。”^[14]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并没有（同时也是没有能力）作出实质性的努力，“其一，他们没有下功夫去把分散在基层和地方上的资产吸引到城市……；其二，他们没有阻止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减少了将来从农村抽取资源的潜在能力。”^{[19](P632)}

5. 财政。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政府进行巨额的财政

^①有学者认为，清朝人口的快速膨胀起因于1713年康熙皇帝的滋生丁口永不加赋谕令，该谕令“有非常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是人口的无限制膨胀，第二是资源因为人口的膨胀而消耗殆尽。”参见张朋园：《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投入。然而，鸦片战争前的统计结果表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农业，……占到国内毛总产值的65%，……剩余的35%中，商业所得超过工业（此指手工业）所得；不低于20%-80%的劳动力以部分或全部时间从事农作。”^{[9](P139)}这就是说，如果农业收入不增加甚至减少将会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1880年代的国民所得（GDP）总额估计为2780000000两，1910年的国家预算为208000000两，约为国民所得7.5%。……中国政府的收入实在太少。……中央政府无能为力，只好任随地方政府自行筹措。”^[1]此种局面导致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化运动的许多工作不是通过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分配机制完成，而只是地方政府在其能力范围内自行运作的行为；另一个是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权的势力，从而对中央政府的对抗力和对抗意识大大增强，也是造就后来军阀纷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资料分析，到18世纪下半叶……中国所使用的白银就有60%-70%来自外国，这样，中国经济在不知不觉中就在货币方面受到世界市场无形的支配。^{[1](P23)}鸦片战争以后，在条约体制的压迫下，政府在财政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雪上加霜，“不平等条约给与中国最大的压力是赔款，使中国人喘不过气来。”^[1]为此，“1905年以后预备立宪，新政兴起，支出增加，有的省份立即陷入赤字状态。”^[1]另外，工业发展的收入除了用来偿还赔款以外，实际上现代性的工业并没有为政府带来实际的巨大收益，“在那些经济进步却是带来了丰裕收益的地方，那些收益是被外国经济企业所支配，并服务于外国利益的。……通过一系列经济和行政特权，外国经济企业成功捆住了历届中国政府的手脚，削弱了初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竞争力量。”^[1]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人口增加太快，天灾频仍，传统的轻赋政策，使政府一无作为，农业也就未能发生辅佐工业的作用。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赔偿累累，政府更是欲振无力。”^[1]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秩序变革

1. 经济秩序。

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时代，中国传统农业的平衡是在人均产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产量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了，只有少量供应市场的剩余产品可用于以下用途：作为工业原料或供应非农业部门。反过来，城市产品的实际需要也受到了限制。”^{[3](P27-28)}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可被视为中国前现代化经济扩张时期的终结。直到此时为止，整个中国经济几乎全部都是农业部门，其他部门或是需要农业提供原料，或是处于为农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地位。手工业大多是一些棉花、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加工工业，商业则主要是进行食品和衣着的市场分配。”^{[3](P27)}不过，战争以前的经济秩序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社会内部经济危机的出现，“据统计，1812年，中国人口已达33370万人，而土地却只有79152万亩，人均耕地只有2.3亩。这种人地比例表明，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已下降到‘饥寒界限’（人均4亩）以下，人口数量已经超过社会经济负载力。”^{[3](P34)}并且，不应忽视的是，传统的中国不仅没有形成重商主义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也并没有任何重商主义的色彩。政府认为在农业和商业之间如果要选择对统治基础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存亡的必要性的话，显然农业应当是选择项，商业在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

鸦片战争以后甚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80年代初期都一直未能解决农村人口占绝对数量优势的势头，也未能改变农业经济在经济结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首先，20世纪初有关华北各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总人口接近450万的18个县里，188万个职业称谓中有90%是农夫，4%是商人，3%是文人学士，大约2%是手工业者。”^{[9](P198)}其次，工业化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王朝末日到来，不论是外国的、中国资本家的还是中国国营的近代工业，其发展都相当有限。”^[1]第三，城乡差别并没有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缩小，甚至在某些时期更大了。到70年代为止，“随着中国日趋现代化，城乡差异并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苗头。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诸如婚配模式和家庭习惯等等城乡差别似乎变得更为显著了。中国以其出地区的混乱而著称于后起的现代化诸国。”^{[9](P657)}第四，鸦片战争时期的4亿多人口的压力在战争以后并没有丝毫减轻，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剩余

人口无法消化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城市自身的发展，也影响着农村的发展，直接的后果是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构成巨大的隐患。

2. 政治格局。

从长时段历史的发展来考察，中国古代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值得关注的，‘帝国 中心’对‘边陲’的社会并未发生深入的穿透，……帝国的能力顶多达到消极维持统一的地步，而并未能做到可以凝结、动员社会力量以赴政治目标的程度。”^④举国都是帝国的范围，但是在政治格局中，地方有地方的政治格局，体现在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政治上的分离。政府的任务就是在城市中实行政治治理，同时运用乡绅的力量对农村实施治理。官员是封建官僚科层制中的一员，而幅员广阔的乡村则是家族和乡绅的势力范围。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地方政治权力与中央政治权力的冲突非常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权对农村控制能力的不足，另一个原因就是绅权可以通过科举制进入皇权领域，从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有一个互通的通道，这就使得绅权往往能够获得官员（不一定是当地的官员）的保护，而官员经常还在农村保留自己的家族。这样，中国传统的皇权与绅权具有冲突和协调的双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方突然力量下降，另一方必然获得迅猛发展的空间，这最终成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政治格局的特点，那就是地方主义的膨胀。换句话说，乡绅通过家族内部的联系，实际上掌控着广大农村地区的政治治理权。正是这种家庭、家族的有机联系组成了中国乡村内部强大的凝聚力，这是一个典型的（滕尼斯式的）共同体结构。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现代化的展开，依赖于皇权的绅权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冲击，严格的家族结构发生了变化。统一的国家政治体制（虽然不断受到地方武装的冲击）使得乡绅不再掌握大量政治资源，从而使其政治治理能力迅速衰落。^⑤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控制力，而且“19世纪晚期，……反常的地方统制机构遂得以发展成为一种滥施淫威的强权，并且尾大不掉。这形成了地方主义以及后来的军阀主义最丑恶的特征。”^⑥(P125-126)辛亥革命以后，名义上的统一政治试图弥补，实际上弥补了一些原有的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状况。但是，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的挑战，中央政府为了加强集权的步伐，又来不及实现制度的创新，只能被迫向传统官僚帝国制回归，从而又丧失了其现代化的导向，削弱了统治的合法性。”^⑦(P9)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再一次受到毁灭性打击，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迁，家族为集体所取代，但是值得重视的是个人依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从政治格局上说，“中央集权和大行政区集权的各种要素的结合代替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作用。”^⑧(P657)现代化所要求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没有出现，“整个 1970 年代，中央政府一直比较软弱。中国没有建立起足以强化中央利益的地方牢固控制。实际上，是地方的情况而不是中央的方针决定了国家的大多数政策。”^⑨(P657) ^②

①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社会基本结构的崩溃来的太快，有可能使得社会难以适应这种迅速的政治格局变迁，利维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结构形式“是一个对某种形态的变迁特别缺乏抗力的控制系统。这些形态的变迁，如果急剧注入，将导致这种控制系统戏剧性地解体。”利维：《中日现代化诸因素的比较研究》，见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42页。

②这种情况在 80 年代以后至今已经获得很大的改善，经过税制的成功改革，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中央政策在地方不能获得良好的执行，或者执行打折扣的现象比比皆是。由此带来的政策和法律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失去了预想的效果和效力，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中央政策与统一的法律体系的社会基础。同时不得不注意的是，现在的地方政府与中央部委之间也存在着利益的博弈问题，一些部委的权力运行时常超出中央政府的授权，其结果是部委权力要么与地方权力发生冲突，要么与地方政府形成勾结。

三、近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与秩序分析

(一) 近代以后二元经济的形成

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的联合作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形成一元的市场经济格局；相反，传统经济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被保留下来，而现代经济又在中国生了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情况，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二元经济模式。

1. 中国的二元经济。

二元经济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二元经济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1][P51]} 二元经济本身并没有贬义，只是一种经济秩序形态而已。从形成时间而言，中国的二元经济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开始的，“中国社会经济二元化的开端，严格说来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才真正开始从事现代化的进程。”^{[3][P135]} 也就是说，“19 世纪末现代经济因素的增长……使传统部门发生了一些变化，使中国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格局。”^{[3][P155]} 这种二元经济在中国的特征表现为，“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各条约口岸，较好的农业地区基本上在这些口岸的周围。而广大的内陆地区，耕作、手工和商业依然很落后，仍用人力操作，并时常蒙受天灾战乱之苦。”^{[3][P417]} 还有学者认为《马关条约》以后在中国逐步形成的二元经济的特征表现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同时存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城市化进程已艰难竭蹶地开始，在当时的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这个部门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劳动力呈无限供给状态。”^{[3][P159]} 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二元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农业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共存。

2. 中国二元经济的形成因素分析。

二元经济在中国近代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形成是一个值得回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有这样几个因素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村社经济的稳定性没有被打破。

村社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基础，“村庄毕竟是 90% 以上的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领土单位。……中国则有另一套社会体系，有意识地偏重家庭纽带，家是安排得很妥贴，而把所在村庄的公益撇在一边。社会习惯和国家政策，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加强着家庭和垂直血统关系的有限地位。”^{[3][P60-65]} 村社经济必然牵涉到家族和宗族的治理问题，“宗族可以借助各种手段将同嗣各户连结起来，长期地同心协力以争取社会地位的上升，所以村庄没有内聚力亦无损于地方的繁荣。”^{[3][P65]} 同时，中国村社经济中由于家庭分化严重，单个家庭的经济能力有限，因此产生不了太多的剩余资本用于投资工商业的发展。“现代精英阶层的产生和储蓄能力的形成，这是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从总体上来看，20 世纪初期，……占总人口 90% 的农业人口绝大部分缺少储蓄能力，少部分富裕者又对银行制度非常陌生。”^{[3][P159]}

第二，二元政治结构的存在。

中央集权的形成，是西方现代化兴起过程中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民族主义是西方现代社会兴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新的经济秩序的最终生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在经济变迁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容忍一个软弱的、依附的中国国家政权；但对其以民族复兴为前提或组成部分的强化国家主权的努力，它们却极力反对，并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压力，来削弱它的力量与合法地位。”^[3] 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的权力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反而变得越来越弱了，相反地方政府的实力不断攀升，因此，“随着昔日中央集权化势力的衰落，随着正在兴起的现代化成分在城市的大量集中，农村变成了在汪洋大海里飘泊不定的小船。有迹象显示，在中国出现了城乡双轨经济，农村地区脱离现代经济潮流的情形远甚于相应阶段的日本和俄国。”^{[3][P653]}

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的现实。

城市在西方社会的秩序变迁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城市作为工业基地、市场中心和商贸集散地极大地满足了现代化过程中产业经济和市场发展的要求。同时，城市也是断送传统农业经济秩序的利器，城市的产业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变革。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情况就是：由于城市发展不足、中央投入乏力、人口基数过大、外资控制过严以及工业化程度不高等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城市根本无法吸纳大量涌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无法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和促进农村经济秩序的变迁。一方面，“中国城市没有变成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由于没有购置土地的财力，穷人就被吸引去当佃农以及农忙时节的农业雇工，因为这时候农村工资大大高于城市工资。”^{[1] (P208)}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城市是政治中心，人们并没有习惯将城市看成是经济活动的地方。相反，农村的人没事一般不进城，可能因为“城内不仅坐落着高大森严的县衙大院，其中有县令的公堂和其他政府机关，而且耸立着各种足以标志该城在广大帝国所处地位的特殊庙宇，无不使百姓在内心产生一系列联想，感到应当服从秩序，应当与外界和谐相处。”^{[1] (P209)} 这种内心的感受和外在吸引力的不足都造成城市和乡村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极，而不是同一个经济秩序中的两个方面。

（二）近代中国二元社会的秩序特征

1. 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

中国传统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原为完整的经济体系，在中国更是一个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1] (P52)} 这些传统的经济部门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基本上也是以农业经济服务为目的的。传统的市场虽然数目众多，但是前现代化时代的市场主要是小型的、零散的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基本上没有发展出来。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国内市场存在着市场价格体制严重不足，此时的市场“基本上是自由市场，但并不是说它就会产生均衡价格”。^{[1] (P68)} 传统经济并未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致命的打击，换句话说，现代产业的发展与传统经济的维持构成了中国二元经济下经济秩序的一个明显特征。在这一特征下，城乡的分离和紧张关系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表征，“城乡关系极为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城镇几乎全靠农村的收益来维持。他们却几乎没有为农村生产什么能够提高其净生产率或总生产率的东西，以改善农民的生活。……这种发展的净结果，是农民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更为离心，至少不积极支持政府作新的变动。该政府已推翻刚刚取代帝制的民国，农民又成了阻碍其现代化的重要角色。”^{[1] (S)}

2. 传统习惯与现代法律并立。

中国旧有的政治格局总体上是皇权和绅权共治的格局，绅权治理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宗法制。宗法制后来又和科举制紧密相连，科举制度实际上向社会中提供了一条相对平等的阶层流动机会，依田惠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开辟的用人之途，是封建统治制度合理的一面，……正因为这一制度有其合理的方面，全体封建统治阶级都深深地眷恋这一制度，热衷于维护这一制度”。^[2] 传统制度框架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诉讼制度上。大量的基层纠纷是通过习惯来进行处理的，^① 一方面，“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1] (P127)} 另一方面，由于皇权与绅权的二分，对于农村地区的民间纠纷，主要依靠乡绅的治理水平予以解决，“不大的纠纷基本上是寻法律以外的途径来解决，这

^① 按照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框架，基层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都属于州县自理的案件，州县官员可以自行处理结案，因此，民事纠纷的诉讼基本上是依靠当地和通行的民间习惯予以解决的。这一问题，日本学者滋贺秀三、佐治立人以及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等人都进行过研究。参见 [日]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以及《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见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9-97页。[日] 佐治立人：《精明集》的“法意”与“人情”——由诉讼当事人进行法律解释的痕迹》，见川村康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38页以下。黄宗智：《中国民事判决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见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十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67-89页。

种特点很切合社会实际，不仅花费低廉而且行之有效。”^{[1] (P129)}

新中国成立之前，民国政府虽然逐步建立了成文法典系统，但是，在严重的二元经济秩序形态下，农村依然保有传统的习惯规则体系。有感于中央政治控制能力的不足，国民政府努力寻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途径，政治多元化的无序状态则迫使政治改革者寻求权力高度集中的方式和结构。可惜的是，这种努力迅速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所阻碍，二元的秩序体系未能打破。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中的政治控制获得了变革，然而农村的经济生活没有改变，生产方式没有变化，生产关系却变革了。对于农民来说，传统习惯在农民的生活中还是具有效力的规则系统，它们与中央政府统一的规则系统并立。农业经济生活中的习惯只能在该经济内部获得新生，没有农业经济革命性的变迁，也就没有中国二元经济问题的解困，二元制度并立的格局就很难打破。毕竟理性主义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生活在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农民而言，其规则的含义和实用的意义都是很难理解的。

3. 传统观念与现代文化冲突。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家族取向”压倒一切。就典型情况而论，主要是根据家族的利益来作决定，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社会可谓“家族取向”至高无上。^[15]对于个人来说，对家族的遵从是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原则，同时对皇帝的效忠也是从对家族的遵从中引申出来的。只要“风调雨顺，物富民康”，人们便认为统治者享有天命并代表天意进行统治。但若灾荒连年，饿殍遍野，就不再认为他是奉天命而治下民的“天子”了，于是他就将丧失统治权力和臣民的效忠。民变是国运衰微和帝王失德的主要标志。一场成功的民变则是最终的确证。^[16]同时，古代官僚科层制也为个人在平民与官僚两个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创造了机会，正是这种机会的存在，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文化，实际上就是影响了人们的人生观。

西欧现代化，一般是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讲起。这是因为，在欧洲，人们的思想不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树立人文主义世界观，现代化将无从谈起。中国不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一直是人文主义的。^{[17] (P4)}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似乎应当在思想上具有向现代性转变的优势。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中国的人文主义是以家族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因此，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在中国没有基础。因为在生产领域，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在政治领域，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概念；在财产领域，个人私有财产的独立性没有制度的确认。所以，“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包括民主和公众领域等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完全陌生。而以个人为单位的和国家与经济分离、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国家组成模式，迄今未在中国生根；而中国源于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些国家组成原则，一直延续到今天。”^{[18] (P334)}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二元经济格局最终决定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思想与以家庭为基础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并存，并且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三) 中国近代秩序形成的独特性

作为混合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秩序变迁从原来的农业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转变为二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状态，这个过程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中国固有的传统社会具有非常强的结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松散的组织结构。“中国社会是一个有自足性的社会系统。其各个部分与部分间，部分与全体间的关系非常松弛，因此，部分的动乱崩解不足影响全体。这就构成中国这一全国性社会系统的安定性的原因，……中国社会的统协性整合性极强，它自己不易开出基本的‘结构的形变’(structural change)。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化是要待外力的挑激才开始的主要原因。”^[19]罗兹曼也有类似的观点，“中国秩序是完整无缺、未受挑战的，而西方秩序则开始呈现出现代结构，充满活力，并因现代知识和现代技术得到巩固。西方的世界观和世界秩序，如果没有与之结合在一起的技术，那它对后来的史家们来说，也将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正如在那些惊愕不已的西方人眼里的中国秩序一样。”^{[20] (P57)}

其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经济变迁并不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发生萌芽的，而是从农业经济以外建

立的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展开的。并且这种新的经济秩序也不是市民社会活动的结果，而是政府的行为——官督商办。“中国发展工业化一开始，为什么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是由军用工业开始，军用工业以官办为宜，后来由军用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就把官督商办的精神带到民用工业。……另外，中国官权大、容易集资，民权小，普遍贫穷；中国官多出身知识阶层，较有眼光，人民大多无知，对西方缺乏了解；也都是造成官督商办的原因。”^[14]这种官督商办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失败的因子，因为，这种经济变迁的形式很容易导致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隔阂，进而加速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秩序的形成，当中国的政府能力不足以支撑工业化不断深入传统农业经济的需求时，二元经济的经济结构就不但形成，而且被进一步稳固了。

第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变迁始终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变迁紧密相关。金耀基先生认为儒家文化的隐性作用是中国近代秩序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五个运动，大体上是从重“认同”，轻“变革”到“变革”的转向，再到“变革”的推进，最后到达“目的取向”的共产组织取代“价值取向”的社会组织，扣紧了原来松弛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2]不过，由于对传统社会并没有实现有效的改造，从而导致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传统一直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儒家传统在今日大陆虽不复是一显性的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但却成为一个有力的隐性的‘抗拒文化’（counter culture）。同时，共产党虽偏重‘变革’，但‘认同’仍然在政治社会的领域中发挥重要的功能。”^[2]

第四，中国在近代秩序变迁的过程中受到外国的奴役比亚洲其他国家更加严重，这种奴役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能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经济秩序的变迁。鸦片战争以后，在条约体制的压迫下，政府的财政能力不仅没有提高的迹象，反而日益艰难。“不平等条约给与中国最大的压力是赔款，使中国人喘不过气来。”^[4]为此，“1905年以后预备立宪，新政兴起，支出增加，有的省份立即陷入赤字状态。”^[4]

最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变迁所凸显出来的特征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台湾学者张玉法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秩序变迁过程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主要有：“其一，清末民初，中国有严重的地域主义存在。……其二，1840-1940年代，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此不平等条约，一方面保护了外国人在中国的工商业，同时也侵犯了中国的行政、司法、财政、国防等权。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决不能有效地推展现代化。其三，中国有轻视工商业的传统，……不能独立作企业化发展的工商业，是没有办法继续成长的。其四，教育内容空疏，缺乏推展现代化的人才，……人民大多愚昧无知，少数领导人物的现代化运动，难获得有效的支持。其五，部分不合时宜的传统，束缚了前进的脚步。”^[14]

四、当代中国的二元社会秩序

（一）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结构

从中国第一次进入“世界格局”以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革。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变革基本上则是从以人力、动物力为基底的农业社会转向为以科学技术为基底的工业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结构及其价值皆相应地会发生变化。”^[4]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表征就是在社会秩序上形成了明显的二元格局，也就是本文称之为“二元社会秩序”。这是两种秩序并存的社会秩序形态，其中发轫于近代的现代秩序在中国初显头角，而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秩序依然存在于广大的农村和城郊地带，这种现代化路径的结果就是，“现代化的发展，给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沿海与腹地带来了一个截然分明的二元化结构。”^{[3](P13)}表现在沿海口岸地区与内地之间形成明显的秩序分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地区与传统地区不仅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反而呈现出彼此封闭和排斥的格局，于是，一种两极化的现象出现了，当现代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地区和部门却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3](P14)}

从秩序转型的角度来看，口岸区域及其邻近地区出现了相当多的现代性因素，经济秩序的变迁比较

明显，政治统治的结构也开始发生改变，法律开始逐步成为这些区域秩序治理的主要规则系统，社会思想意识中现代政治意识和法律意识开始增强；而大范围的内地腹地仍然处于传统经济与秩序的控制中，农业经济还没有迹象向市场经济转化，乡绅依然在农村占据重要的政治资源，习惯依然是这些区域秩序治理中主要的规则系统，社会思想中传统儒家思想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因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协调这两种规则系统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是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需要尽快地，同时也是被迫地要建立符合现代理性的法律体系以取代旧的封建的法律体系，同时，在全社会荡涤传统习惯的影响，推行法律之治，通过制度的变革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这虽然是许多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通行做法，不过不能不看到，“社会的自发秩序与人造秩序是应当和谐一致的，但是，外来文化的移植和制度借鉴有可能使这种一致性被打破，特别是近代以来，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量移植和照搬西方国家制度，使得两种秩序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罅隙。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这两种秩序之间的不一致。”^{[6](P284)}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法律和习惯总是社会秩序中共存的两种规则系统，可以说，人类文明社会开始至今都是在二元社会秩序下演进和发展的。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任何一个文明时代的二元规则系统恰恰形成了秩序治理层面上的规则冲突，这是一对矛盾，这对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往往也是推动秩序变迁的制度性力量。本文认为，近代以后的二元社会秩序实际上也有两种：一种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一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另一种是以中国为典型的传统—现代二元经济下的二元社会秩序。在中国的二元社会秩序中，实际上包含几重二元，第一重二元是整个社会来看，国家的制定法系统和顽强的民间习惯共同存在，现代化早期是后者占主导，当代中国则是前者占主导；第二重二元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来看，国家的制定法与市场经济的自生自发的习惯规则共同存在，前者占主导；第三重二元是在欠发达的地区，国家制定法与以乡村民间习惯为主体的习惯规则共同存在，现代化早期后者占主导，在当代，后者的主导地位有所降低。从宏观的制度层面看，国家的制定法基本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从实际效力看，则有上述情况的存在。

（二）当代中国二元社会秩序的特征

1978 年开始，中国逐步推进市场经济的进程，这实际上也是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延续。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改革原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主要就是对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改革，使之走向一元的市场经济。当时面临的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形态十分严重，农业人口过于庞大、农业经济生产率低下、农业生产方式传统、城市发展不足、城市化水平低下、工业能力较差。从秩序方面看，法律体系严重不足，法律在农村日常生活方面效力缺失比较严重。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中国的二元社会秩序发生了巨

年代	城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年代	城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城镇人口	乡村人口
1978	17.92	82.08	1991	26.37	73.63
1980	19.39	80.61	1992	27.63	72.37
1981	20.16	79.84	1993	28.14	71.86
1982	21.13	78.87	1994	28.62	71.38
1984	23.01	76.99	1995	29.04	70.96
1985	23.71	76.29	1996	29.37	70.63
1986	24.52	75.48	1997	29.92	70.08
1987	25.23	74.68	1998	30.04	69.60
1988	25.81	74.19	1999	30.89	69.11
1989	26.21	73.79	2000	36.22	63.78
1990	26.41	73.59	2002	39.10	60.91
			2003	40.53	59.47

大的变迁，但是，截至到目前，中国的二元社会秩序状况仍然没有被彻底摆脱。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人口比例在人口总量中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农村绝对人口比例依然较大。

(1) 中国城乡人口的比例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了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或者说传统经济的改造是非常明显的。^{[16](P40)} ①

(2) 根据 2004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到 2003 年年底，全国 660 个城镇中的人口总数为 59016.1 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 24722.0 万人，占比例为 41.89%。一般认为，城镇的非农业人口占人口比重超过 20% 以后，城市化进程有望进入加速发展阶段。^{[16](P39)}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到 2003 年年底，中国乡村人口共 76851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 129227 万人的 59.47%（见上表）。考虑到城镇中包含大量的农业人口，因此，2003 年年底，全国农业人口的数量为 91550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0.8%。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同时也说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局面仍然比较值得重视，由于农村经济决定的乡村秩序形态、农村生产方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而与城市所体现的现代秩序不同，从而使得二元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实依然存在。

(3) “市区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1978 年为 8.3%，1997 年为 17.7%，2003 年达到了 19.13%。……通常所说的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严格的城市化水平是指城镇中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6](P39)}

第二，由于人口基数过大，这些人口增长又主要在农村，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多，已经对城市的劳动力容纳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人口提供不了产品，但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因此，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1979 年，全世界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为 24.25 亩，以这个为标准的话，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 2006 年末耕地面积为 18.266 亿亩，应该需要农业劳动力 7532 万人，而 2006 年末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从业人口数量为 33879 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在 26347 万人左右。从总数上看，2006 年末，农业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持续增加，达到了 13181 万人，即便如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然维持在 13166 万人左右，这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就成了中国改革道路上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城市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两大问题，已经造成城市职工就业岗位的紧张，再要消化这么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变成了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一个两难课题。

第三，农村人口绝大部分还是从事传统农业经济作业的人口，而不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口。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过小导致农村的贫困状况难以短时期解决。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截止 2006 年末，全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为 53100 万人，农业从业人口 47852 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 70.8%；从事第二产业的占 15.6%；从事第三产业的占 13.6%。按照这个比例，2006 年末，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仍然有 33879 万余人。^② ‘由于非农业产业的人口比重太小，购买食品的总价值就小。而参与这部分总价值分配的人太多。这是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16](P141)}

第四，贫困现象普遍，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收入的两极分化是刺激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但是，过高的两极分化则会导致社会经济和秩序的稳定性降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增加，因而会影响现代化的进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采取措施

①2003 年以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是连续的，但是速度并不快，截止 2007 年，城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 44.9% 和 55.1%。

②值得注意的是，农业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例，全国不同地区的差别较大。中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这一数据都超过了 75%，分别为 76.8%、86.3% 和 80.1%，相应的人数也达到 10017 万、12019 万和 2587 万，总共达到 24623 万人，占全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从业人口总数的 72.6%。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农业技术的水平以及市场化条件比较薄弱。这些地区许多农村的生产条件落后、技术资源不足，农业生产率相对低下，这种状况的延续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降低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二元经济的存在，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的加剧，辅以政治体制、制度架构和社会文化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国内的贫富差距比较明显，这一情况往往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来。基尼系数在 0.2 以下为绝对平均的分配；0.2-0.3 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 为分配有差距，但是在允许范围内；0.4-0.5 之间为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会出现不和谐现象；0.5 以上为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状况。^[1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 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为 0.45，占人口 20% 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 4.7%。占人口 20% 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 50%。”^{[16](P56)}

第五，农村秩序治理机制的不合理，导致在一些农村地区，传统的秩序治理机制开始复苏，传统的习惯规则开始占据农村秩序治理规则的主导地位，法律的权威受到严重影响。“过去农村社会主要靠行政整合来维持其秩序。党团组织系统，行政权力系统，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是这种整合机制中的三支重要力量。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民和集体经济纽带的弱化，使行政权力系统失去了过去那种整合力量。……村民自治组织本来可以完成整合任务，但是，不少地方村民组织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有些地方乡镇政府操纵选举，农民对它失去热情。……因此，宗族组织、宗法组织、宗教组织乘虚而起。正当的愿望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实现，灰色的渠道就悄然而生。……村民有事不去找正式组织，而是通过自身所在的非正式组织寻求解决途径。乡村正式组织的衰落和非正式组织的复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6](P133)}

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问题依然是二元社会秩序的改造问题，这一问题的前提当然是二元经济的改造。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改革中，将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基础性的内容。有学者认为应当采取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对农业经济的做法，那就是“减少农民的数量，也就是让大量农民向非农民转移。”^{[16](P141)} 但是，单纯依靠城市容纳农民，将会对城市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这种转移需要在传统经济的内部实现转换，实际上也就是大大减少纯粹从事农业经济的人口，减少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本文认为，制度的转化也是实现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如何处理二元经济下的法律和习惯两种规则体系之间的矛盾，是有利于推进社会秩序变革、保障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

（三）当代二元社会秩序中的规则关系

正如前文所说，当代中国的二元社会秩序内部的规则冲突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定法与民间习惯的冲突上。从现实情况而言，民间习惯中以传统农业经济中生成的习惯为主，市场经济中生成的习惯为辅。由于中国城镇人口的比例毕竟只有 29.2%，因此，广大农村就成为法律与习惯冲突的主要场所，这些习惯中有些是在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由传统习惯演化而来。而在有些农业生产方式依然落后的农村地区，传统习惯仍然稳固地保留在乡民的生产和生活中，有些地区实际上成为了“法律不入之地”，社会秩序基本上受习惯的维持。这些习惯满足了尚未改变的农村经济生活的需要，生成于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中，因此，在传统经济尚未受到改造的时候，它们的生命力是不会消失的。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国社会的传统性时就指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8](P30)} 在中国长期的差序格局中，“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18](P55)} 对于现代法律向乡村推进，从而引发法律与习惯的冲突，他指出，中国社会变迁中二元社会秩序的内部矛盾之一，就是“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是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18](P58)} 而这里所说的礼治秩序，就是对传统规则（习惯）普遍服膺而生成的社会秩序形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之一。

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在中国现代化的初期就已经有所显现，当时，“尽管立法与行政机构制订了大量法律与行政规范，形成了一整套书面的制度化系列，但在中国权力运作实际过程中起真正作用的，仍是2000年遗传下来的带有浓郁宗法血缘关系的‘习惯法’，这种因人而异的、随意性极强的人治传统极大地阻碍了现代行政机构中形式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国民政府的制度化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3](P12)}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始终包含着国家总是试图将制定法的规则强加在传统经济所主宰的社会秩序中，以求法律的统一、令行禁止。但实际上，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并未被中断，它们只是从制度层面上退隐了，而以另一种潜在的方式继续存在着，并在实际上决定着制度层面上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中国社会近100年来的许多重大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存在着这一‘双重社会’，而这一双重社会又未能融合一致的缘故。”^{[3](P16)}这种冲突还与社会控制的政治机制有比较大的关联，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与宗族大户维持秩序，推行教化。……到民国政府时期，行政权力在农村由县下沉到区、乡、镇一级，但由于农村精英的流失，政权对农村底层的控制反而更加微弱，其对农民的职能只是征粮、征赋、征丁，这又加剧了农民与政府的紧张与对抗。”^{[3](P15)}

纵观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逐步西化的过程，只不过这一过程中脚步时快时慢罢了。中国的现代制度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法律制度的体系为蓝本的，通过这一制度体系的建构，中国政府希望建立一个满足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秩序来。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社会这一百年来实际的、现实的变迁，已根本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用的问题，而是全面移植了西方的各种制度，在中国原有社会之上依据西方模式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但这一新的社会并未能够彻底取代中国原有社会，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社会’的模式。”^{[6](P15)}从已经建立的法律体系而言，“虽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乃至法律形式均已是西方的模式，但法律的实际运作及其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却无一不体现并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法律并不仅仅体现于它自身的力量，它实际上为背后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所决定。”^{[6](P16)}因此，传统农业经济下的的习惯在体现市场经济原则的现代法律的运行中产生了事实上的抵抗力，从而对于现代法律的运行和效力实现构成了明显的影响。可以说，在二元经济的变迁尚未完成之际，习惯作为一种“隐性”的规则越来越体现出“显性”的影响，从而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秩序治理过程中一个名副其实的“制度性事实”。

本文认为出现习惯与法律的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当下中国的制定法体系实际上是反映市场经济中的法权关系的规则系统，其力图体现的主要是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利益要求。而当下法律与习惯冲突中所指向的习惯主要是反映传统的农业经济中的法权关系的规则系统，因而体现了传统农业经济主体的利益要求。从而，两种规则的冲突既是规则形式与内容的冲突，也是不同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利益的冲突，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冲突。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当下中国经济形态中传统—现代二元经济的现实，就应当承认传统农业经济下的法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应当承认在这种传统经济中形成的习惯的合法性。本文认为，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较好地解决目前面临的冲突，而任何不顾当下中国二元经济变迁的实际进程，试图以法律取代习惯，甚至宣布习惯为非法的主张都是违反客观事实，并且必将不能实现的。从二元社会秩序治理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不能无视经济变迁的事实而追求社会秩序的治理。

[参考文献]

- [1]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2] 金耀基. 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 [A]. 罗荣渠，牛大勇.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 许纪霖，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第1卷）[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 [4] [美]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 [M]. 贺卫方等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5]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M]. 李康, 李猛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6] 尹伊君. 社会变迁的法律解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7] 张朋园. 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助力与阻力 [A]. 罗荣渠, 牛大勇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8] [英] 怀特. 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 [A]. 罗荣渠, 牛大勇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9]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中国的现代化 [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10] 童书业. 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 [M]. 童教英校订.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1] 吴承明. 中国的现代化: 市场与社会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12] 依田熹家.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中两国的现代化 [A]. 罗荣渠, 牛大勇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3] [美] 费正清, 刘广京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下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4] 张玉法. 中国现代化的动向 [A]. 罗荣渠、牛大勇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5] 利维. 中日现代化诸因素的比较研究 [A]. 罗荣渠, 牛大勇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6] 杨继绳.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
- [17] 世界银行. 2000/2001 年发展报告 [M].
- [18]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雨田

(上接第 20 页)

缺一不可, 即从单一的经济建设和市场化改革转向旨在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和谐社会的多元化综合改革。这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是无法用哪一个西方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型来进行诠释的。

在改革绩效的价值评判标准上, 应该注重生产力发展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经济建设和其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辩证统一, 否则, 易导致以污染环境、耗竭资源、忽视公平和影响稳定为代价的跛腿社会而不是和谐社会; 就不是“次帕累托改进”, 而是以牺牲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李嘉图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地方, 在于党和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 应该对在改革过程和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农民、民工、下岗人员等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 直接地主动地支付转轨成本、改革成本亦即和谐成本。并把制定和落实关于社会和谐成本的方针、政策、法规、体制和战略系统化。在中国发展正遭遇“李嘉图推进”和“不公平约束”的背景下, 中国应该适时选择把以人为本、注重公平作为突破发展约束的新的动力源, 引领中国新一轮改革创新。而总的目标和衡量标准, 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 二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从而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 雨田

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应用

——2007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介 *

朱 琪 陈乐优

[摘要] 200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 Leonid Hurwicz、Roger B.Myerson 以及 Eric S.Maskin 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方面的重要贡献。机制设计理论是探讨在一定的条件下信息是如何被用在资源分配上的，通过设计一套机制来达到既定目标又能判断机制优劣的理论。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显示原理和执行原理非常重要，而激励相容的概念贯穿整个机制设计理论。随着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其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它对于解决中国现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 诺贝尔经济学奖 机制设计 激励相容 显示理论 执行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76-07

一、引言

200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 Leonid Hurwicz、Roger B.Myerson 以及 Eric S.Maskin 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Hurwicz 目前的研究主要包括了机制设计理论、重复博弈、收入不均衡问题以及投票理论等等。Myerson 主要的研究包括经济学领域中的博弈论以及政治学领域中的投票体制等等。Maskin 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博弈论、激励理论、拍卖理论以及社会选择与社会福利，研究的课题为机制设计理论、重复博弈、收入不均衡问题以及投票理论。

“机制设计理论”最早由赫维奇提出，马斯金和迈尔森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这一理论有助于经济学家、各国政府和企业识别在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何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帮助人们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政策手段和决策过程。“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解释何种制度或分配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作为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这一理论为最优贸易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让我们能够分辨市场在某种情况下的分配是否运行良好。同时，它也帮助经济学家们识别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方案以及选举进程。今天，机制设计理论在经济和政治科学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例如，何种机制可以实现贸易所得最大化、商人的利益最大化，或怎样的保险政策能够在不引起开支滥用的情况下达到最大的覆盖面。我们的社会究竟该采取怎样的分配机制呢？什么才是达到社会福利和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的分配机制？政府的作用如何？

机制设计理论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设计一套机制来达到既定目标又能判断机制优劣的理论。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显示原理和执行原理非常重要，而激励相容的概念贯穿整个机制设计理论。随着机制设

*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7CJY0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673024）和广东省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06ZDXM7900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朱琪，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陈乐优，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006）。

计理论的发展，其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它对于解决中国现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本文就是从此出发，对机制设计理论的文献的考察，来介绍机制设计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分析其运用范围以及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发展状况，最后对机制设计理论的最新成果进行评介。

二、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亚当·斯密曾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如何在理想状态下保证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但是现实情况经常是不理想的。此外，许多生意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的，个人或者利益集团在其它机构的安排下进行讨价还价。这些不同的机构或者分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是否存在最理想的机制来实现某种目标？政府的规则如何进行最佳设计？

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有关个人喜好和可用的生产技术经常分布在许多参与者中，他们可能会利用私人信息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由赫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罗杰·B·迈尔森进一步发展的机制设计理论极大地加深我们对在这种情况下优化分配机制属性、个人动机的解释、私人信息的理解。这种理论使我们能区分市场运作良好的市场和运作不良好的市场。它帮助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体系和投票程序。今天机制设计理论已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政治学的一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机制设计理论是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通过设计一套机制（游戏或规则）来达到既定目标，并能够判断一个机制优劣性的理论。比如在市场上，卖方想把商品卖给给出价最高的买方，他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但市场上的拍卖方式有很多种，荷兰式拍卖、英国式拍卖以及速胜式拍卖等等，不同方式的拍卖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如何判断拍卖方式的优劣性就是机制设计理论涉及的范围之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最早起源于 Hurmicz 在 1960 年发表的一篇著作，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迅速的发展，直到 Hurmicz (1972) 提出了激励相容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的概念，机制设计理论才得到广泛的运用。激励相容的概念是指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有其自利的一面，如果能设计出一种机制使得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那么这一机制就是激励相容的。但 Hurmicz (1972) 认为在参与约束条件下，不可能存在能够产生帕雷托最优结果的激励相容机制。直到机制设计理论中显示原理的出现，认为一个社会选择规则如果能够被一个特定机制的博弈均衡实现，那么它就是激励相容的，能通过一个直接机制 (direct mechanism) 实现（史晨昱，2007）。

除了激励相容概念之外，在机制设计理论中有两个基本原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显示原理 (revelation principle)，另一个就是执行原理 (implementation theory)。

（一）显示原理

显示原理首先是由 Gibbard (1973) 提出的，它的出现对于机制设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在此之前，机制设计理论中一直有个疑问就是：帕雷托最优能够在优势策略均衡之外的条件更少的均衡或更加广阔的机制，如纳什均衡或贝叶斯均衡中实现吗？而在显示理论出来之后，这些问题就逐步得到了解答。根据显示原理，人们在寻求可能的最优机制时，可以通过直接机制简化问题，这大大减少了机制设计的复杂性。只要这个直接机制是激励相容的，那么人们便可以证明社会选择规则是能够按照某一特定的均衡实现的。

Gibbard (1973) 和 Satterthwaite (1975) 共同建立了 Gibbard-Satterthwaite 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表明当决策人面临三种或三种以上的选择时，那只有独裁的投票机制是优势策略的。Satterthwaite (1975) 证明在一个至少有三种选择的投票程序中，如果每个决策人都真实地显示其偏好，那么这个程序就是免于战略 (Strategy Proof) 的，而每个免于战略的投票程序都是独裁的。Gibbard-Satterthwaite 不可能性定理与阿罗不可能定理是非常相近的，是对这一定理的再一次验证。随后显示原理获得 Myerson (1979、1981、1983)、Baron 和 Myerson (1982) 以及 Myerson 和 Satterthwaite (1983) 等人的发展。这些学者把显示原理扩展到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普遍概念，而显示原理也被运用于管制 (Baron 和 Myerson,

1982) 以及拍卖理论 (Myerson, 1981) 等方面。

(二) 执行原理

执行原理能解决显示原理所不能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机制可能包含很多不同的内部均衡，如何能使得所有的这些均衡达到最佳状况在执行原理被介绍出来之前困扰了不少人。Maskin (1977)^① 发现执行原理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证明假如 Maskin 单调性、非一票否决 (NO-veto-power) 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在至少有三个决策人时，纳什均衡中的执行是可以实现的。在这之后，Groves 和 Ledyard (1977) 以及 Hurwicz 和 Schmeidler (1978) 就研究得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设计出一种机制，使得其中的纳什均衡都可以实现帕雷托最优。Postlewaite 和 Schmeidler (1986)、Palfrey 和 Srivastava (1989) 以及 Jackson (1991) 又将执行原理扩展至不完全信息的贝叶斯纳什均衡中。

三、机制设计理论的应用

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虽然不过几十年，但其运用却已经十分广泛。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都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作为基础，指引人们的行为。近年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广泛运用于社会选择理论、拍卖理论、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方面，对其他理论和实践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 机制设计理论在社会选择中的运用

社会选择问题面临集体决策问题。群体中个人的偏好并不一定相同，当每个人的偏好都相同时，那么社会选择问题就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但当每个人的偏好不同时，如何统一每个人的选择就成了一个难题。而且每个人的偏好是个人的私有信息，他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偏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选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Kenneth J. Arrow (1951) 就对社会选择问题进行过研究，得出了集体决策规则所要满足的五个条件，但他发现没有任何集体决策规则能够同时满足所有的条件，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Gibbard (1973) 和 Satterthwaite (1975) 也提出了不可能性定理，表示如果集体决策中如果至少有三种选择，那么就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能够实施非独裁的社会选择而且能够显示个人真实偏好的机制。但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可以通过寻找博弈均衡解来得到或近似得到社会选择目标集合，从而解决社会选择问题。

在完全信息和纳什均衡的条件下，解决社会选择问题的条件是单调性。Serrano (2004) 认为如果机制设计者能够随机地利用机制，而且执行社会选择的概念可以放宽到近似执行，那么每个社会规则只要满足基本的序列条件，就可以在纳什均衡中得到近似的解决。而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社会选择问题的均衡就与贝叶斯均衡有关，其所必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符合激励相容，其次，贝叶斯单调性的条件也要得到满足。

(二) 机制设计理论在拍卖理论中的运用

在拍卖中，买卖双方各自对进行拍卖的物品都有自己的估值，而双方对各自真实的估值是信息不对称的。假设目前物品的卖方只有一个，而买方有 N 个，卖方可以通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拍卖物品，比如荷兰式拍卖、英国式拍卖以及速胜式拍卖等等。这些不同的拍卖方式会给买卖双方带来怎样的收益，哪种拍卖方式对于卖方更好等等都是机制设计研究者关注的热点。Myerson (1981) 的研究表明，可以设计出一个机制使得只有出价最高的买方才能获得物品，而这个机制必须是激励兼容、个人理性 (individually rational) 以及事后效率 (Ex post efficiency) 的条件下。这表明不管何种拍卖方式，只要符合以上条件，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个机制使得卖方的利益获得最大化。Myerson (1981) 又发现，如果真实的报道组成了贝叶斯均衡，那么直接机制 (direct mechanism) 是与贝叶斯激励相容的。根据显示理论，对于任何辩诉交易 (bargaining game) 的贝叶斯均衡来说，存在一个均衡的激励相容的直接机制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Harris 和 Raviv (1981)、Riley 和 Samuelson (1981) 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①1999 年才发表在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9, 66: 23- 38。

(三) 机制设计理论在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中的运用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运用各种工具调节利率和货币供给量而实行的政策。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会存在时间不一致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根据目前以及预期情况制定出来的货币政策在实施时并不一定是最优的。Yuan 和 Miller (2006) 认为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机制来解决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在 Barro 和 Gordon (1983) 研究的基础之上，Yuan 和 Miller (2006) 发现这种时间的不一致性来源于社会损失职能 (social loss function)，社会损失职能的两个目标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显示出不一致性。他们利用机制设计理论中的执行原理设计了一个中央银行职能 (central bank function)，使得最佳政策和一致政策合为一体，对于解决货币政策实施的时间不一致性有很大帮助。

(四) 机制设计理论在绿色支付政策 (green payment) 中的运用

绿色支付是政府限制生产耕地而给予农民的一定补贴。限制耕地是为了防止农产品的产量过高，带来供给过剩，而造成农产品价格下降所采取的措施。但是耕地限制所带来的产量的下降很可能会导致农民收入的下降，为了维护农民的收入，政府就实施绿色支付来平衡耕地限制和农民收入保护这两个双重目标。在实行过程中，绿色支付的实施效果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天气、农民的生产能力以及实际供求等等，因此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机制以提高这个政策的效率。Feng (2007) 认为绿色支付机制的设计要根据农场的类型以及其限制效率而定，其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决定于大型农场还是小型农场谁更有限制效率，如果小型农场更有限制效率，那么政府所要达到的耕地限制以及收入保护双重目标就很有可能同时实现，但当大型农场更有限制效率时，这两个双重目标就较难同时实现，大型农场还会获得政府给予小型农场收入保护的那一部分支付。

机制设计理论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机制在事物运行中的根本重要性，只有在一个良好的机制的基础之上，事物的发展才能朝着预期的好的目标发展。

四、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国企改革和金融系统的应用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垄断行业、国有企业、集团企业转移定价以及金融改革等问题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而处理好这些问题离不开一个良好机制。我们需要利用机制设计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设计出合适的机制来作为改革的基础。

(一)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设计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以及提升国有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面临着严重的激励不足的问题。据有关部门调查，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着对管理者薪酬的管制。2001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权威部门公布的抽样调查显示，从年收入的水平看，国有企业 89% 的经营者收入在 10 万元以下，其中 2 万元以下的占到了 41% 左右，2 万至 4 万元的占到了 27% 左右，4 万到 10 万元的占 19%。而这又导致了经营者在职消费问题的盛行。同时在国有企业中，经营者业绩的好坏并不是决定其薪酬的标准，当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企业利益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会受到明显的惩罚。以上这些都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存在严重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利用机制设计理论来设计出适当的机制来有效地激励经营者并且惩罚那些失职的经营者。杨善林、王素凤和李敏 (2005) 建立了一种“油锅合同”模型对业绩较差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进行威胁，激励其努力工作，它的基本内涵就是当经营者偷懒时，将会被解雇，而情节严重者还会被追究民事或刑事责任。这种机制对于经营者来说有很强的威胁作用，使其不敢偷懒。“油锅合同”的关键在于设计出一种机制使得经营者在偷懒和不努力两种情况下的输出是具有显著差别的，不然就不可能起到有效的激励威胁作用，甚至有可能损害努力的经营者的利益。

(二) 金融系统的机制设计

我国金融系统正在进行多项改革，需要对目前存在的机制进行修正。以股票市场的机制改革为例，

我国从 2006 年开始实行开放式集体竞价开盘，是我国股票市场透明机制发展的又一成果，它对于稳定股票市场的正常秩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开盘竞价的透明度提高以后，由开盘到连续竞价价格变化的幅度明显减小，连续竞价开始后 15 分钟的价格波动率也减小，而且能够提高开盘竞价收集信息的能力以及稳定连续竞价市场的作用。（许香存、李平、曾勇，2007）而目前，我国银行体系监管也面临一场机制的革新。银行监管机关意在寻求一种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来替代原先的体制外的监管体制。鲁志勇和于良春（2005）认为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的增强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可以减少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提高其监管效率。

机制设计理论对解决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垄断行业、国有企业、金融改革等等问题的存在从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现有机制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利用机制设计理论作为参考，设计出更加适合我国发展道路的机制基础。

五、机制设计理论最新的发展

机制设计理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发展，通常的研究围绕信息效率、激励相容以及其在拍卖、社会选择、分配等方面的运用展开，但近年来，机制设计理论在其他领域也得到发展，如对合谋、产权残缺以及委员会决策的信息获取方面的研究等。

（一）合谋

在市场的运行中，过度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产品供给者的利益受损。比起具有垄断力量的厂商而言，竞争激烈的厂商从消费者中获取利润的能力较低，厂商间总体的利益也可能因而下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这些厂商可能会采取合谋的手段，首先获得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分配这些获得的共同利益。厂商间的合谋会给消费者的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在防止合谋方面，机制设计理论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免于合谋的机制设计理论（*collusion-proof mechanism design*）可以帮助合谋管制者（如政府）在消除合谋方面起到不少作用。Jeon（2003）发现当合谋的利益低于一定水平时，合谋方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交易成本的存在而得不到合谋的好处，而当合谋的利益高于这一水平时，管治者可以利用交易成本设计出最佳的免于合谋的机制设计。同时 Jeon（2003）认为当管治者被限制只能采取相同的转移（*uniform transfers*）措施时，免于合谋的机制可能起不了作用。合谋行为不仅在经济领域发生，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很多见。Myerson（2006）认为民主竞争可以将民众的意志加于政府的政策之上，而且可以对于政府领导人的滥用合谋有遏止作用。在比较了多个选举系统之后，Myerson（2006）发现认可投票（*approval voting*）机制是最能实现以上两个作用的方法。

（二）产权残缺（imperfect property right）

产权残缺是指资产的控制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分属于不同的群体。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存在一部分资产只能由本国的政府所有，而这种产权残缺性对于经济的增长、劳动者的工资以及股本都有很大的影响，在一个产权保护良好的国家，政府的投资是十分安全的，而本国劳动者的财富水平也较高（Myerson 和 Braguinsky，2007a）。Myerson 和 Braguinsky（2007a）发现产权残缺具有政治上的稳定性，因为它使得政府获益，政府并不愿意自己的这种权利受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会发生严重的流动性限制和本国资产的大量外流。政府可以通过允许外国投资者拥有一部分原先由政府独有资产以减少这种过渡的冲击，但是政府缺乏有效的动力采取这种措施（Myerson 和 Braguinsky，2007b）。

（三）委员会（committee）决策的信息获取

在机制设计理论有关信息方面的研究中，对于委员会决策的研究是比较少的。Gersbach（1995）是这方面研究比较早的一位，他研究了包含私人信息获取的两阶段投票博弈均衡的特征，他发现信息的效率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随后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Li, 2001; Cai, 2003; Persico, 2004 etc），他们在委员会决策的假设条件上（如决策选择的个数、委员会的大小以及信息的结构等等）进行变化，对委员会决策的信息获取进行研究。在 Gerardi 和 Yariv（2007）的研究中，其委员会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和任务的，委员会中的成员在最初就需要决定是否要获取成本巨大的信息，然后必须汇报自己的私人信息，而机制的决策者可以决定委员会的大小以及委员会决策的程序，在这些前提假设下，他们的研究得出事前最佳的策略可能是事后无效率的，对于事后效率的最佳扭曲主要取决于信号（signal）的准确性。

六、小结

机制设计理论在 2007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机制的设计使得符合经济人假设的人们实现预期的目标的一种理论。Hurmicz、Myerson 和 Maskin 为机制设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机制设计理论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部分，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政治领域，对于许多现实中的问题的解决具有很重要的帮助作用。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阶段，利用机制设计理论来指导这些改革的进行，是有很大益处的。

[参考文献]

- [1] 田国强. 经济机制理论：信息效率与激励机制设计 [J]. 经济学（季刊），2003, (2).
- [2] Leonid Hurmicz. On Informationally Decentralized Systems, in Decision and Organization, edited by R.Radner and C.B. McGuir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2.
- [3] 史晨昱. 机制设计为不同经济体制破解博弈迷径 [N/OL]. 2007-10-17. <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1017/03014067724.shtml>.
- [4] Gibbard Allan. 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 A General Result [J]. Econometrica, 1973, 41: 587- 601.
- [5] Satterthwaite M.Allen. Strategy-proofness and Arrow's Conditions: Existence and Correspondence Theorems for Voting Procedures and Welfare Functions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5, 10: 187- 217.
- [6] Roger B.Myerson.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nd the Bargaining Problem [J]. Econometrica, 1979, 47: 61- 73.
- [7] Roger B.Myerson. Optimal Auction Design [J]. Mathematic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1981, 6: 58- 73.
- [8] Roger B.Myerson. Mechanism Design by an Informed Principal [J]. Econometrica, 1983, 52: 461- 487.
- [9] Roger B.Myerson, Mark A.Satterthwaite. Efficient Mechanism for Bilateral Trad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83, 28: 265- 281.
- [10] Roger B.Myerson, David P.Baron. Regulating a Monopolist with Unknown Costs [J]. Econometrica, 1982, 50: 911- 930.
- [11] Eric S.Maskin. Nash Equilibrium and Welfare Optimality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9, 66: 23- 38.
- [12] Theodore Groves, John Ledyard. Optimal Allocation of Public Goods: A Solution to the 'Free Rider Problem' [J]. Econometrica, 1977, 45: 783- 811.
- [13] Leonid Hurwicz, David Schmeidler. Construction of Outcome Functions Guaranteeing Existence and Pareto Optimality of Nash Equilibria [J]. Econometrica, 1978, 46: 1447- 1474.
- [14] Andrew Postlewaite David Schmeidler. Implementation in Differential Informatio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86, 39: 14- 33.
- [15] Thomas R.Palfrey, Sanjay Srivastava. Implementation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Exchange Economies [J]. Econometrica, 1989, 57: 115- 134.
- [16] Matthew O. Jackson. Bayesian Implementation [J]. Econometrica, 1991, 59: 461- 477.
- [17] Kenneth J.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Limited, 1951.
- [18] Roberto Serrano. The Theory of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Choice Rules [J]. SIAM Review, 2004, 46: 377- 414.
- [19] Harris Miltion, Raviv Artur. Alloc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Design of Auctions [J]. Econometrica, 1981, 49: 1477- 1499.
- [20] John G.Riley, William F.Samuelson. Optimal Auc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 381- 392.
- [21] Huiping Yuan, Stephen M.Miller. The Making of Optimal and Consistent Policy: An Implementation Theory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EB/OL]. <http://www.econ.uconn.edu/working/2006-06.pdf>.

- [22] Robert J.Barro, David B.Gordon. A Positive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in a Natural Rate Model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3, 91: 589- 610.
- [23] Hong Li Feng. Green Payments and Dual Policy Goals [Z]. Working Paper 02- WP304, 2007, (3).
- [24] 王燕, 李文兴. 回归率规制中道德风险问题的模型研究 [J]. *中国软科学*, 2006, (5).
- [25] 孙康. 强制性垄断分拆的机制设计 [J]. *财经问题研究*, 2007, (6).
- [26] 熊焰. 八成国企老总上级任命, 近九成年收入低于十万 [N/OL]. 2001- 04- 16. <http://news.sina.com.cn/c/232347.html>.
- [27] 杨善林, 王素凤, 李敏. 国有企业经营负激励机制设计——“袖锅合同”模型解析 [J]. *财经研究*, 2005, (9).
- [28] 肖红. 论激励相容约束下的转移定价机制设计 [J]. *财经论丛*, 2003, (5).
- [29] 许香存, 李平, 曾勇. 中国股票市场开放式集合竞价对波动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07, (10).
- [30] 鲁志勇, 于良春. 银行激励相容监管的机制设计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5, (5).
- [31] Doh-Shin Joen. Mechanism Design under Collusion and Uniform Transfer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5, 5: 641- 667.
- [32] Roger B.Myerson. Bipolar Multicandidate Elections with Corruption [J]. *Scand.J.of Economics*, 2006, 108: 727- 742.
- [33] Roger B.Myerson, Serguey Braguinsky. Capital and Growth with Oligarchic Property Rights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7a, 10: 676- 704.
- [34] Roger B.Myerson, Serguey Braguinsky.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Russian Transition- the Role of Oligarchic Property Rights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7b, 15: 77- 107.
- [35] Hans Gersbach. Information Efficiency and Majority Decisions [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1995, 12: 363- 370.
- [36] Hao Li. A Theory of Conservatism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09: 617- 636.
- [37] Hongbin Cai. Costly Participation and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in Informational Committees [EB/OL]. <http://www.econ.ucla.edu/people/papers/Cai/Cai257.pdf>.
- [38] Nicola Persico. Committee Design with Endogenous Information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4, 71: 165- 194.
- [39] Dino Gerardi, Leeat Yariv.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in Committees [Z].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1411R, 2007.

责任编辑: 黄振荣

政 法 社会学

两难抉择与政府职能转变

李丹阳

[摘要]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面临若干方面的两难抉择。只有理性处理这些两难抉择，实现从政府主导向政府推动的转变，才能有效地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宏观的政府职能定位理念体系、建立政府责任选择细分与追究机制、形成动态的职能构成组合机制、消除官员和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策略。政府职能定位的转变，丰富了“北京共识”的内容，形成了中国模式的新特点，在理论上打破了华盛顿共识的独占地位，昭示了发展中国家全新的发展图景。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主导 政府推动 目标模式 策略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083-07

一、政府职能转变的两难抉择

政府职能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永恒主题。一般而言，它是指政府的职责和权能。对此，可以作三个层次的理解：第一，政府职能意味着政府责任，只有确定了政府的责任，才能明确政府应当履行怎样的职能；第二，政府职能规定了政府的作用范围；第三，政府职能反映了该国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总之，政府职能的实质是政府在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实现，取决于政府积极有效地开展制定和执行各类公共政策、实施政府管理和政府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

“两难抉择”是公共政策选择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先于市场或外来力量之前，就存在强大的政府力量”，而又在寻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政府职能转变背后的理论逻辑选择，实质上是政府职能转变面临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选择。即：在进行政府职能改革和面对公共政策选择时，在政策价值基点、政府理念和政策方法等方面，是以市场为中心（Market-centered），还是以政府为中心（Government-centered）。这两种选择分别包含着截然不同的政府理念塑造、政府职能定位、职能范围框定、职能工具选择等广泛而深刻的问题。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公共政策的不同领域，中国政府都必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并且经常同时出现的政策情境（Decision-making Situation）之间做出决策。这种两难抉择，亦可称之为政策困境，已经在近年的中国政府管理诸多层面和领域浮现出来，而且呈现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两难抉择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 政治责任与政策责任。

一般而言，政府责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政治责任，第二是政策责任，第三是管理责任。政治责任关涉政府治理的合法性问题，政策责任有关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管理责任则涉及政府管理或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果的问题。

分散化的政府权力和利益，造成了分散化的腐败。分散化腐败的各个触点所造成的矛盾最终都经由

作者简介 李丹阳，北京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1）。

注意力网络（Attention Network）汇集到中央政府，例如近年来日趋严重的上访潮，以及重大的地方性事件，通过互联网的传播而演变成全国性事件的现象，都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典型的如重庆“钉子户”事件）。显然，政府面临着在政治责任和政策责任之间的两难抉择。中国“注意力社会”（Attentional Society）的到来，以及从改革开放前的威权政府向后来的开明政府的转变对民间压力的释放，所造成的注意力浪潮（Attention Wave）现象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区分政府的政治责任和政策责任？政府采用什么方式来承担政治责任和政策责任？这些都是横亘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问题。只有对这两种责任进行明确的区分，建立相应的、适度的责任承担和追究机制，才能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良好的政治氛围。否则，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如果政府对任何政策问题都要承担政治责任，这种转变的难度和风险都将极为巨大。

2. 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

对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经济职能与社会职能是其推动国家发展的不同维度的基本职能。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承担这两种职能。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言，政府对这两种职能的承担具有共时性。即在同一时间段或横断面上，政府必须同时承担这两种职能。二者的比例关系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势而进行调整，但不可能放弃其中任何一个。然而，在实际的职能履行过程中，受国家发展的阶段目标和政府资源的限制。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间段内，政府只能相对地偏重于行使自身的某一维度的职能，以有效地达成既定的阶段目标。

我国在前 30 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偏重政府经济职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国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印证的正是政府发挥自己经济职能的 30 年。同时，也是相对忽视政府社会职能建构的 30 年。对政府社会职能的相对忽视，造成了社会发展方面的相对滞后。例如事业单位改革偏差导致社会服务质量恶化和不公平、^{[11](P17)} 医疗体制未能理顺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社会工作制度尚未真正发挥作用等，都说明我国社会方面的发展已经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亟待通过加强政府的社会职能建设而得以解决。更深层次地来看，目前我国社会利益分化、社会阶层间距增大、利益分层、利益冲突日益严重，越发显性化，对政府的社会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新时期的政府不仅要提供社会发展事业的硬件设施，更需要提供相应的软件配套，如健全社会发展的理念、整合社会利益、协调社会冲突的机制等。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构建良政政府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情势，决定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将继续成为政府职能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是承担的方式方法、职能投向应该有所调整。否则，将难以完成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并最终实现“三步走”的战略。因此，目前的中国政府，面临着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两难抉择。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取得一个较高层次的动态平衡，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3. 市场方法与行政方法

在我国现阶段，履行政府职能时对方法的选取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应用市场方法还是行政方法的问题。我国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应地，改革政府职能，不但要使之有市场职能，还要在履行职能时更多地应用市场方法。然而，近年的诸多事实表明，政府在处理许多公共管理问题时，如处理投资过快过热、房地产市场、药品市场等，仍然运用行政方法居多。“中国转型过程中总的经济绩效是可观的，但是中国的转型还没有完成。……制度不相容导致转型过程伴随着寻租泛滥、投资过热以及通货膨胀。为缓解这些问题，政府常常会追求于传统的行政手段，这会导致经济动态增长的停滞和制度的倒退。”^{[2](P65)}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1) 目前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唯有通过行政方法才能控制各地方政府和部委的行为选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方法运用方面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将导致无法真正地训练政府运用市场方法来处理公共管理问题。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一方面，由于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市场方法还未真正建立，所以不得不倚重行政方法来调控市场；另一方面，长期依赖行政方法的作用，将难以建立真正有效的市场体制和相应的现代化政府市场职能。(2) 倚重行政方法

的原因，是否是因为现阶段仅用市场方法无法有效解决这些公共管理问题？（3）不能解决的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发育不完善，还是政府的市场职能构建不完善，方法不熟练？还是政府对市场仍然存在过度干预，甚至行政垄断的问题？在这些重大的理念没有廓清，相应的应对思路没有明晰之前，我国政府将长期面临市场方法与行政方法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市场改革的目标和现实要求应用市场方法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应用单纯的市场方法又无法有效解决目前许多急迫的问题，而转而应用行政方法的话，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长此以往，将难以真正建立现代化的市场体制和相应的政府市场职能。更严重的是，对行政方法的依赖，有可能损害市场理念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最缺乏的“公平”利益。

4. 特殊利益与大众利益。

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3] (P129)} 精英主义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则认为，政治学是研究“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的学问。这说明利益的表达、诉求、联盟、冲突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现代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要运用适当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手段，对利益进行分配，使各种利益的冲突不至于达到倾覆整个社会的地步。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各利益团体通过正式的政治制度架构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展开博弈。博弈的结果，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来体现。政府的公共政策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点，亦即政府在解决相应的公共管理问题时所持有的立场。从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的角度而言，则意味着该公共政策的利益出发点究竟以哪一个或几个利益群体为主。

在中国目前的公共政策语境里，公共政策价值基点选择的困境集中体现在特殊利益与大众利益的冲突与选择上。一般而言，特殊利益是相对于大众利益而界分出来的利益。特殊利益往往由少数利益团体的利益所组成，体现的是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大众利益则是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宽泛的利益群体结构之上的利益。中国目前许多公共政策难以出台、出台后亦难以有效执行，其原因就在于上述两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充斥于政策情境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点究竟为特殊利益服务，还是以大众利益为重？这是摆现在很多政策部门面前的重大抉择问题。如果选择为特殊利益服务，虽然从精英主义模型的角度而言，有助于通过精英力量的发展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提高政策资源的集束效应。但是，“按照自己利益行事的多重利益集团导致了恶劣的政府政策”。^{[4] (P237)} 这一点在缺乏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国度，尤为严重。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久大众主义文化传统，且处于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注意力浪潮”时期的国家，如果偏重于特殊利益的政策理念和政策模式，将极易引起大众的反感，以至于侵蚀整个社会所制定或推行的正式规则以及社会共识。其结果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削弱公共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效果。另一方面，假如政府选择为大众利益服务，尽管符合社会层面的呼声，但是由此将发展中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特别是起飞时期的政策资源平均分配，显然是不够理性的。因而，如何在特殊利益和大众利益之间维持动态的平衡同样成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一个两难抉择。

5. 政治官吏与专业官员。

拥有成熟的古代政治文明的国度，通常都倾向于在国家治理中大量运用遍布国家体系的官吏进行统治。于是，世代相沿，这些国家逐渐形成了悠久的官吏传统。在中国古代，事实上早就形成了一种以政治官吏为特点的任官理念和相应的选官制度，即对官吏的政治忠诚度有极高的要求，而相对地不要求其具有某一方面的专业技能。这种政治文化的传统，至今仍然具有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这种政治取向而非专业取向的官员模式，虽然有利于中央政府控制疆域广大、行政层次繁多的大国，但却容易引致严重的后果。首先，只强调政治忠诚度，而相对忽视官员的公共管理技能，容易使公共职位沦为政治分赃的战利品，担任公共职务的官员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其次，对官员政治忠诚度的偏重，很多时候在另一方面就意味着对官员行为监控的随意性，这给官员与特殊利益集团勾结、寻租等不良现象留下了空间。

与政治官吏相对的是一种专业官员的任官理念和选官制度。这种任官理念和选官制度，建基于现代

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适应于现代工业社会复杂公共管理问题对官员素质的要求，特别强调官员的公共行政精神、公共管理能力和职业操守。应该说，这种官员模式代表着现代社会官僚体系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显然已经为英美国家的公务员制度和专业官僚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作用所证明。然而，这种专业化的官员模式，其权力更多地来源于专业取向的官员任用及考核制度和其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从控制的角度而言，专业官员模式难以符合现阶段突出强调公共政策执行的统一性的中国政府的要求。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说，选择何种类型的任官理念和相应的选官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转变后的政府职能都需要相匹配的官员去履行。“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资深”。^{[5] (P264)}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任官理念和选官制度的转变，就难以有效实现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中国政府如果为了保证政令统一，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选择延续政治官吏的任官理念和选官制度，在短期内确实能起到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推行政府职能转变，也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政府选择抛弃政治官吏模式，转而建构新的专业官员的模式，虽然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期要求，但却在短期内难以保证中央政令的贯彻与执行。因而，在任官理念和选官制度层面，新时期中国政府面临着两难抉择。有鉴于此，现时中国政府有必要在政治官吏和专业官员之间寻求平衡，创新官员选拔模式。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及策略

(一) 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

1. 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新凯恩斯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教授关于政府职能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包罗万象的政府职能中，政府对市场经济主要行使三项职能：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增长。”^{[6] (P28)} 事实上，“在所有发达的工业国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即市场决定大多数私人部门产品的价格与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来调控总体经济的运行。”^{[6] (P32)} 这说明，即便在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职能。

纵观各国现代化的案例，给予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此。按照一般的划分，世界上主要的政府职能模式包括英美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北欧模式等。可以发现，在这些模式中，无论是哪一种文化背景的国家，其政府职能模式都普遍地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种机制结合起来，只是“由于两只手结合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即不同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融合的模式”。^{[7] (P12)}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模式都是通过建构不同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形成的，区别只是在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职能定位、职能构成和具体的实施职能的手段不同。

深入分析各国政府职能模式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各国政府职能模式的形成，除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外，最根本的因素在于这个国家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及其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地位。^{[7] (P25)}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这个根本因素决定了各国政府对政府职能定位和职能构成的选择。无论葡萄牙、西班牙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称霸世界，还是英美新兴国家的崛起，或是日德两国的追赶型发展，无不浓重地体现出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在推动国家经济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过程中的重大作用。由此可见，对于处于工业化初期，并且试图进一步提高自身国家地位的中国而言，必须在由政府与市场二元关系所建构的政府职能模式中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理性且有前瞻性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之，新时期我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正在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这一政策情境迫切要求政府转变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式、方法，构建新型的职能结构，以应对新的公共管理问题。目前我国仍然有许多领域，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结构转型、增加国家竞争力、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社会公正、市场监管等，都需要政府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运用高超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能力，积极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绝不应是

削弱政府的作用，而是要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推动型转变。

2. 动态平衡：构建政府推动型的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模式。

中国30年的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种现代化进程的速度与质量，在整个人类现代化的历程上极为罕见。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都难以全面地解释这一现象。如果从政府职能的角度解读中国30年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可以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政府主导型职能模式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奇迹的核心力量。

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主题报告，将东亚经济概括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其特点是：(1)国家领导权由有决断力的、相对不腐败的、主张发展的精英掌握；(2)国家面对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保持着相对的自主；(3)存在强大而且有能力的官僚队伍；(4)市民社会无力对抗国家；(5)在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具有影响力之前，国家权威和自主性就得到了巩固。在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国家）不遗余力地采取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制度环境来支持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总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核心作用。^⑩与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类似的中国发展模式，其政府职能模式同样具有政府主导型的特征。因此，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府职能模式归纳为政府主导型的职能模式。这种职能模式的要义在于，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通过发挥政府机制的主导作用，启动本国的市场机制，实现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显然，从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势来看，这一政府主导型职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高盛公司资深咨询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用“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这个概念提炼了中国经验的精华，它被定义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在台湾问题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有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⑪(P237)}

但是，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政府而言，由于前述的经济社会情势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曾经释放出巨大制度能量的政府主导型职能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并广泛而深刻地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遵循一条基本原则：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换言之，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市场的发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应作为增长的直接提供者，而应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⑫(P127)}

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政府在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从国外经验来看，还没有哪个后发展国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的例子；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先后成功地由落后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乃至最早期形成的民族国家，都依赖于政府的强大力量。这说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属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而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力量的作用，以政府力量为基本的现代化推力去构建政府职能体系。因此，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实际上应当是对政府主导型职能模式的修正和调整，也就是构建一种政府推动型的职能模式。

2003年我国中央政府部门的改革和重组，强调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则要求的政府职能体系，正是我国政府职能定位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推动型转变的重要标志。可以预见的是，我国的政府推动型职能模式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政府职能定位是政府推动，不再是政府主导，即政府仍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并不直接介入；

第二，政府类型是强化市场型政府，而不再是启动市场型政府；^⑬

第三，政府职能构成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

^⑩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是一个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的政府。此概念由曼瑟·奥尔森提出。参见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出自[美] 曼瑟·奥尔森著《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页。

第四，政府推动的方式是，承认以市场机制为配置商品资源的主要机制，以公民社会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机制，政府不直接参与资源的分配，而是通过推出表现为公共政策的激励集，促使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机制更有效地配置两种资源，实现公共政策的目标；

第五，政府职能之间的比例关系遵循动态平衡的原则。

政府推动型职能模式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渐成熟的时刻，相应地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一职能模式的建立，不仅将进一步丰富“北京共识”的内涵，还有可能赋予中国模式以更多的意蕴，使之成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寻求现代化道路的可借鉴的经验之一。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策略

事实上，一国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工业化进程、本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地位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动态的转变。目前我国正处于由政府主导向政府推动转变的过渡时期。这种转变的顺利完成，有赖于新时期中国政府运用创造性的政策思维，超越前述的政府职能转变的两难抉择，以具体而有效的实施策略来推动整个政府职能体系的转变。

1. 建立宏观的政府职能定位理念体系。

如前所述，政府职能定位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工业化的阶段和国际竞争的情势。换言之，政府职能定位是由政府在推动本国、本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发展阶段里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因而，政府职能定位应当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调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面临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双重历史任务的国度来说，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前瞻性的政府职能定位理念体系。具体而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我国宏观的政府职能定位理念包括四种定位、四个阶段。即：第一，政府控制型职能模式，这一职能模式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相应的政府模式是控制型政府；第二，政府主导型职能模式，这一职能模式的指向是通过政府作用启动本国的市场经济机制，其对应的政府模式是主导型政府；第三，政府推动型职能模式，该职能模式面对的是已经逐渐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推动市场机制更好地运转，其政府模式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第四，政府引导型职能模式，该职能模式对应的是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运用各种政府工具为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的运转提供指引和服务，其政府模式为引导型政府。目前我国仍然处于从政府主导型定位的职能模式向政府推动型定位的职能模式转变的过程。鉴于政府职能转变存在上述的职能定位变化规律，为使我国整体政府职能转变过程更加理性和具有前瞻性，有必要建立宏观的政府职能定位理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各个阶段的政府职能构成。

2. 建立政府责任的选择、细分与追究机制。

前已述及，政府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职能构成。而政府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政府的责任。因而，政府责任决定了政府职能定位和职能构成。从新时期我国政府责任的角度来看，我国各级政府较为普遍地存在责任不变，甚至加强、增多的趋势。具体来说，中央政府既要承担政治责任，又要承担政策责任；各地方政府必须既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又承担发展社会事业的责任。而且，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文化惯性，我国国民对政府的依赖感仍然较高，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很多时候不仅需要承担现代政府责任，还要承担传统政府责任，甚至承担一些莫名其妙的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因为政府责任的范围本身存在模糊性和随意性，政府职能的定位和构成也就无法清晰地界定。所以，有必要以正式的文本和制度廓清新时期政府责任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建立政府责任的追究机制，包括对政治责任、政策责任、管理责任、改革责任等的追究，以保障政府职能的履行始终运行在法律法规的许可范围之内。

3. 形成动态的职能构成组合机制。

根据 2004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规定，新时期我国政府应当集中精

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应该说，对新时期我国政府职能的这一框定，极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定位，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从党中央对政府四大职能的规定可见，职能结构的确定，确实与我国新时期政府责任的重新确认有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适应性。对于具体的职能构成，则还需要根据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动态的组合，以适应新的需要。

4. 消除官员和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

“政府官员具有窃取他人利益的强烈欲望，这是最明显的损害经济增长的激励。”^{[4](P22)} 在政府主导型的职能模式下，政府的启动作用以及官员权力与市场的紧密结合，使官员和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得到强化。这种特殊利益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到了“政出部门”、“部门经济”的地步，甚至整个国家为部门所劫持。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之难，很大程度上就难在官员和政府部门不愿意放弃自身既得的特殊利益。而他们不愿意放弃特殊利益的领域，恰恰可能是政府职能转变中需要撤出或者改变干预方式的领域。因此，为了顺利实现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向政府推动的转变，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官员和政府部门的特殊利益。

5. 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政府管理体制上。因为政府管理体制不发生变化，政府职能就无法得到恰当的履行。实际上，这仍然是关于究竟是“政府改革”还是“改革政府”的问题。新时期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需要把握三个层面的改革方略：首先，明确政府管理体制变革是“改革政府”，这要求将社会其他主体纳入到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进程中，吸收社会各界的意见和世界各国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经验，全面有力地推进改革；其次，明确新时期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责任人、执行机构和咨询机构，建立科学民主的改革绩效评价和有效的改革责任追究机制；最后，新时期政府管理体制变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需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其核心要义在于对民众的需求有高度的回应性（responsibility）和责任性（accountability），而不是将政府职能仅仅局限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唯有如此，才能目标明确地实施新时期的政府管理体制变革，进而为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局. 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 [2] 林毅夫.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 [A]. 林毅夫，姚洋主编. 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 D. Easte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M]. New York: Knopf, 1953.
- [4] [美] 威廉·伊斯特利.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 [5] [美] 杰伊·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 [M]. 程逢如、在汉，舒逊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美]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7版）[M]. 萧琛主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 [7] 周喜安. 透视政府经济职能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 [8] 世界银行. 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 [M].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
- [9] 毛增余. 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 [10] 张培刚主编. 发展经济学教程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柏桐

城中村空间结构的社会因素分析 *

蓝宇蕴

[摘要] 城中村独特与怪异的空间结构形态成为当下令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本研究以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为框架，针对城中村空间结构中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公共理性匮乏与孤岛型空间存在状态进行深入分析，并认为，准企业型政府下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公共职能缺位或者力度不足，致使村落以自发方式完成空间的城市化过程，这是目前城中村空间形态问题得以产生的前提。而在该前提的约束下，传统村落空间结构路径依赖、集体土地制度中的模糊地带及其利益争夺、城市化农民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行动的冲击力，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城中村空间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强化公共理性的介入，变村落空间的自发城市化为自觉城市化过程，此乃化解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城中村 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 社会空间统一体论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90-06

城中村之所以备受质疑，很重要的原因，就源自它在城市空间中凸显出来的、充满怪异与残缺色彩的空间结构形态，以及与这种空间结构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社会存在方式。那么，城中村空间结构状态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其内在的生产逻辑是什么？这一独特空间结构状态又是如何影响与作用于它的经济社会存在方式的？鉴于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在理论探讨上的欠深入性、在政府公共政策层面的诸多不确定性，厘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在理论上更好地把握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在实践中制订出更具合理性与切合实际的公共政策。

一、社会空间统一体 (sociospatial dialectic) 理论及其与城中村空间结构的关联

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是西方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它认为，社会实体与它的空间结构处于辩证统一的关联之中，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创造与

形塑着它的空间结构，而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又同时受制于被创造出来的空间结构，两者始终处于双向的解读过程中。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在城市的空间中进行着各种实践活动，这一活动总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属性与需求注入到城市的空间环境中，并建构与改变着城市空间环境的存在状态，而与此同时，人类自身又在不断地去适应这种已经被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钢性效应的空间环境。因而，人在创造与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的同时，又以不同的方式被所在的空间结构状态所控制与影响着，形成经济社会与城市空间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1](P1-75)}

具体而言，在这种双向作用的关系中，一方面，社会关系及其再生产造就了城市空间。城市空间是人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实现与体现，是各种社会活动与社会经济关系作用的产物。^[2] 虽然空间先于各种社会经济关系而存在，但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中村景观问题的社会学研究”(06H03)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蓝宇蕴，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东 广州，510665）。

空间的组织、开发与利用却是被社会化了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积累与沉淀，而且，空间结构状态由于是在人类社会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加入了诸多人类实践的特性，是人类实践的再造，也正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空间结构是与人类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社会形态。因此，在西方结构主义观点看来，在城市空间结构状态中，由于受权势阶层追求自己经济社会目标的推动，并在城市空间中通过物质资本及其再生产、社会资本及其再生产，甚至文化资本及其再生产，从而造就以空间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社会距离。目前，我国诸多城市豪宅区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分隔并存，就是这种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实现方式。

而双向作用的另一面是，空间结构是社会活动及其关系得以展开的“场所”，由此，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又是空间结构变迁与影响的产物。虽然人创造了社会生活的物质空间与环境，但该空间又反过来以不同方式支配与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并进而影响到一个社会的结构状态。这种支配性，不仅包括对微观社会单元，如社区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塑造、维系与改变，而且还由于特定空间结构状态下，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等等难以避免地受到其所在空间结构的形构，从而具有相应的特定性。与此同理，人际关系中的社会距离也是在空间因素的作用下被建构起来的。总之，由于人类必须在空间结构中从事社会活动，那么，空间结构就必然会以自身形式来改变与重构人的活动。

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以其辩证视野，揭示出社会经济因素和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存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内在地表明，社会的强势利益阶层可以通过对权力、物质和文化资源等方面控制优势，来达到对城市空间的操纵、创新与维系，并会以各种方式在城市空间中表达出来。我国目前已经模糊地形成了掌握权力、经济与文化资源的既得利益阶层，而且这些阶层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强势群体，正是通过利用所掌握的各种优势资源，在影响或者决定社会的利益分配规则，并毫无疑问地会表现在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与作用上。而诸多弱势社会群体则恰好以相反的方

式，或者以自身特有的其他方式，在城市空间结构的再造中留下印记。

在城市空间结构的意义上，城中村无疑是与弱势社会群体相关联的城市空间实体。其产生与维系，是城市化中的弱势群体之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与城市空间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城中村由传统农业村庄演化而来，是城市化农民所依存的传统空间实体，它的生成与存续状态，与农民长期历史沉淀中所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与生活规则联系在一起。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这类凝聚了巨大历史惯性的社区转型（包括社区空间结构的转型），如果没有比较强大外在力量的帮助与推动，而任其自发地进行城市化，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脱离“土”的制约。社区空间的建构，也注定是充满“泥土味”的空间建构，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空间结构形态，再放置到现代城市的总体空间格局中，难免与标准化的城市空间形态难以相容。而残缺空间结构状态下的物业，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其租赁价格必然是低水平的，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城市流动人群居住与生活所需。城市流动人口处于多重社会制度排斥之下，收入与社会地位低下，在居住选择上亦呈现出边缘化的特征，^⑨这一特征又会反过来规定与制约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的特点、经济社会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城中村流动人口的聚居化、贫民窟化、经济上的非正式化都是这一逻辑作用与演化的结果。

二、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的主要特点与问题

本研究中，城中村特指位于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并在原村民聚落基础上经自发城市化过程形成的、人口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但在社区权力分配与经济社会结构上仍以本土居民为主的居住性聚落。作为我国城市化中产生的独特社区实体，城中村拥有众多外在表征，其空间结构形态表现得异常显著。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据城中村在城市经济社会体系中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即它所承载的城市低成本居住生活区的核心功能看，而且就地域空间已经进入城市范围的特点看，城中村应属特殊类型的城市社区。也因此，凡本文关于城中村空间结构状态的描述与评价，参照系均属标准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态，若以此为据，

其主要空间结构特点或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 非理性的空间结构状态。一般在经过理性规划的城市空间布局中，具有一系列诸如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化率、公共空间与配套设施的标准化定量指标，以此规定或者决定了区域在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中的合理性安排。而与拥有这些指标约束的空间结构安排不同，城中村由于自发演化的空间性特点，就总体而言，空间结构呈现出混杂与无序状态，如果以城市理性规划的各种指标来衡量，往往都具有较大差距，诸如普遍存在建筑密度奇高、容积率高、绿化率低、基本公共活动空间与设施缺乏，这些因素共同汇聚在一个区域性单元里，形成非理性的特殊城市空间实体。

(二) 公共空间及其设施的残缺性与匮乏性。城中村区域内部的空间结构中，公共空间及其设施的低质残缺性与私人空间及其物品的相对高质丰富性，构成城中村区域内部比较突出的空间矛盾现象。在城中村区域内部，大凡涉及私人领域的物品或事务，相比之下，显得秩序井然，如作为建筑主体的私人楼宇就单独一栋栋分开来看，基本上每栋都是比较讲究的小洋楼，从外在装饰到内在装修，往往都很具现代色彩，并不比城市其他的一般住宅逊色多少。然而，如果超出这一范围，涉及公共领域的事务或者物品，往往由于传统公共性不足的路径约束，以及区域自身公共管理水平与条件的制约，问题就显得比较严峻。目前多数城中村的公共设施配套不足，水网、电线、燃气、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均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或问题，如手机信号不好、公共绿地严重不足、垃圾处理能力差、道路不通畅、消防措施难以到位、各种防灾抗灾设施落后，等等。城中村的土地与空间利用情况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在区域内部，土地与空间开发利用程度都相对比较高，这从建筑密度与容积率中均可直观反映出来；但就实际利用的具体结构看，大凡不具有相对明确个人产权，而属于集体公共土地与空间的，其利用开发的程度与效率往往都比较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人产权性质比较强的宅基地，不仅土地与空间利用程度与效率相当高，而且由于宅基地的过度开发利用，形成对公共土地与

空间的严重挤压，也正是这种挤压所形成的负面效应，营造出独特的城中村空间结构失调现象。

(三) 孤岛型的城市空间结构状态。在城市宏观空间格局中，城中村是以其独特的另类空间方式而存在的。具体而言，由于单个城中村在城市空间结构状态中，是以丑陋的外在特征而自成一体的，且与周围标准化的城市空间风格形成巨大反差，致使在整个城市的空间格局中，城中村往往表现得异常突兀，显示出类似汪洋孤岛的空间存在状态。广州市建成区内的45个城中村，差不多都是以这种方式存在于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之中。并且，由于现代城市本身所具有的突出有机性特点，即现代城市是由各内部要素在运行过程中相互结合起来的一个有机整体而言，^{[4](P2)} 同时就空间因素对区域经济社会层面的基础性影响而言，城中村的这种特殊的空间存在方式，会对城市经济社会，甚至包括人们的社会心理诱发系列连锁效应与问题。

三、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的解读

按社会空间统一体论的解释，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其实质是社会关系生产和空间结构生产相互作用的结果，空间结构形态嵌入在更广泛社会结构之中，既作用、又反作用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在这种双向作用过程中，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就认为，城市空间形态的生产与变迁，与自然界中的生物进化过程相类似，即城市空间的演化，存在着一种类似自然生态中的社会生态秩序，该秩序遵循着竞争与共生的演变逻辑，这样，强势群体凭借着资源占有优势，能够在城市空间竞争中占据优势空间位置，而弱势群体则受到排斥而占据不利空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解释充分市场竞争社会的空间变迁逻辑中，具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在一个继承了强大小农传统与计划经济体制遗产的中国社会，如城中村这样的微观社会单元，其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形成、维系及其表现形态，都会由于相关条件与制度背景的特殊性而带有更多自身特点。

有必要说明的是，村庄自发城市化路径是目前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但因循自发城市化路径的前提是，政府的低成本城市化策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一定

意义上蜕变为“唯企业型”政府，以GDP增长为
核心任务，而落实在城市化策略上，实际走的是
单纯出于经济效益考虑的城市化路子。与此相联系，
城市在空间扩展与土地征用过程中，往往是先
把村落周围的农地先行征走开发，而把开发成
本高昂的村民聚落留下。但这种绕着路子走的土
地与空间城市化过程，最终把村民聚落的空间结
构演化推上了自发城市化“泥潭”。而在促成城中
村目前空间结构形态的问题中，与自发城市化相
关的主要因素有几方面。

(一) 自然村落空间结构形态的路径依赖

绕开村落的低成本城市化空间策略下，村庄
自发城市化演化所直接面临的空间结构约束是，
传统小农村落的空间格局，亦即传统社会延续下
来的聚落空间形态是目前城中村空间形态得以生
产出来的空间前提，它在很大程度上“框定”或
者限定了村民聚落自发城市化过程中的重构模式。
城中村空间结构的问题，实际是传统村落与现代
城市差异冲突于空间层面的集中反映。

传统村落空间结构存在着自身的秩序逻辑。
许多传统农业村落，在过去的空间结构与房屋建
筑布局上都有着诸多讲究，如注重风水座向、五
行运气、对称排序、功能配合等等，且一些村落
在整体的空间结构安排上还是条理俨然的。然而，
问题是，传统小农村庄聚落的空间结构秩序是适
应传统小农生产与生活方式需要，而在长期历史
发展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如传统村落道路宽度的
间隔，多是以人力挑担子能够相互对走为大致标
准的，而不是以汽车通行为尺度的。如大小便是
传统农户经济中的优质肥料，以方便提取为原则，
而不是处理得越干净越好。又如，鸡鸭猪狗是农
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难免与农家人员的
日常生活处于密切交往之中，这一情形下，不太
可能产生出人与这些家禽家畜及其排泄物密切接
触是否安全卫生的概念。再如，传统小农生活条件
下的公共设施，主要是宗祠、寺庙、地方小集市，
而不是现代城市中的所谓广场、绿地、花园等。
此外，人少地多的农家住宅建设，既不需要也
没有现代城市规划中的所谓容积率、绿化率、
建筑密度，以及诸多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诸如
此类，不一而足。

可见，传统村落与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秩序之
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有研究认为，作为居住生
活场所的城市，如果任其自发地生长发展下去，
它本身将简单地从内部瓦解，因而，自古以来的
城市空间发展，都是被有规划地给以开发，维持
与管理的。^⑨正因为如此，传统村落格局下的空间
形态，如果没有经比较彻底现代城市理念的梳理
与介入，这样被打造出来的空间实体，再把它置
于城市的“空间有机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程
度不等的排异现象。现在城中村中，与一般城市
景观不相协调的、但同时也很具典型意义的所谓
“握手楼”、“接吻楼”、“一线天”、“不现天”的空
间景观，就是这种排异效应的体现。城中村由于
是从“村”而向“城”自发转型的过渡性社区，
与这种特定社区属性相关，村落成为传统社会与
现代城市社会之间诸多差异冲突的聚焦点，这同
时也是以排异方式呈现出来的空间结构问题得以
产生的基本原因。

(二) 宅基地制度中的“模糊”地带及其城市化 农民的集体行动方式

关于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产生的已有研究中，
土地制度是作为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被注意的。
就法律意义而言，农村居民的住宅用地，其所有
权归属于所在的村集体，村民家庭只具有使用权
这一不完整意义的产权。由于集体产权本身存在
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加之现在已经形成的权力
或资本强势群体对土地利益的越来越深度侵入，
与此相关，征地拆迁等诸多情形的存在，造成了
农民土地利益常常面临被剥夺的困境。近年征地
拆迁中频发的冲突性事件，多是这一逻辑的演绎。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与社会强势集团对土地利
益争夺的情况相对应，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城中
村民，在宅基地制度留下的“弹性”或“模糊性”
空间中，也同样存在争夺宅基地增值利益的机会。

随着城市用地向外围的迅速扩展，城市化村
庄中，其区域内外城市氛围逐渐形成，这其中提
升最快的往往是土地的级差地租。当潜在的级差
地租以比较清晰的面目暴露出来之时，宅基地集
体产权制度中的“模糊”地带便成为利益争夺中
可以运作的空间。城市土地不仅具有公共产品性
质，也同时具有私人产品性质，在为私人利用时，

如果没有公共理性的制约，其外部效果会诱发公共利益流失的问题。^{[6] (P13)}那么，具体到城中村目前空间结构形态建构上，在集体宅基地制度的框架之下，至少存在以下几种蚕食区域公共空间与利益的集体行动方式。一是在自家宅基地基础上，尽可能地向高处延伸，通过扩充楼层的高度，以扩展自家房屋的建筑空间；二是尽可能多地占用屋基外围的公共空间，以扩大自己房屋建筑用地与住宅面积；三是在已有制度规定中寻找可能的途径，如以儿子结婚、女儿招婿等等为理由，来达到多占土地以扩大房屋面积的目的。这些土地利益争夺行动的共同目标指向是，在现有集体土地制度下，宅基地如何能够尽可能建筑空间最大化地为私人家庭所用，以实现居住与租金最大化的目的。正是在这种公共空间与集体土地资源成为激烈争夺对象的过程中，区域公共空间与设施不可逆转地被极度压缩而致残缺或匮乏。

（三）城市化农民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共同驱动下的空间形态建构

城市化农民理性行动的建构，这是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得以形成、维系下来的重要现实因素。城中村空间结构形态问题的产生，其过程实际上与城市化农民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的强力作用密切相关。城市化过程中，面对日益增值土地的征用与非农化转用，一方面，城市化农民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意识被充分调动起来，这种意识再付诸于行动，产生出异常巨大的冲击力；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区域内部或者外部的公共管理与制约，其力度往往非常有限，与所产生的冲击力相比较，显得过于脆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规制功能，致使城中村社区陷入了整体非理性的空间结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裂变出了一个异常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且其流动的主要目标地是城市。与此同时，由于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低收入的经济特点所决定，该群体在居住方式上必然会产生出巨大的廉租屋需求。一般情形下，城市廉租屋带有一定公共福利性质，其正式供给渠道，主要应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性住房供应。但当下的许多城市政府，廉租屋的正式供给基本都是面向具有城市户籍的双贫困人口（住房贫困与收入贫困），而

针对流动人口的供给则仍然缺位或严重不足。这样，实际就把流动人口的廉租屋需求供给推向了城市的非正式市场。此外，农村宅基地的制度规定中，允许农民可以拥有宅基地，并具有在其上建造房屋的自由权，这一权利的获得，再加之廉租屋经济收益的刺激，城市化农民经济理性的意识得以充分地激活起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至少在现有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下，相当长时期内，廉租屋需求刺激下的经济理性行动，还与失去赖以生存土地后农民的生存理性行动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双重理性行为所形成的合力与驱动力之大，往往足以抵消与化解掉来自社区内外的、尤其又是强度非常有限的公共管理效力。伴随着城市扩张，村庄大量土地被征用或即将被征用，产生出大量失去土地或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这时，城市化农民生存理性的“神经”往往绷得很紧。历史上，失地农民生存理性行动，所产生的破坏性与建设性力量都无比巨大。前些年广州番禺有个村子，当村民听说政府要征用村边一个山头时，村民很快就意识到当中所隐含的某种危机与机会。传言刚刚出来不到几天，原是青山翠绿、花香鸟语的山头，顿时布满了座座崭新的坟墓，山头很快变为了坟场。对农民而言，这种行动的意义在于，至少提升了征地补偿的筹码。其实，在有关土地这一传统农民“命根子”问题上，城市化农民的生存理性意识显得尤其与众不同。而这种极具冲击力的生存理性行动与经济理性行动相汇合，如果再与缺乏强有力公共理性约束的情况相配合，必然导致区域整体的非理性与公共利益流失，其中包括公共空间被严重地挤压。

四、讨论与结论

城中村作为特殊城市居住生活区，是在政府低成本城市化策略下，由于缺乏足够力度公共理性的介入，致使村庄聚落以自发方式完成空间城市化而形成的。而城市化的村庄，如果任其遵循自发城市化演化路径，村庄又会在传统空间聚落格局的路径依赖下，在集体土地制度留下的可运作空间中，在城市化农民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强大合力的作用下，建构出独具外在景观特色与问题的城市空间结构实体。这种情形同时还说明，

在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无论是利益或者实物的平衡，如果不与实体空间的平衡结合起来，往往是难以实现的。^{[7] (P24-25)}

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表明，社区与其空间结构处于相互的建构性关系之中，一定的空间结构是经济社会作用的产物，但同时又对经济社会发挥基础性影响。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一旦形成，必然会反过来作用于其经济社会存在方式，并由此派生或强化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如城中村非理性化、公共理性匮乏以及“孤岛”型的空间存在方式制约到正规、合法经济社会因素的成长或导入，并进一步影响到区域正常经济社会结构的形成，这其实也是城中村非正式经济活动活跃、违法犯罪现象猖獗、卫生环境差的重要空间结构原由。城市空间规划与治理正是从空间角度控制与优化城市发展，提高城市效率性与舒适性的举措。^[8] 新城市主义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为促进社区与邻里发展、提升人们生活质量而推行的运动，它极力主张通过社区规划与设计，最终达到社区空间结构与生活质量优化目的。面对城中村诸多空间结构的问题，如何让它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与城市空间的实质性融合，无疑显得非常必要，这又涉及如何以现代城市空间理念去重构区域空

间，实现其空间结构的转型。而为达此目的，不仅需要消除集体土地制度中的“模糊”地带，而且需要强化公共管理力度、引导与约束城市化农民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行动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否则，难免出现新的城中村空间结构问题。

[参考文献]

- [1] Knox.P..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M]. Prentice. Hall, New York (fourth edition). 2000.
- [2] Lefebvre. H..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J]. Antipode, 1976, 8 (2) :30-37.
- [3] 杨上广. 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及其治理 [J]. 城市问题, 2006, (8).
- [4] 帕克等. 城市社会学 [M]. 宋俊玲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5] 田中重好. 日本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社会的特殊性质 [A]. 张鸿雁, 李强主编. 中国城市评论 (第 1 辑) [C].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6] 王雅莉. 城市经济运行分析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 [7] 饶会林. 城市经济学 [M].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何蔚荣

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救助模式

杨 芳

[摘要] 合理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保证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必须从物质帮助、机会供给、人文关怀等方面入手。物质帮助是解决城市贫困的最基本手段，机会供给是最终的解决之策，人文关怀则是帮助贫困居民从精神上脱贫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城市贫困 救助 公平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096-05

贫困既是一种普遍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又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贫困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合理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保持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决不能单纯寄希望于某一项措施，而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政策体系，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合效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物质帮助：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手段

贫困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匮乏，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来保障其基本需求。较早给贫困明确定义的英国学者朗特里在他的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指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维持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P1) 因此，物质帮助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最基本的和最必要的手段，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救济方式，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贫困家庭的燃眉之急，保证其基本生活得以延续。

在我国，扶危济困的思想源远流长。不管是墨子“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的思想，还是管仲“通穷、赈困、接绝”的政治主张，《礼记》所倡导的“赐贫穷、赈乏绝”等，都可说明历史上对贫困者的物质帮助一直为政府和社会所重视。但是，对于哪些人应该得到帮助，应该得到多少帮助，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获得帮助等问题，一直难以达成共识，有待商榷。

其实，为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是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人权。国家通过给予贫困者救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防止公民陷于贫困线以下，以保障其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相当的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P2) 因此，任何一位有困难的公民获得国家必要的救助是其应享有的权利，而国家对处在困境中的公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则是其根本的义务。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充分体现了贫困居民

作者简介 杨芳，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广东 广州，510006）。

的物质帮助权，该条例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也就是说，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职位高低，不管是出自什么原因，只要生活陷入贫困状态，就享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有的部门不是根据其收入和实际生活状况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受益人，而是利用价值取向来选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受益人。例如有的地方规定，家庭成员中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吸毒、犯罪等情况的，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在有些人看来，如果居民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或做出与社会的道德价值观相违背的行为，政府就不需要保障他的生命权。这实质上是对人权的蔑视，也是对物质帮助权的误解。因此，任何一位陷入贫困之中的居民都应该得到物质帮助，决不能因为某些人的价值取向剥夺公民的物质帮助权。

贫困居民的物质帮助标准也一向是争论较为激烈的话题。主要原因是，在帮助的标准上存在一个悖论。如果保障线过低，无法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其应有的保障功能就会减弱；反之，如果过高，不仅政府的财力难以承受，还会形成依赖社会救助的“福利陷阱”。《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6条虽然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但这一规定比较笼统，而且我国各地消费水平差异较大，所以难以确定一个合理的标准。据国家民政部2006年民政事业统计快报数据显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169.6元，1-12月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均补差额82.9元。^⑩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各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质上低于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费用。因此，科学计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至为重要。在此，建议在计算物质帮助的标准时，应以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所支出的费用为核心，适当考虑居民的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入状况、其它

社会保障标准等。为了保证物质帮助的有效性，还应该结合家庭规模、结构、建立起多元化、弹性的保障标准，对困难家庭实行分类救助。

对于物质帮助的方式，目前可分为现金补助、费用减免、实物提供三类。对于城市贫困居民，可以享受各地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这项费用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同时，各地规定了贫困居民在教育、住房、医疗、水电等方面减免交费的优惠政策，有的地方还为贫困居民提供一些实物救助。此外，从资源融合、物质帮助的有效性角度来看，还可以尝试采取社区邻里互助这一方式。“远亲不如近邻”，邻里相助、患难相恤，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大力开展社区建设，培养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使社区组织成为资源剩余者与资源缺乏者的中介，充分发挥社区成员在扶贫助困中的作用，也不失为一条现实有效的救助途径。目前有些小区，自觉将家中剩余或暂时不用的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送到业主委员会，而有需要者只要登记即可领用自己需要的消费品，长此以往，不仅减少了浪费，也使贫困者得到了救助。

二、机会供给：城市贫困的最终解决之策

贫困不仅表现为资源的缺乏，还表现为机会和能力的缺乏。从致贫的原因来看，能力贫困是主观原因，社会排斥是造成贫困的客观原因。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言，贫困的真正含义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甚至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的丧失，包括低收入、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的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⑪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进一步拓宽了贫困的内涵，认为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情况，“穷人生活在没有最基本的行动与选择的自由的境况中……通常他们缺少必要的食品和住房、教育和医疗，即便使他们能过上所有人都向往的那种生活，面对疾病、经济混乱和自然灾害，他们十分脆弱。同时他们经常遭受国家和社会的不公正对待，在涉及决定他们生活重大问题上无发言权。因此，贫困就是指没有权力、没有发言权、脆弱性和恐惧感。”^⑫所以，贫困

更多的表现为能力和权力的不足以及机会的缺乏。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改变“给钱送物”的消极的扶贫理念，建立新的积极的扶贫理念，即“扶贫是为了创造发掘穷人自身潜力的机会与条件，要高度重视穷人的参与和能力提高的问题”。^{[6] (P105)}因此，为贫困者提供各种机会，提高其能力，消除社会排斥，才是解决城市贫困的最终之策。

第一，就业是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之源，增加城市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是下岗人员和失业人员。失业、就业不充分和就业质量不高是城市居民生活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对于贫困居民而言，就业是消除贫困的最重要手段。而且，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采取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减少失业人口，提高就业质量，是消除贫困的治本之策。国际劳工组织研究表明：“如果想缓解贫困，就必须提高穷人的收入。穷人的收入是由他们自己的劳动报酬构成的，因为劳动是他们主要的，而且往往也是唯一的供其支配的创收财产。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他们要么是通过自谋职业，要么通过工薪就业来获得收入。实施缓解城市贫困战略，意味着要使所有失业者都能找到一份工作，以便使他们能够获得等于或超过最低收入的报酬。此外，还应使那些虽已有工作，但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至少把收入提高到最低收入水平。”^[7]然而，我国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尖锐，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适应的问题突出，致使我国就业压力较大，而且，城市贫困居民一般年龄偏大，学历较低，缺乏专业技术和技能，在就业岗位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贫困居民要通过市场就业比较困难。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城市贫困居民就业的帮扶力度，开展对贫困居民的就业指导、职业介绍，不断拓宽再就业的渠道，搞活再就业形式，增加再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地促进贫困居民的再就业。1、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开发就业岗位。从大环境来看，政府要通过制定以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为取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战略性特别是社区服务业等增加再就业岗位。针对城市贫困居民而言，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投资，

购买公益性工作岗位，培植贫困居民自己的就业组织来促进贫困居民就业；另一方面，可以制定鼓励单位录用贫困居民的激励政策，使用人单位在录用方面向贫困居民倾斜。2、政府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居民自己创业。如提供“小额贷款”，指导生产经营，减免税收等。

第二，为贫困居民提供增长知识，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增强贫困家庭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能力贫困是造成收入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收入的匮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与不足。我国著名专家胡鞍钢提出了“知识贫困”这一概念，他指出，城市贫困群体获取知识能力贫乏、吸收知识能力较差、交流知识能力贫乏。另外，经济贫困往往还与文化贫困联系在一起。以受教育的机会为例，由于受支付能力和居住地或学校空间布局等因素的制约，很多贫困家庭的子女不能获得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不能为他们摆脱贫困创造必要的教育方面的条件，结果不仅不能使家庭摆脱贫困，还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即下一代又会因为文化程度低，导致就业竞争力弱，最终带来经济贫困。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善贫困人口的质量，是解决能力贫困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教育扶贫力度，特别要为贫困家庭培养文化素质较高的子女，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另一方面，政府要根据市场需要结合贫困居民的接受能力，开展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培训内容不仅要有在劳动市场上求职所需要的知识、技术、技能，还应该包括对贫困居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培训，使他们转变传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模式，开拓思路，以积极的心态适应市场环境。

第三，为贫困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机会。经济上的贫困，还将引发一些相关性问题。经济上的拮据和困难，导致城市贫困居民社会参与不足，甚至被排斥在走亲串友这种最基本的社会交往之外，更不用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了。正如克莱尔指出：“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

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⑩ 中国社会是注重“人情”和“关系”的社会，人际网络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本。美国学者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⑪(667)} 社会资本对个人和社会发展有积极正面的作用，有助于降低个人的贫困，能够使人建立起良好的互相信任关系，进而降低交易成本。针对目前城市贫困居民由于缺乏社会资本而陷入贫困，由于贫困更多地被排斥在社会参与之外的恶性循环的现状，政府一方面要引导贫困居民认识到贫困并不可怕，更不可耻，只是一生中短暂的逆境，认识到社会资本和社会参与对摆脱贫困的重要意义，鼓励他们走出由于自卑而“自我封闭”和“自我隔绝”的境况。同时，政府和社区组织也可以有意识地为贫困居民提供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关系到城市贫困居民的政策决策方面，尽可能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力量，争取社会对贫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主动与贫困居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贫困居民获得非正式社会网络的支持，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三、人文关怀：不可或缺的精神扶贫

贫困具有丰富的内涵，“贫困所指，并不仅仅限于物质和伤及人体的剥夺，它也损害人们的自尊、尊严和自我认同。”^⑫ 由于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贫困阶层普遍感到自己没有前途，没有奔头，生活没有安全感，觉得孤立无援，对社会失去信心，容易产生自卑、仇视社会、急躁、悲观失望等情绪。因此，贫困居民的需要是双重的，在需要经济帮助的同时，他们更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理解。所以，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要在物质上扶贫，更要注重以人为本关怀和感情投入。

但在我国的扶贫实践中，这种人文关怀恰恰被社会所忽视，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待贫困居民的态度上，也表现在获得物质帮助的程序上。在我国现阶段，虽然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因素而非个人

因素。但他们潜意识中仍对陷入贫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人抱有歧视和排斥之心。在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的程序上，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繁杂苛刻的政策，把“公示”作为我国低保工作中的一道必经程序，使申请者毫无隐私可言。不可否认，公示的确起到了增强工作透明度的作用，但是其对贫困居民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是与人文关怀精神相背离的，给申请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和心理压力，增加了他们脱贫的难度。有的贫困家庭为了“面子”，为了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或怕孩子遭受同学的歧视，即使家庭经济再困难也不敢、不愿申请低保金。即使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也总是“见人矮三分”。可见，对贫困者而言，物质上的补给固然重要，精神上的关怀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诚如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所说：“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得到一块面包和几句温存体贴的话，他会感到温存的话比面包更贵重。”^{⑬(183)}

所谓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的生存、安全、自尊、发展等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本身为宗旨和目标，以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的平等和能力的差异，关心人的生存、发展、命运和前途，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充分、自主发展为内在价值尺度的一种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人本文化。具体到城市贫困居民而言，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以仁者之心助人，使贫困者有尊严的接受帮助。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⑭ 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求。以仁者之心助人，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承认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帮助别人，而绝不能有“施恩”的观念，也绝不能企图任何回报。这样助人，使被助者不仅心怀感激，又不会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因此，负责扶贫的工作人员更应该树立平等观念，学会“助人”理论和技巧，给予贫困居民应有的尊重，让他们既接受帮助，又不失尊严。

第二，扶贫先扶志，鼓励贫困居民自信、自强、自立。城市贫困居民由于经济上的拮据，生活上的艰辛，再加上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缺乏优势，求职过程中屡屡受挫，导致信心急剧下降，继而对生活失望，甚至自暴自弃。对于这类人员，

如果不激发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即使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也只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很难使他们彻底脱贫。因此，政府和社区组织要通过热诚的帮助、真诚的关心和激励，激发贫困居民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增强他们自强、自爱的思想意识，帮助他们树立通过挖掘自己的潜力和诚实的劳动摆脱贫困的信心，培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人格品质和知恩、感恩、报恩的思想情怀，使他们坦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在外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下重建生活，最终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

[参考文献]

- [1] Rowntree • M.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M]. London, Macmillan, 1901.
- [2] [瑞典] 格德门德尔•阿尔弗雷德松, [挪威] 阿斯布佐恩•艾德. 《世界人权宣言》: 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 [M]. 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3] 数据来源于民政部网站: <http://www.mca.gov.cn> [Z].
- [4] 黄文平, 卢新波. 贫困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J]. 上海经济研究, 2002, (8).
- [5] 世界银行. 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与贫困作斗争 [R].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 [6] 洪大用. 中国民间组织扶贫工作的初步研究 [J]. 江海学刊, 2002, (2).
- [7] 华迎放. 城市贫困群体的就业保障 [J]. 经济研究参考, 2004, (11).
- [8] [英] 克莱尔. 消除贫困与社会整合: 英国的立场 [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 2000, (4).
- [9] Putnam • D • Robert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J].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December, 1995.
- [10] [俄] 舍斯托夫. 无根据颂 [M]. 张冰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11] 孟子.孟子•离娄上 [M].

责任编辑: 柏桐

历史学

•后现代思潮与史学史研究的反思•

[编者按] 后现代的理论太尖锐了，尽管没有传统意义的哲学那么谨严细密的思辨、严整完备的体系，但是其锋芒所向，却忽喇喇地直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所向披靡、不可一世的科学理性的软肋，只逼得那些标榜着科学理性的现代哲学一激灵，不得不急急地回过招来招架、回应、辩护，乃至缝补自身理论的缺陷，而学术则经这一番理论的省思，补苴调敝，获得新的升华。仅从此一点来说，我们就应怀着对这些富有理论原创性思考的哲学家的敬意，汲取其中有益的理论养分，省思我们的研究，在新的问题意识下，拓展我们的学术学科研究。从目前的情况看，随着后现代理论引入后的理论震荡的渐渐平复，人们已开始慢慢地、理性地咀嚼其中的理论意蕴和问题意识。很多学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后现代问题意识下的理论探讨。然而，号称与史学理论关系最密切的、本应受后现代理论冲击最大的史学史学科，迄今却尚未见对后现代理论作出系统的回应。也正是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以期引起史学史研究者的注意，从而达到促使国内的史学史研究得预此世界理论之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目的。

后现代理论视域下的问题意识与史学史的重写^{*}

向燕南

[摘要] 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提出，除了外在因素外，同时亦有对历史认识论不断追问的逻辑必然。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重要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认识和历史知识的形成，认识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和局限性等问题。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应是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在后现代的理论视域下所呈现的新的问题意识，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史学史的同时，也为我们的史学史的重写带来必要与可能。

[关键词] 后现代 问题意识 重写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01-05

—

尽管后现代主义基于一种文化批判立场，对现行的一切抱着一种全面、彻底的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彻底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对通行的历史学及其观念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使历史的认识染上了浓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无视或绕过这些理论对历史的文本重构——历史编

* 本组文章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7JJD770092。

作者简介 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纂中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涂抹和叙事中的想象、修辞等等问题一针见血的抨击。

就历史哲学的意义讲，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冲击，既有非西方国家崛起后世界格局的变动，以及随之出现的对西方中心的质疑等外在原因，也有人们对历史认识论不断追问的内在理路的必然。后现代理论的提出，实际上也是继19世纪末以来，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提出的“历史认识何以可能”、“历史知识是怎样建立的”以及历史认识之特点等历史认识问题的追问之后，进一步对历史学家工作的性质及其局限等问题的继续追问或延伸。而在这不断追问的过程中，因分析哲学、现象哲学、存在哲学、诠释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种种现代哲学思潮，作为分析工具的不断加入，使得对历史认识及其本质等问题的剖析获得了不断的深入。

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知识的形成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和局限等等方面。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也许应属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了。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获得机遇最大的也理应是史学史。这是因为，全部的后现代理论所质疑的历史客观性的指向，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时间中不断展开的历史，而是同样属于历史的文本重构。后现代主义者无不将历史的文本重构当中主体的存在及影响，视为攻击传统历史客观性观念的致命软肋和解构的集结点，认为所谓作为类概念而提出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站在历史之外的“它者”，在历史的文本重构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这首名曰《断章》的小诗，也可说是以隐喻的形式，道出了历史在文本重构中主/客体的交融性和诠释的历史性。因此，从史学史的学科意义讲，后现代理论这种对历史构成中主体意义的强调，对历史叙事性、文本性的强调，除了使史学史研究在整个历史学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外，^①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史学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开拓了新的史学史研究的运思路径，也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骋思空间。

事实上，尽管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思想和学术震荡已渐行平复，但是后现代学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及相关概念，在经过人们理性的咀嚼后，已经渐渐被吸收到一些问题的讨论之中，只是国内的一些史学史研究者还未能对此学术之流，分出一部分心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之所以提出，以及这些问题的学术价值而已。

二

虽然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并没有严格系统的理论，甚至在不同的学者之间还存在很大的理论冲突，但是在对“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批判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所谓理性的普遍性，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和无结构性，注重为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它者”(the other)的地位等问题上，则在理论上基本表现出一致的立场。而由此带出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恰是我们史学史研究者获得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灵感的地方。

后现代理论引出的问题意识，就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来说，至少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省思与检讨：一是对近代以来新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的省思与检讨；二是对中国几千年以来固有的史学传统的省思与检讨。

论及近代以来的新史学，其不断深入的近代化，无疑要归功于西方近现代学科理论的传入。但是，后现代理论则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新史学建立的另一面，即当近代我们张开双臂拥抱西方历史学的学科理论时，事实上我们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并从西方学术预设的立场出发，仰

^①后现代理论对历史认识及其文本性的分析，使得历史研究者对文本文献真实的相对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即历史研究者面对历史文献等以往的历史撰述钩稽自己论证的材料时，首先要对文本进行的史学史追问：文献的作者说了什么？有意不去说什么？为什么？

视着体现理性的西方世界，然后按照西方世界的理性观念，把自己的历史和史学纳入于西方的历史时间之中，同时也作为衡量尺度，重新建构中国的历史文本。这也就是说，后现代所针砭现代史学的种种弊病，随着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完成，也为近代的中国史学接受了。当然，在新史学的历程中，我们亦曾以“革命”的意识形态，虚构了自己的种种“大叙述”；而与此同时，与我们对立的“反革命阵营”的史学家，也虚构了他们话语体系的“大叙述”。于是，当我们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无论是讨论西方理性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还是揭示意识形态支配下种种大叙述的虚构，以及对不同话语体系之不同历史叙述的比较，也就自然形成了我们进行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有意义的课题。

当然，除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外，按照后现代的理论，同样需要质疑的还有近代史学转型之后，我们按照近代学科模式所建立的史学史学科本身。

后现代思潮的重要代表，法兰西哲人米歇尔·福柯，曾在他的《词与物》法文版前言中自称，他写这部著作的灵感，是出于阅读一部阿根廷短篇小说所引述的中国古代类书中的动物分类。他说，当时他在感受到“另一思想体系的奇异魅力”的同时，亦想到了现代西方“思想的界限”，并引发了他这样的反思和诘问：现代西方人又是如何整理各种现象的？现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会是一成不变的吗？这里，福柯提出的不同知识类型及其背后不同思维系统之间不可通约性的问题，也启示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史学史研究的境况——以一种预设的西方/现代知识学科体系，是否真的能准确地说明中国的传统史学？以这种预设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传统史学时，是否也面临着知识或思想界限的窘态？

现代意义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提出，其实属于上个世纪初的事。其时，无论是率先将中国史学史课程搬上大学讲堂的朱希祖，还是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梁启超，虽然都谈到中国史学的发达，但是其所谓的中国史学，实质都已脱离了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而于不自觉之中，转入了西方/现代的学科体系思维模式，切割自己的传统史学，置入到新的学科容器之中。其结果是，此刻的这个“史”已不再是那个“史”。即已从经史子集学术结构中之“史”，转入到“文史哲”学科结构中的“史”。而从那以后直至今日，尤其是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后，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其实始终是在这种西方/现代学科话语权威的统治之下，以西方的史学范畴，进行着传统史学的研究。对此，我们研究传统史学的学者，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这个西方学科思维之履是否真的符合传统史学之足？我们是否应该突破西方强势话语预设于我们思维中的学科领域，或各成边界的学科容器，将传统史学置于它所应的知识体系和思维系统之中展开探讨呢？这个“史”既然不是那个“史”，这个“史”也就必然有它与那个“史”的不同；然而，既然都称为“史”，那么这个“史”与那个“史”又必然有同。作为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注重对“它者”进行研究的后现代的学说，所给我们的启示和问题意识也正在于它促使我们在比较的视域中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其中包括它与西方史学的异与同。

与后现代一再批判的西方现代“科学”史学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从未呈显出主/客体、理性/非理性之间的尖锐对立或紧张。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或“自我一世界”思维模式的主导下，^① 史学中呈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互涵互融。即史学家之于历史，是一种参与式的理解，而非镜像式的反映。其中历史主体的参与，包括主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都是历史的文本重构中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因素，与客体呈显着不可分离的统一性。这从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等一系列“书法”原则的提出，^② 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的自白，^③ 无不体现出对历史的这

^① 关于这种“人一世界”在世结构的特征，张世英先生归结为内在性、非对象性和人与万物相通相融三点。详见氏著《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② 《春秋》所谓“常事不书”的原则，在解释它的所谓“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中常常被论及，并对“不书”的原因或意义予以阐发。

种主体参与性的追求。由于史学主体的存在本身就是史学的有机构成，既合于情，也合于理。于是在这样的历史世界中，史家的自我与历史、古与今、人的自我与外在世界，便不是一个相互自外的，而是相互关切的、融而为一的有机整体，一个更为真实的经验的历史世界。事实上，孔子作《春秋》，在继承周史官“史例”传统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属辞比事”的“书法”，就是既要保证“齐桓晋文”之历史事实的可信，又要表达出自己对于历史的价值判断——“义”，二者相互统一的一种有效的表述方法，或化解历史的文本重构中主体/客体、求真/求善之紧张的一种努力。而传统对史学“寓论断于叙事”的肯定，事实上也是对历史文本所具有的解释性性质的肯定。对于传统史学来说，其最高的追求是“信史”。按《说文》称：“信，诚也，从人言。”即《说文》段注所说的“言必由衷之意”。^{[21][22]}可见传统中国史学所追求的“信史”，与西方实质主义（substantialism）所追求的绝对客观之“真”（truth），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信史”实现的条件，主要表现于或依赖于主体的“言之由衷”。故《中庸》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之说。^①这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一再强调史学家的品质，强调史学家的“心术”，强调史学家的“公心”与“史德”的根本原因。而对这些传统历史认识论之优长的发现，正是我们从后现代对现代追求的“科学”史学的抨击中获得的灵感。

此外，从后现代的理论视域理解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就会发现，远较西方丰富的历史文本形态或体裁，正是中国古代史家力图克服历史事实的无限性与文本表述的有限性之间尖锐紧张的努力。传统史学正是通过多种文本编纂形态，或多种文本形态的统合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史学精神等，^{[31][P2374]}构成对历史的非单一声音的多重叙述。而这也正是后现代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理论追求。至于传统史学对于历史文本修辞的艺术追求和历史解释的价值诉求，以及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之说，^{[41][P2532]}明代王世贞有关“国史、野史、家史”不同历史叙述话语体系的分析等等，^{[51][P275-282]}则更是大有后现代历史认识的深度。

如果说以上均体现了后现代理论视域下中国传统史学对西方近现代“科学”史学之异，或认识价值上的优长，那么，作为中西史学之“同”的表现，或后现代主义者竭力抨击的西方现代史学的种种弊端，则同样可在后现代理论视域的观照下凸显出来。例如后现代曾尖锐地质疑近现代理性和科学语境下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和“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按所谓“元叙述”，就是为思想与体制提供合法化根据的基础主义叙事，它同时也是某种“大叙事”。其特点是将知识合法化，使之变成一种价值度量的尺度，变成一种政治力量。当然，后现代这些批评不能离开对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理性和科学对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但是我们也未尝不可循此省思一下我们传统的史学。事实上，在我们的传统史学中，同样存在某种隐蔽的句式结构，而它的句式就是遵循着儒家政治伦理——所谓礼的“语法”规则编织的历史事实——从事实的选择，到酷吏、循吏、忠臣、奸臣乃至烈女的分类，以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历史叙述等等，无不浸润着儒家特有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建构。与后现代主义者所抨击的现代史学相类，传统史学在组织文本的同时，也同样组织了它的历史知识和观念，并将之转化为“权力”，规训着几千年的社会和历史。而那个时代主要正史所谓“以古鉴今”的堂皇叙述，谁又能说它没有隐含着前朝必然灭亡和自己政权“奉天承命”之合法性的潜台词呢？至于传统史学中所谓的“正史”之称，以及“正史”对“野史”的天然优越感，则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的压抑，意味着“大叙述”对“边缘”或“它者”叙事的压抑。

当然，除了以上问题，后现代思潮提出的诸如叙述文本的分析、读者对于文本的影响、理性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理论分析等等，同样开拓了我们新的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途径，而其结果则是推动

^① 《中庸》第20章，《四书五经·中庸章句集注》本，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版，第10页。按“诚”与“信”在文字上是互训的。

我们不断开辟史学史的新的诠释途径。

三

应该说，新问题意识的提出和新诠释途径的开辟，也就意味着史学史的重写。

“重写”本身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惯用的思路，按照后现代思潮的弄潮者之一利奥塔的话说，“重”的使用意味着回到起始点，回到按说是摆脱了任何偏见的开端，因为人们以为，偏见完全来源于判断的累积和传统，这些判断以前没有经过重新考虑就被认为是正确。”^{[6](P155)}当然这是利奥塔为规避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落到形而上学时间框架中所采用的针对“现代性”的提法。但是其对“重写”意义内涵的阐释，依然能够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启示，即它可以使我们否弃原有的理性偏见下的历史叙事，在新的理论视域的观照之下，重新展开对历史的书写或叙述，使我们能够再回到起始点，从当下的立场出发，以新的思路或方式重新进入历史，在当下的境况中重新体验历史，解读历史中的历史文本。历史是向前运动的，但历史意识只能从当下的自身开始，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必然是由当下活着的每一代人去不断地重新回忆，思考和重新研究”。从这层意义上讲，史学史的重写既是历史的，也应是现实的。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已经不断地提出重写文学史、重写哲学史等重写学科史的问题。而中国史学史从上世纪初作为一个学科提出之后，就不断地为人们所重写——从最初的目录解题式的史学史，到学术史中不断展开的史学史，再到揭示中国史学发展中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规律，并在斗争中不断进步、线性发展的史学史。因此从后现代理论视域的问题意识出发，重新建立中国史学史的书写，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至少不能说是一种坏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孟子·离娄下 [M].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 [2]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三篇上·言部 [M].
- [3] 春秋穀梁传·桓公五年 [M].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 [4] 论语·子张第十九 [M].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 [5] 向燕南.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 [M]. 合肥：黄山书社，2002.
- [6] 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后现代史学：匆匆过客还是余音绕梁

赵世瑜

[摘要] 后现代史学引起西方学术界的讨论已近半个世纪，虽在中国有所介绍，但未引起人们、特别是专注于具体研究的史学家的关注和讨论，并有转瞬即逝的可能。事实上，后现代史学提出的许多问题与我们目前正在发展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有直接关系，它的反思意识正是我们的史学界所缺乏的。

[关键词] 后现代史学 民族国家 宏大叙事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06-0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史学界的影响较为晚出，但并不能说是悄无声息。对于文学和艺术来讲，其杀伤力远比对史学小，因为它将一切视为充满主观意涵的文本，而认识历史所依赖的史料自然难逃其外，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也就必然遭到严峻的挑战。

对历史客观性的挑战并非从后现代主义始，就史学家而言，在我们熟悉的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中，已经持有一种温和的、乐观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而不是纯粹的过去。但后现代主义却认为，历史不过是众多不同的话语之一而已，因此人们已经不再去探究“历史是什么”，而是去询问“还有可能研究历史吗”？^{[1][P3]}

这种对历史学使命的残酷打击无疑应该得到充分的回应，但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之交，欧美史学界对此也曾漠不关心，直到 90 年代末支持者和反对者才开始激烈争论。目前，争论的硝烟似乎已经散去，其结果正如伊文思所说，“历史学家对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有关历史学的批判所做的回应，在一些重大的层面上，已经导致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学者要去修正他们的论据了，就好像历史学家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被迫要去修正他们的论据一样”。^{[1][P14]}

这样的结论对于中国史学界显然并不适用。中国史学对于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对历史学提出的挑战至今还是准备不足的。在 21 世纪的今天，当即使是中国的精英历史学家对西方 18-20 世纪前期历史哲学的脉络还不甚了了的时候，当他们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这一脉络之间的关系漠不关心的时候，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似乎就是一种奢侈。其实，相对于那些只是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自说自话的人来说，只是为了生计而炮制垃圾的人来说，无论是挑战者还是回应者，都是对这个职业具有责任感的。因此，虽然近年来也先后有一些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介绍和讨论，但只是死水微澜，未能引起中国史学家的反应，也许后现代史学真会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匆匆过客。^①

尽管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存在诸多谬误，或许还有些危言耸听，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闭目塞听的借口。伊格尔斯认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以及新文化史的出现都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关，因为后者挑

作者简介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① 仲伟民称其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光明日报》2005 年 1 月 27 日 C1 版），说它是“不速之客”很准确，因为我们的史学家还没有做好准备；说它“姗姗来迟”似乎过奖，我倒觉得对我们的史学界来说还是来得有点早。复旦大学陈新教授、清华大学彭刚教授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绝大多数同行似乎还是对此不屑一顾。

战了历史中的宏大叙事，挑战了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历程的那些研究，而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以及个性历史。^{[2](P16-17)}但是，纳塔丽·戴维斯却对学界把她的《马丁·盖尔归来》以及拉迪里的《蒙塔尤》、金兹堡的《乳酪与蛆虫》归入后现代史学不表赞同，认为他们还是希望得出一些超出个案的大看法。她认为他们三人的共性在于都具有人类学的兴趣和讲故事的陈述方式，^{[3](P74-75)}但正是这样的倾向与以往历史学的宏大叙事追求发生了偏转。

甚至人们认为，社会史研究也为后现代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社会史抨击了政治史的排他性，特别是传统史学从研究对象和史料等多方面都对边缘的或异己的群体加以排斥的做法；他们也通过研究揭示了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影响，比如美国历史往往是掌权精英集团的政治宣传，这就导致了后现代史学对客观性的质疑。^{[4](P182-183)}对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当然不应漠然视之，因为这涉及到我们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而之所以后现代史学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无论是在社会史还是文化史的发展方面，向人们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譬如，人们迄今还在围绕顾颉刚的“疑古”进行争论，一些人只是以为用新的材料证明可以更多地“信古”，而不明白其“层累地制造古史”的意义在于证明史料的非纯粹客观性和话语性。

以上情况说明，某些史学研究的动向是历史学发展自身的结果，并不一定受到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可能它们同是某一思潮的产物，或者，这样一些动向也未必一定要冠以“后现代”的名目；甚至冠以“后现代”之名的动向本身也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正视它要比躲避它更为可取。

譬如，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构是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民族国家是与18世纪以来科学理性追求和自由人追求同步的政体形式，也是后者的政治结果，它利用强权更强化了现代性的话语霸权。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它却引导我们去思考很多重要的问题。如“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西方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的产物，有了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国，就有了一个与之配合的单一民族概念——中华民族，但事实上它是“中华国族”（nationality），意即中国人（Chinese），其中还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或者“族群”（ethnic groups），他们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前很久就已存在。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与国家的关系是与现在不同的。因此，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认识去思考以往的历史，有许多问题是值得反思的。^①

无论从事实的层面上看，还是从解释的层面上看，“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都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其“文化”的意义，二是其“变化”的意义，我们很难通过一个固定的空间范围去确定一个人是否“中国人”。近读一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笔谈，^{[5](P91-102)}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论者认为，“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不论其作者出身于何种民族，不论其采用何种文字……，等等，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论者强调中国史学史研究中要重视“少数民族史学”是很正确的，但上述定义却值得反思。

首先，这个“少数民族”是否今天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是具有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同时也是在今天国族（nationality）即中华民族之下的少数民族？如果是这样，在华夏——汉人没有作为主体民族之时，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小雅尽废，四夷交侵”的时代，谁是“少数民族”？其次，即使是秦汉以降，中原王朝逐渐占据优势的文化地位，视周边各族为蛮夷，但未必人家自己就承认是“少数民族”，匈奴承认过自己是汉朝的“少数民族”吗？南北朝时“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大概可以说是互视为“少数民族”吧？若以元以后的中国版图论，南宋时的版图顶多居1/4，它下辖的居民是不是“少数民族”呢？

^① 在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有很多评论者将此书观点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如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13页。

由这样的概念进而讨论“少数民族史学”，当然会造成进一步的混乱。我们所依据的先秦史料，多是华夏观念的反映，其中对戎、狄、蛮、夷等“四夷”的描述，并不能等同于人家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发现人家自己书写的历史记载，也不能贸然用自己的看法取代别人的看法，至少我们在19世纪以来对许多无文字社会的田野调查中看到，“他者”的看法、包括他们对历史的记忆与我们是迥异的。此外，《史记》中有《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等，但我们怎么知道司马迁是把他们当作“少数民族”看的，还是当作“外国”看的，还是没有差别的？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不会有“少数民族”、“外国”等等这样一些近代民族国家以后出现的概念。如果是这样，我们把这些列传称为“少数民族史学”合适，还是“外国史学”合适？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元朝人修辽、金、宋三史的争论。^⑩同在“二十四史”中，不知是否前二史可以归诸“少数民族史学”，而后者则是“汉族史学”？或者有其他的处理方法？问题在于元顺帝时“诏厘为三史，而各统其所统”。^{⑪(卷208,P152)}其顺序是《辽史》、《金史》，最后才是《宋史》，我曾说这表明元朝特别重视它与草原帝国的承继性，而非与中原王朝的承继性。蒙古人虽然在这里表现出清晰的族群观念，但却未必在脑子里把宋人看作“少数民族”，至少绝不会把契丹人和女真人看作“少数民族”。我们现在称他们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却视自己为“正统”。^⑫

在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痛感目前还有很多人对文化遗产中许多带有信仰色彩的活动持保留态度，一些人动辄斥之为“宗教迷信”，因此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其实，用描述西方基督教的 religion（翻译为“宗教”）一词来描述中国传统的许多祭祀行为，颇多不妥；后来又将描述基督教异端的 superstition 翻译为“迷信”，同样来描述这些中国的祭祀行为更为不妥，且具西方中心之用意。殊不知中国传统这些祭祀行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皆可用“礼仪”一词以蔽之，正与西方的“宗教”一样，成为中西文化传统的标志。但自引进“宗教”并用其来描述此类行为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部分信仰活动就得不到正确的估价。我因而在会上称之为：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前面讨论的“少数民族”问题也颇类此，都属于后现代主义诋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一类。在我看来，虽然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彻底摧毁并不一定成功，但它对近代以来“宏大叙事”的抨击是很有价值的。这种宏大叙事的建构实际上遮蔽了许多追求历史真实的原则和努力，在这里，我们熟悉的辩证法和历史主义都望而却步了。我们几乎忘了我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今天这样的“中国”的，我们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华民族”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他们逐渐的构建过程也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如后现代主义所指出的，宏大叙事的建构是服务于某种权力的，目的正是要遮蔽弱势群体的声音，包括后者对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少数民族史学”的倡导本来应该和美国黑人史学的崛起一样，成为聆听弱势群体声音的契机，但如果缺乏批判意识，它同样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工具。

后现代史学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它关于历史认识论的惊人之语，而在于它对近（现）代以来主导性历史话语的批判意识。在这方面，如果它竟成中国史学界的匆匆过客，那就不得不承认是我们的悲哀。

[参考文献]

- [1] 伊文思（伊凡斯）. 为史学辩护 [M]. 潘振泰译.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
- [2] 伊格尔斯. 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M]. 何兆武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 [3] 伯克. 新史学：自由与对话 [M]. 彭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4] 阿普尔比等. 历史的真相 [M]. 刘北成、薛绚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5]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认同 [J]. 河北学刊，2007, (6).
- [6] 赵世瑜. 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 (5).
- [7] 毕沅. 续资治通鉴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⑩中国政法大学赵丙祥教授曾示我他的最新研究，即南诏祭祀的五岳四渎并不是中原的山河，而是在云南境内的山河。他连唐的正统都不愿意承认，还会自认他是唐的少数民族吗？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徐兆仁

[摘要] 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义思潮挑战传统史学，提出关于历史真实检验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在史学史研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 史学史 后现代主义史学 历史真实 历史解释原理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09-02

曲笔、直书、史才、史学、史识、史法、史德、史意、体裁、体例等关键词，都是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历史客体、历史文本、范式、重演、移情、道德律、长时段、主体性把握、历史效果等关键词，则是西方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中国传统史学以秉笔直书为记事原则，以撰写信史为编纂目标，以经世致用为撰述宗旨，侧重于总结和探索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彰往察来的历史智慧，十分注重发挥史学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西方史学则往往和哲学打通，长于引入理论思维，常有颠覆性的理念问世，引人反思。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立场、认知水平等等原因，导致曲解和误解历史的严重后果，确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抨击和批判的那样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具有深度、系统的专业理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理论上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和基础阶段。诸如历史学学科属性的科学说、艺术说、综合说等几十种不同说法，各异其趣，莫衷一是。研究者无所适从，不明所以。由于研究者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历史理解和解释本身，没能

就历史理解和解释的思维内涵和理论形成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未能更好地运用理论武器的力量，造成历史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停留在个别的、琐碎的、片面的、非科学的状态。所有这一切，结果导致了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研究者被汪洋大海般的史料所淹没，无法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侦知历史发展的动向，无力从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中洞察历史演进的轨迹；二是研究者被强烈的思想偏见所影响，不能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历史真理，无法在相互对抗的学术交锋中廓清真伪是非。这两者均与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相违背，即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获取精神资源，从丰富多彩的历史研究中获得真知灼见和智力支持。

上世纪末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史学领域，一时间波澜叠起，争论纷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中外史学史研究结论表明，历史研究者在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基本元素均离不开历史事实，历史学最直接的研究目的是获得历史真实，最终极的研究指向是历史真理。问题是，到底以什么标准来检验研究者

作者简介 徐兆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100732）。

获得的历史真实？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史学实践，各派理论观点争论激烈，辩难不息。后现代主义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亦为历史真实的获得与检验标准的问题，只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和坚持以下与众不同的观点：

历史消逝之后，过去与现实相联的纽带和关键在于研究者，研究者或者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历史真实性不能划等号，两者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历史内容以及表现形式能够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历史真实的境界。所谓表现形式，就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之外，不存在什么客观历史。衡量历史研究是否真实的标准，来自历史叙述这一实践活动的效用，历史叙述的效用如何，取决于读者在他们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等的要求、态度和选择。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要由读者的理解结果说了算。后现代主义史学因此强调理解的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创造性，由此发展出微观史学、生活史学、环境史学、文化史学，以及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全新的研究范式。

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传统史学关于历史知识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各种理论，挑战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颠覆既有的历史观念，这一理论可谓来势强劲，难以阻挡，也使人们对历史真实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有建立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之间有效、科学、可靠的关系，才能达到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亟需破解的难题。将这一难题称为史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能也不为过。要想接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挑战，走出困境，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内部绕圈子可能无济于事，必须另辟蹊径。而历史解释学则可能为解决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找到对策，成为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支持。

历史解释学就是一种旨在避免误解历史，达到正确理解历史、科学解释历史的学科门类，这是一个正在悄然兴起、有着光明学术前景的历史学理论研究新领域。史学史研究除了将自己推向理论高度，别无他路可以突破藩篱；除了积极进行理论综合和创新，无法从根本上面临各种挑战

和解决自身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大多不出以下范围，即对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历史遗存的考察和发掘、历史轨迹和历史真实的再现、历史场景和历史面貌的叙述、历史现象和历史奥秘的揭示、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阐述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均以历史的理解与解释为根本、核心和关键。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探索、理解和叙述历史的同时不能对其作出有效的历史解释，那么，他们就未能真正完成使命。这一认识，越是到了当代，越显得突出和强烈。当代历史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历史解释学提升研究境界、层次和理论含量。

作为历史学基础的历史理解是一个突破口，理解需要不断地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和历史实际，是获取历史真理必然要完成的重要和持续的任务。通过历史文本、历史遗存等流传物，客观地理解成为可能，对于历史流传物所折射的人类历史实际的解释也成为可能。

历史解释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的特性和逻辑，剖析历史观念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探索并运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原理、方法、规律，提高历史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历史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围绕历史知识、历史真实、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等领域，最终揭示历史的奥秘。

尽管以往对于历史的解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中外历史学界并没有发展出一门完整的、独立的历史解释学。西方关于历史学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经历了从思辩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迄今仍然未能真正打通历史客体和认识主体之间的通道，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的、有效的共识。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新文化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微观史学的兴起，历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异军突起、各领风骚的兴盛景象。但是，各派各持所见，纷乱扰攘的局面也促使历史研究者们开始注重历史知识特性、历史解释机制、历史思维形式等历史解释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建构。

历史解释学的发展渊源有自。古往今来，中
(下转第 114 页)

后现代与史学史的新视角 *

张耕华

[摘要] 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某些结论，看似“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尤其是他们的历史叙述理论，他们对历史叙述的建构和结构演化变迁的分析，颇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为史学史研究找到了一个奇特而有趣的视角。

[关键词] 后现代史学理论 历史叙述的演化史 史学史的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11-04

“新新史学”，这是一位美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别称。^①这个别称，使人联想到“新新人类”、“丁克族”等名词，它们是用来指称那些不愿“遵循”社会老秩序、老规范来生活的一代新人，而那些秩序、规范，却是现实社会的基础。用“新新史学”来指称一种要全盘“颠覆”史学基础的后现代理论，颇为形象，远比“新蛮夷”的称呼文雅。^②其实，无论是“新新人类”，还是“新新史学”，都不可能颠覆现有的秩序和规范。^③我们与其视它为颠覆或破坏，倒不如把它看作一种质疑和挑战。有意思的是，虽然大多数实践的史学家都对后现代的史学观念表示反感，但对用后现代观念、或具有后现代观念倾向的史学著作并不排斥，有些甚至还获得史学界的普遍好评。如何伟礼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 1793 年马嘎尔尼使节》和柯文的《历史三调：事件、经验与神话》就是最典型的二例。^④这似乎表明，后现代史学的某些结论是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借助后现代的挑战，正好有助于我们重新阐明历史学的学科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我们若能平心静气地应对这一挑战，自能引发出史学研究的一些新课题、新探索，这对于像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的研究，也是如此。

半个多世纪前，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史学家都参与了那场对中国古史材料的全盘清理和考辨工作——古史辨伪。现在，这项工作及其成果已经成为史学史上一项重要内容而写进我们当代史学史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元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5JA77006。

作者简介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①美国历史学家劳伦斯·史东称后现代主义者是“兵临历史学城下的那些知识上的新蛮夷”。参见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译：《新史学辩护》，巨流图书公司 2002 年版，第 7 页。

②其实，真正对社会和学科规范具有颠覆性破坏的，并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者，而是那些不遵职业操守的所谓时代新人。如新近加入作协的文学新人，抄袭了他人的作品，还决不道歉，大有“我抄袭又如何”的气概。至于那些“粉丝”，更是高喊“就算‘小四’抄袭，我们照样喜欢”。（参见《底线》，刊于《新闻晚报》2007 年 12 月 7 日）翻译界也有所谓“史上最牛的译者”，4 年翻译了 23 本书。（参见《28 岁龙小姐 4 年翻译 23 本书》，刊于《新闻晚报》2007 年 12 月 6 日）这种连做人的底线都不顾的人，才是真正“颠覆者”。所幸史学界尚未出现这样的新人。

③正像难以界定后现代主义一样，究竟哪些史学著作可以视为有后现代主义的特色或倾向，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此处所列出的，均采自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

的著作里了。虽然今天也有学者倡导要走出“疑古时代”，但那场古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层累地造成古史观”至今仍“屹立不倒”。顾先生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可以说明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位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②(p75)} 顾先生的这一番见解，如果到了柯文的手里，岂不可以演化出《禹形象三调》、《夏商史三调》、《东周史三调》之类的著作？稍作延伸或发挥，顾先生的发明不仅与柯文的《历史三调》“异曲同工”，也与后现代的观念暗合。当然，顾先生决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笔者也无意要将顾先生与后现代主义史学随意比附。上述这番话题无非是想指出：虽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在各种史学史专著中都有专门的论述介绍，但如果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史学观点或史学方法，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史学现象——“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来加以研究，未免有些买椟还珠。

什么是“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呢？有学者说：“那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认识的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③ 简而言之，“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就是人们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历史故事，在不同叙述者及时代、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断演化变迁的现象。至于这番演化是否意味着“提高”、“丰富和发展”，这里暂且不论。

历史学的基础是一个个确实可靠的历史事实，这就像是为建筑高楼大厦而打造的一块块砖瓦。虽然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构建历史大厦，虽然时间顺序或因果逻辑总得优先考虑和遵守，但运用同样的“砖瓦”完全可以构建出不同风格的历史大厦。而事实上，历史“砖瓦”的选择和使用也决不会完全相同。历史学家在材料的选择取舍、安排的主次轻重、搭配的前后左右等等，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从而使建筑的历史大厦——如同历史叙述中的故事就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主题。这是无可否认的、也是每一位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的事。从表层看，历史叙事的演变是有关对象（人物、事件等等）的叙述演变；但从深层看，则是叙述者自身的演变，是叙述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演变。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不单是叙述了历史的故事，也叙述了叙述者自己的故事，叙述了叙述者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故事。历史学家吴晗曾经四次修订了他的史学著作《朱元璋传》。今日，我们若将这几本不同年代出版的著作拿来阅读比较，便可见到几个不同的朱元璋（形象），也可以见到几个不同的吴晗，以及几个不同的社会和时代。在现实的社会里，并非只有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人人都可以“拿历史说事儿”，^④ 社会上不同的人，都会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叙述历史的故事。于是，我们便见到好几个不同层面的历史叙述：有民间流传的历史叙述、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政治话语系统中的历史故事，等等。而每层面上的叙事，又会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且彼此影响。于是我们便有了不同版本的大禹故事、或不同的尧舜故事。历史叙事的演化变迁，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位孝子的模范了”呢？这种历史叙述的演化，有多少与学者个人的学识，以及他的个人气质、性格、经历和阅历等有关，有多少与时代社会相联系。换言之，历史叙述在何种程度上只是叙述者的个人故事，在何种程度上是社会的故事？历史叙述也会暂时定型，定型的叙述又会受到学者的怀疑，表现为一个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某一层面的叙述建构是出于何种因素的制约？它的解构又会带

① 这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参见《新周刊》第238期，第22页，2006年11月出版。

来怎样的影响，以 20 世纪“疑古派”的研究为例。当顾先生将他的研究成果融化到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中，将“古史系统”列入传说时代后，为什么会引发一场司法纠葛？^①^② 今天，为什么又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其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现实要求？历史叙述的形成、它一步步的演化变迁（不断地重新建构）以及后人对它的复原解构、乃至解构之后的再次建构——即整个“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的过程，最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这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非常奇特而有趣的视角，一个后现代的视角。

其实，有关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并非后现代首先发明的观点。只是后现代兴起之后才将最后的一层窗纸点破。我们读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就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很早就已关注该问题。卡尔说：“每个新闻记者今天都知道，影响舆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选择和安排适合的事实。”事实自己并不会说话，让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次第、写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所决定。^③^④ 历史学家对不同事实的选择和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叙述效果。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学者也正是从这一特征来论证“历史等同文学虚构”的。^⑤ 至于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虚构，我们暂且不加讨论，但“历史叙述的演化变迁”的现象却是无法否认的。这应纳入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目前它还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盲点。

何以称它为史学史研究的盲点呢？因为有关历史叙事的演化变迁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学界同仁的关注对象。有学者发现，历史叙事中的施琅，由昔日“投降派”已悄悄转变为今日的“民族英雄”。^⑥ 五代时的冯道甚为当时人称道，甚至对他的评价极高（“德望为遐迩所倾服”、“望重一世”），而到了宋代，却被视为“大节有亏”的“无廉耻者”（欧阳修语）。^⑦ 又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发现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时，当时的舆论并不认为她是革命党人。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多种历史因素逐步建构起来的，除了革命党人的褒扬和民间的纪念活动之外，学术研究为这一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⑧ 也有学者对长征的历史叙述的演变做了历史的考察，认为长征的叙述至少有四种模式：即 1930 年代的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的《红军长征记》和用作向外宣传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49 年以后的长征叙述的定格，以及近年来的长征叙述的新模式。^⑨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报刊杂志、电视电影等领域，我们还可以看到雷锋、白求恩等历史人物叙述模式也在悄悄地演变。^⑩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思考，至多是历史的角度，而不是史学史的角度。

史学史大概是历史学中最古老悠久的一个分支学科。惟其古老悠久，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当成熟和标准的研究模式，即以史家、史著为基本研究单元的学科研究方式，无论如何总是史学史研究的正宗。近二三十年来，史学史的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最明显地表现在史学史研究重心由史学内部转移到史学外部。即由侧重史学内部的史家、史著、史观、方法、流派等内容的研究，转移到学术团体、制度设置等史学外部的一些重要现象（这里所说的“内”和“外”，都不是很确切，只是表示两个不同的侧面而已）。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还突出地表现在对新方法、新视角的引进。其中，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史学范型”研究，就是借用库恩的“范型”理论来考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此种研究，并不墨守库恩理论的桎梏，只是在一般意义上，把范型视为史学研究的一般方式，并由此来考察史学史上研究方式的变更兴替，从而呈现出的发展演变历程。^⑪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史学史研究不妨也“拥抱”一下后现代主义。这倒不是（也不必）去接受后现代的一些结论观点，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用后现代的一些理论观点，启动新的活力，开辟新的课题，转换出史学史研究的新视角。

①后现代主义也正是从事实的选择、组织、安排、结构入手，进而思索历史叙述的主题、情节设计等问题。参见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83 页。

②大致说来，民间历史叙述的变化总是先行，历史学家的叙述变化稍随其后，而政治话语系统中的叙述变革最为滞后。

③参阅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8 页；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2 期。

[参考文献]

- [1] [美]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 新旧历史学 [M]. 余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 [2] 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书 [A]. 古史辨 (第1册)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5.
- [3] 高华. 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J]. 炎黄春秋, 2006, (10).
- [4] 刘起轩. 顾颉刚先生学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 卡尔. 历史是什么? [M].
- [6] 胡文辉. 古典今情中的施琅 [N]. 南方周末, 2006-04-20.
- [7] 宋衍申. 五代人不骂冯道 [J]. 历史学家茶座, 2007, (3).
- [8] 李细珠. 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7, (5).

(上接第 110 页)

外大批历史研究者曾在这方面倾注心血, 进行了富有创见的不断探索, 提出种种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其中, 比较常见的就有: 经验性解释, 常识性解释, 寓言式解释, 假设性解释, 因果解释, 实用解释, 多元解释, 以某一观点为中心线索的解释, 根据统一模式进行的解释, 科学解释 (从生物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范式、逻辑、定律、规则等出发所作的解释), 文化解释 (从哲学、宗教、文学、美术等思维定势、价值取向、审美情趣、行为规范、道德信仰等智力和艺术普遍水准出发的解释), 专业解释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社会科学领域和角度进行的解释) ……关于历史理解与历史解释的学说, 丰富多彩, 琳琅满目, 尽管这些学说和观点并非完全正确, 但因其独到和新颖, 富有学术价值, 激发了新的研究兴趣。

中外历史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显示, 历史学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理解与解释的模式、视域、思想、观念、理论、方法的改变、突破、推进和创新。如何吸取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

发展中的优秀成果, 正确分析、批评、借鉴、吸收各种史学思想, 在新的科学成果、人类社会实践经验基础上加以发展, 实现历史学理论上的革命性飞跃, 形成科学、严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成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

我们在研究中总结和发现了历史解释的十个基本原理, 即历史原生态复制原理、历史事实趋真原理、历史文本语言转换原理、视域融合原理、历史线索突破原理、历史现象层深入原理、历史解释循环原理、历史思维抽象原理、历史重构原理、历史智慧内化和转化原理等等。由于历史解释学着重对求证历史真实的各种理论的探讨, 对历史意义科学阐发和价值判断理路的分析, 对历史思维和历史认识有效边际和性质的定位, 对历史智慧内在机理及其时代转换路径的剖析, 以及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供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从而, 最终可以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寻找对策, 为当代史学史研究提供新的专业理论, 进而即可带动史学史乃至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后现代视野下重新审视 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价值

江 涠

[摘要] 中国史学史研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科学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当作真理标准，以之重塑中国史学传统，给它化上时妆。而后现代主义把“现代”的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加以相对化，让我们多少能换一种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史学，把它从科学史学的“镜象”中移出，让它在科学史学的对照下显出“新意”与“个性”，给现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另类启发。作者力图给出几个例子，以引起讨论与思考。

[关键词] 后现代 中国传统史学 儒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15-04

2002 年，德国史家吕森编辑了《西方的历史思想》一书，其中有一篇彼得·伯克的文章《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这篇文章至少在意识层面，没有把欧洲在 18-20 世纪自觉形成的一套科学历史学的观念、理论、技术系统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作人类历史智识发展的统一性目标与价值，不是在现代、科学的标准下罗列西方史学具有普遍意义的进步性，而是自觉地把西方当作是欧洲的历史学传统与中国、日本、伊斯兰世界的历史编纂传统等列齐观，在一种比较的视野下，来阐述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① 显然，这种眼光与意识是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色彩的。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一个突出的也是积极的思想特点，就是一种对待现代性的激进批判态度，尤其是大力揭批以客观性、科学自豪的西方知识体系所内含的权力关系及其压迫性格，如西方/东方、中心/边缘、白种/有色、男人/女人、异性恋/同性恋……，而这个以后现代为名的时代，它的基本精神，可以用《士师记》中最后一句话来描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有机组成，中国传统史学开始疾速地向现代史学形态转变，在很大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以 18 世纪以来形成的西方科学史学的范式与体制改革、取代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1902 年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是这个过程的重要里程碑。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巨大进步与成就之下，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气质、思想内涵、知识形式都那么令人难耐。它难以承担培养国家意识、打造现代国民的时代重任，与西方科学史学严谨的客观态度、严密系统的逻辑论证、对“因果规律”的重视与发明相比，中国传统史学在进化的台阶上显得低了一级，实在自惭形秽。尽管梁启超后来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种种恶谥深入人心，如“流水帐”、“相斫书”、“二十四姓之家谱”、“帝王将相教科书”等等。虽然与梁启超在政治立场上形同水火，又大讲“国粹”、“国学”，但当时的革命党人也盛言中国“无史”说。^② 20 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倡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开始以积极的肯定性的态度总结、整理中国史学遗产。此后，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思路与不同的

作者简介 江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37）。

侧重，但是，在我们的头脑中，18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是占据“王位”的，我们多少都带着这样一副眼镜看待中国史学传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从中抽出一系列“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史学，似乎与之相合的是“精华”，否则便是“糟粕”。更有甚者，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发掘与阐释，看起来总像是从中据摘现代科学史学之因素并加以排列组合。我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给中国古代史学化了时妆，而模糊了它的本来面目。即使是持肯定的态度，也是把中国传统史学当作现代科学史学的胚胎来为之鼓掌的。而后现代主义则可以提供一种视野、一个反省的契机，让我们多少能以反省与分析的态度去看待中国史学现代化、科学化的进程，而不是一味地看取其历史合理性、进步性的一面。同时，也让我们多少能换一种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史学，把它从现代科学史学的阴影之下移出来，让它在现代科学史学的对照下显出些许新意与个性，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给它“招魂”，而是尽量不用“现在”局限“过去”，尽量让“过去”能成为对“现在”的一种启发。在这里，笔者尝试着举例谈几点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特点，而这正是在科学史学的镜子里难以看到的。

比如，中国传统史学特别重视探讨人在一定历史处境下的责任与能力，一般用“人意”与“时势”的关系来表示。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易》学、《春秋》学与史学的思想联系尤为密切。《易》学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历史哲理，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历史哲学。其中关于如何看待与处理个人与历史环境之关系的思想，充满了实践的智慧。义理派的《易》学以“卦”为“时”，以“爻”表示处于不同“位”的人，“卦辞”说的是某种特定“时势”的特点、状况，而不同的人在同一“时势”下要采取不同的对策，“爻辞”说的是处于不同“位”的人在这种“时势”下该怎么办。这样一套历史观的重大关切，在于“人”在给定的历史处境下，如何抉择、如何行动才是合乎“道”的，合乎“道”的大意是既问心无愧，又对当下的现实最负责任最有用，同时又是自己力所能胜任的，这样在道德上才算是最恰当的。程颐一生，经历了“熙宁变法”前后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而能安其天命，行其所是，他自称“出处进退”无不依《易》道而行，晚年成书的《程氏易传》，正是他一生实践智慧的结晶。这种历史观意味着这样一种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人总是有选择的能力与责任，这种历史观探询历史“因果”的眼光主要集中于某些个人与群体，看他们在自己的“时势”下是否作出了最好的表现，是否有自觉、有能力承担历史责任，而不是对“天命”或“规律”穷探力索——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史学没有这方面的探索，事实上，中国史家经常使用“天”这个概念来表达历史之中超乎人力的某种客观力量，而且一些优秀史家已能从“社会性的思想行动所造成的历史趋势”这个角度来理解它。彼得·伯克指出西方历史思想有这样一个特点：“集体力量或至少某些集体力量在西方史学中得到非同寻常的强调。”^④相对于此，余英时指出：“中国史学思想中的根本性内容是人的作用在历史形成中居中心地位。”^⑤这种历史观及其对人类行为方式的理解也许与中国历史编纂的“纪传体”式体裁不无关系。作为纪传体的创始者，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列传”一体记述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布衣之士，“不令已失时”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有善于抓住、利用历史形势提供的机遇，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意思。自“新史学”以来，人们常以“帝王将相教科书”菲薄传统史学，然而，转念一想，传统史学的确注重探讨负有历史责任的政治人物，在一定“时势”之下如何判断形势、如何权衡轻重又如何抉择弃取。这种探讨很有益于培养人的实践智能，“帝王将相教科书”也没什么不好。梁启超后来非常积极地提出并肯定了中国传统史学在这个方面的思想价值，他说：“严格说起来，中国过去的史学，差不多以历史为个人活动的模范，此种特色，不可看轻。”“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作学做人的教科书。”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⑥(P164-165)

中国传统史学注重探讨人在一定历史处境下的责任与能力，但绝对不限于政治领域与政治人物，相

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它非常关注作为一个“士君子”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形势下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即讲求士君子立身处世的“大中之道”。司马迁的“列传”所述往往不是英雄崛起的喜剧，而是在剧烈的古今之变中，人们忽兴忽败，无力自主，其命运之诡谲、境遇之复杂，令人扼腕叹息。《史记》常把人放在两种价值冲突矛盾的境况里来论说在这样一种难局下人究竟应该怎样抉择与行动。如伍子胥之兴吴灭楚，按照传统宗法道德，当然要向楚王报父仇，但是为复仇而鞭平王之尸又覆灭宗国，司马迁借伍子胥自己的话评论道：“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史记·伍子胥列传》）这一思想主题在以后的史著中反复出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北宋儒道复兴运动的重要经典，它的思想旨趣是要澄清在五代“乱世”搞乱了的伦理观念，以确立正确的道德规范，欧阳修往往通过评论具体处境下的人与事来达到这个思想目的，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比如后唐大将乌震不顾敌方的要挟，致使母妻子女在阵前遭到残害，军中皆不忍正视，乌震则一恸而止，愤激自励，身先士卒，遂大破敌军。时人皆赞叹他的忠勇，欧阳修却说，乌震确实处在一个“忠”与“孝”发生矛盾的处境下，但在这时，“孝”道要放在“忠”道之上，“孝”是“忠”的前提，“能事其亲以孝，然后能事其君以忠”。就算“国之利害”系于己之所为，但若为之利于国而害于亲，都要辞禄而去，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未关系到国家兴亡，他却为了自己的功业而牺牲亲人，“可谓大不孝矣，尚何有于忠哉！”（《新五代史·乌震传》）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为杜维运所称赞，说他接近了近代史学中历史解释的精义，能以归纳方法得出历史演化之因果与趋势，^⑥不过，这部史论另有给人印象深刻之处，但却不一定能给近代史家关心的主题有什么帮助：王夫之对历史“参其变”而“知其常”所要得到的“鉴”，最终落脚到士君子的应变、济世、持身之道，正如他所说的，他论史的一个主要思想目标是要让自己能够“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王夫之：《俟解》）

中国传统史学倾向于就明确的个人或群体探询历史变化的决定性作用，这与下面所说的一个思想特点可能大有关系：中国史家特别善于通过细节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及其对行为的影响，特别善于从历史人物在关键历史时刻的表现来品评其政治素质，并对其事业的可能后果与影响有所预见。可以说，优秀的中国史家常有老练政治家式的知人之明。钱穆夸奖司马迁在写秦汉之际的人物时能做到“性情隐微，则勾画如见其肺腑”，^⑦这样的评语也适于其他优秀史家。唐初所修《晋书》因专记逸闻、体近小说而受到刘知几的严厉批评，此后《晋书》琐碎几成定见，但章太炎却说，自《史》、《汉》以下，能写出“各人之性质风度，无不栩栩欲活”的，首推《晋书》，^⑧这是就中国传统史学的上述特点而言的。章太炎写了很多辛亥人物的传记，颇有这样的古良史之风。他曾提到，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成功，他一度对袁世凯其人抱有幻想。然而，在一次谈话中，章太炎提到“武昌人甚重张之洞”，袁世凯为之愤然，章太炎对袁世凯大失所望，认为他“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⑨梁启超也非常善于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他的《李鸿章传》虽“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但其中处处可见“知其为人”的智慧与笔法，如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失败举国欲杀之时，以73岁高龄出任议和之事；又在义和团事变后，复任直隶总督以全权议和，皆能以国事为重而不以千古骂名为恤，梁启超认为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最过人的地方。他比较李鸿章与同时代人物，如曾国藩“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而与张之洞相比，李为“实践之人”，张为“浮华之人”，李最不好名而张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⑩

再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褒贬”书法也值得重新认识。“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韩愈说的这句话是中国史家最为自负的一种责任与权力。唐高宗时的宰相韦安石说：“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贤臣圣君所以畏惧也。”（《新唐书·朱敬则传》）然而这种自负春秋笔法的褒贬又是传统史学在近代以后最为人诟病之处。但是，正如人们之所熟知，历代史家与史官

^①章太炎：《自定年谱》，转引自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7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以“直书善恶”为准则，坚持记载不利于当时统治者的历史事实，杀身殒命在所不惜。更有意思的是，“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还另有一种强烈的抗议与批判精神。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常以不可抗拒的“天命”、“大势”或“规律”来证明自己的胜利是合理和必然的，敌人只能作为失败者同时也是失德者留名史册，而没有任何作为的不合作者更是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身影。可是，《史记》“列传”首篇《伯夷列传》记载的正是两个背时逆势的人，他们在周武王奉天伐纣的当口，说什么“以臣弑君”、“以暴易暴”，最后不食周粟而饿死，平生并无功烈。这篇列传记叙少而议论多，司马迁最后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史记·伯夷列传》）这是说，史家的职责就是要让那些敢于在历史大势面前“从吾所好”、“各从其志”的人留名青史、永志不忘，这样的历史书写简直是对“历史”的抗拒。而《史记》写失败的英雄，笔下最有光彩。程颐读史时曾感叹：“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19]朱熹深恐学者读史时“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20]也都有以“理”抗“势”的意味。后世史书列有“隐逸传”、“一行传”、“死节传”、“死义传”，多述草野之中闾巷之间的忠烈之士，又有“列女传”备述有特别道德操行的女子，虽然在其中司马迁的抗议精神已经变质，变成了维护人伦礼教的“教化”功能，但毕竟还是表彰了不徇时变、忠于所信的“气节”，在帝王将相的事业之外为普通的小人物留下了印迹。陈寅恪晚年“著书惟剩颂红妆”，花巨大精力考证陈端生、柳如是这两个卑贱女子的生平事迹，展露她们不甘“堙灭而不称”的志气、理想与才华，用她们来承载我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这样的人生奇迹对于历史大势来说是无足轻重的。陈寅恪的“以史载道”与司马迁《伯夷列传》的精神最为相切。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风格与技术。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叙事”是史家之“才”的重要方面，刘知几在《史通》中就有《叙事》一节，专门论述史书叙事之美与文章叙事之美的不同标准。顾炎武的《日知录》有《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一条，其实概括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白寿彝先生写过《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揭示司马迁如何从细琐小事深刻生动地勾画当时的政治气氛与社会风气。又强调要把“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与特点作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重点。^[21]当代史学出现了“向叙事回归”的趋向，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特别强调史学与文学的相似性，认为比之“科学—逻辑”话语，历史叙述与解释更是一套“特化—修辞”话语，“历史事实”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一种在想象中的比喻化构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擅长对“言语活动”（speech event）不同功能的分析，对文本结构的解读，对“风格”的阐释，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与阐发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独特风格与技术，应该能有一定的启发。此外，中国传统史学还善于察“风俗”以论世变，关于这一很独特又极有价值的史学思想，前辈学者也是多有论述。如蒙文通在他的《中国史学史》中强调袁宏《后汉纪》能从“风俗”上考察东汉一代历史形势变化之渐；^[22]瞿林东教授一贯强调中国史学善观“人心风俗”的思想特点，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书之中，特列“风俗论”以论之。这个方面的遗产与成就也有待我们进一步的阐发。近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史、文化史作为史学新领域而广受青睐，古代史家对风俗人心的洞察、对风俗之与历史盛衰之运的论述，也许能带来一定启发，使得我们对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描述更加得其要领、得其神髓。

正如许多前辈学者之所论述，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儒家学术又以经学、史学为主，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远远超过其在西方传统文化之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因此把中国传统史学放在儒家学术体系之中、放在这一学术体系的发展脉络之中，才能更准确地定位和描述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特性。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无法详细论列。笔者所谈到的几点学习心得多得自前辈与同行的启发。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要做系统的论述与总结，也很难说真正把握到中国传统史学里有重要价值的东西。至于中国古代史学是否确实存在着这里所说的思想性格，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下转第 122 页）

史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史学比较与全球视野

邓京力

[摘要] 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使得当代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表现出某些新的趋向，即从跨文化的视角进行史学比较、总结不同史学传统的经验与成果，并展现其间史学交流的过程与复杂关系，以期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关键词] 全球化 后现代 史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19-04

一、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的影响

现代西方传统形式的史学史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地区的历史写作和史学自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的认识。它在较高层次上，应该包含对贯注于历史写作之中的自然、哲学、宗教、社会等思想观念性的研究，即表达为西方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的演进。而在较低层次上，应该包括对各代历史学家及其历史写作的形式与方法、史学流派和史学潮流的变迁研究，即所谓历史编纂学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像这种类型的史学史著作，从乔治·古奇 (George P. Gooch) 所著的《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13)、巴恩斯 (Harry Elmer Barnes) 的《历史写作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New York, 1938)、汤普逊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的《历史著作史》(1942)，到布瑞斯克 (Ernst Breisach) 的《历史学：从古代、中世纪到现代》(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icago, 1983)，以及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的《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1997)，可以说不胜枚举。但事实是，在18世纪以前世界上就已经至少形成了除西方以外的四种非西方史学传统——东亚、印度、伊斯兰和北非。对此，以往西方史学界极少将其放在史学史的谱系当中加以严肃对待，即使在面对近代以来各文明区域间愈演愈烈的史学交流与对话时，也只是简单地将非西方的史学看作是西方史学与文化的延伸，普遍称作是“西方化”的产物。^①

然而，到20世纪末，两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在逐步改变着上述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趋势。一方面是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其内部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西方学术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它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提出了全面质疑，主要表现在对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历史、客观性和科学史学等方面的解构和批判。^②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及其对西方标准的普适性的批判，直接导致了对以西方史学传统为核心的史学史体系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态度的转变——史学史的撰述不

作者简介 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37）。

^① 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Introducti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pp1-17; 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东北师大教育学报》2004年第1期；邓京力：《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能只以西方史学为研究对象，还应当注意到非西方史学的成就与经验；不能单纯地以西方史学模式为标准体系，来衡量非西方史学的价值及其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迅速传播到全球，一个普遍的、理性化的西方似乎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支配和统领的作用，它戏剧性地改变了非西方国家人们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时也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如何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特点——民族性。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在更高的程度上展开了一种相互的冲突、交融和理解。历史学家在其中既担负着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使命（建构民族史），也面临着兼顾全球性视野的责任（建构普遍史）。对于史学史的写作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史学传统与历史思想的全球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比较研究”，^②^(P1) 或“超越自己文化界限的感知和相互理解”，并“促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③^(P6) 其最终意味着全球史学史的撰写——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近现代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揭示各个文明的历史意识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④

二、从史学比较中看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

全球史学史撰写的核心要旨是揭示历史思想全球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展示不同地域史学发展的丰富性，总结多元化的史学实践经验，进而才能说明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因此，进行跨文化的史学比较，用以重新界定不同史学传统的共性与个性是解构西方中心的史学史体系、建立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史学史的基础。

在吕森所编写的《西方的历史思想——一场跨文化的争论》一书中，来自德国、英国、希腊、荷兰、法国、挪威、美国、肯尼亚、日本、印度、中国的学者，就彼得·伯克的主题文章《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进行了集中讨论。^⑤ 这场讨论可以称得上是代表当代西方史学史研究趋势的重要学术事件之一。彼得·伯克在文中提出了关于西方历史思想^⑥ 独特性的十个命题（按重要性排序）：（一）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看待过去的“线性”观点；（二）对历史视角的关注；（三）对个性的关注；（四）对集体力量的强调；（五）对认识论的关注和对历史知识问题的思考；（六）以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七）以客观性为荣；（八）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九）文学形式；（十）对空间的独特见解。然而在笔者看来，彼得·伯克该文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上述十点内容，而在于他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和所运用的比较方法。首先他明确指出，要讨论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必须对其他史学传统（中国的、日本的、伊斯兰的、非洲的、美洲土著的等等）有足够的了解，而且不能先验地认定西方的历史写作风格在各方面都优于其他史学。因此，全文在论述每一点的时候都试图将西方的传统和非西方的历史文化进行初步的比较。其次，彼得·伯克在前言中特别强调“西方”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实际上也就是在对西方与非西方的概念提出质疑，对于本题来说这似乎使人听到了那带有后现代式的瓦解的声音。再次，彼得·伯克还指出，这里所概括的十点并不表明他把西方的历史思想视作是“一系列独一无二的特征”，而是将其视为某些因素的独特组合，“一种有侧重的模式”、“体系”、“模型”或“理想类型”；这一模型是动态的，同时它“对西方与非西方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异性做了必要的夸大，而对西方历史传统内部的思想分歧做了必要的缩小”。因此，全文在每个部分都试图表达为西方历史思想通过不同力量或因素之间的冲突而达成的一种动态平衡，这也许才是其独特性的真正体现。最后，彼得·伯克也试图解释西方历史思想独特性所形成的根源，试图将西方史学与西方文化的某些特征（包括与西方宗教、西方科学、西方法律、西方个人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等）联系起来，考察其差异性的原

^①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Berghahn Books, 2002. 《历史与当下》第2辑翻译了其中彼得·伯克（Peter Burke）、余英时、托马斯·李（Thomas H.C. Lee）、弗朗索瓦·阿托什（François Hartog）、戈弗雷·默里乌基（Godfrey Muriuki）的论文，本文参照了其中的部分译文，但又略有不同。

^②按照彼得·伯克对于“历史思想”的界定，它是指“职业历史学家的若干假定及其实践所具有的含义”。(in 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pp15) 笔者对此的具体理解是，它应该包含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思考和关于历史学的思考两个方面。

因。^{[4] (P15-17)}

彼得·伯克的文章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西方与非西方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模板抑或标准体系，使我们很容易直接触及这类问题：西方历史思想是否是独特的？其独特性是否就是西方史学优于非西方史学传统的集中体现？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是否具有截然的界限和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否一直存在并来源于哪里？对于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问题，彼得·伯克有一套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的差异总是显然存在的，但这种差异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写作越来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西方与其他史学之间的差异性与日俱增，各自走过了一个分流发展的阶段；到19、20世纪，由于西方范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兴趣，使得西方与非西方的史学继分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趋同的阶段。“这一进程的结果削弱而非瓦解了西方史学的独特性，并产生了全球性的职业历史学家共同体”，当然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不同地区史学的差异性。^{[4] (P17)}

余英时在《关于中国历史思想的反思》一文中对彼得·伯克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来自中国史学的回应。他首先认为，很难从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中概括出所谓独有的、绝对分明的、以区别于西方史学的独特性，这样做会使我们陷入本质主义的错误。在他看来，总体上中西两种史学传统之间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而历史地看它们所发展的形式有所区别，表现为历史研究的格局与重心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史学在起源上及其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等方面都与西方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不同。再者，以科学、发展、进步为特征的西方史学并不比中国史学固有的传统优越，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根本内容是人的作用在历史发展中居中心地位，同时兼顾秉笔直书与道德评判的双重原则。^{[5] (P152-172)}

伊格尔斯的《西方史学在什么方面是独特的？——关于西方与中国的比较》文章指出，他自己和彼得·伯克的学术背景中都不具有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足够了解，因此这种跨文化训练的有限性使得当今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只能通过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来进行。而且彼得·伯克所归纳的十点事实上是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其核心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观念，也只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步为人所认同的。最后，伯克关于历史思想论述的视域也过于狭窄，特别忽视了历史写作在社会和制度层面上所具有的特征，而也就是在这两方面中西史学具有明显的差异。^{[6] (P101-109)}

三、从史学交流中看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关系

上述关于西方历史思想独特性的讨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来自不同文明区域的史学家主要还是从各自的史学传统出发做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这对于反映全球史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当然是不够的，它最终还要落实到对于不同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全球化进程中，文明之间的交流使得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与独立性受到挑战，而这对于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则影响巨大，不同史学传统的交融和碰撞也最终模糊了它们之间的边界，甚至重新改铸了彼此的史学模式。

对此，中西学者都已经有所认识并开始付诸于史学史的研究实践。张广智曾系统地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在历史观、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多个层面与中外史学交流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外史学交流史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①伊格尔斯在关于全球史学史撰述的设想中，也将西方与非西方史学关系的探讨作为一条主线。他认为，西方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史学交流中似乎采取着主动的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真实的情况是各个地区在接受这一影响时都对西方的历史观念进行了各自的选择或自我改造，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特别是到后现代阶段，西方史学受到了来自内外两种力量的挑战，即来自其内部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和来自外部（非西方地区，特别是东方）的后殖

^① 张广智：《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另可参见《关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民主主义的挑战。¹¹

诚然，从史学交流的视角研究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的关系，对于史学史的写作来说仍然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何具体展现历史观念在全球范围和各地区间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又如何从根本上将历史学从西方现代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使得不同路径的历史思考获得其在全球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与价值。

[参考文献]

- [1] 伊格尔斯, 王晴佳.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现代史学的走向——一个跨文化全球史观的设想 [J]. 山东社会科学, 2004, (1).
- [2] 陈恒. 历史与当下 (第 2 辑, 卷首语)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 [3] [德] 约恩·吕森著. 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M]. 蔡甲福, 来炯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4] Peter Burke.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in a Global Perspective—10 Theses [A]. in 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M].
- [5] Yu Ying-shih. Reflections o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A]. in 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M].
- [6] Georg G. Iggers. What is Uniquely Western about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West in Contrast to that of China? [A]. in Jörn Rüsen ed., 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 An Intercultural Debate [M].

本栏责任编辑: 杨向艳

(上接第 118 页)

[参考文献]

- [1] 彼得·伯克. 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 十个命题 [A]. 历史与当下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 [2] 王汎森.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A].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3] 余英时. 中国史学思想反思 [A]. 历史与当下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 [4]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A]. 饮冰室合集 (第 12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5] 杜维运. 王夫之与中国史学家的历史解释艺术 [A]. 中国史学史 (第 3 册) [M]. 台北: 三民书局, 2004.
- [6] 钱穆.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7] 章太炎讲国学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 [8] 梁启超. 李鸿章传 [A]. 饮冰室合集 (第 6 册) [C].
- [9] 河南程氏遗书 [A]. 二程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0] 朱熹. 答沈叔晦 [A]. 朱熹集 [C].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 [11] 白寿彝. 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 [A]. 白寿彝史学论集 [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 [12] 蒙文通. 经史抉原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5.

文学 语言学

·文学教育研究·

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 *

郭英德

[摘要] 本文以明清蒙学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效果作为主要对象，从三个方面考察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一）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蒙学读物中的历史人物故事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其伦理内涵也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文人戏曲家“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了独特的戏曲之道。（二）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的生成。八股教育所形成的文学思维方式与戏曲叙述的生成有直接关系，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为戏曲的长篇叙事结构所借鉴，而其“代圣人立言”的文体特征造就了戏曲叙述的深层结构。（三）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的生成。文词派戏曲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是“以时文为南曲”的产物，更进一步看，则与戏曲家早年接受的蒙学教育有关，传统蒙学教材大都是整齐、对偶、押韵的诗歌，这种诗歌教育对戏曲语言的生成具有深远影响。总之，明清文人士子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 文学教育 戏曲文学的生成 戏曲故事 戏曲叙述 戏曲语言

(中图分类号) I207.309; G40-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23-08

一、引言

明清时期的文人戏曲作家，往往首先是诗歌、古文和八股的写作者，然后才是戏曲的写作者，因此，他们自幼及长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便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丰厚的培养基。

明清文人士子接受文学教育的阅读书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宋元以后社会上广泛流行的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蒙求》、《幼学琼林》等；第二，科举考试用书，如“四书”、“五经”及其相关注本，八股选本等；第三，经典的历史书籍，如《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之类；第四，通行的诗文作品，如《楚辞》、《文选》、唐诗宋词选本、唐宋八大家文选之类；第五，通俗文学作品，如戏曲、小说、弹词等。所有这些，基本上构成了明清时期文人士子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文学教育的阅读书目。

在所有这些书籍中，对文人士子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蒙学教材。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启蒙文学教育，为文人士子锻铸了基本的文学知识结构，培育了基本的文学思维方式，养成了基本的文学表达方式。本文即拟以明清蒙学的教育内容及其教育效果作为主要对象，从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三个方面，分别考察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生成、发展及传播”（项目批准号：05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二、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

王国维（1877-1927）《戏曲考原》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1](P163)}没有故事就没有戏曲，尤其是没有戏曲文学。故事无疑是戏曲文学生成的核心内容。那么，在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中，文人士子如何获取有关故事的文学知识呢？

明清蒙学教材中，有一类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韵语知识读物，张志公（1918-1997）《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将它们分为三类，即掌故类、历史类和各科知识类。^{[2](PS2-75)}其中前两类读物，一般用对偶押韵的句子，讲授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成为文人士子接受故事教育和历史教育的基础。作为重要的蒙学韵语知识读物，问世于中唐的李瀚《蒙求》一书，^[3]在宋、元、明几百年之间，因“取其韵语易于训诵”，“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3](卷 14, P424)}此书清代仍然流传，如嘉庆时张海鹏（1832-？）编《学津讨原》即收入《蒙求》。因此本文拟以《蒙求》为例，说明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关系。

《蒙求》现存通行本共2384字，除去最后四句16字为结束语外，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讲一个掌故，总计592个掌故。这些掌故，除了一些纯知识性的材料如“杜康造酒，仓颉制字”、“蒙恬制笔，蔡伦造纸”之类，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也包括一些传说人物故事和神话、志怪、寓言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数出自于史书（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此外还见于杂传（如《列女传》、《列仙传》、《高士传》等）、子书（如《论语》、《庄子》、《韩非子》等）、笔记（如《世说新语》、《搜神记》、《异苑》、《齐谐记》、《幽冥录》、《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

作为文人士子启蒙文学教育的重要读本，《蒙求》从两方面促成了戏曲故事的生成：在历史故实方面，《蒙求》的人物故事为文人曲家的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寓言旨趣方面，《蒙求》的伦理内涵为文人曲家的戏曲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早在东汉时期，扬雄（前53-后18）和班固（32-92）就先后以“实录”称许司马迁（前145-？）的《史记》，此后中国古代以史传为代表的叙事传统便一直标榜“尚实”倾向。影响所及，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叙事也以“实录”为典范，明清时期的戏曲叙事也不例外，如王骥德（1524-1623）指出：“大雅之士”创作戏曲，“多本古史传杂说略施丹墨，不欲脱空杜撰”；^{[4](卷 3, P147)}胡应麟（1551-1602）也说：“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5](卷 41, PS56)}

文人士子喜好根据正史杂传编撰戏曲故事，而童蒙时期所阅读的掌故类读物正好为他们的戏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有200多种戏曲作品取材于《蒙求》中的92个故事，这个数字占《蒙求》掌故总数的15.5%。如果再加上取材于《蒙求》故事的元代杂剧作品，这个数字还要大大增加。^[6]如“博望寻河”，有舒位（1765-1815）《瓶笙馆修箫谱·博望访星》、李文瀚（1805-1856）《株尘轩曲·银汉槎》；“周处三害”，有朱权（1378-1448）《豫章三害》、黄伯羽《蛟虎记》、潘口《跃剑记》、范希哲（清康熙间人）《叙瑞记》（一名《仲庸解》）；“韩信升坛”、“漂母进食”，有沈采（明弘治、正德间人）《金记》、李开先（1502-1568）《登坛记》；“西施捧心”、“范蠡泛湖”，有汪道昆（1525-1593）《陶朱公五湖泛舟》、梁辰鱼（1519-1591）《浣纱记》、翀圆生《浮鸥记》、徐石麒（?-1675后）《浮西施》；“苏武持节”，有祁彪佳（1602-1645）《金节记》、范震康《叙卿记》、曹大章《雁书记》、黄治（清嘉庆、道光间人）《雁书记》；“闵损衣单”，有沈璟（1553-1610）《孝记·衣芦御车》、汪湛溪《孝义记》、阙名《芦花记》；“屈原泽畔”、“渔父江滨”，有阙名《屈大夫江潭行吟》、徐应乾

^① 关于《蒙求》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颇有歧义。本文取傅璇琮之说，参见傅璇琮：《寻根溯源：〈蒙求〉流传与作者新考》，《寻根》2004年第6期，第58-64页。

^② 《蒙求》故事与金元杂剧创作的关系，比明清时期更为密切。对此，笔者将另撰一文加以论述。

(明崇祯间人)《阳罗记》、袁于令(1592-1674)《阳罗记》、吕天成(1580-1618)《呻女记》和《双栖记》、尤侗(1618-1704)《读离骚》、郑瑜(清康熙间人)《阳罗江》、周乐清(1785-1855)《补天石·纫兰佩》、胡盍朋(1826-1866)《阳罗沙》；等等。而“文君当垆”、“相如题柱”，更有朱权《卓文君私奔相如》、朱有燉(1379-1439)《汉相如献赋题桥》、孙柚(1540-约1614)《琴心记》、袁于令《鹔鹴裘》、黄燮清(1805-1864)《茂陵弦》、朱凤森(1776-1831)《才人福》等二十多种戏曲作品。由此可见，文人曲家童蒙时期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故事，为他们的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文学教育对戏曲文学生成的潜在制约。

这种潜在制约也表现在《蒙求》故事的伦理内涵为文人曲家的戏曲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即通过对前贤往事的称述，以传达伦理思想。“借事抒情，事为情用，以情为体，以事为用”，这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体现出一种“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的叙事价值观。^{[4](P39-40)}戏曲叙事也不例外。王骥德说：“古人往矣，吾取古事，丽今声，华袞其贤者，粉墨其慝者，奏之场上，令观者藉为劝惩兴起，甚或扼腕裂眦，涕泗交下而不能已，此方有关世教文字。”^{[4](卷4.P160)}

总括来看，为明清戏曲作家所取材的92个《蒙求》故事的伦理内涵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忠、孝、节、义等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功名际遇与风流韵事为代表的文人文化趣味。从启蒙文学教育时期开始，文人士子就长期受到传统伦理观念与文人文化趣味的滋养和熏陶，形成了一种知识结构的定势，促使他们在讲述戏曲故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以此作为他们的创作动机或创作主旨。揄扬《蒙求》故事中的传统伦理观念，如朱鼎(明末人)《金镜台记》取材于《蒙求》中的“王导公忠”、“祖逖誓江”、“太真玉台”等故事，第一出《奸场》云：“扶植纲常，维持名教，中流砥柱。”^[4]冯梦龙(1574-1646)《醒世恒言》取材于《梁冀跋扈》故事，卷首叙》云：“令当场奏伎，虽妇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传奇之衮钺，何减春秋笔哉！世人勿但以故事阅传奇，直把作一具青铜，朝夕照自家面孔可矣。”^[4]发挥《蒙求》故事中的文人文化趣味，如梁辰鱼《浣纱记》第一出《嫁门》云：“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4]孙柚《琴心记》卷末收场诗云：“才子文章冠今古，佳人倾国更知音。花间每忆相思调，月下常追隔壁琴。分散莫嫌清夜怨，团圆须记《白头吟》。谁人为写云和曲，落魄孙生万古心。”^[4]

综上所述，在启蒙文学教育中，文人士子所获取的有关故事的文学知识，既包括“事”的内容，也包括“义”的内容，并进而培育了他们“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的文学创作理念，从而促成了独特的“戏剧之道”，即“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4](卷3.P154)}使大量的戏曲文学作品应运而生。

三、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的生成

有了故事，有了讲述故事的旨趣，并不等于就有了戏曲文学作品。戏曲文学的生成，还有赖于作家具体的叙述行为，即作家如何讲述故事，或者说如何创建一部戏曲作品的叙事结构。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文学教育主要是诗文教育，因此他们的文学思维方式往往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于是，当他们投身于戏曲文学创作时，首先便面临着两个棘手的难题：一是如何由诗文作品的短篇结构转向戏曲文学的长篇结构，一是如何由诗文作品自说自话的自述体转向戏曲文学代人为言的对话体。这两个难题恰恰是戏曲叙述的关键问题。那么，何种文学思维方式足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两大难题提供有效的途径呢？

我们看到，与此前以往的文学教育不同，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子大多在幼童时期就接受了八股教育，而他们在八股教育下形成的独特文学思维方式，以其无可替代的强势极大地制约着戏曲叙述的生成。^①早在明嘉靖年间，徐渭(1521-1593)就批评邵璨(成化、弘治间人)的《香囊记》传奇“以时文为南

^①关于八股文与明清戏曲之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看黄强：《八股文与明清戏曲》，《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曲”，并指出：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更是“无一句非前场语”，有“今人时文气”。^{[11] (P243)} 所谓“时文”即八股文；所谓“前场”，即科举考试中考八股文的第一场，所以“前场语”即八股文之语；所谓“时文气”则指八股文所表现的思维方式。^{[12] (P5-12)}

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是最重要的仕进之途，而八股文则是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最重要的文章体裁。因此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学习、阅读和写作八股文都是核心内容；在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中，八股文也是必修之学。学童由启蒙开始即以“四书”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为八股文写作培育基础，并进而学习写作八股文。在社会上，图书出版、销售、阅读市场也普遍出现“八股化”现象，明嘉靖间李濂（正德九年 [1514] 进士）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13] (卷 105, P1034)} 正由于此，从幼童时期起，通过长期系统的或比较系统的教育，八股文对文人士子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情致心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度渗透，从而养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和写作习惯。明于慎行（1545- 1607）说：“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染，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箧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矣。”^[14] 清施补华（1836- 1890）说：“少习时文，操之太熟，声律对偶，把笔即来，如油渍衣，湔除不去。”^{[15] (P307)}

那么，八股教育所形成的文学思维方式与戏曲叙述的生成有何直接的因缘关系呢？

首先，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为戏曲的长篇叙事结构所借鉴。对此，张衡（清乾隆间人）《芙蓉楼传奇偶言》说得最为简捷：传奇“数十出中，回环照应，打成一片，是真一大八股也”。^{[16] (卷首)} 胡适《白话序》也曾指出：明清两代的传奇都是八股人用八股文体作的。每一部的副末开场，用一支曲子总括整个故事，那是“破题”。第二出以下，把戏中人一个一个都引出来，那是“承题”。下面，戏情开始，那是“起讲”。从此下去，一男一女，一忠一奸，面面都顾到，红的进，绿的出，那是八股正文。最后大团圆，那是“大结”。^{[17] (P438)}

八股文的组织结构方式与戏曲结构的生成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像胡适说的那么简单，但是其中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文人曲家从小接受的八股写作基本训练及其思维方式，的确有助于他们提高结构故事的能力，从而创作出一部篇幅较长而结构严谨的戏曲作品。李渔（1611- 1680）深谙其中三昧，在谈到传奇戏曲结构方式时，便常常以八股思维为譬喻，例如他说：“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即古文之冒头、时文之破题，务使开门见山，不当借帽覆顶。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前是暗说，后是明说，暗说似破题，明说似承题。如此立格，始为有根有据之文。”^{[18] (卷 3, P66)} 又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留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收场一出，即勾魂摄魄之具，使人看过数日而犹觉声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亏此出撒娇，作‘临去秋波那一转’也。”^{[18] (卷 3, P69)}

如果说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形成了戏曲叙述的表层结构，那么，八股文“代圣人立言”的文体特征则造就了戏曲叙述的深层结构，后者更是戏曲文学生成的关键。明末倪元璽（1593- 1644）最早揭橥代言体是戏曲与八股的共同特征，指出：“文章之道，自经史以至诗歌，共禀一胎，要是同母异乳，虽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词剧，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盖其法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则同。而八股场开，寸毫傀舞；宫音串孔，商律谱孟。时而齐乞邻偷，花唇取诨；时而盖驩鲁虎，涂面作嗔；净丑旦生，宣科打介则同。”^{[19] (P89)} 据此，钱钟书（1910- 1998）概括道：“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扶圣贤之心……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20] (P32-P360)}

八股文写作大多是从“四书”中选择一句话或一段话为题，要求作文者“代古人语气为之”。^{[21] (P193)} 所以作八股文大多要“入口气”，即模仿古人的口吻，“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肖其口吻以为文”。^{[22] (P227)} 如沈位（1529- 1572）就指出：“作文须设以身处其地，目击其事，体贴一段精神出来。如告君父，

须写出忠君意思；如论事势，须写出利害意思；如论小人，须写出巧媚隐伏意思；如论君子，须写出平易坦实意思。”^[23]（《理学汇编·文学典》卷 1, P77576）据此，焦循（1763- 1820）认为：“八股入口气，代其人论说，实原本于曲剧”，^[24]（卷 17, P385）其说不当。因为众所周知，代言一法早已见之于《庄子》、《史记》诸书，^①并不是元杂剧的首创。而且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自上而下的渗透是文化交流的常态。在明清时期，八股无疑是强势文化，戏曲作为“词余”只能是弱势文化。因此，当八股教育蔚为时风之际，与其说文人的八股写作取资于戏曲代言，不如说文人的戏曲写作瓣香于八股代言。

例如，“设身处地”是代言的基本原则，用八股文的术语，就是讲究“体认”的工夫：“体认者，谓设以身，处其地，处其时，而体认其理也。”^[25]（卷 6 引杜静台言）“凡代一人说话，即欲肖一口吻。如圣人、贤人、狂士、隐士、权臣、佞臣，其口吻各有不同，作此题文，即欲设身处地，如我身实为此人。由此发为文字，无不入神入化矣。”^[26]（卷 6 引梁素治言）而八股文这一“设身处地”的原则一旦养成文人士子的思维定势与写作习惯，就为文人曲家塑造戏曲人物提供了极其便利的艺术方式，从而促成了戏曲文学叙述的生成。^②所以王骥德要求，戏曲曲词“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我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27]（卷 3, P138）李渔倡导：“心之言者，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18]（卷 2, P54）

当然，戏曲如果仅仅像八股那样一味地“代圣贤立言”，那就只能塑造出行同木偶的泥人土马，而不可能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明清戏曲中大量存在类型化人物形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八股教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对文人曲家的深远影响。而高明的戏曲作家则善于汲取八股代言的构思方式和表现精神，实现作家与人物之间精神的沟通，即刘大櫆（1698- 1779）所说的“追古人神理于千载之上”，^[28]（P612）从而做到王世贞（1526- 1590）所称道的“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29]（P33）换句话说，八股代言一般讲究模仿以圣贤为主的类型化人物，而成功的戏曲代言则明确要求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人物，后者正是八股教育的先天不足，有赖于文人曲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厚的艺术资源。

四、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的生成

其实，在明清时期，八股教育与戏曲文学表达方式、尤其是戏曲语言的生成方式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传奇戏曲兴起时，文人戏曲创作一变宋元以来南曲戏文质朴古拙、甚至“鄙俚浅近”的语言风格，^[30]（卷 3, P151）刻意追求典雅绮丽，形成文词派戏曲。^③徐渭在批评“以时文为南曲”的现象时，便认为邵璨“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更是“无一处无故事”。^[31]王骥德批评郑若庸（1490-1577）《玉玦记》，说：“句句用事，如盛书柜子，翻使人厌恶。”^[32]（卷 3, P127）沈德符（1578- 1642）批评梅鼎祚（1549- 1615）《玉合记》，也说：“宾白尽用骈语，顿钉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语，正如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欲博人宠爱，难矣。”^[33]（P204）

总体上看，文词派这种“好用故事作对子”的文学表达方式的确是“以时文为南曲”的产物。弘治至嘉靖年间的八股文表现出“以实盛”的特点，^[34]（卷 6 引徐存庵语）即“句句有实理”，^[35]（卷 1 引李光地《榕村语录》）“无一

① 明董其昌《论文》一文释“代”字法云：“代者，谓以我讲题，只是自说，故又代当时作者之口，代写他意中事，用谓注于不涸之源”，并举《庄子》、《史记》为例。见《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卷 181《经义部》引。“代人作语”在古代诗歌写作中也颇为常见，参见蒋寅：《论角色诗》，《文学遗产》1992 年第 3 期。

② 关于戏曲代人立言的详细论述，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 196- 203 页。

③ 关于文词派的构成和演变，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 60- 64 页；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第 121- 127 页。

字无来处”。^[29](卷1录闻若璩《晋书礼记》引顺炎武语)如弘治时八股文大家钱福(1461-1504),就擅长对“名物制度之繁”“考据精详”。^[30]嘉靖时归有光(1506-1571)的八股文,也以“稽经而诹史”为特征,^[31]“每用六成语,如天造地设”。^[32]八股文写作讲求用事、深于典实的主导风尚,无疑成为文词派戏曲文学生成的强烈激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徐渭将“好用故事作对子”和“无一处无故事”作为断定嘉靖年间文人曲家“以时文为南曲”的主要依据。时风所趋,文人曲家甚至以类书为传奇,臧懋循《元曲选序》说:“至郑若庸《玉玦》,始用类书为之,而张伯起(按,即张凤翼)之徒,转相祖述为《红拂》等记,则滥觞极矣。”^[33](P3)

再进一步看,这种“好用故事作对子”的文学表达方式早已在文人士子接受启蒙文学教育时已经习得养成。如前所述,《蒙求》之类韵语知识读物是明清时期启蒙教育的重要读本,而《蒙求》全书就是“用故事作对子”编成的,如开篇道:

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匡衡凿壁,孙敬闭户。郅都苍鹰,宁成乳虎。周嵩狼抗,梁冀跋扈。郗超髯参,王珣短簿。伏波标柱,博望寻河。李陵初诗,田横感歌。武仲不休,士衡患多。桓谭非谶,王商止讹……

全书除最后四句结束语以外,都是以上下两句各讲一个掌故,构成对偶,每句均有出处,这正是“用故事作对子”的典范。

经由启蒙教育,《蒙求》之类韵语知识读物的这种文学表达方式积淀为文人士子的深层学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制约着他们的文学写作。因此当文人曲家创作戏曲时,便习以为常并得心应手地运用骈四俪六的语言表达方式,“词白工整,尽填学问”,^[34](卷下,P170)正如王骥德所说的:“然文人学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其体遂不能废,犹古文六朝之于秦汉矣。”^[35](卷2,P122)我们试摘录梁辰鱼《浣纱记》第四十五出中西施的一段对白,以见一斑:

妾乃白屋寒娥,黄茅下妾。惟冀德配君子,不意苟合吴王。摧残风雨,已破豆蔻之梢;断送韶华,遂折芙蓉之蒂。不堪奉尔中馈,未可充君下陈。^[36](P157)

其文使事用典,对偶工切,这不正是“好用故事作对子”的典范吗?

而且,《蒙求》每两句一组,平仄基本相对,每八句一节,押一个韵,平声韵与仄声韵互相交替,所有这些都符合长篇四言诗的格律要求,所以前人将它收入《全唐诗》卷八八一中。因此,教授《蒙求》实际上成为教授学童诗歌的一种渠道。传统的童蒙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也都有类似的特点,大都是整齐、对偶、押韵的诗歌。^①与此相辅相成,明清人编了不少有关声律的启蒙读物,如明司守谦(生卒年未详)《训蒙骈句》,清康熙间车万育(1632-1705)《声律启蒙》、李渔《笠翁偶集》等,也大都讲究声律与对偶,而句式更为灵活多变。这些歌诀式的书籍在童蒙教育中颇便实用,启功先生(1912-2005)说:“童蒙读起来可以懂得字、词、句怎样相对,又可从长短句的配搭受到声调和谐的启发。不但有三字、五字、七字句,也有四字、六字句。念熟了,背惯了,就无形中打下了作诗作赋的基础。再结合换字方法,运用这里的任何句式都可以翻出不同的对联。韵脚都是平声,作为歌诀比较好念,而其中每个‘上句’又都是仄脚,倒过来就是仄韵的句子,把仄脚的句子用在‘下联’,便是仄韵的对联或仄韵的诗文的句子。”^[36](P27-28)

在启蒙文学教育中,属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包含着词汇、声律、句法、典故等各方面综合的文学训练,为童蒙的文学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成为明清时期文人诗文写作主要的文学表达方式。八股文“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37](卷39)其源亦出于此。这种诗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对戏曲语言生成的影响更是极其深远的。例如李渔是一位积极提倡“以俗为美”的戏曲作家,极力主张戏曲语言

^① 据统计,《千字文》计125组,对偶句有85组,占68%。见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第184页。

应“于浅处见才”，^{[18](卷1,P28)}少用典故。但即使如此，他甚至在宾白写作中，也非常讲究“声务铿锵”，注意“平仄、仄平”的声调变化，^{[18](卷3,P52)}并运用多变的句式，构成灵活的对仗。试举《镇鸾交》第二出《送远》主角华秀出场的一段独白，以概其余：

小生外似风流，心偏持重。也知好色，但不好柔弱之色；亦解钟情，却不钟偷外之情。我看世上有才有德之人，判然分作两种：崇尚风流者，力排道学；宗依道学者，酷诋风流。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18]
(下册,P424)

在散体中夹杂着对偶的语句，在对偶中流荡着散体的神气，这种亦骈亦散的文体恰恰体现出明清文人追求的审美韵味。

清初黄周星（1611-1680）曾说：“曲为诗之流派”，^{[39](P120)}这一认识揭示出诗歌教育与戏曲文学生之间的潜相交通。启蒙诗歌教育对文人学士的戏曲创作影响极深，即使从上述所举的一些例证中，我们也可见一斑。

五、结语

在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的关系虽然贯穿始终，但却因人而异，在不同的戏曲作家身上显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邵璨的戏曲写作得益于《诗经》、杜诗和八股，^[11]梅鼎祚的戏曲写作“词调组诗而成”，^{[34](P239)}蒋士铨（1735-1785）的戏曲写作“独以古文法律行之”，^{[40](卷首)}等等。由此可见，戏曲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戏曲作品的不同特征，也可以从作家所接受的不同文学教育中寻求某些答案。

而且，在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的关系虽然贯穿始终，但却随时而异，不同时代的戏曲文学生方式各有特色。例如，在明正德、嘉靖年间，戏曲文学的生成与八股文教育关系最为密切；在万历年间，戏曲文学的生成则与传统的诗古文辞教育联系最深；在明末清初，戏曲文学的生成更多地得益于戏曲家对通俗文学、尤其是话本小说的浸淫；到清康熙、乾隆年间，戏曲文学的生成则瓣香于诗古文辞与八股文的综合教育；如此等等。要之，不同时代的文学教育与文学风气，形成戏曲文学的不同生成机制，并在戏曲文学创作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但是从总体上看来，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仍有着一以贯之的深层联系，即明清时期文人士子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生成的催化剂，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深入发掘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生成的密切关联，可以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口，观赏精彩纷呈的戏曲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参考文献】

- [1] 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编.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 [2] 张志公.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2.
- [3] 陈振孙撰, 徐小蛮、顾美华校. 直斋书录解题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4] 王骥德. 曲律 [M].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4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5]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M]. 上海: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 [6] 郭英德. 明清文人传奇戏曲文体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7] 朱鼎. 玉镜台记 [M].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C] 影印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4-1955.
- [8] 冯梦龙. 酒家佣 [M].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C] 影印明崇祯间墨憨斋刻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4-1955.
- [9] 梁辰鱼. 浣纱记 [M]. 绣刻演剧 [C] 所收明万历金陵富春堂刻本. 明万历间汇刻本.
- [10] 孙柚. 琴心记 [M].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C] 影印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4-1955.
- [11] 徐渭. 南词叙录 [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3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12] 马琳萍. 《香囊记》与八股文关系之研究 [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5.
- [13] 李濂. 纸说 [A]. 黄宗羲编. 明文海 [C].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7.

- [14] 于慎行撰, 郭应宠编. 穀山笔麈 [M]. 清康熙十六年 (1677) 补刻本.
- [15] 施补华. 与吴挚甫书 [A]. 施补华. 泽雅堂文集 (卷 2) [M].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第 1560 册) [C] 影印清光绪十九年 (1893) 陆心源刻本.
- [16] 张衡. 芙蓉楼 [M]. 清乾隆辛亥 (五十六年, 1791) 原刻本.
- [17] 蔡毅. 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 [18] 李渔. 闲情偶寄 [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 7 册) [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19] 倪元璽. 孟子若桃花剧序 [A]. 郑超宗辑. 姮幽阁文娱 [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第 172 册) [C] 影印明末刻本.
- [20] 钱钟书. 谈艺录 (补订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1] 张廷玉. 明史 (卷 160)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2] 商衍鑑.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 [23] 沈位. 文要模写 [A]. 古今图书集成 [C]. 北京: 中华书局、成都: 巴蜀书社联合出版, 1985.
- [24] 焦循. 易余籥录 [M]. 王德毅等. 丛书集成续编 (第 29 册) [C].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 [25] 唐彪. 读书作文谱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9.
- [26] 刘大櫆. 时文论 [A]. 吴孟复标点. 刘大櫆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27] 王世贞. 曲藻 [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 4 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28] 沈德符. 顾曲杂言 [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 4 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29] 梁章钜. 制义丛话 [M]. 清咸丰九年 (1859) 重刻本.
- [30] 俞长城. 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序 [A]. 俞长城编. 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稿 (卷首) [C]. 清乾隆三年 (1738) 文盛堂刻本.
- [31] 方苞. 欽定四书文·正嘉四书文 [C].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2] 吕留良. 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 [M]. 清康熙五十三年 (1714) 吕氏家塾刻本.
- [33] 蔡懋循编, 隋树森校点. 元曲选 (卷首)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34] 吕天成著, 吴书荫校注. 曲品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5] 梁辰鱼. 流纱记 [M]. 毛晋六十种曲 (第 1 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6] 启功. 说八股 [M]. 启功等. 说八股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37] 吴宽. 送周仲瞻应举诗序 [A]. 吴宽. 鲍翁家藏集 [M]. 四部丛刊本.
- [38] 李渔. 慎鸾交 [M]. 笠翁传奇十种 [C].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李渔全集 (第 5 卷) [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 [39] 黄周星. 制曲枝语 [M].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 7 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40] 罗聘. 论文一则 [A]. 蒋士铨. 香祖楼 [M]. 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 红雪楼刻本.

责任编辑: 王法敏

论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特色

谢雍君

[摘要] 在明清时期，阅读戏曲作品和观赏戏曲演出是女性接受情感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至情”的哲理启发、情爱的心理感染和自觉的伦理意识，构成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文化内涵。同时，借助于戏曲演出的直观性和戏曲语言的通俗性，戏曲女性情感教育利用唱念做打等多种表演手段，充分发挥“能感人”的审美功能。与其他文学艺术样式相比，戏曲女性情感教育具有显著、广泛、深层、持久和潜移默化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 女性情感教育 明清戏曲 文化内涵 审美功能 社会效果

[中图分类号] I207.309: G40-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31-07

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盛行于世，成为当时女性接受情感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从媒介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有文本传播方式和非文本传播方式两种基本模式。戏曲艺术包括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案头剧本和以舞台形象表现出来的现场表演，因此它兼有文本传播方式和非文本传播方式两种教育模式，足以产生相当广泛和极其强烈的教化移情效果。尤其是对于普遍处于文盲状态的下层平民女性来说，在传统的女训教育和诗文教育都无法达到有效的教育目的时，呈现为舞台形象而不是文字形式的戏曲艺术能够有效地达到这种教育目的。戏曲艺术以广大的城镇和农村为衍生地和传播地，与有着较为深厚教育积淀的男性相比，它在面对严重缺乏教育积淀的女性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接受戏曲教育的程度会远远大于男性。戏曲艺术正是在重言情、擅传情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情感教育功能。

明清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主要通过阅读方式或观赏方式接受情感教育，具体体现为阅读女教读物、阅读诗文作品、阅读通俗小说、听讲通俗故事（如说话、弹词、宝卷等）、阅读戏曲作品或观赏戏曲演出等五种方式。在这五种接受方式里，戏曲女性情感教育在文化内涵、审美功能、社会效果等方面表现出极其鲜明的特色。

一、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传统的女子教育以培养相夫教子、料理家务的女子为其目的，主要偏重于妇德妇职教育。“四德与三从，殷殷勤教汝。婉顺习坤仪，其余皆不取。”^①清梁兰猗的《蝶女》诗道出了古代千千万万女性对传统女子教育中妇德妇职教育的认可与赞同。正统女教以道德教育为核心，涉及知识教育、艺术教育、劳作教育和母范教育等，而情感教育却很少涉及。也就是说，传统的女教读物一般只言“德、容、功、貌”，强调女性的道德修养，而不关注女性的生存地位、个性养成和情感陶冶，尤其排斥对女性的情爱教育。但是，传统文学原本有“言情”的传统，而明清戏曲更以强烈的言情抒怀特点受到

作者简介 谢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北京，100029）。

时人的喜欢，明末陈洪绶倡扬的“十分情十分说出，能令有情者皆为之死”，^[2]清初洪昇强调的“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3]皆凸显了戏曲的抒情特点。与女教读物、诗文作品、通俗小说、通俗故事等相比，戏曲的女性情感教育具有独特的哲理启发、心理感染和伦理教化的文化内涵。

在哲理启发方面，受到王守仁“心学”等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明清戏曲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肆张扬“至情”理想，赋予女性情感教育以深刻的哲理内涵。明中叶泰州学派认为：“只心有所向，便是欲”；^[4]（卷下，P28）这种人欲就是天性，“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佚，性也，乘乎其欲者也”。^[5]（第2卷，P40-41）汤显祖发扬了泰州学派的理论，以“情”为人的本性，宣称情是天地、人生自然而然的产物：“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6]（卷34，P188）而且认为情无生死之分，凡人情之所在，皆足以使“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6]（卷33，P153）一曲《牡丹亭》，就是杜丽娘和柳梦梅超越生死的情爱颂歌。在汤显祖笔下，杜丽娘被塑造成感于情而死，死不足以尽情，坚于情而生，生方得以畅情的感人形象，寄寓了剧作家宣扬个性自由的“至情”理想。明末戏曲家孟称舜继承发扬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重申“至情”理想对女子情感的启迪作用：“性情所钟，莫深于男女。而女子之情，则更无藉诗书理义之文以讽谕之，而不自知其所至，故所至者若此也。”^[7]与此相同，冯梦龙认为戏曲的形成是由于性情所至：“文之善达性情者无如诗，《三百篇》之可以兴人者，唯其发于中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用以取士，而诗入于套；六朝用以见才，而诗入于艰；宋人用以讲学，而诗入于腐。而从来性情之郁，不得不变而之词曲。”^[8]他特意为世上一切有情者编撰了一部《情史》，大声疾呼“情”的至高无上，宣称“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9]他强调戏曲具有“悦性达情”的教育功能，^[10]以“情”作为追求个性解放的航向灯，借不拘一格的爱情故事来标举个性、自由的新理念。汤显祖、孟称舜、冯梦龙等人在理论上对“至情”的强调与渲染，无异提升了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哲理内蕴。

在心理感染方面，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具备独特的动人机制。明清时期，除了《红楼梦》，大部分的讲唱文学、通俗小说在叙写两性情爱故事时，往往仅仅满足于曲折生动的悲欢离合情节，而对女性情爱心理的刻画却不甚关注。戏曲艺术具有“达其心而为言”的特点，^[11]（P267）但元代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中的爱情戏，如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施惠的《拜月亭》等，大多以悲欢离合的情节故事见长，而不以细腻深微的心理描写取胜。只有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第一次生动地展示了女性的情爱心理，因此被明人称赞为“情词之宗”，^[12]（P257）传诵千古。汤显祖的《牡丹亭》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叙事文学中女性情爱心理描写的传统，“搜抉灵根，掀翻情窟”，^[13]以奇崛之笔向观众展现了比以往爱情戏更为离奇的爱情过程，第一次完整、细致地展示了杜丽娘经典阅读和自然感发的情爱发生方式，以及情梦、自恋、情死、幽媾、复生、婚合等情爱实现方式，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女性复杂而细腻的情爱心理内涵，从而在女性情感教育方面发挥了强烈的心理感染力。比如，在《西厢记》中，王实甫对自然感发与女性情爱发生的描写，仅仅藉助于张生之口，用旁述者的口吻加以说明：“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14]（P21）而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却用一出《惊梦》细致地叙写了杜丽娘步入春光明媚的花园，受迷人春景的触动，春心荡漾，滋生起对男女恋情的向往，并在牡丹亭畔做了一个白日梦，在梦中不仅遇到了理想的爱情，而且享受了随爱情一起降临的快乐。又如《西厢记》叙写张生草桥夜梦莺莺，借男性之梦衬写女性的情爱心理：“害不了的愁怀，恰才觉些；撇不下的相思，如今又也”；“想着你废寝忘餐，香消玉减，花开花谢，犹自觉争些。便枕冷衾寒，凤只鸾孤，月圆去遮，寻思来有甚伤嗟。”^[14]（P158-160）但这样的女性情爱心理描写并不多，主要体现于第四本第四折和第五本里。而《牡丹亭》则在《寻梦》、《写真》、《魏游》、《幽媾》、《冥誓》等多出里，生动地描写了杜丽娘主动追求情爱实现的心理过程。《牡丹亭》和其他明清戏曲有关女性情爱心理的描写，对女性读者和观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心理感染和情感教育，对此，清人俞用济曾这样总结：“《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拼为他伤心到死。”^[15]（P229）

在伦理教化方面，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也展现出独特的一面。从表面上看，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伦理教化内涵似乎与传统并无二致，都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为基本要义。但在貌似相同的传统外壳下，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伦理教化内涵却隐含着新观念、新思想的萌动。这主要表现为，在明清戏曲中，女性的情爱伦理大多不是呈现为被动接受或被动遵循的状态，而是呈现为主动承担、主动追求的态势。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着力倡扬女性的主体伦理意识，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情爱意识。比如，陆采的《怀香记》、高濂的《玉簪记》、孟称舜的《娇红记》等传奇剧作，都一致认同女性婚前性行为的合理性：“备着携云握雨扁巫山，须仗你了却相思欠”，^{[16](第二十五出,P79)} 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17](第四出)} 张凤翼的《红拂记》、梅鼎祚的《合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吴炳的《牡丹记》、李渔的《凰求凤》等剧，则极力歌颂女性对婚姻自主的追求：“风流岂肯寻俗调”；^[18] 汤显祖的《牡丹亭》、吴炳的《画中人》、李渔的《比目鱼》、张坚的《梅花簪》等剧，则着力刻画女性对美好情爱理想的向往与执着：“天下只有一个情字，情若果真，离者可以复合，死者可以再生”，^{[19](第五出)} “只要一灵咬定情根在，死生患难皆无害”。^{[20](第四十出)} 因此，明清女性情感教育的伦理教化内涵透露出现代情爱伦理的某些先声，这是除《红楼梦》以外的明清通俗小说、通俗故事所不可比拟的，更是女教读物、诗文作品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由此可知，“至情”的哲理启发、情爱的心理感染和自觉的伦理意识，构成了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文化内涵，彰显出独特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审美功能

关于戏曲艺术的审美功能，清黄周星曾有这样的论述：“论曲之妙无他，不过三字尽之，曰‘能感人’而已。”^{[21](P120)} 这也是明清戏曲家的普遍认识。不仅如此，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汤来贺对于戏曲艺术所具备的感动妇女儿童的审美教育功能，更有着真知灼见：“夫歌舞之感人心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尝见幼童一睹梨园，数月之后犹效其歌舞而不忘。至于妇女未尝读书，一睹传奇，必信为实，见戏台乐事则粲然笑，见戏台悲者辄泫然泪下，得非有感于衷乎？”^{[22](P301)} 可见，明清戏曲家对戏曲艺术的审美功能的认识，不止于理论阐述，更将目光投射到其对女性群体的具体影响。

为了凸现戏曲艺术对于明清女性审美教育的独特功用，明清时期的许多戏曲作家和批评家特意将戏曲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进行比较，明确指出戏曲艺术在感动女性方面最为直接、最为真切、最有效果，是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所不可替代的。如明末茅一相将词曲与“春秋之辞令，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相比较，认为“风月烟花之间，一语一调，能令人酸鼻而刺心，神飞而魄绝，亦惟词曲为然耳”，^{[23](P38)} 强调了戏曲艺术审美功能的独特性。而刘念台则指出：“今之院本，即古之乐章。每演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虽妇人竖牧，往往涕泗横流。此其动人最切，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百倍。”^{[24](卷下)} 如果说茅一相是在戏曲与经典诗文的比较中凸显戏曲艺术独特的审美作用的话，那么，刘念台则是在戏曲艺术与通俗文学的比较中突出戏曲艺术的独特功效，他特别强调了戏曲艺术在感动女性观众方面所具备的感人至深的审美效果。明清戏曲采用了多种媒介和手段对女性进行情感教育，充分显现“能感人”这一戏曲的基本审美特征，从而发挥女教读物、诗文作品、通俗小说、通俗故事等难以企及的审美功能。

戏曲作家和批评家还把感动人情和教化人心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戏曲的教育作用是通过审美作用而达到的，戏曲艺术的观赏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教育过程。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生动地描述了观众接受戏曲艺术情感教育的过程：“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无不纤徐焕眩，顿挫徘徊。恍然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哈，或阙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观，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谊，谊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

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愤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6](卷 34, P1189)} 汤显祖所说的“天下之人”，无疑应该包括女性观众，汤显祖所阐述的观众接受戏曲艺术情感教育的过程，也即女性观众接受戏曲艺术情感教育的过程。“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指的是戏曲艺术的移情作用；“瞽者欲观，哑者欲叹，跛者欲起”等等，指的是戏曲艺术的动人效果；而“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等等，则指戏曲艺术的教化作用。可见，明清戏曲对女性观众的情感教育，是在使女性观众的感动中达到戏曲艺术的教化目的，这是审美作用和教化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由“一勾栏之上，几色目之中”的舞台演出来实现。

因此，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审美功能的实现首先借助于戏曲演出的直观性。明万历间臧懋循生动地描绘了戏剧“効人”的情景：“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并且指出这种审美效果直接来自舞台演出：“是惟优孟衣冠，然后可与于此”。^[25]

在明中叶以后，识字教育仍然很不普及，戏曲四大声腔剧种的流行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下层受众，这是以往的文艺形式所不具备的。以往的讲唱文学，因为受到表演场所的限制，不如戏曲演出普及，与此相应，其接受群体也比戏曲的受众群小。戏曲的表现场所并不局限在贵族家庭的红氍毹上，即使在宫廷、寺庙、广场上，也都有戏曲演出的影子，演出场所的多种多样，决定戏曲艺术在受众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赵山林根据清常熟王应奎《柳南文钞》卷四《戏场记》，将农村戏曲演出时观众群里女性观众的比例做了估算，认为女性观众约占三分之一。^{[26](P24)} 在农村，女性几乎都是文盲，所以，她们接受戏曲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明清时期，上层社会女性所接受的经典文学教育多以诗词文赋为主，唐宋诗词中有大量吟咏爱情的作品，贵族女性在阅读这些经典作品中，或多或少会受到情感熏陶。从这点来说，贵族女性是幸运的，因为她们可以通过诗文的阅读来获知与体会情感的本真面目。但对于下层平民女性尤其是广大农村女子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目不识丁、缺乏诗文阅读的环境下，戏曲艺术成为她们最容易接触的文学艺术样式。戏曲艺术凭借唱、做、念、打的多种表演方式和直观、立体的舞台形象，对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女性观众产生影响，令她们通过形象的舞台演出来接受戏曲艺术生动而感人的情感教育。对此，李渔的概括最准确、到位：“窃怪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诚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27](卷 1, P5)} 戏曲艺术“借优人说法”，发挥场上演出现实的直观性特征，通过耳口相传的方式，对女性观众施行直接而便捷的情感教育。

其次，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审美功能的实现还借助于戏曲语言的通俗性。

中国戏曲观众对象具有广泛性，以广大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戏曲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欣赏需要，造成并决定着戏曲文学通晓易懂的语言风格。戏曲语言通晓易懂的特征，是与女性观众的文化水平密切相关的。明徐渭认为，戏曲语言“越俗越家常越警醒”，^[28] 这是因为“失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29](P243)} 王骥德也提到：“白乐天（白居易）作诗，必令老嫗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作剧戏，亦须令老嫗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30](卷 3, P154)} 可见，戏曲语言风格的通俗易懂，是以“奴童妇女”、“不读书之妇人小儿”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作为审美尺度的。与传统文章语言的“不怪其深”不同，戏曲语言呈现出“贵浅不贵深”的特质。^{[27](P21)}

事实上，具有通俗性语言特征的戏曲艺术，最便于对女性观众进行情感教育。清中叶以后，尽管“梨园共尚吴音”，但花部乱弹仍然取代雅部昆曲，在民间广为流行。从审美功能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而花部“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31](P225)} 所谓“虽妇孺亦能解”，说的就是妇女儿童易于通过观赏花部戏曲接受情感教育。另据天津方志记载，静海县一带流行“哈哈腔”，“其扮演皆社会浅近之事；其声调柔和婉转；其词句明显质白、俗中生雅，如‘富贵与共’，则唱为‘有朝一日坐了天合下，你坐朝来我

坐廷’等语，以此类推，故妇孺最易感动”，^{[32](P75)}强调的仍然是通俗的戏曲语言对广大妇女的影响作用。由此可见，戏曲语言通俗易懂，能够直接感动妇女儿童，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教育效果。

三、明清戏曲女性情感教育的社会效果

在明清时期，戏曲艺术是大众娱乐的重要部分，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使得戏曲教育的社会效果呈现广泛的、深层的、持久的、潜移默化的，而不是局部的、表面的、短暂的、立竿见影的特点。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幸福的人绝对不会幻想，只有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人才会幻想。得不到满足的愿望是幻想的驱动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一个对不予人满足的现实的矫正。”^{[33](P331)}明清女性读者和观众在戏曲的审美阅读和审美观赏过程中属于审美主体，审美主体在心造的艺术对象——戏曲艺术中可以发现自我并且实现自我，以幻证真、以虚当实地获得现实中得不到的快慰和满足。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以自己想像的方式设计自己的人生，而这种想像的方式来源于文化传统，尤其是来源于文学艺术传统。法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甚至断言：“生活模仿艺术远多于艺术模仿生活。”^{[34](P19)}重塑人生，再造人生，这恰恰是文学教育的真谛。生活成就了文学艺术，同时，文学艺术再造了生活。女性读者和观众在阅读与观赏戏曲作品时，可以进一步以戏曲作品中所叙写的“事”与所塑造的“人”作为现实生活典范，从而使戏曲阅读与观赏活动产生强烈的模仿效应。

明清戏曲的女性情感教育鲜明地体现出这种模仿效应。洪昇的表弟钱肇修之妻林以宁曾说：“乐之用，莫切于传奇。愚夫愚妇，每观一剧，便谓昔人真有此事，为之快意，为之不平，于是从而效法之。彼都人士，诵读圣贤感发之书，有所不及。”^[35]明清时期的“杜丽娘迷”就视杜丽娘为正面的学习效仿对象。例如，受杜丽娘写真、题诗的启发，明末才女冯小青临死前曾邀请画师为自己画像留影，多次易稿，直到“极妖艳之致”才作罢。随之她“取图供榻前，爇名香，设梨酒奠之”，“几而泣，泪雨潸潸下，一恸而绝”。她为《牡丹亭》所题的诗：“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道出了她如杜丽娘般的痴情与被情所伤后的无奈和绝望——“欲求如杜丽娘牡丹亭畔重生，安可得哉！”^{[36](卷 1.P15-16)}又如，清康熙间史震林《酉阳散记》卷二记载凤歧的话：“近有二女并坐读《还魂记》，俱得疾死。一少妇看演杂剧，不觉泣下。此皆缘情生感，缘感成痴。人非木石皆有情，慧心红粉，绣口青衫，以正言相劝，尚或不能自持，况导以淫词，有不魂消心死者哉？”^{[37](卷 2.P29)}讲述的依然是女性效仿杜丽娘的故事。

由于情爱戏剧对女性造成了广泛而直接的模仿效应，因此引起了许多封建卫道者的恐惧。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汤来贺记载：“迩来各乡从前质朴者，因演戏而习冶容矣。闻某村演戏，席罢之后，妇女逐优人而去矣。又见有嗜戏之家，处子怀孕，淫乱非常矣。”^{[38](P301)}明崇祯间张采也记录：“游民四五月间，二麦登场时，醵人金钱，即通衢设高台，集优人演剧，曰‘扮台戏’。其害，男女纷杂，方三四里内多淫奔。”^{[39](卷 5)}清代更有许多史料披露了情爱戏剧对民间女性产生的强烈情感教育效应。如，清乾隆时人钱德苍说：“戏之忠孝节义者少，偷情调戏者多，妇女观之，兴动心移，所关匪细，不可不慎。”^{[40](卷 8)}

《厦门志》卷 15 记载：“厦门前有《莺镜传》，演泉人陈三诱潮妇王五娘私奔事，淫词丑态，穷形尽相。妇女观者如堵，遂多越礼私逃之案。”^[41]余治记载，宁波城乡每逢庙会，“其所作戏剧，只有一丑一旦，非勾诱通奸，即私奔苟合，丑态万状，淫曲千般，哄动就地男妇人等，挨肩擦背，混杂其间，从此淫风流行，言难胜述。”由此他感慨道：“盖淫戏一演，四方哄动，男女环观，妖态淫声，最易煽惑，遂致青年子弟，璇阁姬妾，牵惹情魔，难完白璧。是国家岁旌节孝千百人，不及淫戏数回之观感为尤捷也；是千百正人君子扶之而不足者，一二贱优狎客败之而有余也。”^{[42](卷 11)}梁恭辰还记载了他亲耳所闻的实例，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浙西某县某乡，演滩簧小戏八台，一月内，本地寡妇有六人再嫁，其中有守寡十余年仍然改嫁者。又有一官家女儿，年已 23 岁，尚未许配人家，亦因此随跟班逃去。当时有俗语说：“滩簧小戏演十出，十个寡妇九改节。”^{[43](卷 6)}同样记载又见于余治：某乡竟“因演滩簧数日，两月内届指其地寡妇再醮者十四人，多系守节有年一旦改志者。更有守节十余年，孤子年已近冠，素矢不嫁，而忽焉不安其室托媒改醮者”。^{[44](卷 11)}

上述史料说明，在明清时期，不管是妇女私奔，还是寡妇改节，都是有违传统礼教规范的，但是私奔、改节的妇女宁愿受到正统社会的谴责，也要遵从内心的情感需求，依照戏曲情爱剧的婚姻、恋爱模式去寻找自己的真正幸福，可见戏曲艺术对女性所造成的情爱教育，有着强烈的社会效应。

在明清时期，与男性可以到私塾或官学接受教育不同，一般情况下女性只能在闺阁内接受教育，教育空间的限制导致了女性缺乏对社会甚至现实世界的认识、了解和沟通。而戏曲艺术属于由公众参与的剧场艺术，是呈现在舞台这一特殊空间内的一种表演活动，不管这个空间是庙会、戏馆还是厅堂，女性参与其中就意味着她们走出了闺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一份子。当女性走出闺阁，加入到戏曲观众的行列时，对她们来说，变换的不仅仅是局部的生活场所，而是整体的人生视野。

走出闺阁，对明清女性来说意味深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它带来的是教育理念、教育模式和教育效果的重大改变。如果说，诗词文赋的教育带给女性彼岸的理想慰藉，那么，源于民间、由真人扮演的戏曲艺术，则给女性带来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剧目的丰富内容和演员的穿着打扮、身段唱腔，为她们打开了睁眼看世界的一扇窗口，使她们呼吸到一股新鲜的空气。在庙会、戏馆或厅堂中直接观赏戏曲艺术时，女性在短暂地享受到与男性相同的社会权力、体会到暂时的地位平等所带来心灵狂欢的同时，获得了与闺阁教育迥然不同的文化熏陶和情感体验。可见，戏曲艺术有效地扩大了女性情感教育的空间，成为女性与社会进行文化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重要通道，它是构成女性完整的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参考文献]

- [1] 梁兰猗.课女 [A].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 [M].清道光十一年（1831）红香馆刻本.
- [2] 孟称舜.娇红记（第四十五出陈洪绶眉批）[M].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C] 影印明崇祯间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 1955.
- [3] 洪昇.长生殿•自序 [A].洪昇著，徐朔方校注.长生殿（卷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4] 王艮.与俞纯夫 [A].王艮.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 [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册）[C] 影印明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
- [5] 何心隐.寡欲 [A].何心隐.何心隐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6] 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诗文”）[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 [7] 孟称舜.娇红记•题词 [A].孟称舜.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卷首）[M].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C] 影印明崇祯间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 1955.
- [8] 冯梦龙.太霞新奏序 [A].冯梦龙.太霞新奏 [M].王秋桂.善本戏曲丛刊（第4辑）[C] 影印明末刻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 [9] 冯梦龙.情史•序 [A].冯梦龙.情史 [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 [10] 冯梦龙.风流梦•小引 [A].冯梦龙.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 [M].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 [C] 影印明崇祯间墨憨斋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 1955.
- [11] 张琦.衡曲麈谈 [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 [12] 凌濛初.谭曲杂札 [M].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 [13] 洪之则.还魂记跋 [A].陈同、谈则、钱宜合评.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M].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梦园刻本.
- [14] 王实甫著，王季思校注.西厢记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5] 俞用济.俚句填词赠玉卿贤妹丈《潇湘怨传奇》[A].万荣恩.潇湘怨传奇 [M].阿英编.红楼梦戏曲集 [C].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6] 陆采.怀香记 [M].毛晋.六十种曲（第5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 孟称舜. 娇红记 [M].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C] 影印明崇祯间刻本.
- [18] 袁于令. 鹊鵙裘 [M].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 [C] 影印明末剑啸阁原刻本.
- [19] 吴炳. 画中人 (第五出) [M].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 [C] 影印明崇祯间金陵两衡堂刻本.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7.
- [20] 张坚. 梅花簪 [M]. 张坚. 玉燕堂四种曲 [C]. 清乾隆间刻本.
- [21] 黄周星. 制曲枝语 [M].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8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22] 汤来贺. 梨园说 [A]. 汤来贺. 内省斋文集 (卷7)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199册) [C] 影印清康熙书林五车楼刻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3] 茅一相. 题词评《曲藻》后 [A]. 王世贞. 曲藻 [M].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4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24] 刘念台. 人谱类记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5] 贾懋循. 元曲选序二 [A]. 贾懋循编. 隋树森校. 元曲选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6] 赵山林. 中国戏曲观众学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 [27] 李渔. 闲情偶寄 [M]. 李渔全集 [C].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 [28] 孟称舜. 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 (引徐渭《昆仑奴》批注) [M]. 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 [C] 影印明崇祯六年 (1633) 序刻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8.
- [29] 徐渭. 南词叙录 [M].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3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30] 王骥德. 曲律 [M].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4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31] 焦循. 花部农谭 [M].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第8册)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 [32] 天津静海县志 [M].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华北卷) [C].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 [33] 弗洛伊德. 创作家与白日梦 [A].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 美学译文 (3)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 [34] Paolo Santangelo. Sentimental Edu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Textual Research on Ming and Qing Sources [M]. Leiden•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3.
- [35] 林以宁. 还魂记题序 [A]. 陈同、谈则、钱宣合评.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M]. 清康熙三十三年 (1694) 梦园刻本.
- [36] 佚名. 小青传 [A]. 张潮. 虞初新志 [M]. 北京: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4.
- [37] 史震林. 西青散记 [M]. 北京: 中国书店影印 1907 年上海广智书局本, 1987.
- [38] 张采纂、钱肃乐修. 太仓州志 [M]. 明崇祯十五年 (1642) 刻清康熙十七年 (1678) 增刻本.
- [39] 胡澹庵定本, 钱德苍增订. 新订解人颐广集 [M]. 清乾隆间刻本.
- [40] 周凯纂修. 厦门志 [M]. 清道光十九年 (1839) 刻本.
- [41] 余治. 得一录 (卷11) [M]. 清同治八年 (1869) 刻本.
- [42] 梁恭辰. 劝戒录五编 [M]. 梁恭辰撰, 丁福保编. 劝戒录类编 [C]. 上海: 中华书局, 1922.

责任编辑: 王法敏

詹安泰对常州派词学的继承与修正

曾大兴

[摘要] 作为常州派在岭南地区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詹安泰对常州派的词学思想，有继承，也有修正。他反对“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主张“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这是对常州派词学思想的继承；他强调并坚持“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是对常州派批评方法的重要修正。

[关键词] 詹安泰 常州派 词学 继承 修正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38-07

詹安泰（1902 年-1967 年），字祝南，号无庵，广东饶平人。生前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能诗，工词，擅书法。学术研究涉及《诗经》、《楚辞》和唐宋词，以词学研究最为知名，代表作有《李璟李煜词》（1958 年）、《宋词散论》（1980 年）、《詹安泰词学论稿》（1984 年）和《花外集笺注》（1995 年）等。作为常州派在岭南最后一个代表人物，^① 詹安泰和常州派的关系表现在词的创作上，更表现在词的研究上。他虽然受常州派影响，但并不为其门户所限。他在吴文英的评价和词的声律要求方面与常州派的主张一致；在词的比兴寄托和有关社会价值方面继承了常州派的思想，但是对其不经考证而胡乱攀扯的做法有重要修正。

一、反对“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

常州派的开山祖师张惠言并不看好吴文英，他的《词选》选唐宋词 44 家 116 首，对吴文英（梦窗）词一首不选，王沂孙（碧山）词选了四首。周济说他“为碧山门径所限”。董毅《续词选》的尺度比张氏《词选》稍宽，选唐宋词 52 家 122 首，也只选了吴文英词两首，王沂孙词仍选四首。周济的《宋四家词选》把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和王沂孙称为“领袖一代”的四大家，选周词 26 首，辛词 24 首，吴、王词各 20 首，虽然为吴文英讲了不少好话，但并不讳言他的“生涩”和“过嗜短钉”。^② 至陈廷焯编《词则》，选王沂孙词多达 43 首，选吴文英词 36 首。陈廷焯认为：“大约南宋词人，自以白石碧山为冠，梅溪次之，梦窗玉田又次之”。^③ 在常州派看来，吴文英在词史上的地位高不过王沂孙。

极力标举吴文英，甚至把他神化的，是蔡嵩云称为“桂派”的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④ 王鹏运讲：“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⑤ 在他看来，吴词已

作者简介 曾大兴，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①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云：“清之末季-----常州词派由江南而移植于燕都，更由燕都而广播于岭表。”见《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3—404 页。

^② 蔡嵩云《柯亭词论》云：“清词派别，可分三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本，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见唐圭璋辑《词话丛编》，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5 册，第 4908 页。

经具备了与杜诗、韩文相提并论的资格，如果说杜甫是诗圣，韩愈是文宗，吴文英就差不多是词神了。这是神化吴文英的开始。朱祖谋认为，吴梦窗的成就和地位不是王碧山所能比的，周济取碧山与清真、稼轩、梦窗分庭抗礼，“拟不于伦”。^{[4](P84)}他说：“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5]又说：“君特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故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绝幽抉潜，开径自学，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6]在他看来，吴文英道德文章均完美无瑕，足以垂范万世，所以他的《宋词三百首》选吴词多达25首，排位第一，选周词只有22首，排位第二，选辛词和王词只有12首和6首，排位第六和第十一。况周颐讲：“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欲学梦窗之致密，先学梦窗之沉著。即致密，即沉著。非出乎致密之外，超乎致密之上，别有沉著之一境也，梦窗与苏、辛二公，实殊流而同源。其所为不同，则梦窗致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处，虽拟议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颖慧之士，束发操觚，勿轻言学梦窗也。”^{[7](P48)}况周颐论词秉承王鹏运之意旨，标举重拙大，在他看来，梦窗词就是重拙大的一个最佳范本。况氏又讲：“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8](P16)}学梦窗居然还需要“绝顶聪明”，那梦窗岂不是“绝顶绝顶的聪明”？这不是神化梦窗是什么？

桂派中的陈洵，广东新会人，也极力推崇吴文英，认为“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唯师说虽具，而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他主张“立周、吴为师，退辛、王为友”。^{[9](P4838—4839)}他的《海绡说词》一书说吴词多达69首，说周词只有39首，说辛词只有2首，于王词则一首都不说。该书是在朱祖谋的授意之下完成的，其主张与朱祖谋如出一辙，就是要力推吴梦窗，把他神化。

朱祖谋的入室弟子杨铁夫，广东中山人。他回忆说：（1927年）“走上海，得执贽归安朱沤尹师，呈所作，无褒语，止以多读梦窗词为勖。始未注意也，及后每一谒见，必言及梦窗。归而读之，如入迷楼，如航断港，茫无所得，质诸师，师曰：‘再读之。’又一年，似稍有悟矣，又质诸师，师曰：‘似矣，犹未是也。再读之。’如是者又一年，似所悟又有进矣。师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从。又一年，加以得海绡翁所评清真、梦窗词诸稿读之，愈觉有得。于是所谓顺逆、提顿、转折诸法，触处逢源。”在朱祖谋、陈洵的诱导下，杨铁夫也神化梦窗：“知梦窗诸词无不脉络贯通，前后照应，法密而意串，语卓而律精，而玉田所谓‘七宝楼台’之说，真矮人观剧矣。”^{[10](P10—11)}

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陈洵、杨铁夫等桂派人物讲吴梦窗，有个共同倾向：放大优点，遮蔽缺点。这就把吴梦窗神化了。神化吴梦窗的一个后果是导致部分人学梦窗学得丑态百出。龙榆生指出：

（晚近词家），填词必拈僻调，究律必守四声，以言宗尚所先，必唯梦窗是拟。其流弊所及，则一词之成，往往非重检词谱，作者亦几不能句读，四声虽合，而真性已漓。且其人倘非绝顶聪明，而专务持扯字面，以资涂饰，则所填之词，往往语气不相连贯，又不仅“七宝楼台”，徒炫眼目而已！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吴，则词学将益沉埋，梦窗且又为人诟病，王、朱诸老不若是之隘且拘也。^{[10](P385)}

不过，作为朱祖谋的弟子，龙榆生一面指出“唯梦窗是拟”的种种危害，一面又不得不为他的老师朱祖谋和老师的老师王鹏运辩护，这是有些矛盾的。神化吴梦窗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一些人全盘否定吴梦窗，要毁掉这尊偶像。例如王国维就说他“隔”，“映梦窗，零乱碧”，“可怜无补费精神”；“砌字”、“雕琢”、“浅薄”，“不求诸气体，而唯文字是务”等等，^[11]几乎没有一句好话。胡适则说《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张炎说“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这话真不错。”^{[12](P296—297)}显然，吴梦窗的缺点全被放大了，优点全被遮蔽了，这就是造神运动的一般后果。经历了造神运动和毁神运动的吴梦窗，也就随之而面目全非了。

比较而言，詹安泰对吴梦窗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理性的。《读词偶记》（1957年）和《宋词风格流派略谈》（1966年）这两篇文章都讲到过吴梦窗。他列举了梦窗词的特点：一是“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足救滑易之病”；二是“以丽密胜，然意味自厚”；三是“亦有气势，有顿宕，特不肯作一平易语，遂不

免陷于晦涩。”四是“用意过事曲折，故有‘不成片断’之讥，然而细加按索，自有脉络可寻，非凑杂成章也，唯不可穿凿求之耳。”^{[13](P263)}梦窗词的这几个特点，前人都曾讲过，詹氏的贡献，主要是就前人对梦窗词的评论做了一个初步的梳理和公正的评价。他在《宋词风格流派略谈》一文中说：

吴词在当时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尹焕誉它可以媲美清真，冠绝两宋（《绝妙词选》引）；张炎讥它“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断”（《词源》），都不免一偏之见。吴词最吃香的时期是在清中叶以后，常州派词人周济《宋四家词选》标揭他和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为四派的首领，把他们来领导两宋的词家，说他“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之后，如陈廷焯、朱祖谋、况周仪、陈洵等都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作为学习的典范，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写旧词的人受到他们的影响；甚至还有人故神其说，说“梦窗之词，与东坡、稼轩诸公，实殊流而同源”（《香海棠馆词话》）。这是不正确的。^{[14](P27)}

在20世纪词学史上，旗帜鲜明地批评吴梦窗需要勇气，旗帜鲜明地批评“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朱祖谋、况周颐、陈洵等人，更需要勇气。夏承焘是有一点批评精神的人，他不仅批评了吴梦窗，还为张炎做了辩护，他说吴梦窗的“有些作品，读了数遍，还体会不出是说些什么”；又说“张炎不满吴词的‘凝滞晦涩’，提出补偏救弊的主张，这无疑是应该肯定的”。^{[15](P404)}可是他还是没指名道姓地批评神化吴梦窗的朱祖谋等人。詹安泰不太顾忌学术之外的种种人事关系，他不仅批评了吴梦窗，就连那些“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人，那些神化吴梦窗的人，他也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通过詹安泰对吴梦窗的评价，以及他对朱祖谋、况周颐、陈洵等桂派词家“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批评，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观点是近于常州派的。常州派对吴梦窗的评价，总的来讲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比较理性，他们不像桂派那样只讲吴的优点而不讲缺点，更没有把他神化。这是常州派高明于桂派的地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詹安泰把常州派的陈廷焯也说成是“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人，把他和朱祖谋、况周颐、陈洵等桂派词家相提并论，这是不妥当的。陈廷焯“极力抬高”的并不是吴梦窗，而是王碧山。这一点，詹安泰应该是知道的。他在《花外集笺注》的后面附了44条词话，其中有31条是陈廷焯讲王碧山的。陈氏讲过“南宋词人，自以白石、碧山为冠，梅溪次之，梦窗、玉田又次之”。怎么能说他是“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的人呢？

二、主张“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

蔡嵩云讲：常州派论词“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桂派论词则“以立意为本，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桂派是不是“词格颇高”还很难说，“词法颇严”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桂派严于守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所推崇的吴梦窗是严于守律的。朱祖谋称他“审音拈韵，习谙古谱”。二是推崇吴梦窗最力的朱祖谋偏嗜音律。沈曾植《疆村校词图序》说：“疆村精识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检本，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16](P320)}有吴梦窗这个典型，自己也具备这方面的长处，朱祖谋就孜孜不倦地教人严守声律。况周颐回忆自己的填词经历时说：“失声律与体格并重也，余词仅能平侧无误，或某调某句有一定之四声。昔人名作皆然，则亦谨守弗失而已，未能一声一字剖析无遗，如方千里之和清真也。如是者二十余年，壬子已还，避地沪上，与沤尹（朱祖谋）以词相切磨。沤尹守律甚严，余亦恍然向者之失，断不敢自放。”^{[17](P433—434)}况周颐接受了朱祖谋的教诲，在创作上做到“四声相依，一字不易”之后，又用来教诲别人。他在晚年写定的《蕙风词话》一书里讲：“畏守律之难，辄自放于律外，或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之大病也。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意，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18](P12)}

在朱、况等人的极力倡导和鼓吹下，许多填词的人往往死守四声，甚至不惜牺牲内容和辞藻以就声

律。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如冒广生、夏敬观、吴眉孙、张尔田等，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夏承焘的《铁风阁学词日记》就保留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如1938年9月10日：“灯下阅鹤翁校《乐章集》……大抵反四声、反梦窗为此老论词宗旨。”1940年3月22日：“归过吴眉翁，谓水云楼及金梁梦月皆不尽守四声，大鹤也不坚守，此事决推古微。彊村词四卷中，仅有二、三处失律耳。”1941年3月13日：“榆生寄来《词声》第三期，载眉孙致予论词三函，皆攻斥死守四声者。自古微开梦窗风气，近日物极必反矣。”1941年8月8日：“又得孟劬翁书……又谓今词既不可歌，斤斤四声，亦属多事，按谱填词，但期大体无误足矣。”^{[18](P46, 187, 285, 325)}朱祖谋的弟子龙榆生，对死守四声这一倾向也是持反对意见的。他指出：“选用僻调，而严守其四声，以为是可以协律矣，然则其他宋人习用之调，半及四声，出入不可胜数者，将皆谓其为不协律可乎？此又令人迷惘而无所问津矣。”^{[19](P178)}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他的师傅朱祖谋等人。龙榆生碍于师徒关系，不愿意把这笔帐算在朱氏等人头上，这是可以理解的。

夏承焘对朱、况等人的过于讲求四声也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在1940年4月完成的《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主张“今日论歌词，有须知者二义：一曰不破词体，一曰不诬词体。谓词可勿守四声，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此破词体也。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此诬词体也。过犹不及，其弊且浮于前者。盖前者出于无识妄为，世已尽知其非；后者似乎谨严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来后人因噎废食之争。是名为崇律，实将亡词也。”^{[20](P81—82)}他所批评的“后者”就是朱祖谋等人，但是碍于朱祖谋在词坛上的余威，他没有在自己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点朱氏的名。

词的声韵问题，是詹安泰最为用心的问题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在《词学研究》这部书稿里就辟有《论声韵》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40年代中期，他一连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文学上之倚声问题》（1944年）和《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1945年），在吸收夏承焘的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四声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四声之说，宋人偶一言及，犹多活用，不主严守；元、明作家，则并四声，也绝口不谈，核其所作，也不过仅守平仄；到了清初万树作《词律》，始倡言四声——尤其是去上必当严守，可是清初的词人对他的学说并不注意，所作的词，依然是仅守平仄；直到道、咸以后，四声严守之说，乃风起云涌，今日诸老辈言词者没有不兼及四声的了。”^{[21](P353—354)}詹安泰在四声问题上的态度很理性，很辩证：“窃意既名填词，则受声律所限制，自不可免，必欲摧陷而廓清之，则亦不成其为词矣。唯四声无或出入，似亦过于死执；况古人名作正多，必以数家为准，门户亦似太隘；既不能施诸歌唱，协诸管弦，则除拗调拗句加以严守外，即仅依平仄填倚，亦不失其真美也。”^{[22](P19)}他的主张是：“除拗调拗句”之外，其它“仅依平仄”即可，不必一一严守。这种主张与龙榆生、夏承焘等人是一致的。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则比龙、夏二人要深入、系统些。他说：

若株守古词之四声，则有不可通者三：（一）词乐既已失传，虽墨守四声，仍不能付诸歌喉，配以丝竹，以复古人之旧观。（二）古词同宫调者其声字每有出入，既难定所适从；且以少数词家所作者悬为准的，亦未免固陋自封，作茧自缚。（三）古词常常使用方言、名物，时、地不同，读法各异，虽严守四声，仍难免出律之嫌。^{[22](P19)}

第（一）（二）条理由，龙榆生和夏承焘曾经讲过，第（三）条理由则是他的独立思考所得。既然有多种理由可以不必严守四声，如果还要“株守古词之四声”，其负面影响就不止一端了。他指出：

当代作家，受其影响者，守之唯恐或失；而新进后生，惮于用心，患其拘束，则又持反对之说，去之唯恐弗力。^{[23](P14)}

数十年来，词学复兴，名家辈出。如王幼遐、陈伯韬、郑叔问、朱古微、况夔笙等，核其所作，非不踵美宋贤，然亦不过专严四声之辨，多和宋贤之作，毫厘分寸，不稍宽假而已，于已失传之词乐，不一过问已。则信乎词学之大不幸，而词乐之必终至灭绝矣！^{[23](P19)}

“株守古词之四声”的严重后果有三点，一是守之者唯恐或失；二是去之者唯恐弗力，也就是夏承焘所讲的，一曰诬词体，一曰破词体；三是只顾守律而忽略了对词乐的考察。这一点，龙榆生曾指出过。

至于今后应该怎么做，詹安泰提出了两条建议：“（1）就形以求质，使声情吻合。（2）变质以求形，使声乐吻合。”关于第一点，詹安泰的解释是：“词之唱法与乐谱虽已失传，然即词之声字与其句、调之组织以求之，其本质之美妙犹在也。”词之声字之运用与句、调之组织，均宜讲求。“某调之宜于表现某种情态，亦以其调中各句之组织与句中各字之配合而定，故句调与声字须兼资并重。知句调而忽其声字，或守声调而乖其句调，厥失维均，不可不察也。”关于第二点，他的解释是：“词乐虽不可复识，其所用之乐器与其用法，犹有可得考见者。”既考明乐器与其用法之后，再依古人唱词之一字一音、一句一拍法，就古词中较为圆美之调，或取后人较为习用之调，配以谱字……（然后）易以今字，试付管弦。”第一条龙榆生曾经讲过；第二条则是他的想法。他承认：“使声情吻合，究心词学者类能言之；使声乐吻合，则非究心词学兼精乐理，兼擅音乐者无能为役。余无慧，于音乐略无感悟。”^{[23](P14-19)}他主张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株守四声上，另求词的出路，便己便人，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詹安泰关于“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的主张，尤其是不必株守四声的主张，与常州派一致的，与朱祖谋、况周颐等桂派人物的主张则大相径庭。虽然他的某些观点是综合了龙榆生和夏承焘的某些意见之后得出的，但在四声问题上，他的研究比龙、夏要系统和深入得多，其态度也比龙、夏要鲜明得多。他敢于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指名道姓地批评朱、况等人的株守四声，更是龙、夏所做不到的。

稍嫌不妥的是，他把郑文焯也当成了株守四声的人，这不符合事实。如夏承焘《铁风阁学词日记》所云，郑文焯虽守四声，但“也不坚守”，他对四声的态度与朱祖谋、况周颐有别。

三、强调“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

常州派以“意内言外”论词，强调比兴、寄托，主张作品要有君国之忧和身世之感。如此尊体不错。他们的问题是，一旦涉及到作品解读就往往出现偏差，穿凿附会，大言欺人，遮蔽了作品的真相。常州派的这个问题越到后来越严重。虽然周济讲过“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1](P1643)}“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24](P1630)}这样稍通达的话，但是对常州派的穿凿附会并没起到多少补偏救弊的作用。例如，张惠言讲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25](P1609)}这还只是就个别作品而言，而到了陈廷焯那里，便是“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菩萨蛮》更漏子》诸阙，已臻绝诣，后来无能为继。”^{[2](P41)}又如张惠言讲“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25](P1616)}陈廷焯则讲：“《铜雀》云：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自是确论……或谓不宜附会穿凿，此特老生常谈，知其一不知其二。”^{[2](P41)}正是由于他们越来越顽固，使得许多人一提起常州派，一提起寄托，就生反感。例如王国维就讲：“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11](P233)}吴世昌甚至讲：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26](P2)}寄托问题是词学史上的一大公案，长期以来争讼不已。实事求是地讲，唐宋词里还是有寄托的，但是没有常州派讲得那么普遍，那么玄乎。而王国维、吴世昌等人批评常州派，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乏偏颇。例如王国维一面否定温庭筠、欧阳修、苏轼的上述作品有寄托，一面又说李璟的《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这两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11](P196)}这就说明词里还是有寄托的，问题在于如何判断。

相对而言，詹安泰对待词的寄托问题比较理性，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在《词学研究》的《论寄托》这章里，他对有寄托与无寄托、寄托与时代环境、寄托与比兴、寄托与史实、寄托与穿凿等等，都做过详细探讨。他认为常州派讲寄托，有三个明显缺陷。一是专尚寄托而高谈北宋。他说：“常州诸老专尚寄托，而高谈北宋；浙水词人，不言寄托，而侈论南宋，均使人不能无所致疑于其间。夫以寄托论词，北宋固不若南宋之富且深也。”^{[27](P130)}他认为寄托一事实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唐、五代词，虽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绮绣纷披，令人目眩，而不必有深大之寄托。（有寄托者，极为少数，殆成例外）以其时少忌讳，则滞著所郁，情意所蓄，不妨明白宣泄发抒也。北宋真、仁以降，外患寢急，党派渐兴，虽汴都繁丽，不断歌声，而不得明言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亦所在多有；于是辞在此而

意在彼之言，乃班秩而出。及至南宋，则国势陵夷，金元继迫，忧时之士悲愤交集，随时随地，不遑宁处；而时主昏庸，权奸当道，每一命笔，动遭大僇，逐客放臣，项背相望；虽欲不掩其辞，不可得矣。故词至南宋，最多寄托，寄托亦最深婉。”^{[27](P120)} 二是只主寄托而忽略词家考证之业。他指出：“夫不使人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则望文生义，模糊影响之谈，将见层出不穷；穿凿附会，又奚足怪！”^{[27](P130)} “似此解词，未免忽略其为人，而太事索隐……飞卿即因失意而为是词（《菩萨蛮》），其寄托亦不若是深远。”^{[27](P128—129)} 三是谓凡词必有寄托，除寄托不足言词。詹安泰指出，常州派重视词的寄托，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们“一意以寄托说词”，“专以寄托论词”，则流入“穿凿附会，反失其词也”。^{[27](P129—130)} 以上三点切中常州派的要害。王国维、吴世昌等人批常州派，没有这样具体，因而缺乏相应的说服力。

詹安泰一面在理论上指出常州派的缺陷，一面在鉴赏和研究实践中尽量做到实事求是。他的基本经验是“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他总结“考明本事”有这样几个途径：一是“于作词者之自序或自注”，“以明作词之动机或故实”；二是利用笺注，认为“笺注之作以时代最先者最足征信”；三是取资于有关词话和笔记，强调：“本事亦有捏造者，要当以正史为主，杂说为辅，此层不可不知。”^{[27](P132)} 詹安泰的《花外集笺注》，据其自序，乃是一本“专言寄托”的书，最能体现他对寄托问题的态度。王沂孙的《花外集》存词 55 首（据詹氏笺注本），其中咏物词占了近 40 首。张惠言断定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陈廷焯更强调张惠言的话“自是确论”。可是他们没有做过任何考证，他们都只是凭感觉说话。詹安泰笺注《花外集》，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就开始了，至 1936 年即已完成初稿，但是一直不敢交付出版。尝自言：“校注笺释，不下五、六万言，而犹有疑义，未能确断，因亦不敢遽付剞劂。”^{[28](P199)} 而其用力最多者，则是有关“本事”的考证。

在笺注《花外集》期间，他还完成并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杨琏真加发陵考辨》（1940 年 3 月）。这篇文章对于了解《乐府补题》所收 37 首词，包括王沂孙赋龙涎香一首、赋白莲二首、赋莼一首、赋蝉二首的写作背景，以及王氏其它涉及到“骊宫”、“深宫”、“太液”、“环妃”、“露盘”、“鬟鬓”诸意象的作品“本事”，进而了解其“君国之忧”，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以《齐天乐·咏蝉》一词为例，周济说：“此家国之恨”；陈廷焯说：“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当指王昭仪改装女冠。”端木采说：“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镜暗”二句，残破满眼，而修容饰貌，侧媚依然，衰世之臣，全无心肝，千古一辙也。”这首词诚然有“家国之恨”，但具体指的是什么，陈廷焯、端木采两家的说法均无异于猜谜，并无说服力。詹安泰指出：“据友人夏承焘考证，《乐府补题》中咏物诸词，皆作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之后，则端木采‘敌骑暂退，燕安如故’，时间不合，且《补题》中赋蝉，十词九用鬟鬓，实系赋孟后陵事，与谢翱《古钗叹》同一故实。”^{[29](P54)} 由于有夏承焘对《乐府补题》和詹安泰本人对杨琏真加发陵事的考证为依据，这个说法就要可信得多。

当然，詹安泰对《花外集》的笺注，也难免有“望文生义，模糊影响之谈”。例如《鬲阳台·纸被》这首词，詹氏谓“此词当有所为而发。或者指贾似道及依附似道者”；^{[29](P21)} 又如《一萼红·初春怀旧》这首词，詹氏谓“此或刺廖莹中辈之作”。^{[29](P72)} 在这些地方，詹氏都忽略了自己所强调的“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的主张。但是，总的来讲，他言寄托的可信度是远远超过了张惠言和陈廷焯等人的，即如对《鬲阳台·纸被》和《一萼红·初春怀旧》这一类作品的解读，他的用语比较审慎，不似张、陈等人，动辄使用全称肯定判断。詹安泰考证有关作品的“本事”，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的出发点，在于考察作品的写作背景，发掘作品的思想内容，以便更准确更全面地评价词人词作。这一点，与常州派以“意内言外”说词、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本意是相通的。他超越常州派的地方，在于尽量地用事实说话，有寄托就是有寄托，无寄托就是无寄托，尽量避免牵强附会。

[参考文献]

- [1] 周济.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M]. 唐圭璋辑. 词话丛编 (2).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3] 王鹏运. 梦窗词稿跋 [C]. 梦窗词稿. 四印斋所刻词本.
- [4] 龙榆生. 选词标准论 [C].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5] 朱祖谋. 梦窗词稿序 [C]. 梦窗词稿. 四印斋所刻词本.
- [6] 朱祖谋. 梦窗词跋 [C]. 梦窗词. 疆村丛书本.
- [7] 况周颐. 蕙风词话 [C]. 王幼安校订.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 [8] 陈洵. 海绡说词 [M]. 唐圭璋辑. 词话丛编 (5).
- [9] 杨铁夫. 吴梦窗词选序 [C]. 吴梦窗词笺释.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 [10] 龙榆生. 晚近词风之转变 [C].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 [11] 王国维. 人间词话 [C]. 蕙风词话·人间词话.
- [12] 胡适. 词选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13] 詹安泰. 读词偶记 [C]. 吴承学, 彭玉平编. 詹安泰文集.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 [14] 詹安泰. 宋词风格流派略谈 [C]. 詹安泰文集.
- [15] 夏承焘. 读张炎《词源》 [C]. 夏承焘集 (2).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16] 沈曾植. 疆村校词图序 [C]. 疆村丛书本.
- [17] 况周颐. 餐樱词自序 [C]. 孙克强辑. 蕙风词话·广蕙词话.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
- [18] 夏承焘. 天风阁学词日记 [M]. 夏承焘集 (6).
- [19] 龙榆生. 填词与选调 [C].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 [20] 夏承焘. 唐宋词字声之演变 [C]. 夏承焘集 (2).
- [21] 詹安泰. 论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 [C]. 词学研究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22] 詹安泰. 词学研究·论声韵 [C]. 詹安泰词学论稿.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 [23] 詹安泰. 中国文学上之倚声问题 [C]. 詹安泰文集.
- [24] 周济. 介存斋论词杂著 [M]. 词话丛编 (2).
- [25] 张惠言. 张惠言论词 [M]. 词话丛编 (2).
- [26] 吴世昌. 我的学词经历 [C]. 吴世昌全集 (4) [Z].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7] 詹安泰. 词学研究·论寄托 [C]. 詹安泰词学论稿.
- [28] 蔡启贤. 《花外集笺注》后记 [C]. 詹安泰. 花外集笺注.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29] 詹安泰. 花外集笺注 [M].

责任编辑: 陶原珂

试论《水明楼诗词》

张海鸥

[摘要] 邱世友是当代著名学者、词人。他的旧体诗词属“学院派”，在学界早已知名。《水明楼诗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诗乃“变风变雅”，怨而不怒；其词风似南宋词坛大家吴文英和姜白石，既密丽秾挚又空灵疏宕，有浑化骚雅之境，同时兼采苏轼、辛弃疾、史达祖、龚自珍等诸家词之长而自成格调；其悼亡词更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 邱世友 水明楼 诗词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45-06

邱世友先生抗日战争前后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方孝岳、王力、詹安泰、王起等名师，1949年从黄海章先生读研究生，1950年任中文系助教，1954—1955年被派至北京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深造，之后仍回中山大学任教至今。多年来，他在学术研究和旧体诗词创作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词学家施议对论20世纪词学，称邱世友和叶嘉莹为“第四代词学家”的代表。笔者赞同此说。叶先生《迦陵论词丛稿》文化视野开阔，常有新颖独特的方法和见解，启人灵感；邱先生《词论史论稿》则多深至微妙的考究，发人深思。

邱先生的诗词是“学院派”的，因此在学术界更知名。笔者近期协助邱先生整理其《水明楼诗词》，^①特撰此文谨论其旧体诗词创作，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一

邱先生平时写作诗词不太留意收集，通常也不注明写作时间。这就给收集编次工作增加了难度。此编有诗47首、词58首，必非全部。作品编年是根据先生的回忆和发表时间大致确定的，或有误差。集中最早的诗是34岁所作七言古体，古朴雅健，笔力老练，可知此前诗作必不少，或随手弃之矣。最早的词是51岁所作《水龙吟》，内容颇具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文笔雅致轶丽，如：“我亦沾濡，昭昭前路，梦中犹记。待鲸鱼斫却，波平澹宕，碧山凝翠。”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典雅之词，非文人学者不能为。邱先生在大学时代即从无庵先生（詹安泰）学词并研治词学，所作词必多，惜未保留。

邱先生以水明楼名其书斋，是取杜甫《月夜忆舍弟》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意。这很像他的生活，清幽淡雅，深邃渺远，正如其诗所云：“不忧宠辱不飘萧，水佩风裳久寂寥。凌波未许尘涴袜，数点幽黄韵最娇。”（《水仙》）又如其词所云：“潭诗论学清门，漫赢得明荷出水纯。”（《寄星明》）他曾说人生“起码也要像菊花”。菊花，淡雅者也。

《水明楼诗词》恰如水静月明，特有一番渊深儒雅的韵致。观其内容题材，远山水而近人文，很少单纯描摹山水之作，多数作品都因社会、历史、人生事件有感而发，真情至性，从中约略可见作者数十

作者简介 张海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510275）。

年心路历程。

二

水明楼诗 47 首，只有一首五言诗，余皆七言。其中七古也只有一首，七律 12 首，七绝 31 首。先生明显偏爱七言近体，尤其偏爱七绝，或以其随机而作酬赠方便吧。诗之格调大体怨而不怒，尚内敛而不事张扬。比如 1970 年在英德“五七干校”所作《读东坡英德石刻》诗，由东坡贬谪岭南而有“江湾本是凄凉地，多少流人哀石头”之叹，以古人之不幸暗寓今人之哀苦，意味深长，含蓄蕴藉，但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先生一生历经诸多动荡磨难，但其所作温婉平和，殊少牢骚怨詈之语。这或许正是艰难世事磨砺之故。1989 年教师节，王季思先生有感于当时教师收入微薄、生活清贫，乃用唐人“明月夜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上阑干”诗意作七律曰：

教师节后月团团，照见先生苜蓿盘。四化人才凭教育，一家老小耐饥寒。

安贫乐道谈何易，走穴跳槽心不甘。但愿嫦娥肯相顾，稍分灵药佐朝餐。

邱先生因步韵曰：

教师节夜月团团，月底山河影一盘。苜蓿盘中儿女泣，桂枝香外子衾寒。

安贫化育成虚语，乐道栽培说苦甘。莫教嫦娥赐灵药，菊花新露尽朝餐。

淡淡的幽怨，但怨而不怒，尾联反用嫦娥典故，申无悔之意，又用屈原《离骚》饮露餐菊之典以明洁身守志之意。我以为水明楼诗词兰幽菊淡，实乃作者生命之图腾。《癸酉除夕三首》等诗及许多词作亦可证此。

邱先生深于情，笔下常有款款情致，亲切感人。如 1992 年《病房遣兴》三首，其一“与某医护女士同检《窃锦标》怀人词”，盖因此时先生倚病榻作《窃锦标·重读照片怀圣超德国》词，中有“风景留人，羁愁侵否。问柔情几缕，料难禁、故家心绪……休念文园老病，悄悄离怀，怅恨一帘飞絮”等句，雅言深意，女护士见赏，先生因有知音之乐：“缺月窥人改慢词，窗前倩女惜支离。读到‘柔情几缕’句，恰如校帖赌茶时。”又因久病而感医护之德，遂有“离院虽知情意重，几回推枕梦依依”之惜别，可谓善言情者。

三

邱先生长于词。论者谓其词似梦窗（南宋吴文英），如刘庆云教授、彭玉平教授皆有此论，余亦然之，在此略为申说。

邱先生于梦窗词素有精研，其《词论史论稿》有专节辨《梦窗词密丽秾挚与清空疏宕的统一》。⁵⁵⁻⁵⁶ 盖因张炎《词源·清空》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味。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张炎之说影响深远，几成定论，数百年来词学家评论吴文英词多从此说。邱先生则别有心解，他认为梦窗词确有密丽的特点，但并不“质实”。梦窗词善于把时间和空间参差倒置，在难以条释的结构中又特有一番空灵和完整，是不可“碎拆”的。南宋人沈义父《乐府指迷》说“梦窗深得清真之妙。”邱先生进而申论：“得清真之妙首先是得其浑化之境，词至浑化则意境空灵。”“梦窗词往往密丽中空灵疏宕”，有“空际转身”之妙。邱先生于此引述无庵师《宋词选》残稿语：“读梦窗词，须于秾密中见疏淡。故非绝顶聪明者不能学。梦窗意多词练。”

“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乃况周颐之论（《蕙风词话》卷一）。邱先生作词则每学梦窗，他在 1993 年《霜花腴》序、1995 年《三姝媚》序、2004 年《铜仙歌》、2005 年《瑞鹤仙》序中都明说学梦窗词，平日与朋友或晚辈谈词，也曾自言学梦窗之意。

学梦窗什么呢？这要先搞清梦窗词值得学习的是什么。梦窗词在南宋已享盛名，时人尹焕说：“求词于吾宋者，前者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中兴以来绝妙好词》卷十引）沈义父《乐府指迷》称：“梦窗深得清真之妙。”戈载《宋七家词选·梦窗词跋》：梦窗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

远。”冯煦《蒿斋论词》：“梦窗之词，丽而则，幽邃而绵密。”王鹏运《梦窗词稿跋》：“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朱祖谋《梦窗词跋》：“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缱幽抉潜，开径自行。”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梦窗，词中汉魏文，潜气内转，不恃虚字衔接。”陈匪石《宋词举》卷上：“南宋善学柳者，唯梦窗一人。”杨铁夫《吴梦窗词选笺释自序》：“梦窗诸词，无不脉络贯通，前后照应，法密而意串，语卓而律精。”^①

梦窗被视为独具风格和成就的大词家，在晚清词家心目中尤其辉煌。邱先生以词学家兼词人的眼光学梦窗词，取法颇高，兼有名师指点，作词境界自然不俗。水明楼词所收明言学梦窗者，最早是1993年夏所作《霜花腴》并序云：“是腔乃梦窗自度，历数百载无填之者，夏咏庵尝倚其四声去上谱填二阙……余恐失律，敢违昔贤”：

翠薇士女，醉午风、香溪荐盏红泉。青冢多思，敕川频梦，而今偃仰阴山。乱怀渐宽，又倚云、留影亭栏。念幽香、白石梅魂，珮环归省动江关。妆鬟藏姬争艳，唱伊州进酒，可却清欢？高会难逢，兰盟稀遇，归来意绪阑珊。漫将蜀笺，写相思、付与青鸾。算蓬莱、宕远瀛瀛，鉴真前度看。

序中提到的吴文英《霜花腴》，是其自创词调，且只作一首，题为“重阳前”：

翠微路窄，醉晚风、凭谁为整欹冠。霜饱花腴，烛消人瘦，秋光做也都难。病怀强宽，恨雁声、偏落歌前。记年时、旧宿凄凉，暮烟秋雨野桥寒。妆靥鬓英争艳，度清商一曲，暗坠金蝉。芳节多阴，兰情稀会，晴晖称拂吟笺。更移画船，引佩环、邀下婵娟。算明朝、未了重阳，紫萸应奈看。

比较二词，吴词因秋日观菊而生孤独怀远之意，邱词因览昭君冢而发思古幽情，兼怀远人。邱词明显借鉴吴词语句有五处，袭其语而翻出新意，并非简单模仿。二词格调非常相似，都以孤寂伤感、离思幽眇为主旋律。细审二词情味意脉，更有一番内在的相似，正可借用邱先生对梦窗词的评语略加说明。首先，邱词得吴词“浑化之境”。二词中人物、事件都不太凿实，唯孤独念远之情浑融无间，境界空灵幽远。若以柳永或辛弃疾同类题材的词相比较，这一点就更容易体会。二是“以实写虚，以密丽秾挚之笔写虚幻幽眇之思，于实处见空灵，于密处见疏宕，而归于沉厚。”两首词都是意象密丽而意境幽远，文辞轶丽而情韵深厚。如“霜饱花腴”句，意象间因果关系紧凑，可谓密丽，然而霜天高远，菊英缤纷，意境又空灵疏宕。吴文英以此句名调，必特别钟爱。邱词“翠薇士女，醉午风、香溪荐盏红泉”句正有此秩丽疏宕之风致。三是“转折层深”，有“空际转身”之妙。二词都善于把时间和空间参差倒置，模糊了时空次序，将真实和幻想交织，历史与现实交错，统一于浑融无隙的情感境界中，特有一番空灵严整的思绪意脉。

1995年邱先生用梦窗词意作《三姝媚》并序云：“四月上旬，同学蔡厚示教授偕嫂夫人林女士来穗签证，赴美探望女公子。席间慷慨依黯，而相与慰焉。后四月，始得此解，亦梦窗所谓‘尘笺蠹管，断阕经岁慵赋’之意云”：

未名湖畔苑。正东风催春，俊游无限。漫忆前尘，叹断笺零墨，雪痕谁染。绛帐荒凉，寻旧境、啼鴂幽燕。森森东湖，输与吟怀，藻苹同荐。沙面而今惊见。料照影霓灯，梦缘未浅。银盏泣残，甚僝惄花絮，便成凄惋。签证乡心，情累苦、旅程如箭。伫久小桥凝想，枫林望眼。

梦窗“尘笺……”句出自《霜叶飞·重九》词：

断烟离绪，关心事，斜阳红隐霜树。半壶秋水荐黄花，香噀西风雨。纵玉勒、轻飞迅羽。凄凉谁吊荒台古。记醉踏南屏，彩扇咽，寒蝉倦梦，不知蛮素。聊对旧节传杯。尘笺蠹管，断阕经

^①上引历代人对梦窗的评语均转引自孙克强编《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岁慵赋。小蟾斜影转东篱，夜冷残蛩语。早白发、缘愁万缕。惊飈从卷乌纱去。漫细将、茱萸看，但约明年，翠微高处。

吴词写因旧爱成尘而无奈、无聊、无绪之情境。邱词写朋友情怀，抚今追昔，感慨岁月无情。词中“漫忆前尘，叹断笺零墨，雪痕谁染”句直从吴词化用而来。又“寻旧、惊见、梦缘、泣残、凄惋”等语，亦化自吴词。检点邱词，另有作于1998年的《霜叶飞》虽未明言学梦窗，却真正是以梦窗这首《霜叶飞》为摹本的。其词如下：

髯翁挥麈，赏心事，荆溪罨画藤树。半囊诗料到愁边，难写忧时谱。爱一卷、《乌丝》寄愫。凄凉谁解英年苦。记紫笋烹泉，扇漫约、蛟桥舞袖，认取眉语。复社当日沉埋。铜仙泪洗，《落叶》箫咽蛮素。乐章琴趣遍人间，冷艳从能覩。祓旧恨，晴丝万缕，无心闲咏风前絮。试再作、新图看，各族融和，体情高处。

词调、韵部皆依吴词，唯内容无关爱情，乃因见《迦陵填词图》而引起对朱彝尊、陈维崧友情之感慨。词中那种枨触深幽、思绪眇远的格调颇似梦窗，但没有梦窗词那种无奈和无聊的况味。意象依然密丽，多用典故，辞语或不免晦涩，词语和句法一一模仿吴词。难能可贵的是，在形制、语句、格调如此相似的模仿中，邱先生却写出了新的意境，把一代词杰的兰情雅谊写得高旷深至，下阙更加入国家民族的话题，增添了历史容量。可谓善于学入学出。观古今学艺者，学而不能入为等而下者，学能入而不能出为平庸者，唯高明者能入能出，终能自立规模，方可谓之创造。

2004年邱先生作《洞仙歌》，词中言及从詹安泰师学梦窗词：“无庵吾甚爱，七宝楼高，清丽摹来奈煊赫。”本意当是说从詹师学词，却以梦窗七宝楼为比况。

2005年邱先生作《端鹤仙·悼侯敏泽》词并序云“斯调有三体，今参酌之仿梦窗”：

晴丝粘燕苑。对岭海斜阳，鬓霜人輓。初咏珞珈畔。忆危亭三间，东湖波暖。风怀久盼，引珠岛、文评盛宴。又争知，众径荒凉，青岛却飞鸿雁。凄断。岁华易逝，出版难期，有谁深惋。孤灯凝倦。待凭约，作书献。欲停笺罢写，还依不忍，尺幅癌疴犹展。覩遗文、点点泪痕，为依悼唁。

梦窗词共有《端鹤仙》八首，邱先生所仿者主要是悼亡之作《寒食节忆姬》：^①

晴丝牵绪乱，对沧江斜日，花飞人远。垂杨暗芙苑。正旗亭烟冷，河桥风暖。兰情蕙盼，惹相思、春根酒畔。又争如、吟骨萦消，渐把旧衫重翦。汉断。流红千浪，缺月孤楼，总难留燕。歌尘凝扇。待凭信，拌分钿。试挑灯欲写，还依不忍，笺幅偷和泪卷。寄残云，剩雨蓬莱，也应梦见。

此词仿梦窗的方式一如仿《霜叶飞》，词调、语句、结构、格调均似之，唯所悼对象不同，意境自然不同。

自1993年至2005年十余年间，邱先生明言学梦窗者四，实则许多词都循此一路，如《三部乐》结尾“幽轸转、惊涛岸拍。风息浪寂，东方起、天际红日”，与梦窗《三部乐》结尾“帆鬃转、银河可掬。风定浪息，苍茫外、天浸寒绿”句法和语汇明显有相似处。又如1997年所作《过秦楼》中“凄迷、怨入、游魂、无声、还漫忆、生怕哀蝉，暗惊”等语汇明显借自梦窗同调词。又如1997年《鬲阳台》(吐露湾深)词，数用梦窗《鬲阳台·丰乐楼》语。

梦窗作词喜用典故，不喜欢用俗语熟词，这一点邱先生尤似之，上举词作皆有此特点，它如因“天一阁范氏后人”而作《欸龙吟》、参加王季思教授学术讨论会所作《鬲阳台》等亦然。批评家们喜欢说这种写作风格是“掉书袋”。其实历代文人写作诗词普遍都喜欢这种审美品味和审美方式，尤其是现代以来，旧体诗词已经成为“告董”式的经典文体，文人们使用这种文体抒情纪事酬赠交流，本不期于

^①杨铁夫语，见《吴梦窗词笺释》，陈邦炎、张奇慧校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老妪能解”，资书用典只要恰当，不但不会伤害作品的艺术美，反而能使作品风格更古雅，更本色，更丰厚蕴藉。

此外，邱先生对词调的选择也颇受梦窗影响。梦窗词今存 340 首，共用 150 余种词调。邱词 58 首共用词调 35 种，^①其中 26 种是梦窗用过或自创的词调。二人都喜用冷僻词调，如《三姝媚》、《霜花腴》、《鹤凤吟》、《三部乐》、《霜叶飞》、《瑶华》、《三犯渡江云》等。

总体说来，邱先生学梦窗词主要体现在意象密集、修辞轶丽、用典频繁、结构转折变幻、格调空灵伤感等方面。这种学习借鉴无疑是很成功的，其成功在于由表及里得其神韵，存形得意自成境界，学得进又出得来。他能学而自立，是因为自己完全具备自铸词境自具风神气格的能力。他是渊雅的学者，是饱览沧桑的文士，是很有造诣的词学家，是性情沉厚风怀馥郁的诗人。他的诗词很少山水之作，因为他创作多缘于内心而不是外物，他的兴发感动多缘于人情世态而不是山水风光，他创作的思绪多是流连于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扭结处，他的诗性关怀不在草木而在人文，不在风景而在心情。

邱先生作词虽然多学梦窗，但并不宥于一家。他阅读和研究既广，自然会博采众长。比如 1983 年所作《铜仙歌》即从苏轼同调词化入；1990 年所作《湘月》（天风吹汝）序自称“仿龚定庵词”；1996《买陂塘》效辛弃疾《摸鱼儿》；1999 年所作《三姝媚》（情深成眷属）借鉴史达祖《双燕》。细审水明楼词，除学梦窗外，邱先生最用心学习的当是姜白石了。

张炎以白石清空骚雅和梦窗密丽质实对举褒贬，邱先生不尽以为然。他认为梦窗词既密丽秾挚，又清空疏宕，二者辩证统一。他既学梦窗又学白石，既喜欢密丽秾挚又喜欢清空骚雅。他同意张炎说的“清空则古雅峭拔”并有一番解释：“峭则刚劲，拔则高超”。至于“骚雅”，他认为是“不怒”“不淫”，“有变雅、骚辨的幽思微讽，怨情婉笃，而且还表现出《离骚》那样，风流蕴藉，高举远慕”。他认为清空指词境，骚雅指词品，“无清空难以体现骚雅，无骚雅则清空无所表德。”那么清空骚雅和密丽秾挚如何统一呢？他说“密丽派如果成功地进行艺术概括和抒情典型化，其所为词却能于密丽中见清空飞动”。“清空的词境与转折的艺术描写是分不开的”，^{[2](P37-46)}而“梦窗词往往密丽中空灵疏宕”，善于“空际转身”。具体说来就是“以实写虚，以密丽秾挚之笔写虚幻幽眇之思，于实处见空灵，于密处见疏宕，而归于沉厚。”^{[2](P52-53)}邱先生把这样的学理探索运用于填词实践，学白石和学梦窗在他的创作中不仅不对立，而且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如前所举那些学梦窗的作品，其实都有白石词清空骚雅之神韵。又如他 1978 年为好友张维持《兰茵集》所题《金缕曲》就是清空骚雅和密丽秾挚融洽无间之作：

四十年前事。正风流，玉人手种，庭前兰芷。林下谢娘高格调，化作风楼逸气。羡花荫书琴写意。争奈珠江冷月荡，纵狂风横雨犹相倚，缡亲结，岂憔悴。自识君家余二纪，甚多情，药炉慰我，三生知己。今日登临出手卷，感摇落，难题记。尚激励石湾窑志。高树浓荫人长在，共清光，好把彝尊理。春来也，赏兰矣。

用密丽的意象，转折层递的结构，写朋友间 40 余年的兰情琴意，秾挚亲切，一种古雅清幽的文士气息流宕于字里行间，高逸峭拔，刚健卓萃，又自然浑成，堪称词中上品。集中《三姝媚·寄宗齐美国》、《百字令·重游广州漱珠岗》、《鹤凤吟·怀论有美国》等词亦可如此品鉴。

姜白石、吴梦窗皆终身布衣文士，邱先生也是布衣教授，他出入于姜、吴之间，或许也寄托着类似的“布衣情怀”吧。热衷于红尘仕宦的人，很难有他们这份清空骚雅的格调和空灵孤寂的生命意识。另外，姜、吴二词家都是词史上著名的格律派，邱先生一贯尊体，作词对格律要求甚严。近日我与他论及此意，他说大学时代读词，即依詹师指点，先读《白石道人歌曲》，当时自己悄悄学习填词，就是从白

^① 水龙吟 4、金缕曲 3、洞仙歌 4、湘月、清平乐 4、木兰花慢、临江仙 4、三姝媚 3、夺锦标、念奴娇 2、虞美人、霜花腴、高阳台 4、百字令、丹凤吟、三部乐、蝶恋花 2、买陂塘、点绛唇 2、过秦楼、解连环、浣溪沙 2、霜叶飞、瑶华、忆江南、减字木兰花、三犯渡江云、潇湘夜雨、寿星明、采桑子、瑞鹤仙、齐天乐、西江月、忆旧游、江城子。

石学起的。他选择姜、吴为填词范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尊体严格，是词之正宗。

四

水明楼词 58 首中，悼亡之作有八首，这些词最见性情，最具风怀神韵，最能代表水明楼词的艺术水平和足以自成一家的风格。八词所伤悼者，有老师、同事、朋友、甚至学生。作者伤之悼之，哀思深切，意远情真。如《休兰花慢·悼海章师》：“西州伤泪眼，忍来吊，谢公魂……抚遗篇，掩抑更怆神……难忘珠江淡日，萧然一老清尊。”又如《蝶恋花·纪念詹安泰教授百年冥诞》：“怨罡风肆虐，却换幽悠。遗著昭明海内，伤离索、败榻空留。百年祭、忍将酸泪，浑洒向清流”。尊师重道之意厚重真挚、哀痛感人。又如《金缕曲·悼麦佩娟女弟》乃白发人送黑发人之作，别有一番伤感况味：“娟也何时起，可还能、举杯同醉。……愁似织，拭残泪。”（这是稼轩笔法）就艺术造诣而言，这些词既有梦窗之密丽秾挚，更有白石之清空骚雅，又有苏、辛词之至情至性哀感顽艳。况周颐说：“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蕙风词话》卷一）邱先生兼有之，深于性情而严于格律，博采众长而自立规模。如《金缕曲·悼黄庆云师》：

洒尽西州泪。向灵前、凄迷低诉，此身如寄。小院回廊犹在眼，病榻频呼小字。似绛帐、莞然深致。遥想关河蹂躏日，正中流、击楫见高义。夏山映，丹心丽。艰难转徙浑无计，又牵裳、痴儿幼女，此时情味。虎仆麋丸黄昏后，还把康梁料理。命我谱、维新冤史。噩梦惊回邻笛怨，幸长年、辛苦成图志。三十卷，烛人世。

此词密丽清空，以古雅之辞诉怨秾挚之情思，用梦窗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将历史事件和现实场景凝定在刻骨铭心的永恒哀思之中。其叙事既有“病榻频呼小字”、“又牵裳、痴儿幼女”等私人生活细节，又有“关河蹂躏”、“艰难转徙”的民族灾难，一代学人一世艰辛而不废著述的情景跃然纸上，伤悼怀念之情真切感人。又如《贺陂塘·悼卢叔度教授》：

更能消、岭南霜气，秋心难展凝雾。纸钱泪湿篆烟袅，凄寂影堂如许。天也怒，只赢得、风流儒雅非人遇。伤心漫与，剩廿载幽怀，笔情墨绪，付与痴儿女。平生事，总被细腰人妒。蕙兰零落无主。梦痕恰似高唐赋，好景还争清路。邻笛怨，问底事、深灯呼我成绝语。弥留最苦，待留取真容，冬青坟畔，吟我断肠句。

《贺陂塘》即《摸鱼儿》。此词上、下片皆以稼轩同调句法领起，幽怨悲凉的情愫、寄托深远的笔法亦似稼轩，唯伤悼之意自肺腑自然涌出，淋漓凄楚，自成境界。此等词直可入词史之上乘，即邱先生所心仪的“思想感情和意境超常拔俗，达到与那些经过长期历史考验、百世以下犹能打动人的艺术”。^{[2] (P37)}也就是张炎所说“清空则古雅峭拔”。

[参考文献]

- [1] 邱世友. 水明楼续集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 [2] 邱世友. 词论史论稿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王法敏

经典与文艺学学科生机的反思

王 坤 蓝国桥

[摘要] 文艺学目前正面临多重挑战：文化转向所带来的“无边化”、进入图像时代所带来的“文学终结论”、后现代思潮中的反本质主义思路。如果把这些挑战理解为危机，那么造成危机的根源之一，应该还是与经典的距离。西方文论史和中国文论史都表明：优秀的文论著作是以研读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为基础的。在印刷时代与电信时代并存的社会，研读经典作品还要考虑结合图像文本，重视表演语言文本。重视经典作品，是为文艺学的发展带来学科生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产生经典文艺学与非经典文艺学的分野，文艺学仍然不能脱离经典作品的支撑。

[关键词] 经典 印刷文本 图像文本 表演语言文本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8) 03-0151-05

近 20 多年来，文艺学是疆域拓展得最快的学科，以至于成为最不稳定的学科。这种不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边化。假如要想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目前文艺学的学科现状而又不引起大的争议，恐怕没有比“无边的文艺学”更合适了。形象一点说就是：文艺学矫健的身影，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里。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文艺学向文化研究转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何看待这种转向及其后续效应呢？首先，这绝对是好事，一门学科如果缺乏走出“家门”的胆识，缺乏吸收、综合、融化其他学科知识的能力，其发展前景是难以乐观的。其次，这也有令人担忧之处：文化这个范畴比意识形态要大多了，可以说无所不包。文艺学曾经几乎等同于意识形态，殷鉴不远，现在又几乎等同于文化，难免令人担忧。一门学科一旦什么都是，可能意味着什么都不是；一旦无边化了，甚至可能意味着自我消解。

第二，取消论。这个话题，是由文学终结论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而来的。现在的论者，一般都把“文学终结论”的帽子戴在 J. 希利斯·米勒教授的头上，其实多少有点冤枉他。2000 年 7 月 29 至 31 日，“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米勒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引起轩然大波。杜书瀛先生的专著《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对此有过详细的交代。^① 自那以后，有关“终结”的话语就开始流行起来。美国阿瑟·丹托的一本论文集，本名应该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② 丹托时尚之福，也被翻译为《艺术的终结》。^③ 如今市面上以“哲学或……的终结”为书名的译著还不少呢！

作者简介 王坤，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蓝国桥，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275）。

^①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 不好译为《艺术的终结》，因为 Disenfranchisement 一词意味着“对……的剥夺”。

说多少有点冤枉米勒教授，是因为他在会上只不过转述了雅克·德里达的看法：“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1]当然，在具体阐释过程中，米勒认为德里达确有“文学终结”的意思，也同意他的观点。这里的“文学”，是有特定历史涵义的：“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2]而西方美学史上，有关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概念的定型时间，正好也是在17与18世纪。^{[3](P6-7)}所以，我认为，德里达及米勒所说的将要终结的文学，并不是我们今天在谈论文学时内心里默认的文学，而是指进入电信时代之后，原先在印刷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在他们看来，电信时代的文学与印刷时代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问题当由另文细说。需要强调的是，近年关于文学终结论的说法，确实由此而来。

由陶东风等一批青年学者所引发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多少与此有关，也与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有关。^{[4](P244-247)}陶东风本人其实并未明言生活审美化与审美生活化是否导致艺术终结，倒是指出应当重构文艺社会学。^[5]问题在于，文学终结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消失了，结果如何，自有别人来得出结论；而结论肯定不会是单一的，其中自然就会包括：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将随着文学的终结而被取消。这一潜在的结论，恐怕也是这场争论之所以产生的潜在原因之一。

第三，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我国文论界的后现代思潮极大地开辟了学科空间的话，那么时至今日，随着后现代削平深度模式、反中心主义等等观念的流行，已使得文艺学面临严重的学科生存危机。对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汤一介有精当的见解：“后现代主义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并没有广泛流行，但到90年代突然成为当时中国哲学界（不仅是哲学而且其他学科，如文学、艺术等）注意的一个焦点”。原因何在？就在于不同于现代理论的明晰性、确定性、终极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等等，后现代思潮追求不确定性、无层次性、反中心主义等等。^{[6](P11-12)}

具体到文艺学，后现代思潮的挑战表现为反本质主义。其影响之大，已经足以颠覆现行文艺学教材体系了：近年来出版的文艺学教科书，鲜有以“本质论”为全书基点的；而在此之前，“本质论”可是任何一本教材都不可或缺的“通灵宝玉”呀！

说以上三者造成了文艺学的学科危机，应当是不为过的。现在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种危机并找出生机，或者指出生机的方向何在。

在我国高校文科课程体系里面，文艺学作为一门基础课，已有几十年历史，她早已被体制化了。直接受苏联影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设置之日起，文艺学就被赋予“扛旗”、“打头”的使命。按说，文艺学应当紧密结合文学作品的，但实际上，文艺学的“理论色彩”日益浓厚，越来越拔高、抽象、稀薄，甚至于置具体的文学作品于不顾，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纵横驰骋。个中缘由，是不是当初设置之日的“充足底气”所致？总之，有体制化这块坚硬的基石垫底，文艺学的无边化还有可持续的空间。

对于取消论，只要能够分清印刷时代的文学与电信时代的文学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只要这两个时代还可以并存，取消论就难以大行其道，或者说没法彻底。更何况，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尚在继续，一时也无法产生具有绝对权威性的结论。

真正从学理上挑战文艺学的，就是反本质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恐怕还得追溯到欧洲中世纪以奥卡姆为代表的唯名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以及波普尔的反本质主义，下来才是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现代哲学大家。

学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社会现实中的日常经验为依据，是无法应对学术论争的。否则，对待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仅用一句“艺术至今仍然存在”足矣，不需要克罗齐煞费苦心构建另外的逻辑理论，通过指出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不足即可驳倒“艺术终结论”。附带说一句，杜书瀛对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十分精辟的辨析，指出我们同样误解了黑格尔：“终结”不是“消亡”。^{[1](P18-21)}

后现代思潮虽然没有运用像黑格尔那种一以贯之的逻辑理论，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语言，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的反中心主义就是直接来源于他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独到辨析。相比之下，我们文艺学的理论色彩，比较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辨那一块，而对于语言学这一块则比较忽略一些。

其实，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不啻文艺学的资源宝库。比如，对于《诗经》中的“国风”，多年来无人提出任何疑问。而根据新近出土文献《孔子诗论》，我们得知：“国风”二字，是避刘邦之讳的结果，原为“邦风”。^④虽一字之别，然而个中大有深意。最起码来说，文艺学“无边化”过程中所包含的走向“田野”，如果指的是田野出土的资料，那真是太好了！密切关注最新出土的资料，对比、对照古籍中关键字词的异同，对文艺学的基础工作来说，意义重大。

又如，一直争论不休的“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的问题，要是仅只停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分歧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陈炜湛从甲骨文入手，指出许慎的误解，证实了“羊人为美”：“早期的甲骨文里美字就不少，也有好几种写法……美字也是一个象形字，本是一个人戴着两双羊角而正立的形象……人正立而戴羊角，所强调的正是美好的装饰，亦即装饰之美”。^{[8](P246-247)}我国甲骨文里“美”字的来历，与普列汉诺夫考察原始人关于美的概念的产生过程，有惊人的一致性：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有力的人”。^{[10](P135-314)}时间一长，这些起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戴的东西便渐渐引起审美的感觉，演变为装饰品了。这不正好说明人类艺术的起源和美感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吗？而到目前为止，本质主义思想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也就是执着于探讨文学艺术的共同性本质吗？如果世上确实存在着共同性本质，或者说人们确实可以从现象中概括出共同性本质，那么，大大方方地进行探讨又有何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思路也确实存在问题就刻意回避或一概否定。所以，企图追求并运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来规定人类文学艺术的特性及发展，肯定行不通，但是，如果通过反本质主义来反对本质主义的话，恐怕也行不通。我非常赞同杜书瀛先生的意见：要本质、要普遍，但是不要主义；要规律，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11](P239)}

以上皆为文艺学的学科生机或生机的重要因素，而这生机主要指产生文艺学的土壤：文学经典。

文艺学作为我国的一门学科，在被体制化之初直接承袭于苏联，随后就一直在通过吸收西方经典文论的养分得到成长。综观我们自己编纂的或者直接翻译过来的任何一本西方文论史，像康德那样较少涉及艺术、主要只谈纯理论的大家，非常之少！大多数经典文论，都是以文学经典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古希腊悲剧，黑格尔的《美学》与古希腊戏剧，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莱辛的《汉堡剧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弗莱的《批评的解剖》，等等，不一而足。要想穷尽的话，那将是一份十分可观的目录清单。尤其是，作为文论基础的马列文论，几乎全是在对具体作品的批评中产生的。现在，我们自己的文论著作，也可以开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了，其中的理论色彩，显然要比西方的浓厚得多；以分析作品为基础的，又比西方的少得多。既然这门学科的现代形态是从学习西方开始的，那就应该从基础的东西学起：通过精细研读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从中概括、提炼出一些虽不是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确实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结论，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总结经验，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依据。康德的东西，可以说是极高层次、甚至迄今最高层次的理论形态。没有长期而扎实深厚的积累，一上来就学康德的路数，只能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看看那些除了作品什么都包括、什么都涉及的文论著作或文章，再对比一下康德的东西，欲速则不达的结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那是先有了理论框架，再去用文学的材料予以填充而已。比如黑格尔，艺术史只不过是用来自证明“绝对理念”显现过程的材料。这又涉及到学术研究的思维过程问题，尤其是材料与观点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另文细谈。就文艺学而言，借鉴史学研究的思路，还是应当论从史出吧。

至于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国古代文艺学的典型形态就是诗文评。^[10]我们可以随手列出一个单子来：《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诗式》、《闲情偶寄》、《原诗》，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诗话、词话、点评等等之类，这些经典文论著作或文章都是以研读作品为基础的。说起来，也许这些诗文评的理论色彩远不及今天的文论著作和文章，但是也从来没有听谁说过它们的价值远不及今天的文论著作和文章。通过从古代文论宝库里吸收珍贵营养来发展今天的文艺学，这种呼吁倒是不绝于耳。文艺学是研究文学艺术的，研读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当为必备功课。古今中外的经典文论著作和文章，大多产生于对作品的精细分析。反躬自问，我们的文艺学对这一基本功课是不是有点忽略？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思潮的解构力量，同样已经作用于人们关于经典的认识。对经典的注重与讨论，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一。张荣翼的文章指出，在当代，传统的经典机制已经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文学评奖制、文学演进中的潮流化趋势和视觉文化的崛起，张荣翼称之为“后文学经典机制”。^[11]黄浩的文章提出了“经典文学”或“文学经典主义”的概念。他对经典文学的界定非常有个性：“文学经典能不能产生，……取决于人们是否把文学文本当作经典来阅读”；经典文学时代都发生在人类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时期，那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被当作经典，不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具有很高的鉴赏力，而是因为那时的文学资源匮乏，“人们除了把文学文本当作经典来阅读之外，别无其他可能”。^[12]

由文学史常识可知：经典的形成过程非常漫长且情况千差万别。比如《西游记》，成书过程就经过了历史故事、佛教文学和民间传说、平话、戏曲和长篇小说等五个阶段，从“西游记”故事的产生、流传和演变，到吴承恩最后加工成书，期间长达900余年。据说，《红与黑》出版之后几乎无人问津，直到司汤达去世之后，才逐渐得到世人的重视。总之，对经典的认定，常常是当代人难以完成的工作。

就对经典的认识而言，本文认同童庆炳和刘象愚的看法。童先生认为，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至少包括六大要素：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发现人”。^[13]刘先生的文章指出，经典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可读性等内在特征；同时，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大师的肯定、教育机构的传授以及读者的阅读与判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典不可能消失，它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构成因素。^[14]

文艺学重视经典，其实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任务：既要仔细研读历代流传下来、已经得到公认的经典，更要在重读过程中重新组合经典名单。能够成功做翻案文章的，必定是大师或成为大师。比如建国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成功，就是一个极好的范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不可因为经典的鉴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成功，就放弃对当代经典作品的挑选与推荐。即便出错的几率非常高，文学史上推荐同时代经典的这个传统也不能在当代中断。现在，学界对建国后文学史上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堪称当代文学经典，已达成一定共识。对新时期以来具有极高经典性作品的认定，比如《班主任》之类，也正在进行之中。这项工作的阅读量之大，是不可预知的。据统计，近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上千部之多。

当代人挑选与推荐当代经典作品，视野不能局限于文学领域，还必须意识到：我们确实已经身处印刷时代与电信时代并存的社会。因此，除了重视印刷文本之外，一定要高度关注重视图像文本，高度重视承担图像展示重任的表演（身体）语言文本。像《亮剑》中李云龙的扮演者李幼斌、《暗算》中黄依依的扮演者陈澍，他们的身体语言文本，应该进入研究范围。尤其是陈澍，她对角色的演绎，的确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让她扮演林黛玉，能与她竞争的对手肯定多多；然而，如果让她扮演安娜·卡列尼娜，估计一时少有人可敌。对于像《狼图腾》（姜戎）和《悲悯大地》（范稳）这样一类优秀长篇小说，以后结合图像文本进行综合研究，阐释空间可能会更大些，阐释效果可能会更好些。其中的蕴涵对文艺学的支撑也可能更有力些。

从目前情况来看，文艺学在应对诸多挑战时，已经隐隐约约显示出一种分野的趋势：以注重经典为基础的文艺学，大致被看作传统文艺学或经典文艺学；同时，顺应文化研究与反本质主义思路，将目光转向其他学科，转向历史上和现实中被忽视的非经典文学现象，转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审美现象乃至民间习俗等等之类的文艺学，大致被视为非经典文艺学或非经典诗学。这种分野的发展状态和效果，现在难以预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胡适当年的《白话文学史》，如今已是规范的、评述经典文学的经典文学史，现在支撑非经典文艺学的非经典文学现象，以后未必不会成为经典文学现象。分野不会、也没法造成两者的截然分离或分割。当代著名摇滚歌手崔健的歌词《一无所有》等，已经进入学者圈定的经典名单，^{[15] (P47-49, P326-328)}这就足以说明问题。古人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即包含一代有一代之经典的意蕴。在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学经典的支撑下，文艺学的发展永葆生机。

[参考文献]

- [1] 杜书瀛. 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 [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 [2] 阿瑟·丹托. 艺术的终结 [M]. 欧阳英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3] J. 希利斯·米勒.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J]. 文学评论，2001, (1).
- [4] 罗宾·乔治·科林伍德. 艺术原理 [M]. 王至元、陈华中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5] 陶东风.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学的学科反思 [J]. 浙江社会科学，2002, (1);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 [J]. 文艺研究，2004, (1).
- [6] 汤一介.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 [C]. 杨河、邓安庆.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7] 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8] 陈炜湛. 古文字趣谈 [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9] 普列汉诺夫. 没有地址的信 [C].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0] 彭玉平，吴承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J]. 中国社会科学，1997, (5).
- [11] 张荣翼. 文学经典机制的失落和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3).
- [12] 黄浩，张春城. 文学经典主义批判——兼答盖生先生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5, 第45卷第3期.
- [13] 童庆炳. 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5).
- [14] 刘象愚. 经典的解构与重建 [J]. 中国比较文学，2006, (2).
- [15] 谢冕，钱理群主编.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第7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陈思和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术动态

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综述

张荣芳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中山市政协港澳台侨和文史工委协办，广东省香山文化研究基地、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岭南与香山文化研究所、中山市香山文化研究会承办的“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于2007年9月13至15日在中山市召开。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40多篇，其内容集中在下面四个专题。

一、关于“海洋文化学”的学科建设

海洋文化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课题，对人类海洋建设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指导意义。海洋文化学在国内尚属一门新兴学科。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比较早地提出在我国建立“海洋文化学”的学科设想并展开研讨。早在1995年召开的第一次（珠海）海洋文化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提出了建立“海洋文化学”的创议，并对“海洋文化学”的学科对象、基本概念、文化特质、基础学科分类各抒见解。此后，“海洋文化学”课题成为历次研讨会上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次研讨会有8篇论文集中论述了这个主题。

不少专家共同指出要确立海洋文化学在我国文化研究中的学科地位，使学科本身的研究具有目标性，使我国海洋文化的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并逐渐扩大海洋文化在我国文化领域的影响，从而增强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在海洋文化的基本概念上，一些学者认为，构成海洋文化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人”和“海”。海洋文化是人海互动及其产物的结果，是人类文化中具有涉海性的部分，是人的本质力量发生在海洋这一特殊对象上的主体自觉活动的产物和结果。一些学者不同意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来表述“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异，认为海洋文化依托于陆地文化，也回归于陆地文化，两者具有互相依存的关系，它们之间并不涉及“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区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沿海城市能得到飞速发展，主要是托政策之赐，而非只是由于其处于沿海的地理位置。值得肯定的是，在一些专家的论文中，鲜明提出了“海洋文化产业”的概念，认为“海洋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涉海文化产品和提供涉海文化服务的行业”，并初步规定了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内容，其中包括滨海旅游、休闲体育、海洋渔业、节庆会展和商业化运行、服务等各大门类。“海洋文化产业”使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发扬光大，有了用武之地。此外，我国海洋文化史专家、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宋正海先生对我省的海洋文化研究十分关注，他提交的论文《长达千年的潮论之争》，对世界科学史上罕见的我国古代对潮汐的认识作了全面介绍和提出了自己的灼见。

二、岭南地区海洋文化研究

本次研讨会的突出成果之一是对岭南地区的海洋研究，许多作者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岭南地区海洋文化的光辉历史和显著特色。有学者提出了海洋文化是岭南文化的特质的观点，指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体，由于岭南是中国海上交通的发祥地，中国由海路走向世界的前沿，成为中西

作者简介 张荣芳，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文化的交汇地，因之，海洋文化成为了岭南文化引领时代潮流的重要基因。

在岭南地区海贸、海交史的研究上，专家们较集中在海上丝路的研究。一些学者指出，2000 年前盛世雄风的汉帝国，其时中华文化已形成有完整的海洋观，尽管其海洋观尚属于农业民族海洋观，而非西方商业民族海洋观，但畅达繁忙的海上贸易，使汉帝国通过岭南地区而被纳入当时的“世界体系”。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汉魏时期是南粤地区“海洋文化”形成与初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南粤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南粤地区的地域开发与经济文化发展，由于积极的海外贸易活动，该时期岭南出现了大量繁荣的商业性港口城市，如番禺、徐闻、合浦，以及南朝以后以广州为中心的大批郡县的设立。岭南地区的海上活动，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要途径，构筑了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地位。其时海上对外贸易已遍及东南亚，直至南亚次大陆地区，其杰出的成果，即是世所认可的“佛教最早由海路传入中国”的史实。不少作者建议，今后在研究中外关系史上，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岭南地区。

在岭南地区与南洋地区的海上交往中，有作者著文指出我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对外文化交流，均以岭南为主要枢纽。作为岭南近邻的南洋地区，是中国的船舰前往西洋都须经过的地区，由于我国历代奉行睦邻政策，更兼海路一贯畅通，岭南与南洋地区长时期保持了修好和睦、友好往来的关系，在经济、文化上达到了共同的进步和繁荣。

南海神与天妃是中国沿海最大的两位海神，有作者通过对两者信仰发展的不同历程，揭示其在海洋文化上不同的历史功能。

以往，东洋方面的研究，可谓是我国海交史研究的薄弱面。省社科院的专家在日本学术访问期间搜索了大量资料，查阅到清初至中期广东商船赴日本贸易的资料。这些资料内容具体、细致，史料价值高，从而填补了我国及南粤东洋海贸的缺失和空白，这无疑是广东学者做出的贡献。

阳江发现的“南海一号”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阳江“南海一号”沉船的打捞，以及国家级的丝路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我省水下考古的长足发展与取得的初步成果。本次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探究水下沉船、海港遗址、海洋聚落等人类活动遗物遗迹，开辟了考古学的全新领域，对推动学术研究和促进海洋经济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关于广东海洋文化的现实与应用研究

目前海洋经济已成为沿海地区经济的新增长点，广东省的海洋经济发展占居全国沿海省区的榜首。研讨会上不少作者在海洋文化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实，注重应用研究，对广东诸沿海地区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中山市的作者着重介绍了中山市发展蓝色产业带的路向及新思维，主要是：1. 制定开发海洋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兴海”政策，以利于海洋产业合理调整和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转移；2. 协调经济、资源、环境的三者共存发展；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中山市规划的“蓝色宏图”，正有效地推动着中山市的经济建设，对其他沿海地区亦有示范意义。

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海洋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有作者著文提出四点对策：1. 健全和完善海洋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2. 大力开展普法教育，牢固树立现代海洋文明理念；3. 强化海洋司法，完善海洋环境侵权的法律救济；4. 强化对执政者的再监督。从而真正做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海，依法兴海，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人们对海洋不合理的“取予截夺”（取其资源，予其污染废弃物，夺其湿地资源，截其淡水资源），有学者以“和谐海洋”的观点，论证了“取”和“予”的关系。指出只有树立正确的“取予观”，才能繁荣海洋事业，走可持续发展的海洋道路。“取予观”值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管理借鉴。

四、香山文化与海洋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香山文化与海洋”，专门研究香山地域海洋文化的文章达 9 篇。专家们从各个角度，对此命题作了很好的阐述。

地处珠江入海口的香山，包括了中山、珠海、澳门三地，香山文化一脉传承使三地在文化上共同繁衍。得地缘优势，香山人在获得渔盐之利的同时，学会了围海造田和中外贸易，形成了海洋经济和农耕经济、商贸经济并重的经济社会格局，实现了本土文化与西洋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具有包容性、多元性、开放性、重商性、冒险性、创新性、外向性、交融性的香山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的代表，也直接丰富了中国海洋文化。一些专家通过研究，认为“海洋性”是香山文化的主色调，香山文化极富岭南海洋性特点，海洋文化是香山文化的起点、核心，香山文化藉发展之势，毗邻省港澳之利，得以开风气之先，引领潮流，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典范，为近代中国乃至世界所注目。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郑观应开维新风气之先，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旗帜引领中国近代化潮流，刘师复开中国无政府主义先河，杨匏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在商业文化方面，香山买办是中国洋务工业、民族工业的翘楚，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等执近代工商业巨贾之牛耳，香山的四大百货奠定了中国近代商业。在华侨文化方面，香山华侨对中国近代工业起步，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推动与支持，建立了丰功伟绩。香山在教育、科技、艺术、出版等业界名人荟萃，业绩卓著，香山文化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中国文化、海洋文化的典范。

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专家，应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学派理论，分析了零丁洋海域及其范围的扩大，零丁洋海域处于正常贸易与走私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的特殊地位，随着广东社会经济与中外贸易的发展不断向海洋推进。

香山商业文化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香山文化中最具活力的要素，有学者归纳了香山人的企业思想与成功之道：一是香山人创办企业具有海纳百川的商业文化思想，其典型实例是其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开创了中国的百货商业；二是香山工商业群体积极开拓进取，形成了勇于竞争，自强自尊，敢于冒险，敬业爱业的优良品质以及“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的“商战”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商业文化焕发了强大的生机，顺利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商业文化的转变，有专家剖析了香山商业文化的现代传承途径，指出香山商业文化的创新性利用，使之做出了更大贡献。

总而言之，本次研讨会在海洋文化学术研究上呈现了一批新的成果，彰显了本次研讨会的特点：即学术立论深邃，内容丰富，视野宽阔，研讨课题的现实性、应用性以及针对性十分显著，有些论文的现实指导性强。本次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将会对广东省的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我国海洋文化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杨向艳

Main Abstracts

Cross-cultural Critiqu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Philosophy: a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Researching the Late Michel Foucault

He Fabi 5

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ies on late Foucault within the realm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written in Chinese language. Facing the question how a critical and trans-cultural philosophy of cultivation can be possible, the author tries to delimitate the usage of trans-cultural critique by an analysis of late Foucault's two-dimensional notion of critique, with archeology as the first dimension and genealogy as the second. The discussion in archeological direction focuse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parative and trans-cultural philosophies. While the discussion of genealogy is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of transcending the comparative logic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ethnocentric tendency connected with it. A further question is that whether those important languages of continental European philosophy like French and German provide the necessary historical conditions to embark on this kind of critical and trans-cultural philosophy. The contrast with some aspects of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written in Chinese is introduced to explain the impact questions.

The New Period of China's Transition: Another Turning Point in the Sustainable Reform and Open Up
Yan Pengfei and Gan Hongming 14

Since 1950s, cooperation, peace, development, reform, adjustment and transition have becom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e world. China i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ith a dual characteristic, which requires u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market, government, reform and open-up in the dimensions of 'what, how, for whom and on whom'.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at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concerning the new ideas of sustainable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new mechanisms and mod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 striding over the 4 turning points, a sustainabl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ll start.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Li Zonggui 21

The debates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in the past century have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imes development, which is helpful to rejuvenates China and realize modernity. In its modern sense, it generally refers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ts heated discussion in the last 20 years represen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span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 and concerns both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The debates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are essentially on how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and what kind of modernization to pursue in China.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is neutral as a concept, but people usually impose various values on it in study and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times spirit is reflected to some extent in the debates,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several stages: the debate on its concept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bout 1900-1915), that on its value involved in another vast debate o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bout 1915-1927), that on modernization (in 1930x), that on the way out for Chinese culture (1930s to 1940s), and an intense discussion underlying a cultural craze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It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with a clear track of thought and some obvious features of the times, i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times spirit.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reflects the times spirit, while the latter offers some impetus to and guides the former. The recent hotly discussion reflects a spirit of innovation characterized the age, develops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displays Chinese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ir national culture. However, th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 can neither be used as a cure-all medicine nor be treated as a replacement of the new cultural construction. Today's spirit of innovation should direct the study instead. It is irrational to reject or accept the learning blindly.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ransitional Economics 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Zhou Bing 53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itional economic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hina'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explore the cause and process of transition, included the power, mode and mechanisms of promoting the economy.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is caused by both the social and rational construct and the spontaneous evolution. Transition is essentially driven by the interests of right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s objective function and knowledge to establish a governmental bound by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smooth transition appears as a series of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for an alternative, which is an institutional chang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adaptation, providing them impetus, changing in structure and guarantee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The Economical Change and Order Genera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Zhang Lei 61

The social order after the formation of law is a dual social order,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based on different social economic foundations, a single economic mode and a dual order under the dual economic mode.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y is a single economic mode of agriculture, in which many contradictions of interest can be resolved by customs instead of law, and this preference seems to be more advantageous for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stability.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ety didn't start from economic change, but from politics that caused a developmental state, in which multiple elements simultaneously exist in Chinese postmodern society.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conomy led to a special type of social order. In a view of social rul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modern law should assume the task of governing social order together.

On the Models of Surviving the Poor Population in Chinese Cities

Yang Fang 96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urban poverty is helpful for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lization of social fa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roblem of urban poverty must be resolved in every possible way. Material assistance is a basic and necessary means. Opportunity supply is the permanent and fundamental solution. Humanistic care is the essential embody of humanity. It can help get rid of poverty from spirit.

Six Essays Reflected the Post-modernist Trend and the Historiography History

Postmodernism is much more acute than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that is more speculative and systemic. But it pierces the weakness of scientific reason that has flourished without competitor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time. A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imposed by postmodernism,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ch has boasted their scientific reason, has to turn back to defend their defectiveness. At the same time, academic studies has got a sublime. For the sak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absorb the beneficially theoretical elements of the postmodernists with respect, introspect our study with awareness of these problems. The study of postmodernist questions has got to some deep extent in many subjects. However, historiography that has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historical theory and has been attacked most seriously by the postmodernism, has not yet responded to it systematically. The essays are arranged together here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from domestic historiography researchers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

Literary Education and Generation of Opera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o Yingde 123

Stories about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enlightening textbooks provided rich and convenient materials with ethical connotations and most serious rhyming texts which influenced the language of classical drama narrative. The structural modes and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eight-part essay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al drama narrative. By the particular literary education, the drama autho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ot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thinking way and expression means, all which became a kind of catalyst for the generation of classical drama literature.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 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b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_____ 单位全称：_____

地址：_____ 邮政编码：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_____ 手机：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箱：_____

1. 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_____

2. 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_____

3. 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文章质量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学术价值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创新性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4. 您认为本期《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校对水平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版式设计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印刷质量	<input type="checkbox"/> 1/很差	<input type="checkbox"/> 2/较差	<input type="checkbox"/> 3/一般	<input type="checkbox"/> 4/较好	<input type="checkbox"/> 5/很好

5. 您认为今后《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6. 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8年3月

荔枝湾位于今天广州市荔湾湖公园一带，唐代由珠江冲积成陆地，地势低平，多池塘洼地。南汉时广种荔枝，因而称“荔枝湾”。这里既有南汉经营昌华苑、芳华苑、华林园等王家园林的芳踪，荔红时节的“红云宴”曾是一时之盛，又有元代的御果园，曾有800多棵柠檬树的芳华。由河涌纵横、百舸云集、游人如织构图的“荔湾渔唱”成为明代一祯羊城八景的旧图。清代富商潘仕成的海山仙馆、黄景棠的小画舫斋等分列两岸，更平添几分韵致。这一带存留了老广州对十里荷香、千株荔枝的许多记忆，成就了无数人“一枕舢舨游河”的消暑凉梦。

《羊城竹枝词》里

▼ 旧时荔枝湾的游艇。

“泮塘夏日荔初红，万树虬珠映水浓。消受绿天亭一角，乱蝉声扬藕花风”的诗句描绘了旧时荔枝湾的水乡风情，

艇仔粥、游河、品荔则是荔湾旧事留下来的片段。抗战后，河涌淤积，“荔枝湾”日渐衰败。1958年在此开挖修建了荔湾湖公园，仍以湖光水色取胜。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蒋志华供稿）



▲ 海山仙馆的湖上凉亭。



▲ 20世纪30年代的荔枝湾，游艇如织。



▲ 1953年的荔枝湾风情。



Academic Research



刘穗艳 奇异果

画家小传：

刘穗艳 1962 年生于广州。1985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2003 年结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同等学历研究生。2006 年结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同等学历研究生。现为广东文艺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副主任，广东青年画院画家，广东省青年美协常务副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广东书画协会副会长，亚细亚美术协会会员。作品曾获亚细亚现代艺术展优秀奖，并先后入选“广东省美展”，“海峡两岸首届教育界书画联展”，“2006 广州美术大展”，“全国高等院校美术作品展”等展览。



刊物名称：《学术研究》
出版单位：学术研究杂志社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管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叶金宝
地址：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510050 电话：020-83846163
出版日期：2008年3月20日
装帧设计：明镜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010349
印刷：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期刊基本参数：CN44-1670/D·1958·H· 大16开·32页· P· ¥8.00·3200·24·2008-03

网址：www.gdskj.com.cn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全国各处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46-64
国外代号：M268（北京389信箱）
刊号：ISSN1000-7326
CN44-1670